西藏政治史

孜本夏格巴·汪秋德丹 著
李 有 义 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
历史研究室 藏族史组印

一九七八年十月

西藏政治史

孜本夏格巴·汪秋德丹 著
李有义 译

一九七八年十月

Tsepon W. D. Shakab pa

(རྩིས་དཔོན་ཞྭ་སྒབ་པ་དབང་ཕྱུག་བདེ་ལྡན),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369)

目　　录

前　言

孜本夏格巴1907年1月11日生于拉萨。二十三岁时担任了政府官员，九年以后当了财政部的首脑（译者按：这里所说财政部就是指"孜康"。）同时成为国民大会八大发言人之一（译者按：所谓八大发言人系指"译仓"的四个僧官和"孜康"的四个俗官）。除了他在政府中的广泛经历之外，他还出国旅行过。1948年他是西藏商务代表团的团长，走遍了世界。

1951年，在中国共产党占领西藏以后，夏格巴先生就住在印度，他在那里就开始研究西藏的政治史。近年来发表了一些关于西藏的书。大部分是关于宗教和现代事务。夏格巴先生的研究，比较来看是对西藏从古到今历史的平衡的呈述。

在写这本书时，夏格巴先生引用了五十七种西藏原始材料。有些是难见的西藏政府档案；另一些是　为英文作品所常引用的。应当注意在脚注里引用西藏资料时都未注页数。这虽然是违反西方习惯的，但在西藏历史中却是传统习惯。开始叙述关于最早的西藏历史，只提到了书名——作者的，假定是一位有学问的人定能找到出处。只是在工作了一段之后，夏格巴先生才了解到西方的方法，这就是引书要注明页数，这样这部书里就既有西藏传统，也有西方的方法。要让他把前段的引文的页数都注明虽然不是不可能也是十分困难的。（译者按，这有什么困难，他不肯注出处只证明他是想故意捏造和歪曲）因为有些是西藏的档案已经找不到了。另外能读藏文的人也不难找到这些引文的出处，那些不想知道的你注明页数也无用。

为了一般读者的方便，夏格巴先生把西藏名称都音译过来，为了避免拼法不一致和发音的混乱，他还对每个词注出了正规藏文拼法。这对那些想认真钻研西藏历史的人提供了方便。关于藏语结构的谱写法，

维利 T. Wylie在"谱写藏语的标准系统"一文中曾加以叙述，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2期（1959年12月）261—267页。

夏格巴先生的书对我们了解西藏是个独一无二的贡献，因为这标志着一个西藏的高级俗官自已写他国家的政治历史。他对西藏独一无二的宗教政府的演化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因素。此外他提出了新的有趣的证据，可以帮助我们澄清西藏在现代的政治地位。

我是1960年在印度第一次遇到孜本夏格巴的，当时我们详细地讨论了西藏的政治史，以后我对他的努力继续发生兴趣，因此我是以愉快的心情为这本书写前言，这是夏格巴先生多年研究的成果。

T. 威利 Wylie

华盛顿大学

西藏语和文明付教授

序　　言

1931年我被我叔叔诺尔布·旺介·池门召到他家里。他当时任首席噶伦。他对我详述了中国对西藏的战争，若干年前中国人如何被赶走了等。他也进一步让我知道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它是由英、藏、中三方的全权代表签订的，他当时是西藏全权代表伦勤夏扎的助手。我舅舅把条约的草案交给我并附有传统的哈达，他说："你研究了这些文件以后写本西藏政治史，将会对西藏有帮助。当时我年纪还小,没有能充分理解他的劝告和这些文件的意义。

1946年我和我的家属第一次到印度去朝拜，亲眼看到了印度人民要求独立的广泛运动。在孟买时我听到尼赫鲁和巴特尔 S.V.Patel 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这些讲话使我认识到独立的真实意义。从那时起我才开始重视我舅舅给我的那些文件。在我回到拉萨后我迫使有关的官员保障西藏的独立和外国发展外交关系。

1947年末西藏政府委派我担任五人商务代表团的头头。我们奉命去访问世界各大国，讨论商务和政治事务。在印度时我们曾受到已故甘地的接见，会到这位伟人，他以非暴力方式领导印度的独立运动，并听了他的劝告，对我们是一次真实的鼓午。在我们所访问的所有国家里，我和代表团的其它成员都努力增加人们对西藏的了解。在这次和其它出使的机会使我感觉到世界上需要关于西藏历史和政治地位的知识。

当1950年共产党中国人侵入东部西藏后，政府官员陪伴达赖喇嘛到了亚东，靠近印度锡金边境。当1951年西藏和中国在北京签订了一个协议时，我就越界到了印度，我不愿回到拉萨被迫与红色中国人合作。

在印度我就开始这本书，我知道在英文里并没有一本关于西藏的广泛而准确的政治历史著作。于是我从西藏找到大量古代文件，我的好朋友锡金的邓沙巴 T.D.Densapa （译者按，即锡金王室的大喇嘛，有时也可指锡金王），我利用我舅舅给我的文件为背景开始了广泛的研究，当1956年达赖喇嘛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诞生二千五百年纪念大会时，他鼓励我完成这本书。

1959年西藏反叛以后，达赖喇嘛和成千上万的难民逃离故乡，我被委任为达赖的代表，任务是负责救济和安置约八万在印度、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的西藏难民。1959年嘉乐顿珠（译者按，他是达赖的二哥）和我在爱尔兰和马来亚的支持下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了"西藏问题"。由于这些事务，我没有时间来写我的书。到1963年5月15日我最后放下了我官方任务来专门完成这本书。

首先我必须对"亚洲基金"（ Asia Foundation ）表示深切感谢，是在它的资助下我才能到达美国，没有他们的帮助出版这本书也将会是遥遥无期的。我还得对耶鲁大学印刷厂的职工表示感谢。他们对我进行了耐心的帮助，还有耶鲁大学图书馆的职工，他们那里搜集了极广泛的关于西藏的材料。

我同样也感谢我儿子们和罗斯金帮德 Ru, Kin Bond ，他们把我的手稿译成英语。我愿表示我对华盛顿大学（西雅图）的威利教授的欣赏，他帮我编辑我的稿子并提出一些建议。最后我得提到我的妻子白马永登，是在她的不懈的鼓励下使我完成这部书的。

孜本夏格巴

一、概　　况

西藏一名称的起源。

根据早期西藏学者的著作，“博”Bod 一词代表西藏，是从本教出现以前“布甲”Pugyal一词来的。（见《青史》）另一些人说“博”这一词是从本教的本Bon来的。本教是在七世纪佛教传入以前西藏早期的宗教。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博”一词口语的意思是“逃跑，”因为印度的头目如巴底Rupati 和他的从者在与班达瓦人 Pandavas 作战时逃来西藏。（见《青史》也有人说“博”一词并没有特定的意义，只是一种称呼而已。藏印边境的居民称西藏人为布提亚人Bhotias 这一词是从梵文中的西藏名称 Bhota 而来的。

现代为全世界所知的名称“Tibet ”一词，是从蒙古语“图伯特”Thubet 和汉语“吐蕃”以及泰语“ Thibet ”，阿拉伯语“ Tubbat ”来的。这些名称都见于早期著作。在西藏古代的诗歌里，西藏被称为‘喀瓦金’Kha-Wa-Cen ཁ་བ་ཅན། 或康郡 Gangjong ，意为雪国，还有悉当郡 Sildanjong 意为清凉国。

地理位置

西藏很久以来被认为是一个被雪山封锁的禁地，一般人对它准确方位并不清楚。大致说来它位于中国的西部，印度和尼泊尔的北部，波斯的东部，俄国和蒙古的南部。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地方，在它和尼泊尔边境上有额非尔士峰（即珠穆朗玛峰。译者注）锡金与西藏之间有金城章嘉峰，在不丹与西藏之间有卓木拉日峰，这座山在1937年被恰普曼S.Chapman 首次登上，他下山时迷了路，结果出现在不丹。其它一些大山，诸如凯拉斯山（即冈底斯山主峰，藏名为康任

波其’，在阿里地区。译者注），这座山不论佛教徒和印度教徒都视为神山；查日山、雅拉珊波山，卓目喀拉山，岗噶沙美山，念青唐拉山，马钦本若山（阿尼马卿山）像宝石似的点缀在西藏高原上。

东部的打箭炉，有一架铁索桥划分汉藏。在东北部噶曲（这是甘肃河州古地名，今为甘南临夏地区。译者注）边境有一个白塔叫作‘曲登噶波’标明了藏族地区的界限。

西藏的南部边界是喜马拉雅山；西部边界是喀喇昆仑山，北部是阿尔泰山与中国土耳其斯坦分界（这是帝国主义对我国新疆的称谓，夏格巴使用了这一名称，译者注）。

西藏有三个主要地区，称为“曲喀松” Chol-Kha-Sum 从西藏西部的阿里三围到索拉桥 Soklakyao 这一地区称为卫藏 Ü - Tsang，从索拉桥到玛曲河（黄河上游湾曲处称为多堆 Dotod 即康）从玛曲湾到曲登噶波称为多美 Domed （安多）。藏民说最好的宗教来自卫藏，最好的人来自康，最好的马来自安多。西藏的古代区划称为“尺古尔久松”，“尺古尔”意为万户。“久松”意为十三（这是指元代在西藏建立的十三万户，并不是西藏自已的划分。译者注），这些区分都已不再使用了。

河流与湖泊。

四条河都有形象名称是从西部凯拉斯山附近发源的。僧格卡巴（意为出自狮口）流经喀什米尔进入巴基斯坦称为印度河；拉清卡巴（意为出自象口）向南流，进入西部印度称为萨特里日河；麻恰卡巴（意为出自孔雀口）成为神圣的恒河（流过干杲其 gangotri 被认为印度教的圣河）；达曲卡巴（意为出自马口）向东流在拉萨以南和吉曲河会合，流经阿萨姆、孟加拉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 Bramaputra.

一条叫作俄曲 Ngochu 的河从西藏中部发源流经多堆（康）进入缅甸称为萨尔温江。从北部西藏有两条河：昂曲 Ngomchu 和杂曲 Zachu 穿过东部西藏汇合为一流入老挝泰国称为湄公河。哲曲河穿过康区进入中国称为扬子江。玛曲河发源于东部西藏的马敦若穿过安多，成为中国的黄河。

在西藏最大的湖是玛法木湖（莫那萨洛瓦湖）在西部，它也是不论佛教徒和印度教徒都是引为神圣的，纳木湖（腾格里诺尔）在西北部，羊卓维错湖在西藏中部，错池宿甲莫 Tso Trishor gyalmo（青海湖）在西藏的东北部。

气候。

在西藏北部，人们生活在一万六千英尺的高地上，在南部最低地区则为海拔四千英尺，大多数居民区是在海拔七千至一万二千英尺之间。拉萨是西藏的首府,海拔为一万一千英尺。在北部没有种植的土地，主要是用以放牧牛羊。一万二千英尺以下的土地则可以种植。

西藏的气候因海拔高度而异。一般说来空气干燥，日射強烈。在高的地区气候较冷也少雨；但在低地则雨量适中，气候温和，例如拉萨最高温度为华氏八十五度，最低为零下三度，最大雨量为十八英寸最小十五英寸。

外部世界的人以为西藏人终年生活在冰雪之中。实际在西藏很少下雪，如果下了则难以融化。在高原上最厚的雪可以达到四英尺，在印度的西姆拉则经常有十英尺的雪。在西藏南部边境平均降雪约为七至八英尺。

农产和植被

西藏的主要农产品是青稞、小麦和黑豌豆。其它产品有玉米、豆类、荞麦、菜籽、麻等。树木有杨柳也有果树如桃、杏、梨、苹果、

核桃等。草莓、葡萄、大黄、蘑菇也大量生长。蔬菜如土豆、白菜、菜花、西红柿、葱、蒜、菠菜、萝卜等较低地区是常见的。在高原则除草以外菜蔬很少。在过去每年收成供应全体居民而有余，剩余粮食可储存二十五至五十年，这是由于气候有利的关系。

玫瑰花、向日葵、紫菀花、夹竹桃、大丽花、石竹花、荷花、金盏花、木堇花、香豌豆花等在西藏也能生长的很好，从英国进口的花籽也长得特别好，野兰和草原野花种类数不清，在海拔较低地区药用植物到处都有。

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种类很多。在不同的地方有老虎、豹子、喜马拉雅黑熊、棕熊、猴子、狐狸、水獭、兔子、野狗、野猪、野羊、鹿、麝子、羚羊、野牛、野驴、野猫、岩蛇、豪猪。

一种土拨鼠是人们猎获的对象，它的皮是很值钱的出口项目。但是白色的土拨鼠迷信的西藏人认为是神圣的，他们认为打死一只就会走恶运。

麝子习惯上在固定的地方饮水并在树皮上蹭痒。猎人们能判断它是否长了大量的麝香，如果长了就在它常去的树边设陷阱。

西藏牧民说在野牛中一百头中有一头公牛。这并不是由于公牛生得少，而是由于母野牛用牙齿阉掉大部分公牛，只让最強壮的公牛长大。未阉的公牛离群活动，在交配季节只选择一头母牛交配。它们是非常凶猛妒忌和易怒的，所以也是为了畜群的安全，只能保持少数公牛。野驴据说也有同样的习惯。

热心的鸟类爱好者可以找到乌鸦、鹰、喜雀、鹦鹉、枭、隼、鸢鹰、黄鸭、野鸡、麻雀、白鹭、啄木鸟、燕子、八哥、杜鹃鸟、布谷鸟、鹳、鸽子、斑鸠和各种水禽。杜鹃、燕子和小鹰夏季在北方，冬

季移到南方。西藏人认为任何一类枭类进入人居都是不吉之兆。鹫鹰是很常见的。把人的屍体切碎喂鹫鹰是西藏常见的葬法。

种族

关于西藏人的族源有两种传说。一种是印度种源论。相传一个高若瓦 Kaurava 国王或将军，名字叫如巴底 Rupati 和他的随从在与班达瓦人的一次大战中失败逃到西藏。很多西藏学者说这些人就是西藏人的祖先。这种说法是根据一位印度班智达写的信，他的名字叫香喀拉巴底 Shankara Pati （ Deje Dakpo ）这是在佛去世一百年以后，在这封信里他叙述了如巴底和他的从者来到西藏。

第二传说是西藏人是从猴子传下来的，是一个观音化身的公猴他和山妖结婚生了六个孩子。这个猴子的变种除没尾巴外和其它猴子一样。逐渐他们的后裔失去了他们的野性。他们继承了父亲性格的，变得非常慈悲、聪明精细和不爱说话。那些承继了母亲性格的变得脸红，喜欢追求罪恶活动，非常固执。

传说这发生在西藏中部的泽当附近。在泽当背后有一座山叫贡波日，当初猴子祖先住过的山洞依然存在。在十一世纪访问西藏的印度班智达阿底峡，曾在大昭寺发现一条石柱，上面刻着一个文件是按照七世纪时松赞干布的传统写的，这个文件提供的证据，是倾向于第一种传说的。近代人类学家认为西藏人属于蒙古种，这种分类是有道理的，因许多世纪以来藏蒙之间就有密切联系，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人比较过西藏人和蒙古人的头颅。卫藏地区的人，一般身材较短，园头，高颧骨一因此与其它两地的藏民稍有区别。多堆（康）多美（安多）的藏人则身材高、长头和长肢体。

人口

在西藏从没有彻底准确地清查过户口，只能作一个大致的估计。在早期法王在七世纪中和中国打仗时，能　动员二十万人，根据藏史《巴协》Ba Salnang　　有一次曾动员了一千四百万人进行战争。不管这些数字准确性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西藏人口几个世纪以来减少了好多。现在对曲卡松（三个藏族地区）人口的估计是六百万。在这个数目中，牧民约占48%，农民与商人约占20%，喇嘛尼姑约占20%（其中18%为喇嘛，　2%为尼姑）。

城市

西藏最大的城市是拉萨，达赖喇嘛西藏政府就在这里。拉萨人口约为三万五千至四万，在藏历新年中举行传昭大会时，各地喇嘛、香客来到拉萨，人口可达七、八万。

第二大城是日喀则，人口约为一万三千至二万，扎什伦布寺就在附近是班禅住持的地方。

第三大城是昌都在西藏东部，那里有一座寺院。过去这里是东部总督（藏名称为多美遂恰　Mdo - Smad　Spyi - khyab
也称昌都噶伦。译者注）的驻地。人口约为九千至一万二千。

江孜在西藏中部是第四大城。有名的巴科曲代寺就在这里。在1904年荣赫鹏远征西藏后，在这里设立了商务代办处。1955年（应为1954，译者注）一次大洪水将商务代办处全体人员冲走。

另外还有许多小城镇，但不值得一提。

运输与交通

每个西藏人，勿论他是商人、喇嘛、官员、军人或香客都是骑骡子骑马或步行。行李一般是由马、骡、驴、牦牛、或羊驮运的。旅行者习惯在行李上挂上小铃铛。牲口项上挂上大铃铛，这可以减少旅途

的寂寞与辛苦。它可用以吓走野兽，也可帮助骡夫找寻自已的牲口。一个驮子不能超过八十磅，一只牲口可以驮两件，这是政府的规定。

在西藏西部羊是最常用的力畜，每只羊能驮十磅盐，一个商人都有百十来只羊，经常是十几个商帮一起走。几个礼拜驮子都不从羊身上卸下来。羊在卧下休息时找寻两块石头间的空隙，使石头承担了重量，羊就可以得到休息。当你看到羊在到处找这种地形时是很可怜的。有时在旅程终了时连皮带驮子一起掉下来。他们在到达尼泊尔或印度边境后连盐巴带羊子一起卖出去。

在过去交通只限驮运时，道路不过是一些崎岖的山道，也缺乏主要桥梁。有些是用牛皮船渡河，每次约装十人，或者用大的木船，一次可渡三十个人和马匹。在西藏东部河水湍急，只能用独木船过渡，一次只渡两三个人。

在东藏有些河流甚至用独木舟也不易渡过，在那些地区，人们巧妙地使用溜筩 。由于都是峡谷，人们在两岸用粗藤（有的用竹索，译者注）以六十度的倾斜牵引到对岸。旅客把自已绑在溜筩上，溜筩挂在藤条上一滑就溜到对岸去了。回来时用另一条相反倾斜的溜索。地方居民对这种渡河法是非常熟练的。如有大批人马等候过渡时往往需要好几天才能渡完。他们在两岸搭起帐房，不仅人员连骡马驮子也用同一方法过渡。方法都是把它们吊在溜筩上滑过去。

在十五世纪时有一位遊方艺人叫做汤东结布，他到处行乞为别人做好事，他在卫藏地区修建了五十三座铁索桥。他成年累月搜集废铁然后请铁匠打成链条建成铁索桥，这种桥对早期旅行者是十分有用的。有一些至今仍然在使用。牲畜完全不能使这种桥。

直到１９５６年西藏维持着一种驿传制，是由人步跑接力传递的，一个人一次跑四英里半，然后交给下一个人。这条驿传是在拉萨与印

度之间，穿过锡金，在西藏内部也和其它几个市镇维持着这种交通。在拉萨与印度之间还有一条电话线，但是在西藏内部则没有这些便利。西藏的军事和政府公文是用驿马传递，紧急情况则把公文绑在箭上，对这种带箭的公文都立即传递，不敢怠慢。

1930年英国商务代办在江孜与帕里间修了一条吉普车道，但只使用了几星期，因为当地人反对它，说是会抢掉他们驮运的饭碗。十三世达赖喇嘛曾试行把机动车辆介绍到西藏，1928年在试验的基础上弄了几部汽车在拉萨街上行驶。由于印度与拉萨之间并没有公路，汽车只能拆卸开运到拉萨。

1945年以后，西藏政府在重要地区如昌都、黑河和噶大克都设了无线电站。1951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筑了几条公路、桥梁和机场，为得便利占领西藏的军事调动。

商务与经济

早先在西藏一定出产过大量的黄金。当西藏人虔诚地把佛教吸收到西藏来时，他们向印度的寺院和班智达们贡献了大量的纯金，他们购买东西也是用黄金支付的。

到后来，主要出口物资是羊毛、牦牛尾，主要出口到美国，作圣诞老人的胡子（这是不完全对的，大部分是卖到印度市场上当蝇拂，译者注）硼砂和盐。次要物资包括各种皮毛、麝香、藏香和许多种药材，其中有熊胆、鹿茸。此外马匹、羊、毛驴、骡子、山羊等每年都向印度、尼泊尔和中国出口。

从印度的进口有毛料、布匹、次丝织品、棉花、毛线、煤油、玻璃、各种小机器、铜和铁以及大米干果和药品，从中国进口砖茶、瓷器、珐琅器和哈达；尼泊尔则供应铜器和大米。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占领以前，饥饿是不存在的，由于有粮食的储存，捐税都是以实物

缴纳的。多余的食品，特别是粮食都存在政府粮仓里。据估计存粮够人民三年的食用。除了大米、茶叶和一些干果糖食外，西藏是完全能够自给的。

西藏政府自已没有银行，它也不管制外币兑换，对进出口都没有限制，因此外币市场是随着贸易而波动的。市场是由供求节制的。西藏内部贸易很大程度受天气的影响。例如青海商帮，他们主要来拉萨贩卖骡马，必须在四月出发，为的是沿途牲口可以有草吃。他们在八月到达拉萨，次年二月返回青海，他们赶着牦牛驮着他们办的货，牦牛也就给他们在路上提供肉食。西藏旅行者都是成群结队带着武器，以防土匪，法律并不禁止带枪。

币制

很早以前西藏是以物易物，用青稞可以买到牲口或衣裳。时至今日，在偏僻地区仍然有物物交易的。甚至处罚也用粮食缴纳。后来银子开始使用，开始按分量计算，到分量标准化以后——十分等于一钱，十钱等于一两，五十两等于一品。于是产生了一种货币，用银块代替钱币。

1750年后，尼泊尔钱币在西藏流通，一枚尼泊尔"章噶"，等于一钱五分藏银。1792年以后西藏人仿尼泊尔"章噶"的样子制造了自已的'章噶'。上面有西藏的标志。后来不同币值的铜币也由西藏政府铸造发行，上面有狮子的标记，两、钱、和分，成为实际使用的货币。不仅是重量单位了。它相当于印度的'卢比'，'安纳'和'派司'。这种币制一直维持到中国共产党占领。

从1890年起西藏政府发行了纸币。最初纸币的价值是五、十、十五、二十五和五十个章噶。后来这些纸币就称为藏银。发行了票面为五两，十两，二十五两和一百两的票子。接着又发行了五个、十个、

十五个、三十个到一百个‘学岗’（即钱）的银币。还发行了一种值二十两藏银的金币。所有票子和钱币上都有政府标志狮子和发行年代。政府的黄金储备作为纸币的备金。造币和印制钞票是在西藏官员到英属印度考察学习后办起来的。

居住和生活情况

在西藏房屋建筑没有明显的差别，只是样子略有不同，习惯上房屋都是朝南的，尽量利用阳光。建筑材料主要是砖石。双层建筑一般在单层建筑之后。门窗都刷黑边。早先，柴火堆在房顶上以予防小偷。这一习惯存留下来成为一种装饰，屋顶的柴火排列成各种图样。玛呢旗在屋顶上迎风飘扬。

寺店建筑，在相当程度上受了尼泊尔、印度和中国的影响。关于绘画，西藏艺人按佛经传统作画。西藏绘画的三大派是，喀木（康区）的噶玛噶哲 Karma Gondre 、贡噶的堪日 Gongkar khonri 和卫的门通阿日 Menthong Qri of Ü 。绘画和塑像最初是从尼泊尔传入西藏的，这些艺术的发展则来自中国。

牧民用牦牛毛织成结实的帐房。最大的帐房可以容纳一二百人，里面还可以分成间。除了很富裕的牧民，他们很少在一个地方久住。他们一定要在帐房外面插起玛呢旗，在帐房门则烧香。看看他们的玛呢旗杆就知道这里有几户人家。牧民养着牦牛、羊、山羊、马和凶恶的獒犬。农民饲养马、骡、驴、猪、黄牛、家禽、牦牛和犏牛，犏牛是母牦牛 和公黄牛的杂交种，是最好的耕牛。公犏牛称为 dzo-pho 母犏牛称为为 dzo-mo 。

牦牛在西藏可能是最有用的牲畜。它能在最艰苦的环境下生长。它提供畜力、奶和肉。它的皮可以做靴子、鞍袋、皮船等，它的毛包括尾部长毛是织帐棚和衣服的好原料。牦牛也能犁地。母牦牛和母犏

牛产很好的奶，牦牛奶的酥油可以做很好的酥油茶。

语言和文字

西藏的语言和印度、中国都没有类似的地方（这是胡说，汉藏是属于一个语系。译者注）虽然它采用了一种印度的字母。许多名称来自中国、印度和英国，也构成藏语中的词汇。在西藏三部（曲卡松）内有各种方言，这也造成和其它国家相似的语言问题。卫藏方言被认为是最通行的，只有一种文字使得文字的文化是统一的。

许多学者认为西藏字母在松赞干布时(1629—49在位）开始使用，他派吞弥桑补札和一些学生到印度学习笈多字（ Gupta ）。但很可能在前就有一种文字，一种和本教有关的文字——因为松赞干布在没有派遣吞弥以前就给尼泊尔国王写过信求婚，根据历史记载他是亲笔写了这封信的。但是还没有找到更早的本教文字。

目前的西藏字母是从婆罗米和笈多 Brabmi and Gupta 字来的，这两种字，公元350年时在印度流行。吞弥一行人到印度后只剩下他一人回到西藏创制了藏文字母。

宗教和性格

根据早期的著作，西藏的本教是由西部西藏的象雄人贤饶米沃 Shenrab Miwo of Shangshung 创立的。关于贤饶米沃生存的时代是有争议的。有些本教徒说他和释迦同时，另一些人说他是佛的一位化身。还有一些人说他是一位虔诚的佛教班智达的化身，他后来反对佛教。

佛教于七世纪从尼泊尔和印度传到西藏，但真正发展是八世纪莲华生来过以后，逐渐本教的影响缩小，但仍存在于许多边远地区。佛教也并不是一下子就传到了西藏，是由不同时期，不同的祖师逐步传入的。主要的教派有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和格鲁派。小派有希介

派Shi-Che-Pa　　甲清派 Chag-Chen-pa　　和俄尔派Ngor-Pa 这些都是西藏的佛教徒。在西藏也有回教和印度教信徒，在共产党占领以前宗教和思想是自由的。

西藏人笃信佛教，相信业 Karma 的说法，它教训人这辈子受苦是由前一辈子的行为造成的。这就是西藏人富于同情、诚实、乐观和安于命运的原因之一。他们忠诚、开朗、文雅、仁慈。他们悠闲自在，甚至在他们的邻居中国和印度把妇女的地位贬低了西藏人仍然是彬彬有礼地平等看待妇女。这是许多到西藏旅行过的人们的意见。相传卫藏人是热心宗教的，康巴人是好斗士，安多人会做生意。

虽然西藏保持着封建制度类似中世纪的欧洲。但在共产党占领前并无宗教信仰和旅行的限制，对最穷的农民和仆役都是如此。（这是胡说，西藏的仆役完全没有人身自由。译者注）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宗教上的社会流动，如现在的达赖喇嘛来自一个农民家庭，实际上转世喇嘛可以来自各个阶层。

寺院生活

由于宗教在藏民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我要简单谈谈寺院的生活。上千所喇嘛寺分布于西藏各地，甚至于一个小村子也有一所喇嘛寺或尼姑庵，生活方式由于教派不同和寺院规模的大小而略有不同。

大部分教派在形成西藏历史的过程中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在现代，格鲁巴，也称为黄帽教，以它拥有的哲蚌、色拉、甘丹、扎什伦布等著名寺院而称著，这些大寺院都称为登萨 Densa（喇嘛首领坐地）或曲德（大教法机构）。很小的寺院有时称为‘日处’（茅棚）。寺院的一般名称为‘衮巴’。

各个阶级的人都可以进寺院，一个五六岁的儿童进入寺院时要穿上僧装，把头发剃光，只留头顶一小撮，这一小撮要请一位师付举行

仪式中剃掉。然后他就得到一个法名，开始学读和写，并背诵经典。这样要过二年就可以受'格楚'戒。这是僧侣的第一阶段。受戒后他就可以加入班次学经。他必须长期用功学经，必须完成以下一些经典，《大般若经》、《中论》、《戒》、《实相》、《量论》等。

当孩子长到成年时（十八至二十岁）可以受'格隆'戒，他就成了一位具足的僧人。必须严守寺院戒律，经典学好以后，他就可以获得最高的寺院学位，即拉让巴格西。（格西分四等，拉让巴是最高一级，译者注）小寺院的喇嘛就不那么重视戒律，也没有考取格西的机会。

一位寺院的毕业生，可以终身在寺院住，也可以找个清静地方去修行，慢慢进入社会给人念经传道。还有更高的经典学习，要到另外的学院去学'鄂'（即怛忒罗）。从这种学院出来的僧人就有资格当堪布，甚至可当'甘丹池巴'（意为甘丹寺座主）他算是西藏学位最高的人物。当一位格鲁派喇嘛成了甘丹池巴候选人时，大半都已六十多岁了。

西藏寺院的组织很像西方的大学，每所寺院都分成学院和宿舍。（指扎仓和康村。译者注）。政府和有钱施主向他们布施粮食、茶和酥油。也布施一些钱供他们买衣服和日用品。在所有寺院里都要求僧人过清苦的生活，不许吸烟、喝酒和跳午，多数教派对受具足戒的僧人要求独身。

这些情况当然都是指共产党中国人占领以前。

历法与天文

在这本书里读者将遇到藏历的日期，例如阳水马年三月初五。从西方材料中找到准确日子的在藏历日期后附公历日期。找不到相对应的日期时只用公元纪年。这里需要对藏历的制度加以解释。

有两个困难不能列一张藏历公历对照表。第一个困难是藏历是太阴历，名义上一年十二个月，每月三十天，一年共三百六十天，这和太阳历的365¼天相差了几天，这段差距用隔两年一闰的办法来补足。不幸的是闰月是不固定的，认为那个月吉祥就闰那个月，这样日期就很难与公历相对应。

第二个问题是对照表需要把理论上的一年360天的太阴历和实际只有三百五十四天的藏历调整好。它是用增减日期来调整的。在藏历上每页标六格每格有一数字代表本月内的日子，这六格不等于西藏的一周，但是五页恰好是阴历的三十天。当某一天认为应当略去时就在这一格内刻上一个'欠'字。这个月就缺少了这个日子，因此日子可以这样排列一、二，欠四、五、六，同样某一天也可以重复，如一、二、三、三、四、五、六等。

鉴于这种增减日子的调整，除非你有一本历书在手，否则是排不出藏、公历准确的对应日子的。藏历本子是在前一年底，由官方算师编好公布的，他可以决定那天不吉利应当删去，那天吉利应当增加。到第三年该闰时，他可以确定那个月置闰月，西藏人在看到新历本以前是无法知道明年日期的排列的。

新年是从西历二月看到新月时开始的。如果前一年有闰月，就得从三月开始。根据这种差别也能较准确地算西历的相当年份。

西藏的月份没有特别名字，是按数字次序数的，七天一周的习惯也标了出来和西历一样，七天以七曜代表，其次序为日、月、水、火、木、金、土。藏名称为"萨"，星期日为'萨尼马'，星期一为'萨达瓦'等。

在古代藏历是以十二生肖计年的，即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这种计年法一直使用到十一世纪。此后六

十年一周的纪年法就引进来了。这一历法在《时轮金刚经》中曾有阐述。它是于公元１０２７年译为藏文的。这一年就成为这种新纪年法的第一年。这种制度是以五行和十二生属相配，六十年一个循环。金、木、水、火、土各与两个生属相配以阴阳加以区别，如阳木鼠年与阴木牛年。

算命、打卦和看镜子在藏民日常生活中占有极重要地位，五行生属相生相尅，要由算师加以推算。例如虎与猴合即不吉祥，金与火相尅。每个月或日都有这类问题。

在年底编造新历时，这种推算要影响西藏的各项事务。如达赖喇嘛坐床，甚至出门远行都得选择黄道吉日。

用数字、念珠、骰子和其它东西算卦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事。看镜子是选择配偶时，选择送葬人时或予告一生吉凶的一种方法。

婚姻

婚礼在西藏各地依社会地位和财富而有不同。一般先由男方家长对拟议中的女子加以选择和了解。如果双方请人算命认为命相相合，就择日举行订婚仪式。

男方的人要到女方去献哈达和礼品，藏语称为‘隆酡’（意为请婚酒）。要送女方的母亲一笔钱称为‘奴仁’（意为奶酬），不论女方的母亲是否在世都得送这笔钱。婚姻确定后要请中人写婚书，由双方家长盖章。

结婚要选择好日子。在婚礼的前夜，一队人马由男方到女家，这一行列由一位阴阳先生率领，他手里举着一枝箭，上面挂着一幅星宿图，称为‘席白波’Si Pabo ，上面还画有驱逐邪魔的符咒。这队人马还赶着一匹备好鞍鞯的母马。这匹马是供新娘骑着来男方的。

在结婚这一天的黎明，女方的喇嘛要请求家神允许把女儿给出去。

新郎的一位代表要把一支有五色飘带的箭插到新娘的项上。在插时要口诵诗篇，然后就宣布新娘与新郎正式成婚了。接着迎亲的队伍就出发，新娘骑上马随着，在她后面又是一串送亲的队伍。一般新娘在出门时要哭泣挣扎。另外还要派几个新娘的亲近人到男方去陪她住几天，以免她想家。

迎亲队伍在路上要遇到一队欢迎的人给他们献青稞酒，在到达男方的大门口时，新娘在一个用青稞色和茶色堆成的台子上下马。新郎的母亲捧着一桶奶迎接新娘，新娘用中指在奶里沾一下向空中弹出几滴奶表示敬神。

新娘被带到家庭的佛堂里去，和新郎并肩坐着，然后双方家里的成员按长幼顺序都坐下来，接着两家就交换哈达和礼物，随后就举行婚宴。双方的亲友都来献哈达送礼向新婚夫妇道贺。然后新婚夫妇被领到屋顶上，由男家请的喇嘛念经、祈男方的保护神保护新娘。女方的一个代表在男方屋顶上插上一面玛呢旗，这是表示她和她丈夫家中的成员有同样权力。接着要举行好几天丰盛的婚宴。新娘在一月内是禁止回娘家的。满一月后新婚夫妇可以正式回门。此后新娘就可以随时回她娘家去了。近年来婚礼逐渐简化，恋爱婚姻也被认可了。

运动

马在西藏人的体育运动中占有重要位置。跑马要跑四英里比赛速度，而不是跑一个固定的圈子。有些赛马没有骑手，有些只跑短距离，但骑手要在行进中射箭、打枪或穿刺。这些活动举行一次要隔很长时间，每一位俗官一生中至少要参加一次这样的活动。亦有射箭比赛。由于奖励都是由政府给的，因此这也牵涉到威信问题，官员们要进行几个月的练习。这种比赛的原始目的是让官员们有准备可以随时迎击敌人。但后来这成为一种传统的运动项目。

西藏古代的风俗，要求每一家俗官的成员参加三英里的步行竞走。举重的人也不少，摔交也很流行。西藏人很爱游水，横渡河流，在河湾处逆流而泳是考验人们的毅力。

西藏也有和西方相似的投掷运动，如在一定距离外向一个目标（角或标石）投石子。跳远是在一个长跑道上进行，参加者分成组，在跑道上冲刺力使他能跳出三十英尺或更远。在秋季放风筝是每个孩子爱好。秋高风急，晴空万里，拉萨上空风筝飞午。风筝是用竹骨和彩纸糊的。放风筝的绳子上涂有胶和玻璃粉，风筝放起后，互相摩擦，以切断对方的绳子使风筝飘失为笑乐。近年以来足球、网球和其它运动项目也有了。打麻将、掷骰子和玩纸牌则是流行的室内活动。

衣着

相传古代藏王是用一条红带子把头包起来，穿着长而肥的袍子，足上穿着脚尖朝上的靴子。这种服装据说是来源于波斯王。（见《红史》）

西藏喇嘛的服装来源于印度释迦的服式，后来按西藏的气候作了适应，僧俗官员的服装部分起源于蒙古服式。官员的品级从服色上可以看出来。街上的一般平民穿粗氆氇长袍，腰里系一根带子。冬季则穿皮袍以御严寒。

和西方一样西藏妇女也是讲究穿戴的。节日盛装穿彩色短袖衬衫外罩长袍，腰前系着五彩条纹的围裙。她们的长发编成辫子，头上加以“巴珠”这是一种用丝绒裹成一个三角架，上面嵌以珊瑚、珍宝。“巴珠”的形式各地有所不同。妇女还戴长的金耳坠，镶有绿松石挂在耳上，镶有绿松石，钻石的金嘎乌挂在胸前。

男女的帽子在冬季是相似的，它们都沿以金丝缎，有两片大耳，两片小耳都有毛皮。夏季男人们喜欢戴西式呢帽。

很有趣的是大僧官和大堪布的饰缎袍子很像罗马天主教大主教的袍子。还有弯曲的喇嘛帽子也是如此。虽然尺寸有所不同。使人看到能联想起古希腊的头盔。有人问这到底是西藏人自创的还是亚历山大大帝远征波斯和印度时由那里传来的？

古代，藏兵穿盔甲。但到十七世纪发生了变化，一种棉布做成盔甲样式的服装代替了铁甲，1916年以后军队制服仿英式的。但1947年以后又逐渐恢复西藏的形式。

政府

西藏政府最高的首脑是政教统治者达赖喇嘛。理论上达赖喇嘛的权力是绝对的，实际上他很少不征求属下的意见而行使绝对权力。在达赖幼年时由大会（ Tsongdu ）选举一位摄政主持政府。政府的结构是双重的，有两位司伦（首席大臣）一僧一俗。下面的行政也是僧俗分开的。

“噶厦”Kashang ，是主要行政机构，管理所有公私事务，噶厦由三位俗官，一位僧官组成。他们的头衔是噶伦 Kalon 。噶厦办理由达赖喇嘛通过司伦交下的各项事务。噶厦有权提出任免行政官员及地方官吏，控制政府的广大事务范围。

噶厦下面，有各种行政机构，政治、军事、经济、司法、外交、财政和教育等。除了财政部（孜康）外，所有机构都是由一位僧官，一位俗官共同负责。财政部是由四名俗官组成，头衔是‘孜本’，每个机构都有权决定它们主管的事务。超越了它们主管范围的则呈请噶厦处理。

关于宗教行政是由一个总管大臣（基巧堪布）和由四个僧官组成的机构管理的。僧官称为仲译钦莫。有关宗教事务，由这个机构提出通过司伦交达赖喇嘛批示。总管大臣也负责外交部和达赖喇嘛私人财

政的事务。

遇有重要政治事务则举行四名仲译钦莫和四名孜本的联席会议加以讨论。当召开国民大会讨论全国性重要问题时，仲译钦莫和孜本主持会议并作为大会的发言人。国民大会的决议一般是不能更动的，由噶厦和司伦的办公室转呈达赖喇嘛。

这仅是西藏政府结构的一个简述。这也是在１９５６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以前的情况。

二、早期藏王的帝国

关于西藏最古的历史时期，没有文献记载可供我们参考。根据佛教传说，藏王的祖先是印度比哈尔 Bihar 邦，马格达的一家贵族，相传他生来就长着长而兰的眉毛，一行完整的牙齿和相连着的手指。他的父亲马克甲巴 MakGyapa 为了害羞把这孩子藏起来，长大以后他就来到西藏。这孩子来到西藏的雅隆地方，这里的人民都是本教信徒，他遇到一些放牛的牧民。本教徒认为天是最神圣的，人们就问他是从那里来的？这孩子听不懂他们的话，就漫指天空，人们想他是来自天上就决定请他做他们的头头。他们把他放到一张轿子上，用肩膀把他抬了回来，给他起名叫聂尺赞普，意为“肩坐王”。在聂尺赞普来时西藏人还都住在山洞里。相传他建筑了西藏第一所房子“雍布拉岗”，这所房子至今仍在。以上是佛教历史学者关于第一位藏王的说法。

聂尺赞普和后来的六代国王都在死后回到天上，人间没有他们的坟墓。第八代赞普的陵墓相传在卫藏的工布地区。藏民称它为第一个

藏王陵。这位藏王的名字叫直古赞普，从他起才开始了西藏可靠的历史。他被埋在一个陵墓里，相传那时天梯断了，他无法象他祖先一样回天上去了。

这位国王的儿子和继承者叫甲直赞普，Chatri Tsanpo， 又称布德功甲。根据藏史记载，直古赞普是由他的一位叫龙阿 Longan 的大臣谋杀的，并且篡了王位。直古的儿子们：甲直赞普、娘直赞普和厦直赞普被迫逃亡。后来甲直赞普恢复了王位。有趣的是蒙古历史学家萨彦斯坚 Ssar sang Setsen 在他写的《蒙古源流》中把蒙古王的世系推到西藏。霍渥思 Howorth 引萨彦斯坚的话说，龙阿杀死藏王篡夺了王位后，国王的三个儿子就逃走了。三个各向不同方向，最小的儿子叫博特其诺 Burte Chino 逃到北地人的地方，这些人住在贝加尔湖和不尔罕山 Burkhan Khalduna 附近。

有些记载说，第九代藏王布德功甲和汉武帝是同时人，武帝于公元前140—085年在位。在布德功甲时开始冶炼铜铁矿，他还修筑水渠发展农业，在河流上也建了桥梁。在雾结地方还修建一所叫作青瓦达孜的宫殿，这所宫殿的旧址今日仍然存在。

布德功甲后过了十八代，王室的一位儿子叫拓拓日年赞于公元173年出世，他长大登基后成为第二十八代藏王。相传在拓拓日年赞六十岁时，他在雍布拉岗得到一部佛经，他不能读因为那是用梵文写的，那时在西藏也找不到一个人能译出这部经。国王称这部经为宁波桑瓦 Nyen Po Sangwa （意为密要），保密了很多年。他不愿他的大臣们知道这部经是从印度来的，就告诉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还假託做了一个梦说，过四代后将有一位国王能解这部经。一位早期西藏历史学者聂尔巴班智达 Nel Pa Pandita 提到这

部经是从一位印度班智达叫作罗桑错 Losemtso 手中传来的，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四代以后在公元617年，第三十二代藏王囊日松赞生了个儿子叫作尺德松赞（原书误。应是尺松赞。译者注），人们更多叫他作松赞干布。汉文书上称他作弃宗弄赞。他的出世刚好是在唐朝建立以前，唐高祖于公元618年即位。

松赞干布于十三岁即位。他制订了十善法与十六行为准则。几年后，他派了大臣噶东赞带着礼物和书信去尼泊尔见国王安苏瓦尔曼 Amshuvarman 求娶公主布日库提德维 Bhrikuti Devi 为妻，国王把女儿给了松赞干布，她去时带去一尊不动金刚佛像。这尊像被西藏人认为是最神圣的，相传它是由释迦佛亲自加持的。（“加持”是佛教用语，意思是祝福过的。译者注）。西藏人称这位尼泊尔公主为“白萨”意思是‘尼后’。

翻遍西藏历史也找不到松赞干布派吞弥桑波扎和十六从者去印度学梵文的准确日期。吞弥到了印度西北部的喀什米尔，在这里他找到老师利必卡拉 Lipi Kara 和底瓦维地辛哈 Devavi dyasimha 随从他去的人都死在那儿。吞弥回来以后，就利用他对梵文的知识设计了一套藏文字母。相传他翻译了托托日年赞时传来的那部秘经。人们才知道了这部经的内容。这部经的重要是因为它是最早传入西藏的。近代西藏的纸币就以这部经传入西藏开始计年，即公元233年。

（注：关于托托日年赞和松赞干布的年代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我从材料上找到托托日年赞生于公元173年，而松赞干布的生年为大家所承认的是617年，这是在吞弥出生后四百五十六年，但是在这期中只有四代藏王。记载说托托日年赞活了一百二十岁，尽管如此，还差三百二十四年，如果四代藏王在位那就要每代在位八十一年，这虽

然不一定是不可能的，但连续四代都这么长寿似乎也不大可能。这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同时松赞干布又向唐朝皇帝请婚，当时吐谷浑的统治者也向皇帝求婚，松赞干布就派兵去打败吐谷浑，同时还征服了白兰、党项等羌人部落，又派了二十万军队攻打和占领了松州。松赞干布于是再派人向中国皇帝求婚，送了一付金甲。中国皇帝应战但是被打败了，这才同意把文成公主嫁给他。噶东赞曾充当迎接尼后的使臣，这次也派到中国去迎接公主。

公元641年中国皇帝派江夏王（李）道宗送文成公主直到西藏边境，松赞亲自在边境迎接，藏人称公主为'甲萨'意为汉后，公主把大量的绸缎、瓷器带到拉萨，还带来一尊释迦牟尼像，这像传说也是由佛亲自"加持"的，西藏人认为非常神圣。

尼后和汉后都想为她们带来的像建庙，汉后建的庙称为'若莫且庙' Ramoche，（即小昭寺。译者注）尼后没有主意就请汉后帮她设计，汉后建议她把庙建在一个小湖上。尼后以为这是汉后妒忌她出的坏主意，尼后向松赞提出这件事，松赞经过祈祷和静思也认为把庙建在小湖上是合适的。西藏人用大批山羊搬运土石把湖填平。在庙建成后还专门塑了一个山羊象纪念它的劳绩。这座庙称为"若萨楚那祖拉康" Rasatsulnang Tsukla khang，（即今拉萨大昭寺，意译为拉萨神变殿或显灵殿。译者注）西藏人也称它为"觉卧康"。汉后的庙门向东，尼后的庙门向西，到下一代，两所庙的佛像对换了一下，这是为了安全的原因。当时谣传汉军将进入拉萨。在今布达拉宫上修建的尺孜马波宫（ Tritse Marpo ）相传也是尼后建的。

同时西藏还征服了上缅甸的一部分。公元640年占领了尼泊尔，并驻扎了若干年。至今尼泊尔人的姓氏如藏 Tsang 、拉马 Lama，

协尔巴Sherpa， 和达芒 Tamang 都是西藏占领军的后裔。在尼泊尔还有一个尼泊尔王纳楞德拉底瓦 Narendra Deva 立的石柱称为西拉底瓦 Shila Deva， 上面刻着应当向西藏国王纳的贡赋。公元643年象雄王黎克美 Likme 成为藏王的陪臣。

松赞的藏后，堆龙的门萨尺姜 Mongsa Tricham， 生了一个儿子叫作公孙公赞，他十三岁后登了王位，五年后十八岁时去世，松赞再度掌握王权。

为了治理国家，松赞委任了六名总督（Khospon ）他们在辖区内分配土地给属民（《贤者喜筵》只提到五位总督的名字，噶东赞治卫藏，穷波松孙孜 Khyungpo Sumsung tse 治象雄，伙尔·约苏仁布 Hor Jashu Ringpo 治苏毗和喀木，魏藏桑巴列 Wai Tsangzang Palleg 治安多的基布 Chibs；觉若坚参羊宫 Chongro Gyaltsen Yangong 治朱古的通雅（Thongyab， 第六名总督的名字缺）在军人、仆役和农民之间有了阶级差别，每一千户指定了一个发言人。每位总督有他自已的军事司令部，各以服装、旗色、马色加以区别。

在拉萨宫廷松赞任命了九位大臣。在公元645年他派了一位大臣到中国报告中国皇帝要在山西省的一座山上建一所庙宇，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庙子建成后称为五台山庙。

公元648年中国皇帝派了一个善意使团到印度皇帝哈尔歇 Harsha （606—647）那里去。使团的首领叫王玄策，他带着30名骑兵，当他到达印度时哈尔歇已经去世，由于他没有儿子，由一位叫阿尔如那 Arjuna 的大臣继了王位。那时印度的局势很不安定而阿尔如那是反对佛教的。他下令把善意使团的人除王玄策外都杀死了。王玄策逃到尼泊尔，当时尼是西藏的属国，他从那里请求松

赞支援。他得到一万二千西藏骑兵和七千尼泊尔兵。根据一些历史记载，他前进到印度在比哈尔的希拉哈提 Hirahti in Bihar
打了三天仗，结果把阿尔如那免职和俘虏了，但印度的材料不支持这种说法。

阿尔如那的对手，国王卡马如巴 King kama Rupa 对他的战败是很高兴的。做为赞许的表示，他送了牛、马以及许多其它礼物给松赞。中国皇帝对松赞也是很感谢的，为此他下令在他死后雕一尊藏王的石像立在他的陵墓旁。

公元６４９年松赞和汉后、尼后住在叫作澎波的地方。这时发生了严重的瘟疫，尼后的侍女得了这种病，这种病叫什么名字弄不清，记载上说它使人发高烧。松赞染上这种病就一命呜呼了。根据后来宗教历史家的说法，松赞和两位王后都进入大昭寺的观音像里去了。国王的年龄是八十二岁。敦煌的材料说松赞死于公元６４９年，汉后死于公元６８０年，松赞的陵墓在琼结县的雅隆江畔。

松赞死后，由他的孙子芒孙芒赞继位，那时还是一个小孩子，由大臣噶东赞任摄政，直到孩子成年。

公元６５４年在一次大臣总督的会议上决定国王与大臣、总督每年聚会一次商讨未来政策和军事准备。下一年西藏军队集结在中国边境，准备攻打吐谷浑，摄政噶东赞在阿豺（即吐谷浑）地方住了八年来指挥军事。战争延续了很久，后来吐谷浑的大臣素和贵叛逃到西藏，吐露了吐谷浑的虚实，吐谷浑就被最后打败了。河源王慕容诺曷钵被迫逃到中国的凉州。

公元６６６年噶东赞从阿豺地方回到拉萨，第二年他就得病死了，不像别人传说他是和中国人打仗战死的。东赞有四个儿子，噶尔曾雅东布 Tsenya Donpu ，噶尔尺津曾壮 Triding Tsendro

（汉籍作钦陵。译者注），噶尔钦多衣 Zindoye （汉籍作赞婆译者注）和噶尔增演松洞 Tsenyen Sungton 。曾雅东布当了首相，其余三弟兄均任军队司令。在公元七世纪，噶尔家族对缔造西藏帝国占有重要地位。

在西藏人战败吐谷浑后，大批难民涌入凉州，使得中国皇帝召集大臣们商量如何安抚这些难民，和是否要和西藏打仗。一位叫阎立本的大臣反对打仗，一位叫契苾何力的将军主张打仗，由于道途遥远，供应困难，阎立本劝说皇帝要暂时忍耐，等国力充实后再战而胜之。但是大臣姜恪不同意这种主张说是现在不打，将来西藏会更强大起来。商量无结果而散，也没有想出什么安置吐谷浑难民的办法。

公元668年在直马科 Dremakhol （即铁刃城汉籍称石堡城。译者注）筑起一个军事要塞，第二年吐谷浑就发誓向西藏国王效忠。

公元670年是西藏在军事上取得巨大胜利的一年，藏军进入塔里木盆地，占领了中国的安西四镇。皇帝派了薛仁贵领十万大军来恢复四镇，结果在大非川吃了败仗。薛受到降职的处分。公元671年又派另一支军队由姜恪率领准备进攻，结果姜死在路上，军队也退了回去。

藏王芒松芒赞派了一位大臣叫然计 Jangjig （汉籍作仲琮译者注）出使中国，中国皇帝接待了他，问了许多关于西藏的问题，他告诉皇帝藏王強毅有能，处理国事胜过他的祖父松赞干布。然计又说西藏人上下一心，团结努力，这就是西藏所以強大的基础。然后中国皇帝责问他为什么要容纳背叛了吐谷浑人民的素和贵，他回答说我是奉命来送礼的，其它非我所知。

公元676年藏兵攻打鄯州和廓州，杀死很多官员和人民，大获

而归。中国皇帝立即命令大臣刘仁轨带兵到洮河，派另一位将军李玉（不详其人，疑是李乙夫，译者注）到凉州。在这些军队还未出发，藏兵就攻打了甘肃的叠州、密恭、丹岭等地。中国皇帝把将领们召去对他们不能及时出兵，狠狠地训斥了一番。他又派秘书（汉籍作中书令译者注）李敬玄为将军，并从剑南、山南征调军队。

李敬玄在龙支打败藏兵，于是进攻青海地区，这里是大臣曾雅东布驻防的，李敬玄下面的一名将领刘审礼率兵深入藏地，后援不济，结果被围困丧命。军队溃散。李敬玄的一个将领叫黑齿常之，带领五百战士夜袭藏军使藏军溃散，李敬玄带兵回到鄯州。他也受到降职处分。

尽管有许多中国将领作了很大努力，对西藏没有取得什么有意义的胜利。高宗皇帝召集大臣商讨局势，他申斥他们屡次战败，而在早先倒能征服高丽。皇帝问他们今后应当怎么办？多数人说应当和西藏和谈，少数人说好好准备几年然后再进行报复，最后决定防守边境。

676年藏王芒松芒赞去世，但是西藏人怕中国人知道他们失去了领袖，三年没有发表。藏王死时王后正怀孕，不久就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都松芒介（汉籍作器弩悉弄译者注），在他三岁后，方宣布父丧。

公元677年象雄叛乱，次年被平息，这时西藏的武力为邻国所深畏，在西藏有七名著名的将军，他们都善于骑斗，也是优秀的弓箭手，善于指挥，能与野驴赛跑，与野牛搏斗。他们是俄克东肖 Ngok Dongshor，俄克凌干 Ngok Lingkham，侬坚参 Nan Gyaltsen，巴归洞强 Bas Gosdongchan，果雅仲 Gas Yakchung，觉弄东晓 Chokro Dongshor 和侬尺洞云津 Non Tridun Yujin。

首席大臣曾雅东布死于685年，其位由他的兄弟尺津曾壮继承。他的两个兄弟仍然带兵和中国打仗。但是噶尔家族的势力太大了对王室的忠心成了问题。噶尔钦多衣（系于公元699年钦陵被杀后，投降唐朝，非战争中被俘。译者注）于公元694年在战争中被俘，他的兄弟增演松洞被藏王处死。首席大臣尺津勇壮于公元698年被免职，次年与国王的军队战败后自杀。

根据藏文史料都松芒介于704年死于米雅瓦地方，传说这里是南诏的国土，在今中国云南省。汉文资料说藏王在讨伐尼泊尔和北印度的叛乱时被杀死。

那时尺带珠丹（汉籍作叶隶缩赞译者注）刚刚七岁，继承了王位，他的祖母尺莫罗 Trimalo 　　充当摄政。尺带珠丹外号梅阿错（意为大胡子）。这当然是在他上了年纪时的事，他在位期间，在拉萨以南修建了三所寺庙，扎马丁桑 Drakmar Dingzang 　　清浦南若 Chimpu Namral 　　和扎马克如 Drakmar Kero 。

有些藏文资料说梅阿错有个儿子叫姜查Jangtsha，他为儿向汉皇帝请婚，但是在公主还没到藏时儿子死了，于是自已娶汉公主为妻，这是个有趣的故事，但这种说法在西藏史学家中也是有矛盾的。汉藏史料都记公主入藏是公元710年，当时梅阿错只有十二岁，还不可能生有儿子。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是由藏王的祖母尺莫罗（汉籍作禄没氏译者注）向中国皇帝求婚，皇帝把雍王（李）守礼的女儿金城公主给了藏王。皇帝亲自送公主到始平县，为纪念公主改为金城县。公主由杨矩送到西藏。皇帝希望通过和亲减少战争。但他的希望没有成为现实。

根据一些藏文史料，金城到藏后没有过舒服日子。她没有伴当而

且受到国王其它妻子的妒忌。她写信给哥舒非王 Koso Fiwang 他是西藏属下阿射（吐谷浑）的陪臣，要求庇护。但哥舒不敢庇护她，把她的请求转给另一陪臣石达希柯 She Ta hiKo，他也不敢给她庇护得罪藏王。他给中国皇帝写了一封信报告公主很不快活，想逃离西藏。

皇帝给公主写信要她留在西藏，急躁行动可能招致战争。他劝她安心在西藏王廷，为她自己也是为她的国家。公主勉强地同意了。不久后他就问文成公主带来佛像的下落，它被西藏人藏起来了。经过仔细搜查佛像被找到了。她让把佛像放在大昭寺的正中殿里。

公元719年当玄宗皇帝在位时，中国人的军事活动大大增加，原因是他们要阻止西藏和阿拉伯（此处应指突厥与回鹘，作者使用 Arab 一词是错误的，译者注）他们有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西藏人没有逃过早期阿拉伯历史学者的注意，他们称西藏为图伯特 Tubhat ，称它的统治者为可汗。根据巴尔托 Bartold 的说法 Tüpüt 和 Tüpüt-Kaghan 最早见于阿尔昆碑 Orkhon 。当时也建立过一些贸易关系，相传那时西藏人把麝香输出到穆斯林世界。

公元730年藏王向中国皇帝请求各种经典和历史，一位大臣叫于休烈的说这些书里有许多关于军事战守的内容，传到西藏对国家不利。但是皇帝没有听他的。

公元741年，一个西藏使团来到中国宫廷报金城公主之丧，同时请求和谈。但是皇帝拒绝了。不久西藏就动员了四十万军队进攻中国承风堡，后进至长宁桥为中国将军盛希液所阻。后来藏兵攻下了石堡城，他们一直占领到公元748年才又被中国收复。

公元755年藏王梅阿错去世，多数藏史材料说他死在雅卓巴采 Yardok Batsal， 是坠马死的，但布达拉宫前的石碑上说梅阿错

是被他的两位大臣，巴尔顿察 Bal Dong Tsab 和朗美希 Lang me Zig 杀害的。这通碑是弃松德赞在位时立的。

梅阿错死后，他的儿子弃松德赞即位，他是一位佛教信徒，鼓励传布佛教。但在宫廷里却遭到大臣们的反对，这些大臣都是崇信本教的。马尚顿巴克 Ma Shang Dompake 和达喀路贡 Takra Lugong 就是坚决反对佛教的。（这后一名字不应与另一大臣达扎路昆混为一人。这人也叫鄂兰路昆，他忠于国王，他的事迹也载于布达拉宫前的石碑，一些西藏历史家把这两人混起来，这是有损于达扎路昆的真实面貌的）

有两位较小的大臣果尺桑 Gas Trizang 和尚聂桑 Shang Nyamzang 是乐意帮助国王宏扬佛教的，他们联络那些同情佛教的大臣们，鼓动他们在宫廷讨论佛教问题时支持他们。然后他们贿赂了一位卦师让他予言国内将出现大灾荒和瘟疫，除非是把两位忠心的臣子作了牺牲。

传统的说法是信佛大臣果氏和反佛大臣马尚氏都被砌在一座坟墓里。但这个计划是果氏设计的，他做了秘密安排逃了出来，马尚氏则死在坟墓里。

还有一个说法是，预言要求放逐两位大臣，于是召集了御前会议讨论此事。有两位地位较低的大臣，果氏和尚氏一道站起来说，为了表现忠于国王自愿接受放逐。他们的表态受到欢迎，都称赞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但这对两位地位较高的大臣马尚氏和达喀路贡却是很失面子的。他们二人站起来大声嚷嚷说他们不仅是地位高，而且对国王的忠心也不亚于任何人，坚决要求放逐，大会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这实际上是一种安排的圈套。

西藏记载说，马尚氏和达喀路贡被送到堆龙的一个墓地里，但这不

一定就是被杀了。另一个故事说这两位大臣被允许过"活死人"的生活。这和藏王的葬法有关。当一位藏王去世后，最忠于他的大臣必须自愿与国王一起埋葬，但不是真正埋起来，而是和一群"死人"住在陵墓附近，这些人禁止和任何活人说话。继任国王每年来这里祭祀，带来很多祭品，祭完就把这些东西分给"活死人"。这些人的家属也可以给他们送衣粮。当有人走近陵墓时，就吹响一个号角，这些"活死人"立即藏进他们住的茅棚，这样家属才能进入墓地，留下东西。当这些人离开后，又吹响号角，于是"活死人"就可以出来活动了。

假如偶然有一匹马或一头牛跑到墓地，"活死人"就在牲口身上做了记号，然后放了，牲口的主人看到记号立即送返墓地作为对死人的祭品。

虽然有传说果氏尺桑耍了个计谋把马尚氏活埋在坟墓里，另一传说则说马尚氏和达喀路贡都被放逐到墓地当"活死人"去了。（见《红史》）

当马尚氏被驱逐后，国王弃松德赞派了一位大臣巴赛囊 Ba Salnang 到尼泊尔去迎接印度班智达菩提若克希达来西藏传佛法。菩提（下同）接受了邀请，当他到达扎玛尔地区时受到国王的热烈欢迎。据说当菩提开始传法后触怒了本教神灵招致了风暴、闪电和水灾。人们说这些征兆表明佛教是不能接受的。菩提感觉到时间还没有成熟，就回到尼泊尔去了。在他离开以前向国王建议去迎请印度的怛特罗大师莲华生来西藏。

巴赛囊这次又奉命去迎请莲华生，这时他正在尼泊尔。莲华生长于密咒，幻术，西藏人是容易接受的。运用他的神通莲华生治服了反佛的本教神灵。他使它们发誓成为新教的保护者，从此许多本教神灵被接受为佛教护法。

莲华生受到国王的欢迎，善提又被请返西藏。国王决定建一座寺院，善提仿照乌坦塔普日寺 Otanta Puri 的样子画了设计图。寺院建在扎玛尔地区，过了十二年后被称为"明居龙季都贝祖拉康"，Mi gyur lhun gi dubpai Tsukla - Khang 意为'不变园满神殿'，人们平常称为桑鸢寺。

国王想知道西藏人能否当好和尚，他挑选了七个聪明人，他们是巴戈乌若占那 Pagor Verotsana ，钦夏甲达娃 Chim Shakya Tawa，巴若特纳 Bas Ratna ，俄兰甲瓦劳洋 Nganlam Gyawa Chogyang，马仁清卓 Ma Rinchen Cong ，昆巳义王波 Khon Luiwangpo，和藏来珠 Tsang Legdrub， 他们都当了善提的弟子。这是西藏的第一批僧侣。这一出家试验很成功，后来许多人出了家。在桑鸢寺办了一所梵文学校，大量的佛教经典被译成藏文。(阿底峡，一位著名的印度班智达，在十一世纪访问桑鸢寺对译经之富叹为稀有)

善提在死时预言在西藏将出现佛教两派之争。一派是主张通过禅定修炼，得到大彻大悟立地成佛，这是由汉和尚传的，一派是由善提传的主张功德须逐渐积累，需要认真学经，广行善事方能成就。他说到时候应该把他的大弟子喀莫拉希拉 Kamalasila 请来保卫印度佛教。

弃松德赞召开了御前辨论会，地点在桑鸢寺，时间为两年(792—94)一位汉和尚保卫他的"立地成佛说"，喀莫拉辨护他的积累法，辨论结果宣布喀莫拉得胜。于是国王宣布这一派佛教为西藏的正统信仰。这个文件是用金写的，并藏于国家档案库。这一宣布的要点是永远不能离开三宝(佛、法、僧)要维护各个寺庙，继续供养寺庙，王室的后代都要执行这个宣布。国王让王子、内、外、大小大臣们都发了誓，遵守这一宣布。一共备了十三份文本分别藏于各地。

为此王廷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典礼，举行了射箭，跑马表演继之以

歌午宴会。这一庆祝标志着佛教成为国教桑鸢寺的完成和第一批度僧的成功。下面是国王在宴会上唱过的一首赞歌：

金银铜铅铁，
五金出我国，
青稞荞豆麦，
五谷我所食。
我为我国王，
寒暑无瞭烈。

勤辛积多宝，
乐施无所节，
但愿宏佛法，
来自天竺国。

托托年赞时，
秘经来此地，
松赞译此经，
教法我创立。

庄严祈祷旗，
骄日致光晖，
飞鸟旁羽翼，
旗旌高插天。
寺非人手建，
圣地自生成。 （见噶塘协扎 Bka thang Shel brag ）

值得注意的是汉地佛教的失败是受到当时政治事件的影响，当时中藏边界不断发生战争，一直延续了八世纪的下半页。不断的战争增加了两国间的紧张局势，在公元763年弃松德赞下令派二十万军队，在四名大将率领下，由吐谷浑地区向中国进攻，这四名大将是：尚介拉那 Shangyal Lhanang　　　　　　尚钦甲希苏登 Shang Chim Gyalzig Shultheng　　　　，达扎路昆 Takdra Lukhong　　　　和拉桑贝Lhazang Pal　　　　。这支联军攻下泾州，它的守将高晖投降，接着奉天邠州也被藏军攻下。代宗皇帝（763—804）派了他著名的大将郭子仪带一支大军阻截藏军，也被迫撤退。藏军在高晖个人亲自带领下迅速前进到中国首都长安，皇帝逃出首都，郭子仪也带着眷属向南避入牛心谷。

藏军进入长安后即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帝改元大赦，中国习惯新皇帝登基都要改元，于是西藏人宣布一个新年开始，他们从新皇帝得到保证年年纳贡，十五天后他们就从中国首都撤出了。

关于上述事件也记载于拉萨布达拉宫前的石碑上，是弃松德赞时立的，有少数字已漫漶了，现将译文录下：

"在藏王尺带珠丹（梅阿错）时，鄂兰路昆 Nganlam Lukhong　　　　执行了王室信託的任务。尺带珠丹，由于巴顿察和拉美希给他的伤害而死去，虽然这两人都已经　高级大臣。

他们也想伤害国王的儿子弃松德赞并使王国分裂。所有巴和拉美对国王仇视的事实都由路昆通知了国王。巴和拉美的敌对活动被证实了，他们受到惩罚，路昆成为国王的贴心人。

在弃松德赞时，鄂兰路昆受到国王的信任进入大内会议。他老于政事，受命指挥喀尔仓 Khar tsan　　　　（中国）方面的军事。

他善于作战，征服了阿豺（吐谷浑），他原先是臣服中国的。他取了很多中国地方，征收了赋税。使中国人完全丧胆。雅莫塘 Yarmothang 中国的一部分……在宗喀方面……这样从……鄂波且 Nga Phochel 为路昆……敌人挑战……使王国强大……给予巨大奖赏……他与国王相处亲密，他为王国的利益尽了最大的努力。

国王弃松德赞是完美无缺的，他度量宽宏，他对国家的一切作为都是完全成功的。他攻取并占据着许多中国的地方和要塞。中国皇帝和大臣们都吓坏了。他们答应每年向西藏进贡五万匹绸缎。当中国皇帝（唐肃宗）去世，他的儿子广平王继位，他不向西藏进贡，于是藏王大怒。鄂兰路昆带头建议向中国中心地进攻，占领中国皇帝宫殿所在的京师。尚钦甲希苏登和路昆恭派为进攻京师的将领。他们进攻京师，在盩厔打了一仗，汉军被击溃，许多被杀死。

中国皇帝广平王离开京师逃到陕州，内务大臣 Che Wu Kong Don Kyan 和 Sokyan ……臣民（藏）王……西藏……广武王金城公主之弟立为皇帝……大臣……诸侯大小……（西藏）帝国名声大著赞扬之声广布各方。路昆受到国王的信任他为王国利益历尽苦辛。”

这个碑刻上的一些字因年久而磨掉了，有些是由于人们敲打而损掉的。这认为是一种乞求好运的行动。漫漶的字以虚线标出。中国名字的拼法也有很大变化如 Kim Shing 代表汉字 Chin Cheng，但碑上的叙述和汉文史料是大致相合的。这一段铭文是刻在碑的南面，由国王下令刻的另一些铭文在东西和北面。这些是给予路昆及其后人的种种特权。他们可免于死刑和重刑，不论犯了什么罪，除非是对国

王不忠和叛国。

公元７８３年西藏和中国举行了和谈，结果签订了清水盟约，约上规定了两国的边界。大致上洮州以西的青海地区和大渡河以西的地方都划归了西藏。

西藏式建筑和用具在中国土耳其斯坦的沙漠中出土，也找到一些古代文献。有两件是给沙州行政官的申诉信件。第一件是两个军官从驻地西藏的丹喀尔宫 Dan Khar 写的。日期是龙年的仲冬，信的内容如下：

我们从沙州市民收到申诉，他们原先来自尼泊尔被不合理地对他的小果园收税。他们抗议认为王宫的果园有足够的果子供应文武官员。今后你不许再向沙州市民的果园抽税。

（签字）春喜 Trom Sher　和拉桑赛通

Lhazang Salthong　（丹喀尔官印）

第二件是东巳龙曲写给沙州行政官的信，日期是猪年春季的第一个月。

我们收到两个地区来的申请，通知我们说西藏文武官员借口要结婚取走沙州姑娘实际上他们让她们当丫头。

沙州人说他们和西藏的属民有同样权利。他们说姑娘们不应当被强迫带到别的地方去。他们要求准许在她们自己地方和自己的人中结婚。

今后，不许强力夺取姑娘。如果男女双方相爱不应当阻止他们结婚。

（官印）

根据《白史》记载西藏与中国的著名的两个战场至今在安多（青海）仍可见到，它们在黄河的东西与北面。今天西藏人仍称它们为甲

穿塘（意为汉血原）和甲杜塘（意为汉墓地）。当地人仍可向参观者或旅人指点战场种种情况。安多地区的许多居民姓氏是和卫藏有联系的。安多的土民说他们就是卫藏军人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来和中国打仗就定居在这里。

根据 Yiktsang Khaspa Gache 的记载，在弃松德赞时军官们分守四方，九位勇敢大力军官守北方，国王问他们兵力是否足以守住边界，是否需要援助，九位军官一齐回答他们足以守住边界对北方可完全负责。从那时起这地方就称为"固图"。（意为'九能'）后来九位军官向国王请示是否可以回去，国王通知他们要等待他的命令。但是命令永远也没有来。时至今日安多的觉尼和卓介 Cho ne and Zo gye 地方的牧民就是这九个军官的后裔。他们被称为噶莫罗 Kamalok （意为无令不许回）。

在弃松德赞时西藏也结了各种联盟。公元750年阁罗凤，他是皮罗阁的儿子做了暹罗王（应为南诏王，此处著者故意用暹罗一词是别有用心译者按），他在位时和西藏结成联盟。公元754年南诏被侵，为表示他的协助，弃松德赞封阁罗凤为"兄弟"（汉籍作赞普钟意为赞普弟，译者注）。异牟寻继承了阁罗凤的暹罗国王王位，公元778年西藏兵与暹罗兵并肩在四川与中国兵作战。藏兵和暹罗兵在一起八年之久，然后返回西藏，当时中国与暹罗恢复了友好关系。

根据一些西藏资料，在弃松德赞时曾发动了一次宗教十字军去反对白地伙尔 Bedehor， 为了夺回一尊白哈尔 Pehar 像，这是西藏佛教的一位护法神。这尊像是立在桑鸢寺护法神殿，为了取得佛的遗物在桑鸢寺修佛塔，弃松德赞派人到印度去取。大臣巴赛那曾两次赴印度和尼泊尔，他写道，两队骑兵派到印度去，一队通过尼泊尔，一队通过帕里然后进入印度。相传当统治恒河以北地区的一个印

度大公看到西藏的骑兵时，还以为是先锋队，大军还在后面，因为印度的习惯，先锋队后跟着步兵和象队。大公就向藏军投降了，但这仅仅是一次宗教出使并非征服土地。

西藏军队跨过恒河来到马格达 Magadha，这里的统治者和随从知道藏军不会攻打乌坦达普日 Otantapuri 寺院，就把他们的财产藏到寺里向东逃跑了，藏军继续前进到菩提伽雅Bodhgaya，他们对圣菩提树献了祭，得到了佛的遗物，然后就向西藏去了。他们在过恒河的地方立了一根铁柱。

在弃松德赞晚年西藏的权力大为扩大，藏军在790年再度占领了安西四镇，他们是在公元692年武则天皇帝时被中国人赶走的。藏军向西进到帕米尔，甚至到达乌克苏河 Oxus，作为一种距离的标志在乌克苏河北面的一个湖被令名为阿尔图伯特 Al-Tubhat（小西藏湖）。几年后，阿拉伯人哈立发哈绒阿尔若西德 Caliph Harun Al Rashid，看到西藏的势力太強大了，就和中国结了盟来对付西藏。西藏人成功地抵御了阿拉伯和中国联军的攻打，虽然吃了一些败仗，并没有丢失很多地方。西藏人的扩张梦想是被制止了。但白达时 Pedech 这样写道，"在中世纪早期两个最強大的帝国的联合，才把西藏的扩张制止住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这些強悍的山居人民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力量是多么大！"根据布赖斯奈德 Bretschneider 的说法，在公元785—805年之间西藏人继续向西进攻，他们的军事目标已离开了中国，它的边境地区比早先受到较少的蹂躏。西藏的材料只能略略提到与西方国家的冲突。

在五世达赖喇嘛（1617—1682）墓里发现的一件文集目录的引言中強调了一种叫作"达喜" Dasi 仪式。引言中叙述一个谣言的故事，说这个谣言传到弃松德赞的耳朵里，谣言说西藏马上要受

到四方来的入侵了。信佛大臣果尺桑 Gos Trizang 就问道"我们将杀死一百个或一千个敌人。或者是准备逃跑。让我们相信佛。请教一下莲华生吧。他正在桑鸢寺附近的清浦山坐静"。他们就去请教莲华生。他说情况很严重。让大家举行"达喜"仪式。入侵就没有出现。

在琼结桥附近有一个石刻也足以证明弃松德赞的強大。它是对国王说的语气写的。

国王弃松德赞。由于你父亲和祖父的努力。我们的国家強大了。我们的宗教有了威力。

我写这个铭文是要纪念你的巨大功绩。你执行了你父亲和祖父的为了我们国家的和平和福利以及改善我们的祭神地的每一件事情。

我对你为扩大你的帝国所作的有价值的工作已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这个报告在你的档案库里。

国王弃松德赞你很不同于邻近的国王。你的巨大的威望和权势。西抵若西 Rashi 东达陇山 Longshan 尽人皆知。甚至在南北也然。

你的宏伟帝国的伸展给西藏带来了伟大。我们是一个快乐的人民。和平地信奉我们的宗教。这是由于你的仁慈的心。你不仅对你的臣民宽宏和仁慈。对一切生灵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人民称你作楚计拉江曲清波 Trulgyi Lha Changchub Chen Po （大菩提神异神）

弃松德赞有四个儿子。木尺赞普 Mutri Tsen Po， ，牟尼赞普。穆第赞普和尺带松赞。长子木尺赞普早夭。当弃松德赞于797年退位时。他住到宗喀 Zungkar， 他把国家权力交给他的第二个儿

子牟尼赞普。有些材料说弃松德赞在第二年死在宗客，另一材料《噶塘协札》Kathang Shetrag 说他参加一次赛马，观众中射出一支冷箭把他杀死。

在西藏资料中关于牟尼赞普在位的年代和他的继承者说法混乱，有些资料说他统治了约一年半，有的材料说他统治了十七年。后一说法来自对汉文史料的误解。在西方学者中也同样存在分歧，有的说他在位是797—804，有的说他统治了差不多十八个月（797—99）鉴于他曾进行了三次社会改革，十八个月的时间似乎短了一些。

西藏记载中传说牟尼赞普想努力平均财富，实行了土地改革，任命大臣监督平分土地和财产。当国王问到改革进行的如何时，他发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他又进行第二次改革，同样没有成功。他的这些理想计划失败后，曾去请教莲华生，他告诉他不可能用强制办法弥补起贫富之间的鸿沟。莲华生说："我们这一生的情况是前一世行为的结果，任何办法都不能改变这种安排"。关于这些记载至少说明在早期就试图进行过改革。

在牟尼赞普时他的政策是建立在他父亲和祖父的宗教记录上。他是由于母后的阴谋而结束了他的统治，他的母才朋萨 Tsephongsa 非常妒忌她的儿媳王后颇永萨 Phoyongs a ，她曾经是和她一样做过弃松德赞的妃子。颇永萨是一个很年青又美丽的女子。在弃松未死前就让她和儿子牟尼赞普结了婚，这样她就可免于在才朋萨手下受罪。相传才朋萨十分妒忌她的儿媳，以至毒死自己的儿子对她进行报复。也有的说是因为他的不受欢迎的改革而被毒死的。

由于牟尼赞普没有儿子和继承人，王位就传给了他的兄弟，穆第赞普，但他由于下列的原因而失去了资格。在他父亲弃松德赞时曾召集过一次关于边界的重要的秘密会议。国王和大臣们在桑耶宫第一层

的室内。穆第赞普不注意正在进行的重要会议，走来敲门，要求进入。尚纳南 Shangnanam 开了门，一位大臣立刻告诉他正在进行重要的会议。他感觉到受了侮辱，这位骄横的王子抽出刀来一下子就把这位大臣戳穿了。作为处罚，王子被放逐到洛扎喀曲 Lhodak Kharchu 在不丹边境的附近。当他的哥哥牟尼赞普去世，他的王位承继权就被转给他最小的弟弟尺带松赞了。（我幼年曾到洛扎喀曲去调查过这件事，这地方是一个密林围绕的山谷，人口稀疏。在穆第赞普被放逐时一定是荒无人居。当地人指给我看陡坡上的三个山洞，据说就是这位王子居住过的地方）。

可注意的是杲译师 Gos Lotsawa，珠拉称瓦和其它西藏历史家是依靠汉文记载，说在牟尼赞普死后是由足之煎赞普继位。但白达时说那些历史家没有把汉文记载的国王识别出来，因此就搞出一个新王叫足子赞普（译自汉文 Tsuchihchien 。最近由艾里克哈尔 Erik Haarh 所作的研究，也是没有弄清楚，哈尔说被放逐的王子的名字是木如赞普，穆第赞普就是尺带松赞。尺带松赞是在799年还是804年即位的也有不同说法。但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说在804年尺带松赞是国王。在藏文史料上他被称为萨纳来

由于萨纳来还很年轻，有四位大臣协助他进行统治。他们是：章卡白季云丹，Danka Palgi Yon den，娘定津 Nyang Tingzin，尚多尺苏 Shang do Trisur 和纳南才扎甲 Nanam Tridra gyal 这前两名大臣也称“班德”，因为他们都是佛教僧侣。他们按照前代国王的政策行事。

一些印度班智达被请到桑鸢寺翻译经典。萨纳来修筑了拉萨附近的噶琼神殿。由于当时还有反对佛教的，国王召集了一个由大臣和各地诸侯参加的会议。会上起草了一件广泛的文书要求大家发誓发展佛

教。出席会议的每个人都在文书上签了字。为此事曾在噶琼神殿前立了一通石碑。

在萨纳来统治时，西藏军队继续在西方骚扰阿拉伯人。根据 AL Yaqubi 西藏军队甚至包围了外乌孙尼亚 Transoxania 的都城。萨马干。哈绒阿尔若西德 Harun al-Rashid 的第二个儿子阿尔马门和土耳其斯坦的西藏总督签订了一项协议。总督赠送他一尊金像和宝石，这些后来都送到默加。

萨纳来有五个儿子：章莫 Tsang ma 达磨 Darma，尺祖德赞 Tritsug Detsen （亦称热巴巾）拉鉴 Lhaje 和龙珠 Lhundup。长子出家为僧，四、五两子早夭，当萨纳来于815年在扎 Drak 去世时，大臣们越过了达磨，因为他是反佛的，而且暴躁易怒。他们把权力交给了热巴巾，他是奉佛的。班第章卡白季云丹作了首席大臣，他是一位出家人。热巴巾娶了一位王后叫白介安楚 Palgye Ngang tsul。

热巴巾请来了三位印度班智达希兰得拉菩提 Silendrabodhi、达纳希拉 Danasila 和真纳米达拉 Jinamitra 并配备了两位著名的译师，噶瓦白采 Kawa Paltsek 和觉若吕义坚参。这两位译师的名字几乎出现在那时所有的藏文书上，他们对早先译出的经典也作了修订。他们使译经用的名称标准化。他们编制了第一部字典称为马哈乌玉巴提 Mahavyupatti、这是一部藏梵字典，对那些译经的人是不可少的。

热巴巾在即位后派军队在然介曾 Hrangje Tsen 的率领下到了中国边界。中国和西藏的佛教徒都出来调停，最后双方代表会于边界签订一个和平条约。这是在公元821年。这次和约的文字曾刻在三座石碑上，一座在长安中国皇宫门口，一座是在边境上，地名叫姑姑梅如 Gugu Meru 第三座在拉萨大昭寺门口，在举行和盟

时，举行了两种宗教仪式，即本教的杀牲歃血仪式和佛教的请求“三光”证临。

关于这个碑文已有若干种译本，因此不打算重复引在这里。总的说来它是肯定783年清水会盟时所定的边界和恢复友好关系。拉萨的这一石刻是立于公元823年。碑的西侧刻有盟文的藏汉文本；东侧刻有藏王对藏汉关系的总述。北侧刻有参加会盟的十七名西藏官员，南侧刻有参加会盟的十八名汉族官员。

我看见过拉萨的会盟碑，没有见过立在中国的。中国碑文的文本曾由英国在中国的高级专员从中国抄录后（1913年）交给了池门噶伦。池门噶伦曾于1913—14参加西姆拉会议。他是我的舅舅，他给了我一份中国的文本。和藏文的文本是大致相符的。

第三通碑，立在边境上的已经不存在了，除非它真的是藏在法国博物馆里，相传这碑是被法国人拿走的。一位知名的甘肃人阿巴阿洛 Apaalo （指黄正清，译者注），告诉我说他父亲曾看见姑姑美如的这通碑，有一群法国西藏学者曾拓了这通碑的铭文。阿巴阿洛也曾找寻过这通碑，但没有找到。

热巴巾为了要建新庙，他打发人到中国尼泊尔和西北去请泥匠、木匠、银匠和铁匠。这座庙叫做恩长多神殿 On chang Doi Lhakhang 在拉萨西南约三十英里吉曲河的附近。热巴巾还从印度采用了一新的度量衡制。

他作为对出家人的鼓励，宣布每一僧人由七户人家供养。这可能是为寺院抽税的第一个例子。为了增加僧侣的威信，他们被称为“国王头上的僧人”。这一称号来自热巴巾头上结一条长的带子，这带子拖在地上僧侣就坐在带子上。这是这些僧人在国王面前念经或进食时的情况。只有在僧侣是国王请来的客时方能受到这样的待遇。

虽然热巴巾对国家和宗教作了很多好事，但却遭到他哥哥达磨的坚决反对。由于他没有得到王位，他十分仇恨佛教。在一个有王室支持者的会议上，达磨想出了把他兄弟和班第白季云丹等搞掉的办法。他成功地把他兄弟送到不丹的巴若 Paro 地方，在这里他就无能为力了。然后使他相信那位僧人首席大臣班第和王后白介安芝有秘密的爱情关系。

班第章卡被送到聂塘，他在这里坐静。两位大臣白甲多热 Be Gyal Tore 和觉若拉龙 Chongro Lhalon， 是忠于达磨的就到聂塘去把班第章卡杀害了。他们在用刀刺他以前先把他嘴里填上布，使他不能呼喊。在聂塘据说还保存着班第章卡的头颅。

在佛教大臣被杀后王后才知道这些虚假的指摘，她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为了自已的尊严她就从宫墙上跳下来摔死了。

在公元836年的一天热巴巾正在善巴宫的花园里晒太阳喝青稞酒，大臣白甲和觉若偷偷从他背后爬过来抓住他的脖子直到把他的脖子拧断。

信本教的大臣们没有遇到反对就把达磨扶到王位上。白甲多热当了首席大臣，白塔纳清 Be Taknachen 当了内大臣，纳南甲查尺松 Nanam Gyatsa Trisum 当了外大臣。下令在全西藏废除佛教。他们把拉萨的大小昭寺和弃松德赞的桑耶寺，热巴巾的恩长多寺都封闭起来，把喇嘛喝酒的图画在外墙上。

僧侣被命令在结婚、当兵和当猎人中作出选择，或者宣布他们改信本教，走到那里都得摇一个铃铛。两者都不从，则处死刑。两个著名僧人娘定津 Nyang Tingzeng 和马任清曲 Ma Rinchen Chong 因拒绝放弃佛教而被正法。印度班智达和学者们发现无人尊敬都回老家去了。

达磨也被称为拉（意为牛）达磨。因为人们不喜欢他对待他们和佛教的态度。拉达磨把中部的西藏的佛教搞光了。但在他权力不及的其它地方则没有。公元842年对佛教的迫害正在进行，一位在叶巴寺 Yerpa 静修的僧人拉隆白季多吉决定想点办法。

拉隆白季多吉向拉萨进发，戴一顶黑帽子，穿一件黑袍子带白里子。他用木炭刷黑他骑的白马，袖子里藏了弓箭。他到了拉萨，把马拴在河边一个塔子的附近，然后步行走进城里。他发现国王拉达磨和大臣们正在看大昭寺前的和盟碑。

他在国王面前叩头，从袖子里摸出弓箭来，当时没有被发觉。他站起来后对准国王心窝射出一箭。国王射在地上挣扎，周围的人发生混乱，拉隆乘乱跑到河边，骑上他的马泅水而过河，马身上的木炭被洗掉，他又把袍子反穿过来，他从另一条路回到叶巴寺。

一队人马在追寻凶手，但没有看到一个穿黑袍骑黑马的人。在附近山上和村子里都作了搜查也毫无结果。当搜寻者来到叶巴寺，人们告诉他们这里只有一名秘密修行者住在山洞里。他们上去看时没有看到脚印和人活动的痕迹，于是没有进去。有一个人当真进去看了一下，在山洞远远的一头有一个人闭目静坐，搜寻的人走近他也不理。当搜寻者把手放在你胸口时他觉得他心跳很速。这个搜寻回到家里对他家里人说，他相信刺杀国王的凶手就是那位坐静的人，但他不想去告发他愿意牺牲个人利益做件大好事。有谣传说凶手已经被发现了，拉隆白季多吉于是离开山洞躲到东部西藏去了。

拉达磨死时他的小后有孕，大后也假装有孕找了一个弃婴声称是她自已的儿子。有些大臣怀疑这孩子是不是她亲生的，因为太大了。但是也有一些相信大后的说法，于是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云丹意为“母坚”。

当小后的儿子生出来后她怕由于有合法继承权而被害，于是加意防护，白天置于日光下，夜晚置于灯光下，这样他得到一个名字叫‘乌损’意为‘光护’。

乌损在拉萨承袭了王位，云丹去到雅隆，在那里他又开始了另一个支系。这是中央权威和王室世系的第一次分裂。另一次分裂是乌损的两个孙子造成的，尺扎喜才白 Tri Tashi Tsekpal ，他是大孙子统治藏部，基德尼马宫 Kyide Nyimagon， 小孙子被放逐到西部西藏的布让 Purang （今普兰县译者注），在这里他建立了西部的世系。

关于拉达磨有许多故事。传说他头上长着角和舌头是黑的。为了藏起他的角，他编两条辫子然后在头顶上打成两个结。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件事，除非是他的梳头人。相传这也是今日西藏俗官头上梳发髻的起源。据说这也是西藏人会见尊长时挠头吐舌的起源，表示头上无角，舌头不黑。

王室的悠久的世系在拉达磨被杀王国崩溃后就中断了。这是早期的历史西藏人认为这是法王 Chos Gyal 的英雄时代。

三、佛教生存的斗争

公元842年拉达磨被刺后王室世系的分裂标志着权力分散的开始。一直到公元1247年萨迦班智达受到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授权统治西藏十三万户前很难说有一个中央的政权。因此从公元842年到1247年是西藏中部的分裂时代。在这一时期内出现了许多小头目，经常为了自已的利益互相结盟或打仗。这些小权力中心，有他们

自己的城堡，统治者逐渐都成为僧侣。我们无法重塑这些小国的历史但是这四百年间重要的历史事件是可以综述的。

在拉达磨宣布废除佛教的第二年，有三位住在拉萨以南靠近曲乌日 Chu WoRi 山上的三位静修的僧人。他们的名字是藏若布赛 Tsang Rabsal， 岳吉瓦荣 Yogyewa Jung 和梅耳释迦牟尼 Mer Shakya Muni. 一天他们看见一些人认得原来都是俗人拿着弓箭出去打猎去了。他们向人打听知道佛教在西藏是被法律禁止了，所有僧人必须还俗，当猎人或者作本教徒。这三位静修僧决定逃出西藏。根据西藏资料说他们用骡子驮了一驮佛经，穿过阿里三围到达了噶洛 Gar Log 和伙尔地区 Hor， 最后来到安多，这里的牧民生活在玛曲河（黄河）边，他们供给这三人的生活，让他们给人们传教。

这个地区有一个年轻人原来是信本教的，自愿出家当僧人。他在受戒以后取名为吉瓦若赛 Gewa Rabsal ；他学经和领悟是如此迅速以致这三人给他改名为贡巴若赛 Gongpa Rabsal （意为全慧）。任何人都可以受初级的戒，但是要受僧侣的高级的戒就必须从一位僧人受从佛一直传下来的戒，一位僧人要有传承的世系，一直上推到佛自己。从中藏来的这三位僧人是有资格传戒的，因此贡巴若赛得以从格楚（ Getsul， 正式受大戒成为格隆 Gelong. 贡巴从藏若布赛受了大戒。在拉达磨死后很多年在中藏就没有举行过受戒仪式。但是佛教在东部和西部仍然在活动。

根据传说乌损的一位后裔，查那意希坚参 Tsana Yeshe Gyaltsen，在桑鸢有一处庄园，他学习了早期国王的历史和宗教记录知道一位学僧只能守格楚戒，正式的格隆大戒必须由受过全戒的僧人传授，当时在中藏已经找不到这样的僧人了，他决定派一些人到安多去学佛法。

他找寻志愿者，从藏和卫各选了五名最有希望青年，并给了他们以投拜师付的礼物。这十个人的名字是卢美楚尺喜饶，定意希承登，若克希楚才均乃，巴楚才罗卓，松巴意希罗卓，洛洞多吉旺徐，春宗喜饶僧格，波洞乌巴德噶和阿里武甲巴 Ngari Wogyapa 两兄弟。

这十个人到了安多，藏若布赛年纪已经很大了，他把教经的责任交给贡巴若赛。在这十个人正式受戒成为僧人后，他们就把返回中藏的桑药。他们发现支持他们的查那意希坚参已经死了，但是他的儿子阿达，尺巴 Ngada Tripa 继续供养他们。这些僧人问桑药的人谁看见过僧人，有个七十六岁的老妇人说她在六岁时看到过僧人。这个故事正好说明中藏佛教被禁的时间。

同时在西部西藏阿里地方，几德尼玛宫 Kyide Nyimagon 的一个孙子叫赞普柯热 Tsenpokhore 即了王位。他修建了托林寺 Toling 并决心做一僧人。他把权力交给他的兄弟松格 Song 柯热受戒出了家，取名为拉喇嘛意希奥。他发现西藏西部的佛教衰落了决定派二十一名少年到喀什米尔去学梵文研究佛教经典。在这二十一人中只有两人经受住炎热和旅途之苦。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的译师，他们的名字是任清桑波和来贝喜饶。他们请了一些印度班智达偕同他们回到西藏。他们回来以后正赶上印度教徒，佛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发生冲突。

公元978年班智达们来到西藏被认为是西藏宗教复兴的开始。人们这样描述，“在东部的一点火种被西部来的风吹燃了。”公元978这一年被称为佛教恢复的第一年，从密经传到西藏是746年，是在佛去世后1522年。虽然这些班智达们代表佛教的各个派别，但大[illegible]的怛特罗派是主要的。

再晚一些时候，意希奥又派人迎请阿底峡 Atisha，他是一位大

乘教班智达，当时住在印度著名的畏克拉马希拉寺 Vikramasila 意希奥的代表甲重生 Gya Tson Seng 和随从人员带着信和黄金来到印度。信上说。

很长时间以来，西藏是成了没有教法的地方了。假如你是这样一位人，我相信你是的——一位真正的佛教大师，你一定会来帮助我们。我是一个苦恼于渴的人，我渴望喝到从你口中流出的智慧之水。我以极大的耐心等待您的到来。

阿底峡拒绝了邀请和礼物，理由是佛教在印度已经衰微了，他的留下为防止进一步衰微是必需的。甲重生带着阿底峡的回答回到西藏然后再去印度从这位大师学经。意希奥以为也许是送得黄金不太够。因此他决定取得更多的黄金。他带了一支军队去打噶洛 Kar Lok，但被俘并关入监狱。他被告知如放弃佛教即可获得自由，他拒绝背教。国王又要求以等重的黄金来赎他。

意希奥有一位侄孙叫江曲奥，他是一位僧人。当江曲奥搜得所能搜集到的黄金时，仍然不够赎回意希奥，带了少数随从江曲奥跑到噶洛监狱去探望他的叔祖，他告诉他不要用黄金来赎他了；用它去迎请阿底峡吧。意希奥已经很老只剩一把骨头了。他最后由于年老和所受的非人道待遇死于狱中。

江曲奥回到托林后就物色一位合适的信使到印度去迎请阿底峡。他带了一封信给位在尼泊尔边境贡塘的著名译师纳错 Nagtso 。纳错得信后就来到托林江曲奥热烈地欢迎了他。给了他一个比自已的坐位还高的座位。以极恭敬的态度，叙述了他叔祖立志在西藏恢复宗教的努力。他也评论了大乘教和小乘教之间教法差异所造成的混乱。江曲奥然后说。"你知道去印度的道路，你也懂语言和习于炎热天气。你是唯一的人可以把阿底峡请来这里。这位班智达是唯一的大师可以

澄清我们的混乱和把我们领上正路"。纳错回答道："这将影响我的修习，但我愿意答应，你们如此对待宗教我不能拒绝你们的请求"。纳错带了五个随从，和给阿底峡的黄金和信，在江曲奥亲自送别下出发了。

阿底峡是畏克拉马希拉寺的长老，讲经的座主。纳错的到达由在那里学经的西藏人甲重生报知。阿底峡建议西藏人的请求要保密，因为其它班智达们反对把他弄到外国去。他们让西藏人当这里的学生，他们也答应了。当纳错最后见到阿底峡时，他把想请他到西藏去的全部故事讲了一遍，强调了他去的必要。

阿底峡认识到西藏人所遭遇的巨大困难，他不忍再拒绝他们的邀请了。由于他所负寺院的重责，做出要走的决定是困难的。但在一次静坐和祈祷时他的护法神，度母催促他去西藏。他然后下了决心。寺院的方丈希拉卡拉 Silakara 要纳错发誓在三年后把阿底峡送回来。

一大群人取道尼泊尔向西藏进发。它包括阿底峡和二十四名弟子，纳错和他的五个随从，甲重生和他的两个伴当。他们在尼泊尔受到国王的热情接待。接着一个欢迎团从西藏来接他们。公元1041年是在尼泊尔过的，唯一不幸的事情是甲重生的去世。

公元1042年他们到达了西部西藏的金殿托林寺，它是绛穷意希奥建的。译师任清桑波是这个寺的堪布，这也是建在阿里地区的第一座西藏寺院。阿底峡和他的弟子订正了许多藏译佛经的错误和混乱。阿底峡在托林寺用梵文写了一本 Bodhipatha Pradipa 经，藏文称为江曲拉莫季仲美，意为菩提道次第明灯。

当他回印度的日期来到时，他从托林到了普让。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从中藏来的俗人仲东巴，他是来拜阿底峡为师的。公元1045

年他们到了尼泊尔边境附近的济绒，因为阿底峡的三年已经满了，他正要回到印度去。在济绒他们听到由于内部纠纷从尼泊尔到印度的道路被切断了。这时候仲东巴就请阿底峡到卫藏去。但是纳错反对因为他已向寺院的方丈赌过咒，三年后要把阿底峡送返。但是阿底峡说由于回去的道路被阻断了，一切就搞他都不必负责；另外中藏的僧人都要求他去，他也不好拒绝。

由于本教和佛教之争崩溃了的王国，在中藏出现了许多敌对的小国，其中许多是由喇嘛或和喇嘛有密切联系的俗人统治的。仲东巴于是给主要僧侣首领写信，他已经请阿底峡来访问中藏了。各个喇嘛头头们大张旗鼓地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他们聚集在白塘列队等候阿底峡的到来。

当阿底峡远远看到他们就问仲东巴那些人是谁，仲东巴回答说是喇嘛的头头来欢迎你。阿底峡说："假如你们有那么多的僧人在中藏，那还要我来干什么？"但当他走近时看到了这些人衣服华丽，随从如云，旗锣伞扇，一片喧腾，这和佛的教导是不符合的。

这些宗教头头互相竞争着款待阿底峡。开始他是桑莺土豪拉尊菩提若甲 Chatsun Bodhi Raj 的客人。他在那里住了几个月，然后又当了另一宗教首领库通宗住云仲 Khuton Tson drus Yung drung 的宾客。他把阿底峡接待在他的寺院汤波且 Thangpo che 里。接待阿底峡成了一件关系威望的事情。但是库通云仲一朝接到他的客人以后，一点都不使客人感到愉快和值得。阿底峡感到不快，仲东巴溜出汤波且到了温地 On 。聂塘的首领班通 Bangton 听到这情况，他就派了两百名骑兵去接他。他先去拉萨接待他，然后到聂塘接待。阿底峡在这里住了好几年。最后在1054年死于聂塘，至今他的遗体仍然保存在聂塘的一个佛塔里。

仲东巴被阿底峡指定为继承人。在聂塘修了一所寺院专供阿底峡的护法神度母。1057年他到了热振寺，他扩建了寺院，他在那里教授弟子直到1064年去世。

阿底峡的教导被仲东巴发展成为一种改革运动。结果在西藏出现了一个新的佛教派别。为别于莲华生所创的旧教派，阿底峡和仲东巴的弟子们被称为噶当巴（教义统一派）原来的教派称为宁莫巴（旧教派）。

萨迦派从萨迦寺院而得名，它是1073年由昆氏贡却甲波建的。噶马巴派是噶举巴派的一个支派。它是由噶马巴都松堪巴 Karmapa Dusum Khenpa 的从者们创立的，他于1155年建立了楚浦寺，这些寺院和其它寺院在后来的西藏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任何西藏王公或地方首领派人到印度去请法师都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成就。在这些大人物之间存在着对立的关系，他们争做宗教的施主以取得威望。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印度班智达都能安全到达西藏。有一个记载说两位学者和他们的藏语翻译走失了，这两人无法和当地人交通，结果被人抓去当了牧羊人，据说这事情发生在中藏的达纳 Tanag 他们留下的石刻使梵文学者感到极大兴趣（这两个人的名字叫扎拉仁瓦 Trala Ringwa 和梅提 Meti 见 Rdzogs ldan Dpag bsam）

四、喇嘛和施主

公元1207年西藏人听到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兵正在征服唐古特帝国，汉人称为西夏。这一地区包括今天甘肃和青海的一部分。在

中藏召开了一个会议，指派了一个代表团到蒙古汗王的帐前去表示归顺。从此建立了友好和朝贡的关系。为此汗王的军队没有侵入西藏。

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西藏人不再纳规定的贡赋，关系紧张起来。124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新汗王窝阔台的第二个儿子叫阔端的，带兵来攻打西藏。三万军队在拉吉和多铎 Leje and Dorta 的率领下到达了拉萨以北的澎波，他们焚烧了热振寺和甲拉康。宗教首领苏桐 Soton 和五百多僧民被杀，市镇村庄遭到抢掠。

阔端王子下令找寻一名西藏的喇嘛首领。他们通知他有三位著名喇嘛：止贡寺的喇嘛是最富的，达垅寺的喇嘛是最善交际的，萨迦寺的喇嘛是教法最好的。阔端派人带着信和礼物去见萨迦喇嘛贡噶坚参，信上说：

我，最有权势的王子阔端，现在通知萨迦班智达贡噶坚参，我们需要一个喇嘛来劝化我的无知的属民，使他们知道如何在行动上合乎道德和精神。

我还需要一些人为我死去的父母祈祷，对他们我是深为感恩的。

为此我已考虑了一些时候，经过仔细斟酌，我认为你是唯一能胜任这项工作的。因为你是我选中的唯一喇嘛，我决不会接受关于年龄和旅途辛苦的借口。

佛陀为所有生灵而献身，难道你就不吗？你要躲避这一责任不就是反教吗？我不难派一支军队把你拿来，但那样做会对无辜的生灵造成损害。为了佛教的利益和一切生灵的利益我建议你立刻就来。

作为对你的优待，我将对住在太阳西边的那些僧人表现仁慈。

我赠送你五个元宝，一件镶有六千二百颗珍珠的缎袍与甲和

丝织的鞋子和二十四各色绸缎。它们将由我的使者交给你。他们《是多赛贡 Dho Segon 和翁绕噶马 Un Jho Kharma 。

（日期）龙年（1244年）八月卅日。见《萨迦世系》

这一邀请实际上是一封哀德美顿书，贡噶坚参在收到后就接受了。他也被人称为萨班，因为他精通梵文知识。他在1244年离开萨迦向青海地方而去，王子阔端就驻扎在这里。萨班带着他的两个侄子，一个是十岁的帕巴罗追坚参，另一个是六岁的恰那。蒙古使者陪伴着他们。

在旅途中他们经过拉萨，帕巴在大昭佛像前由萨班给他传戒成为僧人。萨班一路上讲经说法，因此路上耽搁了很多时间，他打发他的侄子先走。当1247年萨班到达阔端的驻地时，这两位年轻的西藏人已经赢得了蒙古人的欢心。据西藏记载萨班见阔端于甘肃的省会兰州。（汉籍为凉州，译者注）。

萨班给阔端说佛法，甚至劝阔端不要把大批中国人扔到河里。当时正以此减少当地人口，这并不是经济的原因，而是政治的原因。因为大量的中国人口对阔端的统治形成威胁。在萨班说这样做是违反教义时阔端就停止了。

萨班被授与统治中藏十三万户的权力。他给西藏的领袖们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反抗蒙古人是无用的，因为蒙古的军力太强了，应当按时纳贡。

西藏人派代表请求萨班返回西藏，但他拒绝了，他认为他在青海地区更有用些，这里他受到阔端的优待。他把他写好的一部经图贝宫赛 Thub-pai-Gong-sal 意为‘佛意’（汉译为《彰所知论》译者注）。他知道自己活不长了，他把这部经当作遗产留给他的国家。对世俗的施主和百姓他写了一封长信劝告他们，大意如下

王子告诉我，如果我们在宗教上帮助蒙古人，他们将在世俗事务中支持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把我们的宗教传布到远方。王子正开始学习和了解我们的宗教。假如我在这里住得长一些，我将能去扬我们的宗教以帮助我们的国家。王子已允许我自由传教并供应我所需的一切。他说他要对西藏做好事，我也得对他做好事。他现在完全信任我。我觉得在王子的心眼里是愿意帮助所有国家的。

我不断的向他的子孙和大臣们讲说佛法。我现在已老了，活不多长了，你们也不必为此担心。我已经把一切都教给我的侄子帕巴了。

一名西藏代表把这封信带回西藏去，还有送给著名喇嘛和寺院的礼物。萨班把一个海螺和乞钵交给帕巴，这就表示把宗教权力交给他了。公元1251年萨班死在兰州，享年七十岁。

萨班死后不久，阔端王子也去世了。继承他的权力的是忽必烈。西藏人称他为色清 Se - Chen 。1253年忽必烈坐镇青海地区。他把十九岁的帕巴召到宫廷，他对这位年轻僧人的学问大为赞赏。忽必烈请求他传授佛法，但这位年轻喇嘛告诉他要学法必须先受戒。那就得向师付磕头，拜帕巴为师，在任何场合相遇都必须以师礼相待。忽必烈说他并不反对磕头，但只能在学经和私见时如此，公开则不行，因为这将损害他的权威。忽必烈还同意在决定西藏事务方面要征求帕巴的意见。但在中国和蒙古的内部事务帕巴不能干予。帕巴同意了这些条件，忽必烈就从他受了戒。根据 Howorth 的说法忽必烈在受戒时是坐在一个比帕巴的位子低的坐位上。在处理政府事务时则坐相同的位子。

根据传说，帕巴给忽必烈的二十五个大臣在三个场合传了戒。他第

一次传戒后得到对中藏十三万户的政教权力，第二次传戒后得到一件佛的遗物和统治曲卡松 Chol-Kha-Sum 的权力，这是指卫藏、多堆（康）和多美（安多）三个地区。当1260年忽必烈成为汗以后，帕巴被封为帝师，意为“皇帝的师付”。这是第三次传戒后。他还得到“Gyai-me-yur Chen - mo”的称号，这一名称意义还不明，有些人说这是一个中国地方，另一些人说这是同意不再把人扔到河里以控制人口。

忽必烈不愿意允许帕巴所属教派以外的教派存在。但是帕巴主张应当允许其它教派各行其事。这使得帕巴受到西藏各个教派头头的拥护，不过几个不同教派的存在确实削弱了萨迦家族的统治权力。很有趣的是当忽必烈还是一位王子时，就有另一位喇嘛在他身边，这个喇嘛是噶玛巴巴克西 Karmapa Paksi 他是噶玛巴派的一员。在他死后就开始了噶玛巴喇嘛的转世，这是西藏的第一个转世的纪录。

公元1254年忽必烈给了帕巴一道封敕，给他以统治西藏的最高权力，这个封敕被记在萨迦的文件内。内容如下：

作为佛的虔诚信徒，世界上全仁慈和不可战胜的统治者，他的出现象太阳一样照亮了黑暗的角落，我一直对你们地方的僧侣和寺院给与优待。

对佛有信仰，我研究你叔父萨班的教法，在水牛年（1253年）我又受到了你的教训。

在我从你学佛后，我受到鼓午，继续帮助你的僧侣和寺院，为了报答从你学到的教法，我要给你一个赏赐。

这个封敕如在我面前一样，它给予你整个西藏的权力，使你能保护宗教制度和你的百姓的信仰，传布佛的教法。

另外，我敬爱的师付，我赠给你一套袈裟，一顶帽子和一件

长袍，都镶满了黄金和珍珠，一个金坐、一柄金伞和一个金杯，一把剑，剑柄镶有各种宝石，四条银子，一条金子，一峰骆驼和两匹马，都带鞍鞯。

在这个虎年我还要赠你五十六条银子和两百箱砖茶，一百五十四绸缎，使你塑造神像。

应当告知西藏僧民，使他们知道我在为他们干什么。我希望他们不要再去找寻你以外的主子。

带这份诏敕的人，不许欺压百姓，僧侣不应当吵架和动武。他们应当在一起和平快乐地过日子。

那些懂得佛的道理的应当努力传教，那些不懂的，应当好好学，每个人都要念、写和默想，向佛祈祷，并为我祈祷。

有些人说不学经也能入定，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先懂，然后才能修炼，高级僧侣应当教导年轻的，年轻僧侣则应当向他们的上师好好学经。

对僧侣我要说，他们应当对免除捐税表示感激，他们的生活也没有受到干扰。假如你们的僧侣不自觉地执行佛的教训，我们蒙古人是不会敬重他们的。

不要认为蒙古人学不会你们的教法，我们是能够慢慢学会的。

我对你们的僧侣高度赞赏，我对他们不在公开场合损伤我的威严也表示欣赏。

因为我已做了你的施主，你也必须执行佛的教导表示尽责。这一诏敕是我使我成为你的宗教的主持者。

（日期） 木虎年（1254）夏仲月初九日。

1260年，蒙哥汗去世后，忽必烈成为新汗，他要求帕巴主持登基仪式。有这样的传说，蒙古汗和西藏喇嘛间的喇嘛和施主的关系

就像"天空太阳月亮一样"。（西藏的传说是 Yqya-bod chos-yon nya zla rqya 意思是汉藏佛法，施主俨如日月，作者故意拉为蒙藏，是别有用心。译者注）

1265年帕巴从他幼年时离开第一次回到西藏。在萨迦他受到所有西藏首领的隆重欢迎。他们都向他致敬。他分散了礼物并提出劝告。在中藏的实际行政则是由一位叫本勤（大主宰）的主持。在他下面是十三万户，各万户统治自已的人民，由帕巴委任的本勤叫释迦桑波。

帕巴回藏两年后，汗的一位使者来到萨迦，请帕巴回到蒙古宫廷去。帕巴安排了十三名官员照顾他路上的需要，帕巴和随从官员的服装都仿蒙古人的样子。有些喇嘛批评帕巴的做法，其中一人叫春登日结 Chomden Riqral 是一位纳塘寺的喇嘛，他给他写了下面的诗句：

乌云遮佛噶举巴，
官员横暴民艰苦，
喇嘛装束似蒙古，
有人'例外'不省此，
自身敢称八思巴。

帕巴也以诗回答：

佛说兴衰自有时，
苦乐依仗轮迴法，
官员所为何所与？
为使蒙古信我教，
我穿蒙服也何妨！
有人不省此中意，

定系愚人少智慧。

帕巴就这样向蒙古王廷进发了。在拉萨附近他经过格尔寺 Ger 帕巴很羡慕它，说是有些喇嘛运气真不错呀，有这样的好助手为他修建如此华严的寺庙。本勤释迦桑波，陪送帕巴到边境，听到了这话就察看了格尔寺的样子画了一个图样，决心在萨迦建一所同样的庙。释迦桑波回到萨迦后就开始建庙，但在没有完成就去世了。贡噶桑波原来是他的行政助手现在继承了他的位置，继续完成了修建工程。这一殿宇是很巨大的，被称为拉康钦莫。

当帕巴来到蒙古，他受到忽必烈妻子和长子的欢迎。他们都走出相当距离来欢迎他，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当1268年到王廷后他向忽必烈呈献了他设计的蒙古新字母。这种字母是完全按照藏文写的，只是像汉字一样从上往下念，而不像藏文或梵文由左到右念，忽必烈非常喜欢这种新字母，后来称为八思巴字。他宣布公文一律使用新字。由于它是方块字用起来非常麻烦费事，在忽必烈死后这种新字很快就不用了。但有很多重要的官方记载是用这种字写的。

忽必烈又封帕巴以新的封号"印度神祇的王公，天府下地以上的奇异神王，新字创造者,全世界的和平使者，五明的大师，帕巴皇帝之师"。送他的礼品有一千个银元宝，五千九百匹绸缎。

在日记里帕巴提到在1271年忽必烈友好地接待了一位远方来的客人，他是偶然来访问这位汗王的，日期正是马可波罗访问蒙古王廷的时期，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提到他会见过汗的喇嘛但没有指出名字。

当1274年帕巴打算回西藏去时，汗王决定陪他走一段路。出于对喇嘛的喜爱，他和他在一起好多个月直到他到达了玛曲河（黄河）上湾处，这是在安多地方。在这里蒙古王廷给帕巴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西藏喇嘛又给他以同样隆重的欢迎，他们是专门来迎接他的。

在路上走了两年，帕巴于1276年回到萨迦。他于1280年在萨迦去世。他死时只有四十六岁。有人说他是由一位亲近的侍从毒死的，他们正阴谋反对本勤贡噶桑波。这位侍从以帕巴的名义给忽必烈写了一封信，控诉本 的不忠。忽必烈派了两员大将和一支军队来处理这件事。听到蒙古军已经接近了，这位搞阴谋的就把帕巴毒死，他自己也自杀了。

蒙古将军认为帕巴是由本勤杀害的，就审问本勤贡噶桑波。本勤穿着白袍戴一顶黑帽站在他们面前，他否认他有任何不忠并与帕巴之死无关，他宣称假如他被正法将流出白血表示他是无辜的。将军们把本勤正法了，在砍头以后的确流出了白血。当忽必烈得知全部案件的情况后，就说这位行政者穿一件白袍是表示他无辜，戴一顶黑帽表示控告是假的。由于这两位将军没有对案件进行彻底审查，汗王就把他们正法了。由于这个故事的流传，藏语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些表白语："你砍了我的红脖子会流出白血"。"你给我的白身戴了一顶黑帽子"。

在帕巴死的这一年，1280年，忽必烈征服了整个中国，并且成了中国皇帝。在他死以前曾派人带着礼品和书信向忽必烈的成功表示祝贺。

恰那是萨班的小侄子，他和帕巴一起到了蒙古王廷，后来娶了一位蒙古公主，但二十九岁就死了。他的儿子达尔玛巴拉 Dharmapola 于1282年在北京受封为帝师。尚忠 Shang Tsun 做了萨迦新的本勤。

大约在1286年的时候，有一个瑜伽师叫乌金僧格，他经常在西藏与印度之间旅行，他发现穆斯林在印度的发展，佛教快要绝迹了。在一次对印度的访问中他设法和锡兰国取得联系，他们募捐了一笔钱来修理菩提迦雅的大寺。在重修过程中乌金僧格和五百名其它瑜伽师

住在寺院的北端。在那里修了一座门取名为“西藏门”。

相传忽必烈打算派军队取道西藏进攻尼泊尔和印度，萨迦本勤尚忠坚决反对这样一个计划，瑜伽师乌金僧格给忽必烈写了一首宗教长诗劝他不要和印度、尼泊尔打仗。汗王大约是接受了这些抗议，因为计划中的战争并没有发生。

帝师达尔玛巴拉于1287年出发回西藏去，但死在旅途中，后来在本勤阿兰时，止贡万户强大起来向萨迦的权威挑战，并向之进攻。阿兰带领一支军队包括一部分蒙古骑兵，打败了他们。在1290年他们打到止贡地区，把寺院烧了，杀了许多喇嘛。有些逃出来的跑到工布和塔布，他们后面跟着追兵，一路劫掠村庄。阿兰的名字刻在塔布的岩石上至今仍存。

公元1295年忽必烈汗去世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蒙古人如何取得对西藏的军事控制，开始是萨班于1247年对王子阔端的归顺，整个这一时期实际行政权仍在西藏人手中。在忽必烈汗时在蒙古统治者与西藏喇嘛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具体的转变，比较阔端给萨班的信和忽必烈给帕巴的信，可以看出前者是王公与属民的关系，后者则是施主对喇嘛的关系。这信是独一无二的在中亚的施主与喇嘛关系的概念，在这里对世俗权力的支持，换来了对宗教权力的精神支持。这种关系不能用西方的政治术语来说明。我们可以审察汗王对帕巴的态度：他是如何宠信帕巴，他认为帕巴是自己的宗教师付和西藏的最高权威，向帕巴学经和陪送帕巴直到安多地区，进一步表明了这是一种互相合作与尊重的关系。这种施主与喇嘛的关系是由蒙古的忽必烈和西藏的帕巴建立起来的。这就是西藏人与蒙古人之间政治宗教关系的基础。后来满洲皇帝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由于清王朝的崩溃，这种施主与喇嘛的关系也于1911年中断了。

在忽必烈死后，蒙古在中国的势力走向衰微。萨迦在西藏的势力也是如此。公元1305年达尼桑波贝 Danyi Zangpo Pal (1262—1322)登上了萨迦的宝座，在他的助手来巴贝 Legpa Pal 和僧格贝 Sengge pal 的协助下统治了十八年。达尼有七个老婆。他的一大群孩子是造成萨迦权力分裂的原因。有四个儿子都各自建立宫殿，继承世系。萨迦统治喇嘛的宝座此后就轮流充当；但是实际权力是在本勤和各万户手中。

忽必烈汗宠信萨迦派。他的后人并没有独信一派。公元1331年一位噶玛巴喇嘛若均多吉 Rangjung Dorje 被请到中国蒙古王廷。两年后他主持了妥欢帖木耳的登基礼。这位皇帝封他为“徧知教法噶玛巴佛”。若均多吉于第二次访问蒙古王廷时于1338年死在中国。

1350年在本勤噶瓦桑波和萨迦喇嘛锁南坚参时，中藏的卫地落入了有力万户帕木竹巴绛求坚参的手中。这标志着萨迦权力在中藏的衰退。绛求坚参是一位僧人，他是第二个宗教统治的创建者。

五、帕木竹巴，仁蚌巴和藏巴汗

说明朝的中国皇帝从蒙古人那里继承了对西藏的权力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蒙古人在缔造他们的帝国先控制了部分西藏又经过了若干年才征服了中国。在绛求坚参时(1302—64)西藏已经从蒙古人手里赢得了独立。中国则在1368年在朱元璋的领导下赢得了独立。西藏喇嘛被请到明朝的宫廷已不像被请到蒙古宫廷那样的政治地位了。

萨迦在中藏的衰微导致了帕木竹巴的兴起，“帕木竹巴”一词意为‘母猪船’，这是给予一位1158年从喀木来的喇嘛多吉甲布的称号。他在泽当渡口附近建了一所小茅棚，叫帕木竹。他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僧人，吸引了很多弟子。不久在他茅棚旁建起一座寺院，叫作贴寺 Thel 有一个帕木竹巴的弟子叫陈俄仁波且 Chennga Rimpoche 后来成了寺院的座主。这时候有一位喀木人多吉贝 Dorjepal 自称是朗拉喜 Lang Lhazig 的后人，他受到陈俄仁波且的注意，因为他表现出能力和成就，多吉贝就被指定为乃东庄园的头目。

在帕巴时，改组中藏的万户时，多吉贝被指定为帕木竹万户。以后这个职位始终保留在朗氏家族的手中。万户长的驻地在乃东。朗氏家族的习惯要有一个儿子不结婚来管理寺院和万户事务。其余儿子都结婚以绵延家族。长期来这个家族经历了许多动荡。当绛求坚参还年轻时，朗氏家族正处于衰落阶段。

绛求坚参生于1302年，在十二岁的时候被送到萨迦接受宗教和行政训练。作为一个孩子他表现出是未来万户长的好候选人，因为他非常有毅力，勤奋能吃苦。他在西突巴（萨迦四大支派之一，译者注）下面接受训练。他是一个著名喇嘛最美巴的弟子，他随着这位老师和其他来学的人学习了七年。在学习终了时，老师问他是想当一位僧人还是当万户，他回答说想当僧人。老师说他永远当不了一个好僧人，倒是能当一个好万户，因此他专门教给他军事战略方面和对付各阶层人民方面的训练。

为了使他懂得平民的生活情况，老师让他烧火、拾柴和照看牲口，还让他练习演说和领导群众工作。最美巴告诉他要想当一个好领袖，首先必须为别人服务，指导别人的工作，还必须学会自己动手干。绛

求坚参很认真的接受了这些训练。他的自信和野心也随着增长了。他和平民家庭的儿童都搞得很好，但对一起受训的从有权势家庭来的人则有反感。

当绛求二十岁时，他的叔父乃东万户长被萨迦喇嘛以滥用权力为理由免职了，绛求被指定为万户长。他得到万户的印是用檀香木刻的。1322年他离开萨迦回到乃东去当万户长。他指定苏奴桑波 Shunu Zangpo作他的助手，然后就开始改善他所属地方的情况。他修理老碉堡，建立新宫殿，在山谷里种树，在衫曲河 Shamchu 上建了桥梁。他也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减少了一些租税。

在他叔父任万户长时，相邻的万户雅桑曾霸占了乃东万户属民二百八十户和他们的份地。绛求任万户长后很快进攻雅桑收复了失去的土地。这两个万户的对立状态存在了一些时候。土地之争导致了萨迦统治者审询，蔡巴万户与雅桑万户很好，就贿赂了审案官员，做了一个假报告，结果争议的土地又给还雅桑。

乃东和雅桑的纠纷继续下去，1337年一位新的萨迦行政官俄些儿僧格 Odser Sengge 就任，对这件事再作审询，但他也受了贿赂，这件案子就被搁置起来了。1345年两个万户又打起来了。这时另一位萨迦行政官王徐若尔巴 Wangchuk Rulpa 又调查这件案子，做出了有利于绛求的决定。但是雅桑万户不接受这一决定，纠纷还是继续下去。

萨迦喇嘛的一位个人助手参与了这一阴谋。他说他锁南坚参是乃东前万户长的亲戚。这时候萨迦喇嘛和他的官员们对绛求的顽固坚持和气势汹汹的态度不满。就由内务大臣下令免去绛求的乃东万户长职务而把这个职位给了锁南坚参。锁南就到乃东去就任，但绛求拒绝交出权力，于是出现了僵局。

几个月后内务大臣王春 Wangtson 写信给绛求请他到卫地的一个叫卓龙巴 Drok Lumpa 的地方去接受萨迦喇嘛赠给他的一面奖牌。绛求认识到请他去卓龙巴可能是一个阴谋。在快要到达那里时，他就对一个亲近的随从说："假如我被捕，你就立刻回到乃东告诉那里的官员们，要准备打仗，一定不要交出乃东。不管你们听到他们如何对待我。这是关系到他们是否能存在的问题。他们就是把我脱光了游街，剥了我的皮，你们也决不能把地方交出来"。

和他予料的一样，他一到达卓龙巴就遭到逮捕了。他被带到萨迦大臣王春的面前。王春问他为什么不把万户印交给锁南坚参，他是拿着萨迦喇嘛的委任书来的。绛求回答：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锁南坚参是我的亲戚，这些年他藏在什么地方呢？假定他就是我的亲兄弟，我也应当管理我的地方。我并没有违反了萨迦的法律，我为什么要求交出万户职位呢？由于锁南没有丝毫的功劳，要他当万户长无异让腿来干头的事情。

绛求坚决不屈服。王春把他关了九十三天，在第九十五天王春把他找来，给了他一套干净衣服和一个舒服的坐位，很温和地对他说：

"你为什么不肯放弃万户职位呢？萨迦喇嘛已经委派锁南坚参接替你，你不服从也是无用的。假如你同意现在辞职，我答应两三年内把地方交还你"，绛求回答："在锁南坚参和我的脖子上拴上一封信，把我们送到萨迦喇嘛那里去审判吧。不这样，你就把我杀了然后夺取我的职位吧"。

这使王春很难办，他无权杀他。另外他逮捕和监禁绛求，萨迦喇嘛根本不知道；他也没有意思要送他到萨迦喇嘛那里去审判，他除了释放绛求外，一点办法都没有。

在释放以后，王春写信给萨迦喇嘛，报告绛求拒绝把乃东交给锁

南竖参。在王春的支持下，蔡巴雅桑和汤波且结成了联盟。

绛求回到了乃东，在萨迦王廷的一个朋友告诉他，在萨迦大臣们之间是有分歧的，主要在行政官王春和王徐若尔巴之间。他劝绛求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王徐联合起来反对王春。绛求给王徐写了一封信请他到卫地来亲自调查事情的真象，王徐接受了邀请，接着访问了乃东。

王徐并不是一个很能干的主要行政官，萨迦属下的官员都不很尊重他。当他受到绛求和官员们的盛大欢迎时他很感动。开始偏向绛求这一边。他写了一份有利于绛求的报告，回到萨迦后继续向萨迦喇嘛为绛求申诉。关于绛求的有分歧的报告，使萨迦喇嘛产生了混乱。结果使绛求有几个月的缓和。不幸的是他的新盟友王徐若尔巴不能久居其位，不久就由噶瓦桑波 Gawa Zangpo 代替他的职务了。

就在这时候，汤波且万戶，在王春支持下进攻并打败了相邻的羊卓万戶，这个万戶是和绛求结盟的。这些相对立的万戶准备来一次大摊牌。绛求在自已的传记中写道当他听到蔡巴、雅桑和汤波且万戶在拉萨开会，雅桑的万戶宣称他将在羊卓过夏到乃东过冬时，他几乎气炸了肺。

1351年雅桑与乃东之间发生了战斗，绛求取得了胜利。这时萨迦有责任来决定那一方应该得到土地那一方该失去。萨迦喇嘛迟迟不作决定，雅桑万戶最后求助于王春。王春给新任本勤噶瓦桑波写信，这时他正在阿里，要求他立即返回萨迦。

噶瓦桑波回到萨迦后，召集官员开了一次会，决定派教师聂美巴和囊索苏生 Nangso Soseng 去给双方调停。当绛求听到他以前的老师要来调停，他就带信给聂美巴，请他不要来，因为雅桑万戶可能不接受他的判决，因为聂美巴对绛求非常友好。但是聂美巴终

于来了。于是绛求请他照顾他的对手，以免使雅桑万户感到偏袒。调解完全失败了，当聂尖巴到雅桑时找不到万户，他故意避免会他。

调解失败后，萨迦决定派一支军队来处理这件纠纷。假如绛求不服从萨迦的决定就要受到正法，雅桑和汤波且万户则免职。三个万户将合为一个，由萨迦直接管理。绛求听到这一消息后，他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他认为他能够成功地抗拒萨迦的军队，因为他的军队是训练有素的；他的地方是有坚固的碉堡的，而且还有羊卓万户这个盟友，但这就表示公开反叛了，他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干这一手。

当噶瓦桑波带着兵来到闹事的地方，绛求送了他金银各一锭，要求他公正处理这事，绛求愿意合作。当本勤离开乃东还有两站路时，绛求欢迎他，他发现噶瓦桑波的随从人员对他特别客气和恭敬。他感到这中间有鬼，他把他的客房供他们使用，这是在河的另一边，距离他的堡垒和宫殿约一英里。

当天晚上他去向本勤致敬，他告诉他们照萨迦官员的这种做法，西藏是永不会安宁的。在他要出来时，他回头说，"记住，你们就是杀了我，东边和西边都会有人来领我的尸首，萨迦将遇到麻烦。假如你们能使雅桑和我们的纠纷满意地解决，萨迦和你的名字将永垂不朽。"自传上说噶瓦桑波当时没有吭气，仅仅点头表示同意，但带着不高兴的表情。

第二天雅桑万户带着人来参加谈判了，他们在客房附近扎下帐房。绛求指示他的官员准备防守堡垒和宫殿，如果他被逮捕的话，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投降。

当调解会议正进行时，绛求和雅桑万户被兵包围起来，而且被绑起来成了囚犯。乃东官员感到情况有变就禁止萨迦部队进入碉堡内。绛求怕俘虏他的人可能利用他的万户印对官员发假命令，他假装焚烧。

他要求生火和一碗豆蔻水。一盆木炭火送到他面前，他把头蒙起来，假装要吸豆蔻水的汽，轻轻从怀里取出印丢在火里。一个看守的人问他那里出来香气，他回答说："我的檀香木印"！

连续三天绛求和雅桑万户面对着审询，一系列假的控诉归到绛求头上，要求他盖印承认。但他却轻松地说办不到了，我印已经烧了。

第三天，他喊腰疼，要求找他的一位随从来。他偷偷写了一封信让随从尽快带给碉堡里的官员。信上告诉他们照他以前的指示办，不要理会以他的名义发的任何命令，因为印已经烧了。

同一天晚上他叫来一个看守他的人，要求见噶瓦桑波的秘书。绛求对他说他决定接受萨迦的决定，他打算交出他的碉堡和宫殿。第二天早晨他就被释放了，他被带到噶瓦桑波面前，他假装害怕和悔改，绛求对本勤说，请对他的官员们仁慈些，他们拒绝投降是在执行他的命令，他建议派他的两位随从去通知他们投降，他的官员是不会相信别人的。

噶瓦桑波很高兴绛求改变了态度，但是坚持他的建议须有保证，绛求在法厅上又重复了他的诺言。两个随从就带着他的信回到乃东。官员们起初很惊奇，都准备要投降了，但是随从提醒他们绛求早先的指示是要他们不理会以他的名义发的任何命令。

噶瓦桑波发现自己上当了，他就狠狠地对他施行酷刑。当他在痛苦中呻吟时，他发誓今后获得自由时要夺取萨迦的宝座。绛求被放在一辆牛车后面沿着河走，让人们看到他所受的凌辱。一条牦牛尾的帽子给他戴在头上，但他把它摇掉到河里。萨迦的兵士讥笑他，他说很快就要回到乃东去了，因为他的脸是向着他的城堡，尽管牛车在把他拉走。

绛求被带到萨迦附近的一个镇上关了起来。人们从房子里来讥笑他，向他扔土块，他张开口接了一些土块。他笑着说，"是的，我正在

吃萨迦的土。不久我就要吃掉萨迦了"。

本勤噶瓦桑波宣布汤波且、雅桑和乃东合併，但是乃东的官员拒绝投降，他不能使合併成为现实。他急需回到萨迦去，他在河对面留了一部分军队就回去了。

一些时候来，噶瓦桑波和王春之间发生了磨擦，王春是受到萨迦喇嘛的信任的，他还从蒙古汗妥欢帖木耳那里得到一个封号。噶瓦桑波看到唯一机会能继续当权必须找一个有力的盟友，他给绛求写了一封信答应把他放出来，恢复他的职权和地位，只要求绛求不反对他。聂美巴是这一允诺的见证人。绛求接受了这一条件，于1352年被释出狱，在狱里共呆了三年又一个半月。

绛求回到乃东受他的臣民的热烈欢迎，他告诉他的官员们，他之所以能保全性命唯一原因就是他们拒绝向萨迦投降。他赞扬了他的助手苏奴桑波在他不在时，把大家团结起来。他告诉他们萨迦局势很不稳定，建议很快进攻。毫不迟延地他把军队开到雅桑和汤波且，并占领了这些地方。在噶瓦桑波的协助下，全部卫地几乎都落入绛求的掌握。北京的蒙古汗封他为大司徒，从那时起他就被称为司徒绛求坚参。

1354年噶瓦桑波和绛求会于萨迦喇嘛公邦巴 Kungpangpa 前，噶瓦桑波对先前对绛求的处理表示歉意。绛求建议护送噶瓦桑波回萨迦去，但他拒绝了。噶瓦一回到萨迦，就被王春逮捕投入监狱，这一行动招致了绛求来援救。当绛求距萨迦还有五站路时，噶瓦桑波就被释出狱了，但被免了职。在这一年除萨迦本地之外，都落入绛求的手中了。

1358年王春杀害了萨迦喇嘛，他是主持了绛求和噶瓦桑波的和好的。这时有谣言传到绛求耳朵里说噶瓦桑波在他的农村住宅里被毒死了。他立刻来到萨迦，把王春关起来，把新萨迦喇嘛赶下台，用他自已的人替换了四百名官员。

在绛求取得全部权力后他改组了行政部门。他放弃了十三万戶，把土地分成许多宗，他委派了他自已的人去当宗本管理这些地方。这样就把万戶的潜在的威胁消除了。他在和中国接壤的地方，派了官员和守卫，把部队集中在西藏的重要中心。他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规定了收获的六分之一为赋税。新道路和新桥梁修筑起来。在重要渡口都备了牛皮船，在峡谷上架了溜索。为了保护行旅在多匪地区设立了军事哨所。这后一措施是特别有益的，因为它消除了西藏旅行的最大祸害。在朝山进香的路上还设了宿站和粮库，特别是在神山查日山（ Tsari ）和凯拉斯山（ Kailash ）的周围。

在萨迦喇嘛统治时期被怀疑的犯人不加审讯就正法了。这是按照蒙古人的规矩。绛求采用了早期西藏国王的法律，制订了十三种刑罚，根据罪行轻重加以处理。在判决前要进行调查。

绛求想废除官员的世袭制度，提高平民的生活水平。他发了一本关于防守边界、军事战略、收税、保护村庄防止突然袭击和予防传染病的训令。他制订了几种农业竞赛的规定，以鼓励高产，并为各行业的人创立了奖牌。在新年期中高级官员必须穿早期国王的服装。这一习俗一直存在到今天。

绛求在乃东的宫殿由三道墙围起来，每道墙都有城门。酒和女人不许进入最后一道墙，绛求一直到死都是一位严格的佛教僧人。在他的时代，地方是如此的安全，相传一位老妇人可以携带一袋黄金从西藏的这头走到那头而不怕遗失。因此人们称这一时代为‘根莫色柯’（意为老妇携金）。在统治了西藏几年后，绛求于1364年六十三岁时去世，由他的侄子僧人姜样释迦坚参继位。

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明朝建立。1372年宗喀巴罗桑扎巴，这位格鲁派的创始人由安多来到卫藏。姜样释迦坚参于次年去世，由

扎巴仁清继位，他统治了八年就退休到贴寺去。公元1381年他的侄子锁南扎巴继位，在他统治的四年中是西藏的繁荣时期。因为收成很好，他被称为“福王”。他也退休到贴寺，由扎巴坚参继位。

在这一时期一位叫若登贡桑帕巴的大臣因捐款修建江孜巴郛曲德 Palkhor Choide 大寺而获得声誉。另一大臣新其扎仁 Zingche Drakrin 系统治家族的一位亲戚，以严厉粗暴著称，后被其同僚杀死。这是帕竹王廷内部分裂的第一个信号。宗喀巴为这一事件而苦恼，因为这是统治家族和他的行政不稳的标志。但是达擂的喇嘛首领用他的财富来满足那些煽动闹事的人。

明王朝沿袭元廷的习惯派人到西藏来请一位法师，没有一位有统治权的喇嘛接受邀请。第四代噶玛巴喇嘛德兴显巴 Deshen Shekpa 于1407年到了中国。下面是历史家朱拉陈瓦 Tsuglag Trengwa 关于这次访问的记载。

在火猪年正月二十一日，我们到达南京郊外，这里是明家的首都。骑马的官员和贵族欢迎我们，把噶玛巴放在一头大象上。在南京城门口皇帝亲自来迎噶玛巴，交换了礼物，他献给皇帝一个金轮和一条哈达。他从皇帝那里得到一具海螺和一条哈达。皇帝返回宫里，噶玛巴被迎至宾馆。

第二天我们又由同样的皇家护卫带进皇宫觐见皇帝。中国的和尚和官员烧香，吹海螺路上撒鲜花。约三千名最高级官员穿着华丽服装恭敬而沉默地列在御道两旁从宫门一直到三殿门。

皇帝自己站在门口陪噶玛巴进去，其余官员一律由两边旁门进去。五十名金身甲胄的兵，立在每一方宫墙的前面，另外四十名站在皇帝和噶玛巴的周围，他们在大殿中坐于两个宝座上。中国官员靠墙站着，噶玛巴的随从坐于主宾的右首。接着进饮食，表

演了歌午，皇帝和噶玛巴通过一位官方译员在交谈。后来他们从正门出去了，我们被送回宾馆。

朱拉陈瓦的其它记载，有关于噶玛巴说法的细节和新年的庆祝仪式。噶玛巴被赏赐了很多礼物并封他为“大宝法王”。

在德兴显巴以前已有一些喇嘛被请到中国去，随后也有不少前往，但关于他们的情况我们知道的很少，因为他们的随从不像噶玛巴的人一样记详细的日记。只能这样假定他们都受到了同样的优待。

中国皇帝永乐（1403—24在位）听到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大名，邀请他去中国，宗喀巴拒绝了这一邀请。当第二次邀请时他打发他的弟子嘉清曲介释迦意希代表他去明廷。嘉清当了皇帝的喇嘛，他得到一个比德兴显巴更显赫的封号“大慈法王”，在得到许多礼物后他返回西藏。

这时候西藏和中国的关系由这些特殊待遇和庄严封号，甚至对一些小喇嘛也加优待，著名有权势喇嘛则拒绝邀请，派弟子代替前往，等等都说明明朝皇帝把西藏看成是一个西方独立的王国。

公元1409年宗喀巴在施主扎巴坚参和他的大臣乃乌那喀桑波的支持下，在拉萨创立了第一次大祈祷会，（即传大昭。译者注）。以后每年都举行这种法会。由藏历正月十五日开始，连续三周喇嘛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而祈祷。著名的佛教哲学家要举行辨论，在群众中考试，并得到称号。法师们给群众讲经。相传在节日中的每天廿四小时说法的声音到处都可听到。这种法会成为一年中最大的节日，成千上万的香客，二万以上的喇嘛从西藏各地到拉萨来庆祝这个节日。

同一年宗喀巴创建了格鲁派的第一座寺院甘丹寺，它成为第三座大寺容纳喇嘛三千三百名公元1416年宗喀巴的弟子嘉样曲节（1379—1449）创建了哲蚌寺，是在乃乌那喀桑波的资助下兴建的。它

成为西藏最大的寺院。容纳喇嘛七千七百名。色拉寺是第二大寺容纳喇嘛五千五百名,是公元1419嘉清曲节由中国回来后创建的。

在土猪年(1419年)的12月25日,宗喀巴去世了(系藏历10月25日为西藏的燃灯节家家点灯纪念宗喀巴,藏语称为甘丹安曲。译者注)以后每年到这一天家家点灯纪念他的忌辰。

在扎巴坚参时期,中藏没有发生内部斗争,只有两次派兵到后藏去,但在部队到达前事情就平息了,没有发生战斗。为此人们称他为贡马曲甲钦波意为"大法王"。公元1432年他于乃东去世,年五十九岁。从这时起,中藏的帕木竹巴的统治者被称为贡马,意为"至高无上"。

在贡马扎巴坚参时有一位大臣叫南喀坚参牵派管理仁蚌和萨迦地方。他以仁蚌称他的家族就像帕木竹巴的家族被称为乃东家族一样。贡马扎巴的一个兄弟娶了仁蚌南喀坚参的女儿,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扎巴均乃,一个叫贡噶来巴。

贡马扎巴死后,他的几个侄子争夺位子,每人都有一些大臣支持。召开一个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位大臣,仁蚌的诺桑建议去请教陈俄锁南坚参,他正在贴寺静修。这位陈俄喇嘛是同情仁蚌家的,他说争位子大部都结婚了,建议由未结婚的扎巴均乃来继承大位,他是仁蚌诺桑的外甥。

按照陈俄的建议,扎巴均乃于1433年继位贡马,第二年陈俄去世了,一些争位子的又叫喊起来了。他们被放逐到雅甲巴 Yargyapa 给他们以广大庄园以资补偿。这一年1434年被认为是帕竹家垮台的一年。

以后的一百年是卫、藏之间争夺权力的年代。他们的头头分别依附于格鲁巴和噶玛巴。噶玛巴又分为红帽与黑帽两支。一位著名西藏

历史学家果洛扎逊奴贝 Gos Lotsa Shunupal， 当时曾任扎巴均乃的私人秘书，他说和他的前代不一样，他老留在乃东不去各地巡视。

1435年仁蚌家的权力在后藏气势熏灼，顿珠多吉打下日喀则，把它的首府由仁蚌迁到这里。许多后藏的头头都依附于日喀则的仁蚌家。

贡马扎巴均乃统治了十二年，大部分时间是搞宗教活动，于1444年去世。他的兄弟贡噶来巴接替了他的地位，但是有三年时间他没有管事，一次会议上最后决定了他是最好的选择。仁蚌的诺桑和他的付手贡却任清管理民事行政。

贡噶来巴到后藏作了一次巡视，除在仁蚌首府外，是受到礼遇的。仁蚌的人对他漠然置之，尽管他是仁蚌诺桑的外甥，这使贡马贡噶来巴不痛快。他开始信任他的付大臣贡却仁清。这就造成了他和仁蚌亲戚之间的隔阂。

大臣仁蚌诺桑死于1466年，他的最小的兄弟错吉多吉 Tsokye Dorje， 在有力亲属的支持下当了大臣。他努力在纠纷中保持中立，但是乃东集团的一些小动作使他支持仁蚌派。

仁蚌诺桑的儿子东月多吉 Donyo Dorje， 想在拉萨代表噶玛巴派建一座寺院，但是拉萨的行政官，支持格鲁派，不加允许。结果寺院建在拉萨以外，让帕康卓在 Palkhang Chozay 负责。但是附近格鲁派寺院的喇嘛在一个晚上冲下来把它搞平了。一位噶玛巴喇嘛曲扎嘉错差一点儿被杀死，他跑到拉萨来避难。

仁蚌集团的东月多吉在日喀则当了首领，为了报复，他于1480年带兵打到卫部，占领了拉萨管辖的几处地方。然后又开向乃东，到那里他把他父亲的对手贡却任清赶下台。

在铁牛年（1481年）东月多吉打拉萨未能得手。同一年大臣们聚集在乃东讨论贡马的支持者和仁蚌家的纠纷。讨论结果，贡马贡噶来巴退位，作为补偿给了他一处庄园。他的爱闹事的亲属都不许留在乃东。贡马的一位小表弟陈俄曾叶巴 Chennga Tsenyepa 继承了王位，又通过一些手续让他还俗结了婚。

最有权势的大臣都来自仁蚌，因为他们的势力已控制了卫藏。帕木竹巴的贡马只是个傀儡而已。公元1484年仁蚌的军队攻打江孜，因为这里是由乃东的大臣管理，但是后者在拉萨有盟友的支持，仁蚌家打败了。

三年后，江孜地区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纠纷，仁蚌军队再度攻打并夺取了江孜。1491年，年轻的贡马去世了，大臣会议在乃东统治了几个月，直到仁蚌诺桑最小的兄弟错吉多吉当了摄政为止。

1492年，东月多吉再度侵入卫部，夺取了三处地方。又过了几年以后，在1498年，一位拉萨的显要居民第巴囊孜 Depa hangtse 和他的叔父和侄儿在拉萨行政官的命令下正法了。以此作为借口东月多吉进攻并占领了拉萨，把行政官免了职。仁蚌的势力控制了拉萨一直到1517年，才最后被赶出来。在这一时期哲蚌寺和色拉寺的僧人不许参加拉萨的节日大法会（即传大昭），因为东月多吉是噶玛巴的支持者。

在土羊年（1499年）乃东大臣开会讨论推选一位新贡马。选了一位十二岁的孩子叫阿旺扎喜扎巴。他在位五年后仁蚌家给他送来一位新娘。她生了两个儿子，卓卫工布 Drowai Gonpo 和扎巴均乃。然后他又和第二个妻子生了几个孩子，这样就产生了两个支系间的磨擦。大王后和两个儿子被送到贡噶庄园。由于是仁蚌家的亲戚并不乏支持者。后来贡马退位了，他带着第二个老婆和孩子到自已的庄

园上去。王位留给第一个老婆的孩子，由于长子已去世了，扎巴均乃就当了贡马。

名义上西藏三部的人民仍称乃东统治者为贡马，但是仁蚌集团掌握着实权。卫藏大部分地区在他们控制之下，贡马只剩下个空名。当这些西藏首领们埋头于相互间搞阴谋时，蒙古部落又抓住机会在青海地区扎了根。由于蒙古人有无敌战士的名誉，西藏的一些教派的头头又找寻他们的支持了。

公元1505年，仁蚌家的一名仆役尺登多吉被派为日喀则的马官。他对仁蚌耍了一个计谋。他提出请求允许他在日喀则周围地区敛三百支缝衣针。立即就得到允许。在藏语里针和盔甲是相似的字，尺登多吉毫不费事地就把它改为三百付盔甲。他聚集了一些人又得到噶玛巴派的支持，尺登多吉就开始巩固他在日喀则的地区，慢慢又控制了附近的地区。他对乃东表示友好，于是命他为大臣。他就和青海地区的扎纳卡松 Dra nag khasum 的蒙古部联系，从却图部得到军事支持的允诺。

公元1512年，前贡马扎喜扎巴召集了一次会议，讨论如何改进执行法律和地方治安。这个会的宗旨很快就为出席的人们丢在一边，而在从各地和各教派来的大臣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攻击谩骂代替了建设性的讨论。前贡马也无法控制会议。同时平民却在享受一个宴会周，他们比赛服装，首饰，那些大臣们带来的卫士也都参加。他们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开会在讨论什么。他们只能知道对他们不会有好处，因为这是一个平民受苦的时代。宗教的压力大为增加，格鲁派的僧人三三两两出行时都得戴噶玛巴派的红帽子。只有回到寺院后才敢把黄色露出来。

公元1516年仁蚌集团又受到被免职的付大臣贡却仁清的挑战。

他争他有权做出所有司法决定。他把军队派到后藏。但前贡马出面干涉在三年内卫藏之间保持着不稳定的和平。公元1517年仁蚌家的力量被迫退出拉萨。格鲁派的喇嘛再一次又参加新年的大祈祷会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大臣们继续进行教派之争，各为自己教派集团的利益而斗争。

尺登多吉死后，他的儿子噶尔玛登松王波继位，为第巴藏巴。第巴藏巴（汉籍称藏巴汗。译者注）是尺登多吉于1565年占据日喀则后成为一个新统治集团的首领所得到的称号。噶尔玛登松王波在幼年时，他父亲就叫他干体力活，同时也学文字和经典。他长大成了一个勇敢的政客和一个有学问的噶玛巴派的成员。他加強了他父亲所建立的和蒙古人的联系。在以后的十一年中，他在西藏南部夺取了四大块地方，在西部和北部也占了不少地方。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明朝皇廷和西藏的首领们联系很少。中国穷于对付蒙古部落，他们已进入东土耳其斯坦，青海地区甚至俄国的南部。

六、达赖喇嘛的出现

为了说清达赖喇嘛的起源和他们如何得到权力，有必要回到十五世纪去。被后世追认为的第一世达赖喇嘛名叫根敦主巴，他于1391年生于后藏的夏堆 Shabtod ，他于1405年在纳塘寺从楚巴喜饶 Truppa Sherah 受格楚戒。他广泛地学习了哲学和佛教经典。1415年他遇到宗喀巴，这位格鲁派的创始人，成了他的最重要的弟子。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是由根敦主巴于1447年创建的，受到达吉本白桑 Dargyas pon palzang 的财政资助。这

座寺院可以容纳三千喇嘛，根敦主巴当时在西藏是著名的佛教学者，成为这个寺院的堪布叫作班禅根敦主巴。他于1474年在扎什伦布去世，死时八十四岁。

第二年根敦嘉错生于后藏的达纳色美 Tanagsegme ，他被认为是根敦主巴的化身生后被追称为第二世达赖喇嘛。他于1486年受初戒，在扎什伦布和哲蚌寺学习。他在扎什伦布的住处称为坚参通布 Gyaltsen Thonpo ，这一地方后来成为班禅的住地。在哲蚌寺他又建了一处住所称为甘丹颇章。后来在五世达赖掌权后，西藏政府也被称为甘丹颇章。

公元1509年根敦嘉错创建了群科介寺 Cho-Khorgyal 它位于拉萨东南约九十英里。附近有个海子相传可以看见未来。相传在找寻十三世和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时，都从海子中看到了转生地的形象。

宗教矛盾在这时正激烈进行。公元1537年，当根敦嘉错正住在群科介寺时，止贡寺的军队攻打阿尔喀寺 Olkha ，后者被战败，结果有十八处格鲁巴的寺院落入止贡寺手中，止贡寺是属于噶举巴派的。根敦嘉错于1542年六十五岁时在哲蚌寺去世。

一年以后，锁南嘉错在拉萨附近的堆陇出世。他被认为是根敦嘉错的转世。他在哲蚌寺学经，从锁南扎巴受了大戒。他成为一名学者和教师，随着就做了哲蚌寺的堪布。由于他成为众所信仰的著名人士，他以个人身份帮助调解西藏各势力集团的纠纷，防止发生暴行。

公元1559年，乃东的贡马请锁南嘉错访问乃东，他成为贡马的个人教师，贡马给了他一个可以用红色印色的印，这是对特殊重要人物给予的特权。一年后格鲁巴和噶举巴的支持者在拉萨发生战斗。地方喇嘛调解无效，他们把锁南嘉错请来在他的调解下战斗就停止了。

在1562年的夏季吉曲河泛滥，拉萨遭到水灾，使当地人都上了船。锁南嘉错和他的从者大力救灾并修复河堤。他立了一条规定，在大法会的最后一天，喇嘛要培修河堤，这后来成了传统的习惯。

乃东贡马扎巴均乃于1564年去世，锁南嘉错被请去为他念经。扎巴均乃的儿子继承了王位。在他以后还有两代不知名的贡马，帕竹的权力就告终了。

锁南嘉错于1569年去扎什伦布学习由他的前世根敦主巴所制订的寺院设计和行政管理。他被要求在那里当堪布，由于他已经担任了色拉和哲蚌寺的任务，他谢绝了这一要求，他只留了一位代表在扎什伦布寺。

土默特蒙古俺答汗请锁南嘉错访问蒙古，但他没有答应。几年以后俺答汗派了一个大代表团带着骆驼、马和对西藏的供养，再请锁南嘉错去访问他。这回喇嘛答应了。他于火牛年（1577）十一月廿七日离开哲蚌寺。他由三大寺喇嘛一直送到达木，这里距拉萨已九十英里。乃东贡马的代表和各贵族也给他隆重送行。

当他的一行要离开达木时，一位贵族，沙均扎喜拉登Sakyong Tashi Yapten 执住他的马镫唸了一首赞歌，祝他长寿，歌里称锁南嘉错为"信仰的保持者"，这首赞歌因这一事件而出了名。

刚刚离开达木，即为风雪所包围，很快就迷失于茫茫的高原上了。这一带杳无人居的，水草都得由骆驼驮着并节约使用。他们经常为幻景所误，经过了一百七十天他们才再度见到文明。

1578年夏，他们一行人到达了蒙古人的驻地察哈尔外部。他们发现蒙古人住在毡帐里，放牧牛羊、山羊和马匹。这些帐房居民过着游牧生活，吃肉、酥油和奶子，并喝马奶，这是一种民族饮料。俺答汗派人在察哈尔迎接他们，几天后俺答汗带着一千名骑兵亲自来欢

迎他。他们一起到了蒙古人的都城。汗和他的属民一样也是住帐。只是一顶很大的帐房而已。

锁南嘉错开始了一系列传法活动，有一次是在一个大会对全体人民说法。俺答汗信奉了佛教。根据《欧珠新达》 དངོས་གྲུབ་ཤིང་རྟ 这部锁南的传记上说，俺答汗做了以下的宣布：

我们蒙古人是強有力的，因为我们的祖先来自天上（成吉思汗）甚至把他们的帝国扩大到中国和西藏。

佛教早期就来到我们地方，我们支持了萨班。后来一位叫铁木耳的皇帝，在他统治时我们的人民没有宗教，我们的地方就衰落了，就好像一个血海淹没了我们的地方。

你的来访使佛教再兴，我们之间施主和喇嘛的关系，就好像太阳和月光一样。血海变为乳海。

西藏人，中国人、蒙古人，现在住在这个地方的都应该行佛的十诫。还有，从今天起我要给蒙古人的行为作一些规定。

以前一个蒙古人死了，他的妻子、仆役马和牲口都要殉葬。今后这是不许可的。死者的马和牲口在双方同意下可以给寺院的喇嘛和僧人；死者家属可以要求喇嘛为死者念经祈福。那些以人殉葬的要依法正法，他们的财产要没收，十倍于所杀的牲畜要归公。

任何人伤害一名喇嘛将受到严厉处罚。对死者"翁公"Onkon（偶像）的血祭今后一律不许举行，已经存在的这种像要烧掉和摧毁。假如我们听到谁偷偷藏有这种像，将把他的房子摧毁。

人民可以供奉西藏神灵意希工布 Yeshe Gon po 的像在他们家里可以给神供牛奶和酥油代替血。

每人要和邻居和睦，不许偷别人的东西。

简单说。这些已在卫藏实行的法律要在本地方实行。

为了酬谢他传法，锁南嘉错得到大批礼物和"达赖喇嘛"的称号。达赖是一个蒙古字，意为海，是说明喇嘛的学问和海一样的深广。他还得到一个印，上面刻的称号是多吉强 Dorje Chang （金刚持）。锁南嘉错也称俺答汗为"梵天法王"，并且予言在八十年后，汗的后裔将成蒙古和中国的统治者。

达赖喇嘛传过法的地址和他与俺答汗交换礼品获得封号的地方，现在都成了圣地。达赖喇嘛建议修一所寺院，俺答汗同意并且提供费用。这座寺命名为德清群科儿 Thegchen Chon khor 。许多蒙古部落首领，甚至一些中国贵人，听到达赖喇嘛的宗教权威都纷纷邀请他到他们地方去。他访问了一些这样的地区包括中国边境的兰州。中国人要求他劝阻察哈尔部落入侵中国，他的确使冲突减少了许多。

西藏资料还说达赖也接受了中国宁夏总督的邀请，在这里他向从东土耳其斯坦、蒙古和邻近的中国地方来的大批人士传法。开始人们很难听懂，因为他只讲藏话，但是这位总督给了他三位翻译，这个困难就解决了。当他在宁夏时，他得到了中国皇帝的邀请，使臣带来了明朝皇帝的信和礼品，请他到中国北京去。锁南拒绝了这一邀请，因为他已答应到西藏在部喀木地方传法。

为了维持达赖与俺答汗之间的亲密关系，决定在东郭儿设立一个外交机构，也叫作"卢萨尔"Lu sar 喇嘛和汗都派人住在这里联系事情。东郭儿正好在拉萨与察哈尔蒙古之间的半路上。

达赖喇嘛来到喀木，1580年他创建了里塘寺。然后他到了昌都，被聘为这里寺院的名誉堪布。当他在昌都时他听到了俺答汗的死耗。他的儿子达延汗继承了王位，他邀请达赖再回去。1582年达

赖离开昌都向蒙古进发。在路上经过青海地区，在这里他在宗喀巴出生地创建了“宫蚌寺”（即西宁塔尔寺。译者注）现在的达赖也生于这一地区。在旅程中他做了两位蒙古王公，达颜诺彦和汝南汗 Doyan Noyan and Junang khan 的宾客。1585年他最后到达目的地。他和达延汗在一起约两年多，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俺答汗时期一样。在1588年开始返回西藏时达赖病倒了并死在路上。他的屍体被火化了，骨灰送回拉萨，保存在哲蚌寺里。

几年以后，达赖的随从听到1589年在蒙古出生了一个小孩子，他是卓库尔 Chokhur 部酋长的儿子，俺答汗的曾孙，相传有异于一般儿童。西藏喇嘛就前往调查，认为这位特别儿童就是索南嘉错的化身。一大群乃东的官员，格鲁派三大寺的代表，达赖的管家都到蒙古地方来寻认，并设法把儿童带回西藏。但是父母不愿儿童离开，要求等大一点后再回西藏。于是就在蒙古地由西藏老师教他经典和其它宗教训练。

这个孩子就成为第四世达赖喇嘛，取名云丹嘉错，通过这个孩子蒙藏之间结成了更紧密的宗教关系。格鲁巴在西藏也成为一个更強大的集团。由萨迦以来所建立起来的萨迦派的势力逐渐衰微了。

在1601年云丹嘉错十二岁时，西藏寺院的首脑们坚持他应当回西藏去了，他们派出一批人来接他。在路上，他在东郭儿寺住了一些时候，前世达赖在这里设的外交机构被加強了，任务也增加了。

当云丹嘉错到达拉萨时，在寺院官员主持的仪式上正式承认他为第四世达赖喇嘛。他由前甘丹池巴僧格仁清传戒。当他在哲蚌寺当学僧时，扎什伦布的一位有学问的喇嘛罗桑曲坚 Lozang Chosgyan 来访他并教他经。这就是第一世班禅喇嘛。这一称号的意思就是‘大学者’。从此罗桑曲坚的转世就被称为班禅喇嘛。

就在这时候噶玛巴的红帽派给达赖送来一首诗。这首诗他的随从译不出来。他不去作一个含含糊糊的回答，而回了一封字句生硬的信，这样就造成一些恶感。红帽派的人到处宣传说达赖的随从连诗也不懂，这对有学问的人说来是一个大缺点。

不久后一位红帽派的噶玛巴喇嘛，到拉萨大昭寺朝佛，他给佛像献了一条哈达，上面写着一首祈祷诗。这条哈达送给了在哲蚌寺的达赖的随从。他们误认为这首诗是侮辱达赖喇嘛。他的蒙古骑兵发了火就去抄袭噶玛巴红帽派人们的家和马厩。结果噶尔玛登松王波，这位后藏的首领和噶玛巴派的支持者于1605年带领大队人马进入拉萨，赶走了陪送达赖喇嘛来到西藏的蒙古人。跟着就发生了权力之争。卫地是在格鲁巴控制下，藏地则是噶玛巴派的控制下。有一个时期登松王波占了上风，他夺取了卫地几个地方。

1606年达赖喇嘛访问了群科几介寺院和山南部分地区。乃东贡马对他给予盛大欢迎。下一年他又被后藏的格鲁巴寺院邀请到后藏去，班禅喇嘛罗桑曲坚出来很远欢迎他。扎什伦布的喇嘛在日喀则街上举行了热烈的夹道欢迎。

后藏的首领登松王波，他的首府就在日喀则却没有举行欢迎或对达赖喇嘛布施。但他也没有在扎什伦布设置阻挠。寺方要求达赖充当堪布。由于他已经是哲蚌寺的堪布，他只接受了一个名誉堪布的地位。然后他又在回到卫部贡噶以前访问了其它格鲁派寺院。

噶玛巴红帽派的喇嘛首领就住在贡噶的附近。这两位喇嘛之间交换了信件，很可能要安排一次会见。这样一次会见也许会结束格鲁派和噶玛巴之间的对立；但是双方的随从人员却不愿和平，达赖的随从匆匆把他送回哲蚌寺。来朝见达赖的人们遭到噶玛巴红帽派人的搜查。当时有人写了诗谴责双方随从不使两位喇嘛会见以达成两派和解。

1611年噶尔玛登松王旺去世。由其儿子噶尔玛朋错那介继位。当他登位时他控制着整个后藏和堆(西部西藏)和卫的部分地区。他两次和不丹冲突。但是西藏资料和不丹纪录都没有记载冲突的原因和结果。也没有说明当时班禅到不丹是为了什么。很可能他是去结束冲突的。噶尔玛朋错那介在巡视了南部边境后。访问了拉萨，他派私人秘书去见达赖要求会见。达赖身边最有权势的随从锁南扎巴反对这样一次会见。理由是日喀则的藏巴第巴是格鲁派的敌人；这样朋错那介只得到一个客气的答复说达赖正在坐静。不能扰乱他。这位后藏首领被深深激怒了。当时舆论是同情他的，人们认为如果举行这样一次会见藏巴第巴很可能被和平地争取过来。朋错那介在失望中回到日喀则。

在1615年明神宗派了一位使者来邀请达赖喇嘛到南京为一座寺院祝福。由于他对色拉和哲蚌寺的责任，他拒绝了这一邀请，但他答应在西藏为这座寺院祝福。他真的面朝中国进行了祈祷并向空中撒青稞。

1616年达赖喇嘛患关节炎痛，他到几个温泉去进行治疗。1617年一月他死在哲蚌寺年二十八岁。他的遗体被火化了，骨灰由哲蚌寺、他的蒙古父亲和他的一位施主蒙古土默特台吉分有。

在这一时期西藏与蒙古之间往来频繁，甚至俺答汗与达赖喇嘛交换称号时蒙古是一个独立国，一直保持到满洲时代。另一方面在明代西藏与中国很少接触。明朝皇帝对西藏很少有兴趣除了邻近中国边境的部分。

七、达赖五世掌权

四世达赖的随从对朋错那介的侮辱招致了他于1618年进攻拉萨。他遇到哲蚌和色拉喇嘛的反抗，又受到世俗施主的支援。在拉萨有一些人被杀死。在哲蚌寺所在的山上散布着被杀死的僧人的屍体。情况十分危急，色拉和哲蚌寺的僧人暂时退到北边的热振寺和达隆寺躲避。

由于后藏军队的胜利，一些小的格鲁巴寺院被強迫改从噶玛巴派。在拉萨城外修建了两处后藏的营房，一处切断了哲蚌与色拉和拉萨的交通，另一处卡住了整个地区的咽喉。这样格鲁巴的两大要塞就被有效地围困起来了。那些回到寺院的格鲁巴喇嘛行动受到严格限制。

同时朋错那介在对扎什伦布寺可以俯视的地方建了自已的噶玛巴寺院。寺名取名为“扎什喜弄” Tashi zilnon 意为压倒扎什伦布。修寺的人故意滚下大块岩山压死了几个僧人。扎什伦布的僧人在到日喀则的路上处处受到牵制。这种迫害继续了一些时候。在1605年被登松王波赶走的蒙古兵在1619年化装香客又返回西藏。这就提高了哲蚌和色拉僧人的希望，因为蒙古人是格鲁派为支持者。但是蒙古人在准备一次大战斗，他们只在距拉萨较远的地方扎营。由于他们没有动作，人们就说“蒙古人当作一帮土匪是多了，当作一支军队则又少了”。

前世达赖的主要侍从锁南若登，此人也叫作锁南群培，派人四出找寻达赖的转世。在1619年他得到消息有一个小孩于火蛇年九月廿三日在琼结的清瓦达孜出世。他得悉这个孩子与众不同，他就带了前世达赖用过的东西亲自到琼结去了。传说这个孩子认出这些都是他自已的财产。为了进一步确认，锁南若登回到拉萨，派人去找班禅和

另一位喇嘛去看这个孩子。他们都认为这个孩子就是前世达赖的转世。

达赖五世被命名为阿旺罗桑嘉错。由于西藏的政局不稳。这一发现被严格地保密起来。他被带到囊噶孜 nankartse 而没有留在他的出生地或带到哲蚌寺。

一些时候来蒙古军队的司令官驻在拉萨城外和哲蚌寺的蒙古喇嘛保持密切接触。他们向他报告了周围的一切动静。1620年蒙古军对后藏的两处兵营进行了突然袭击。由于突然袭来。后藏的兵丁大部分被杀死。于是另一支后藏军队准备来打蒙古人。害怕战争再扩大。班禅喇嘛、甘丹池巴和达垅夏仲出头给双方调停。经过谈判后。蒙古人同意撤走。但要依两个条件：后藏营房必须撤除。被强迫改教的格鲁巴寺院应恢复原来的面目。

在统治了后藏十一年后。朋错那介于1621年去世。由他的十六岁的儿子噶尔玛登均王波继位。有两名主要官员代表这位年轻首领管理后藏。朋错那介之死使卫藏之间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因此达赖五世的寻认就于1622年公开了。于是由三大寺的代表把他接到哲蚌寺。

害怕新达赖的安全成问题蒙古僧人和一部分格鲁巴的坚决支持者。想把他送到蒙古去。但是达赖的个人随从则不愿让他去。而悄悄地把他带到山南的艾地（即今拉加里地方。译者注）他们把他在那里藏了一年。当情况好转后又把他带回哲蚌寺。1625年由班禅喇嘛给他传了戒。

1627年有两位葡萄牙的耶稣会传教士 、E.Ca Oella 和 J .Cabral从不丹到达日喀则。在这里他受到噶尔玛登均的接待。他们的宗旨是宣扬天主教要人们信奉。但没有获得成功。虽然噶尔玛登均对他们很友善。噶玛巴僧人出于宗教的原因反对他们。不久以后

Cacella 和 Calral 就去尼泊尔去了。Cacella 于1630年又回到日喀则，但健康坏了，在到达一周后就去世了。噶尔登均派人去找 Cabral 他当时在尼泊尔。Calral 于1631年来到日喀则，第二年又离去。

当 Cabral 离开时噶尔玛登均派人护送他，并给尼泊尔国王带了礼物和书信，要求他帮助这些耶稣会传教士。通过尼泊尔统治者的协助 Cabral 得以穿过尼泊尔平安到达印度的巴特纳 。他被认为系第一个旅行穿过尼泊尔的欧洲人。Cacella 和 Cabral 也是踏到中藏土地上的最早的欧洲人。第一位到达喇嘛的传教士据说是 Friar Ocherie of Pardenone ，他于1328年由契丹（Cathay ）来到拉萨（Cathay 一词也指元朝时的北京。译者注）但从没有在这一地区旅行过。

这时格鲁巴派在中藏仍然遇到很多困难。噶尔玛登均被称为第西藏巴（意为藏的摄政）尽力防止格鲁巴派在卓克图蒙古人中得到新的信徒。这些人现在定居在青海地区。同时他鼓励他的东藏的盟友白利王东月多吉，他是一位本教支持者，去迫害里塘寺的僧人。格鲁巴三大寺的代表和他们的官员和施主决定召集一个会来商讨如何防止教派被灭绝。当时的情况就象“在风暴中的一盏油灯摇摇欲灭”。他们决定去联系额鲁特、准噶尔和察哈尔部落，这些都是格鲁巴派的新的蒙古从教者。

三位代表包括锁南群培被派到蒙古去。他们先和额鲁特和准噶尔部的首长联系。他们为了蒙古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密切关系，决定进行一次宗教战争。实际领导责任落在一个二十八岁的长胡子的和硕特部首长固始汗的头上。固始汗的这一计划得到准噶尔部巴特鲁浑台吉和土尔扈特蒙古乌尔卢克的支持。固始汗决定他先扮为香客访问西藏了

解那里的形势。锁南群培带着许诺支持的消息回到拉萨。其它信使也派到东西两路。安排好一年之内都回到蒙古汇报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

从尺登多吉于1565年成为后藏的统治者后。藏巴统治家族与卓克图蒙古始终维持着友好关系。噶尔玛登均。第西藏巴向他们请求援助。1635年卓克图部专派了他的儿子阿尔萨兰
带一万军队进西藏去。准备扫光格鲁派。当固始汗听到这一消息。他就集合了一支小的队伍去堵截卓克图的军队。他和阿尔藏兰安排了一次会见。关于这次会见没有记载。但结果是阿尔萨兰改变了他的计划。他从青海地区进到那木错湖（即腾格里海）然后他就把部队驻扎在湖的附近。他一个人带了少数卫士就到卫部去了。由于没有人知道他属于那一边。在他接近拉萨时。噶玛巴喇嘛和他的弟子们就逃跑了。阿尔萨兰没有遇着抵抗就进入拉萨。

他带信给哲蚌寺的达赖喇嘛要求他来拉萨。在1635年的新年，他们于小昭寺会面。原来以为阿尔萨兰不会尊敬达赖喇嘛。人们看到他向达赖磕头时都大为惊奇。阿尔萨兰然后去哲蚌寺听达赖喇嘛给他讲经。他下令不许伤害格鲁巴派。

噶尔玛登均听到阿尔萨兰没有进攻格鲁巴派。就派人去通知卓克图部长说他的儿子没有按照原先的计划执行。同时他派部队到拉萨驱逐卓克图蒙古人。刚刚进行了接触。还没大打起来。达赖喇嘛的代表甘丹池巴和噶玛巴喇嘛出来调停。他们在报告中说阿尔萨兰当时是神志昏迷的。当阿尔萨兰的父亲收到报告后。他就派专使到西藏去把阿尔萨兰和他的两个随从杀死。

固始汗认识到阿尔萨兰之死可能招致卓克图蒙古消灭格鲁派。他决定立即向卓克图部进攻。由于缺乏足够的军力。他和蒙古酋长巴特鲁浑台吉结了盟。在1637年春。他们向青海地区的卓克图部进攻。

先在青海峡谷里打了些零星仗。过了几天又在两山之间打了一大仗。这一仗成为著名的血山之战（ Olango 　　血山）。卓克图的部队在肉搏血战后四散逃走。固始汗的兄弟追逐他们。当他们的退路为岩石阻断。他们就投降了。卓克图的首领开始没有找到。在搜寻了几天后发现他藏在一个地老鼠的洞里。他当时就被固始汗的兄弟杀死了。

当驻扎在那木错湖边的卓克图蒙古人听到他们在青海地区的部落几乎被消灭了。他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地位。是回青海去呢？还是去后藏和藏巴汉的军队汇合呢？可能看到两者都不利。他们就留下来在西藏过游牧生活。他们的居住地扎玛尔 Zamar 　草地。他们的后裔被称为‘索第’Sogde 　　（蒙古部）。

1638年固始汗和其它蒙古香客来到西藏。接受了达赖喇嘛传法。在拉萨大昭寺的佛像前举行了一个仪式。固始汗被拥上宝座。给了他“丹津曲季甲波”的称号和印（佛教支持者佛法之王）。达赖喇嘛还给了固始汗的官员以称号。蒙古人也给了达赖喇嘛的属下以称号。这就是西藏高级官员中一些蒙古称号如札萨。台吉。达赖喇嘛和达颜等起源。这种称号一直保留到今天。

固始汗邀请达赖喇嘛访问他的地方。由于无法离开。他派了一名常驻代表到蒙古去。和蒙古人保持着更好的关系。在巡行了卫藏以后。固始汗就回到他新得到的土地青海地方去了。他的和硕特部决定定居在这里。

这时信本教的白利酋长东月多吉通过一位商人给藏巴第西噶尔玛登均带信。这封信落到格鲁巴派喇嘛的手中。他把这信转给了固始汗。这封信有如下一些内容。

非常令人沮丧的是我们的同盟者卓克图部被消灭了。虽然如此。明年我将在喀木集起一支兵。把它带到卫。同时你也应当带

着后藏的兵来。我们一起消灭格鲁巴派，让他们连个影子也找不到。大昭寺的佛像好像是招致这些战争的，应当扔到河里。我们将允许人们信奉各个教派，包括本教唯一的例外是格鲁巴派。

固始汗立即作出反应。1639年，他带领部队来到喀木。他给达赖喇嘛一封信通知他将先征服白利首长，然后向后藏进军。达赖喇嘛和他的主要随从锁南群培进行了讨论。达赖喇嘛的报告是这样说的：

我是一位喇嘛，我的责任是学经、修行和向人传法，这是我在年轻时最好的安排。我认为没有必要在这里制造乱子，那会引起人民对我们的批评。我们和后藏的关系不像去年那么坏了。他们不再迫害格鲁巴派了。他们给哲蚌和色拉寺造成的损害那是由于格鲁巴派的错误。他们拒绝让藏巴汗会见第四世达赖喇嘛。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和乃东贡马或嘀举巴，或觉南巴相争。至于我们格鲁巴派和甘丹颇章我们有的已经足够了。在过去为了这种政治活动很多人遭了殃，有的还被杀死。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必要地行动起来，我们又会遇到同样的困境。

锁南群培不同意达赖的意见，坚持说后藏统治者不公道的迫害格鲁巴。他主张在西藏要有全面的和平必须统一起来，把地方留在各种头领和教派头头的手中是不行的。他主张格鲁巴派经常需要一个有力的靠山，现在有了固始汗，我们应当很好地利用他。

讨论的结果写了一份联合声明派了一名信使送给固始汗。声明说："要求你摧毁白利首长，因为他对喀木的佛教进行破坏"。没有提其它教派，只是总的谈到对佛教的威胁，也没有专门提藏巴汗。它要求固始汗达到目的后，就回他自已的地方。达赖的愿望是不希望有很多人被杀。信的结尾是邀请固始汗的两位王后和其它香客来卫地。

达赖喇嘛后来在自已的著作中提到"我怀疑笛声还没有变成箭声"

因为他知道在信使出发前他的主要随从和官员们进行了仔细的商讨。其中必然有文章。

固始汗从安多巴利克 Panik 部落中抽了一些人加入他的军队，然后进到喀木。虽然白利地方的小部落很快就被征服，战斗却进行了差不多一整年。白利酋长东月多吉最后被俘获并于1640年冬处死。第二年固始汗把整个喀木置于他控制之下。被白利酋长关起来的佛教徒都释放了。在打箭炉以西的所有地方包括南部的三淡 Sadam（此为藏语对云南丽江地区的称谓。译者注）都恢复了西藏人的控制。

1641年新年大法会时，固始汗对白利酋长胜利的消息传到拉萨。开始以为固始汗会回到青海地方去，但是消息继续传来蒙古兵正临近卫藏。当达赖对此感到惊异时，他的主要随从锁南群培告诉他，他曾让信使对固始汗说，在对付了白利酋长后达赖喇嘛并不反对消灭藏巴汗。锁南群培说藏巴汗是一个糊涂又头脑发胀的人。还有虽然达赖只想保持中立，但是格鲁派的追随者却说他偏向藏巴汉了。

达赖喇嘛对锁南群培说，他走的太远了，但是如果能劝说固始汗回青海去，或者可以避免流血。达赖喇嘛说，"假如因为你作了诺言，不好向固始汗说，我可以去见固始汗，利用我的宗教影响来说服他。假如我们能成功地劝说他离去，我们在政治上会有好处，更提高我们的威信。

锁南不同意达赖的计划。他说要避免和后藏摊牌已经太晚了，到现阶段已不可能把固始汗挡回去了。他们正讨论此事时，固始汗派来了信使通知他们要攻打后藏，建议把班禅挪到一个安全地方。

由于很难派人把班禅从扎什伦布寺护送出来，因为它就在藏巴汗的首府日喀则，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来拉萨。信上说固始汗已经回青海去了，他的两个王后正在来拉萨途中，太后希望会见班禅。不

幸她生了病，不能到拉萨以外的地方去。所以要请班禅来会她。

在班禅离开扎什伦布寺不久。从拉萨以北噶举巴派的达垅寺的信使来到日喀则，带一封信给噶尔玛登均。达垅僧人告诉他固始汗如要回青海就该向北进入达垅沟，实际上他却向后藏方向前进。藏巴汗吃了一惊赶紧派人截留班禅，班禅被拘留在仁蚌，但后来释放了。

锁南群培对所发生的情况负有全责，他立即到北边去见固始汗。几天后他给达赖送来一封信说他已见到蒙古汗了，已派了一名高级官员领路去后藏。结尾他说将陪伴固始汗的两位王后来拉萨。

藏巴汗派他的军队去防守边境。精锐部队留在日喀则，在噶玛巴寺院和碉堡周围修了工事。固始汗善战的名声非常之大，以致他在一些小地方只遇到很少的抵抗，他轻易地就踏遍了十三个宗。最后到了日喀则把藏巴汗包围起来。

同时锁南群培正在接收被后藏管的卫地的地方。他很难直接拿过来，但制造了紧张局势，使得这些地方不敢去支援被围的日喀则。锁南群培派到后藏去的两名间谍回来了，报告说日喀则已被蒙古骑兵包围起来了，但是后藏的射手很准，使人不能进入碉堡。蒙古人控制了日喀则周围的山头，正等待碉堡里的人在给养耗尽后投降。只有内部发生叛变或藏巴汗被杀死碉堡才能拿下来。

锁南群培没有料到后藏军队会这样的反抗他有点惊惶，向达赖喇嘛承认他作了错误的判断。他建议达赖喇嘛亲自到后藏去调停。达赖申斥他说。

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一句粗话，但今天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得对你说几句。我曾多次对你说过和后藏统治者打仗是不明智的。他不是像你想像的饭桶。现在人家都知道我们派了官员领着固始汗到后藏你叫我怎么出头调停呢？就算我能使战斗停止，后藏军

队也会在固始汗回去后进行报复。当固始汗的信使到达的那天起我就下了决心要把藏巴汗的仗打下去。这是你粗心地挑起的。假如固始汗胜了当然一切都好，如果败了，我们就得离开拉萨到其它地方生活去了。

在遭到申斥以后，锁南群培加紧了努力使战争取得胜利。他准备拿下卫地的一处后藏要塞东喀宗。在哲蚌和色拉寺僧人的协助下，一天就拿了下来。多数后藏管理的地方没有抵抗就投降了。有些还表示愿意为达赖喇嘛出兵，但在卫的东南部也有少数地方继续进行抵抗。

锁南群培原来假装是中立的，现在一下子公开了。他带了一支部队开到后藏和固始汗会师。他布置了对蒙古军队的粮秣供应和新的武器供应。他自已的部队则着手建立巨大的墩台，有一次他们几乎攻进了碉堡，但是又被高墙上的乱箭炮石打出来。

藏巴汗派人通知班禅喇嘛和噶玛巴喇嘛，请他们调停讲和，但是由于卫部公开参了战这已经不可能了。在水马年（1642年）正月初八，经过了激烈战斗之后，日喀则碉堡、噶玛巴寺最后被夺取了。噶尔玛登均王波和他的家属和随从都被俘了。拉萨色拉寺和哲蚌寺的喇嘛庆祝了这一胜利，他们在屋顶上插上祈祷旗，到处烧香供佛。

噶尔玛登均和他的两位重要官员仲尼（官职名意为传事官。译者注）本宫和岗苏巴被押解到拉萨，关在一个叫乃乌的碉堡里。固始汗邀请达赖喇嘛到后藏去。他在三月十一日离开哲蚌寺，在离日喀则还有两天路时，固始汗和锁南群培带着骑兵给予他极隆重的欢迎。在到达日喀则时，有卫藏的重要官员和六百名蒙古骑兵欢迎他。僧人排列在街道上，居民们表演了歌午，穿过人群他到达扎什伦布寺，这里做了他暂时住的地方。

水马年的四月初五，相当于佛去世2186年或公元1642年，

达赖喇嘛以官家仪式被迎到日喀则宗的大殿里，把他放在一个宝座上，另外两个稍低的坐位上坐着固始汗和锁南群培。固始汗向达赖喇嘛供献了"曼扎登松"，这是一种象征性的献礼，包括一尊佛像，一部经和一尊小佛塔，分别代表佛的身、口、意。蒙古汗然后宣布他给予达赖喇嘛以东至打箭炉，西达拉达克边境全部西藏的最高权力。西藏的政治行政责任，由锁南群培负责，给他以第西的称号。这一称号相当于首席大臣，成为达赖五世和六世时期的主要行政官。达赖喇嘛第一次成为西藏的政教领袖。一切政治事务由第西处理，重要事务则禀呈达赖喇嘛处理。

四月十五日离日喀则返拉萨，他在途中访问了若干地方，一个月后抵达哲蚌寺。他制订了法律，任命了地方官员，选择大臣组成一个新政府。

几个月后，有一个噶玛巴派的拥护者名叫噶尔巴雅普赛 Garpa Yapse 计划发动叛乱反对甘丹颇章。一次普遍的起事发生了。在大部分西北地区地方官员把乱事平息了，但在江孜，官员逃掉了，藏巴汗的拥护者夺取了地方。拉萨的部队很快收复了地方。但在东南部工布地区则发生了大的叛乱。新建寺 Zingche 被烧毁了。固始汗和锁南群培开兵到那个地方狠狠地镇压了叛乱的人，杀死了七千多工布人，俘虏的更多。一名俘虏带着一具噶乌（护身佛盒）在里面发现一封信里面有噶玛巴派的全部计划，包括那些他们打算逮捕、正法和撤换的人员。固始汗为这一计划所触怒，他立刻下令把关在乃乌的登均王波和他的两位官员正法。藏巴汗一死噶玛巴的叛乱中心就没有了，起事也瓦解了。这一情况很像苏格兰王后玛丽的被正法，它结束了对伊丽莎白王后的种种阴谋。

1643年第西锁南群培巡视了堆和后藏，对人口进行了清查。

同一年，印度统治者派使节携带礼物来西藏庆祝达赖喇嘛掌权。锡金的记载《哲孟雄王统记》 འབྲས་ལྗོངས་རྒྱལ་རབས 上说锡金第一代统治者朋错那介保证给予达赖喇嘛以协助。第二年明朝亡了，满洲人登上了中国的宝座。

在这一时期门巴的寺院和不丹人闹纠纷。后来固始汗和锁南群培调查了情况。他们派了几百名蒙古兵和西藏兵到不丹去协助门巴人。这些军队习惯于高原作战，但没有在丛林地带和炎热气候下作战的经验。他们进的太靠南了，迷失了方向，结果被不丹包围起来。三位主要官员囊索顿珠 Nangso Dondup 仲曾乃 Drongtsenas 和都均乃 Dujunas 被俘。部队四散逃亡，大部分回到西藏。这一失败动摇了蒙古军不可战胜的迷信在以后蒙古军就不愿到炎热的南方去作战。

在拉萨达赖喇嘛决定在他新定的都城建一所宫殿。在一山上有古宫殿的废墟，称为尺孜玛布 Tritsemarpo 是公元636年松赞干布为他的尼泊尔王后建的。达赖喇嘛选定这一地址来建他的宫殿。木鸡年（1645）三月初五动土开工，这一宫殿今天称为布达拉宫。

1646年西藏和不丹进行和平谈判，成立了一个协定恢复冲突发生前不丹与门巴人已有的关系。在藏巴汗统治时，不丹人每年纳米。新的协定每年应纳的米送交甘丹颇章。和平没有维持很久，第二年又打起来。西藏军队经由帕里前进到巴洛 paro ，在路上，占领了一处不丹的碉堡。他们在巴洛郊外驻下来，但不丹军队进行了夜袭，西藏军队丢下他们的帐棚和给养逃回了帕里。西藏司令官只好住在一个普通帐棚里，他的那份漂亮的帐房也被俘获了。这一失败在西藏历史上是一个耻辱。

1648年，好几个噶举巴寺院改为格鲁巴派的寺院。在压力下，僧人也没有别的选择。同一样，达赖喇嘛派了两名官员拉康巴 Lhakhangpa 和巴卓 Badro 到打箭炉、明正司、甲绒、（今阿坝藏族自治州）巴塘、里塘永宁 Jun 中甸 Gyal thang 木里 mili Dan （邓科 ）Gokhok ，灵藏 Lingtsang 拉多 Lhatnok ，和囊谦。这些地方都在喀木东部，在这里清查了户口，对占有土地者征收赋税。赋税的一部分是维持西藏的寺院，余额存入甘丹颇章公库。五十六本收税册是由达赖喇嘛批准，由拉萨发出的。（西姆拉会议时西藏代表拿出56本税册来反驳中国代表，英国全权代表麦克马洪在这些税册上签字证明。）

在1649—1651之间顺治皇帝几次派人邀请达赖喇嘛到北京。达赖喇嘛接受了邀请条件是不能久住。理由是气候和天花病。

在出发前达赖喇嘛去访问了薛科儿介寺，由固始汗和锁南群培陪同，在水龙年（1652年）三月初七日，带着十三名官员向中国进发。他的队伍和组成很像四百年前帕巴到中国时的情况。

按照西藏传统为什么满洲皇帝屡次邀请达赖喇嘛，原因是达赖三世在1578年说过予言，说俺答汗的后裔要在八十年后当蒙古和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西藏人认为满洲人和蒙古人关系很密切，就认为予言实现了。

中国传统，则认为邀请是重申达赖三世和蒙古人结成的友好关系。还有达赖四世是蒙古人，更加强了这种关系。邀请达赖五世到中国，满洲皇帝希望他利用他的宗教威信，劝止蒙古人侵犯中国地方。

当达赖喇嘛要离开时，班禅从后藏来到达木给他送行。他们在这里停留了六天，然后向边界进发。固始汗和第西又陪伴他走了一天路。达赖喇嘛一路上受到西藏牧民和蒙古部落的欢迎。在青海湖附近的扎

纳卡松地方。他受到西藏人的极为隆重的欢迎。过了西宁以后一路就由满洲人照顾了。

"八月。满洲皇帝收到达赖喇嘛一封信。请求皇帝到中国边境以外的一个地方来会他。要不要出去会见达赖喇嘛向他表示敬意以取得喀尔喀蒙古的归顺。在皇廷的满汉官员中进行了辨证。满洲人主张皇帝去。汉人则建议派亲王去送礼。在达赖尚未进入中国本部界内时达成一种安排。达赖将带少数随从进入汉地。皇帝将在一个适当的地点会他。

一路上各种礼物和欢迎的信不断的由皇帝的使者送到达赖喇嘛手中。在九月初五又一位使节送来礼物。地点是在宁夏。从这里达赖就不再骑马而是坐上皇帝送来的一顶黄色轿子。十一月初二日仍然在路上。来了一位汉大臣通知他满洲皇帝就要来会他了。要求达赖先走。他就带了三百名官员出发。第二天剩下的人继续前进。接着皇帝的军队司令官带着三千骑兵来到了。告诉达赖喇嘛第二天皇帝就要来了。然后演习了朝见的仪式。

在十二月十六日，达赖一行到达了一座城叫高头 Khothor
达赖在官员夹道中进入城内。当远远看到宫殿时。达赖的随从都下了马。达赖仍然坐在轿子里。在进宫门时。达赖下了轿子站在黄色的丝织地毯上。从宫门进去走了一半路。顺治皇帝就出来迎接他了。满洲皇帝拉住达赖的手。通过一个译员进行互相问候。然后他们一起进了宫里。在这里达赖的随从把呈献的西藏礼品陈列出来。在和主人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后。达赖回到准备好的宾馆去。有些记载说皇帝是在打猎时遇到了达赖喇嘛一行，但是皇帝使者的周密的准备和西藏记载的叙述都证明皇帝是专门从北京出去会见达赖喇嘛的。

十二月十七日。达赖一行到达北京。住在黄寺这是专门建了为招

待达赖的。高级满洲官员天天来看他。廿五日两位大臣来访他。带来了朝见皇帝时的各种用品。在水蛇年（1653）正月初一，所有北京官员来向达赖喇嘛致敬。他给他们以隆重的招待，因为这正好是西藏的新年。

在十一日会见的这一天，城里进行了装饰，人们列在街道上，香烟缭绕。达赖喇嘛坐在轿子里，官员们在前头举着仪仗。从宫门起他就在官员夹道中在黄地毯上走。皇帝把他的客人带到朝见厅，坐到他的宝座上，达赖喇嘛则坐到设在他右边的宝座上。在他们面前各摆着五十个金银盘子，里面盛着中国的好吃的。

满洲皇帝献给达赖喇嘛一面金牌，上面刻着"达赖喇嘛多吉強"（多吉強意为金刚持）文字用满文、藏文和汉文。达赖喇嘛献给皇帝一个金牌上面刻着"那季拉嘉样贡马达保清波"（意为天神文殊皇帝大主宰）。接着就举行宴会。然后达赖又在仪仗导引下回到黄寺。

满洲皇帝和在场的蒙古首领，要求达赖给他们写出关于寺院组织的规皇。训示发到所有寺院上面都盖有达赖喇嘛的印。

在同一年的二月十七日满洲皇帝为达赖喇嘛举行送别宴会，他送给客人一些中国制的东西。两天后达赖离开了北京，仍然和他来时一样的举行了隆重仪式。给了他更多的礼品和"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呾喇达赖喇嘛"的称号。

在到达噶尔俄波 Khar Ngonpo （Koko Khatan ）后，达赖喇嘛打发他同行的一半人先去西宁等他。他自已则巡视安多地区的寺院和城镇，然后和在西宁的人会合继续前进。当他离开拉萨还有六天路时，固始汗、第西和西藏政府的其它重要官员出来迎接他。班禅这时已经老得不能动了，他派了自已的代表。在同年（1653年）十月廿四日达赖回到拉萨。

为了回答访问扎什伦布寺和藏堆地方的要求。达赖于木马年（1654年）六月十六日开始了一次巡游。班禅准备到仁蚌去迎接他。但他认为班禅太老了当时已八十三岁，不好再劳动他，就写信要他派代表。班禅同意了，但是仍然走出一天路来欢迎他。

在完成巡游后，达赖回到哲蚌寺，同年十二月初七，固始汗死在拉萨年73岁。他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扎喜巴都和达延罕联合进行统治，但在1660年他们把和硕特部的统治权分了。扎喜巴都得到青海地区，达延罕仍留在西藏，后者的名字叫丹津多吉，他从达赖得到达延罕的称号，后被称作丹津达延罕。

在1656年一位孟加拉统治者叫作沙苏甲 Shah Shoo gah 派一位使者去见达赖喇嘛，送了他一匹印度布。作为答谢达赖喇嘛送了他一些宝石。这一年第西锁南群培去世了，但他的死耗被扣压了一年多，因为当时西藏局势不稳。直到新的第西被任命前，达赖自已负日常行政的职务。他对锁南群培一生所干的很为赞赏，他说第西建立起来的和蒙古人的关系就像一位高超的织匠织成的地毯一样。

下一年，一位不丹首领曲节那喀仁清和他的二十名家属被仇人杀死了。他和西藏有密切的往来，于是一支西藏军队再度进入不丹，虽然没有详细的记载留下来，很显然比以前几次是强多了。

1659年达赖喇嘛派了一名代表到蒙古去要求各酋长团结，不要经常互相争夺。作为他们愿意遵从的表示，蒙古酋长们不论在蒙古还在西藏的都发了誓，并在誓言上盖了章；这也是达赖喇嘛宗教影响的一种标志。

在铁鼠年（1660年）七月十三日清来嘉错被任命为第西。第二年藏尼边境发生事端，结果一支藏军在扎喜孜巴，姜仲巴和梅恰巴指挥下被派去驱逐尼泊尔骚扰者，这是和尼泊尔冲突的头一个例子。

以后还有。

在锡金登松那介继朋错那介成为国王，他来拉萨向达赖喇嘛致敬，并向第西请教打算在锡金推行"十六法"，这是在绛求坚参时西藏制订的法律。

顺治皇帝死后，由他的儿子康熙继位。同一年１６６２年班禅喇嘛罗桑曲坚去世，年９１岁。三年后新满洲皇帝向达赖喇嘛提出紧急请求，请他派一名代表去青海安抚那里的蒙古人，他们经常骚扰中国边境地区。代表派去了，蒙古人也服从了，局势就安静下来。当时达成一个协议，蒙古人不再骚扰边境，蒙汉间的贸易予以恢复。

在１６６５年扎什伦布寺向达赖报告一名三岁的儿童在后藏的托甲 Thogyal 地方找到了，可能是班禅的转世，请求他对这孩子认定。他认定这个孩子是班禅的转世，给他取名为罗桑意希，被认为第二世班禅，接到扎什伦布寺。

第二任第西清来嘉错和丹津达延罕在１６６８年的同一个月内去世。罗桑图托 Lozang Thuthop 被任命为第三任第西，丹津达延罕则由其弟贡却达赖汗继位。由于不丹攻击门巴的阿觉部 achok fribe 他们二人又派藏兵去不丹。因班禅一世于１６１２年访问不丹时和他们建立了友好关系，于是扎什伦布的一批僧人和几雪台吉 Kyishod Teji 就和不丹人谈判，重申了１６１５年的协议。这时达赖喇嘛被要求调解额鲁特准噶尔部与喀尔喀蒙古部之间的纠纷。他派了一名代表去，纠纷就解决了。

小班禅这时已够年龄从达赖喇嘛受格楚戒。他专为受戒到了拉萨。在达赖喇嘛的官员中为坐位的高低问题讨论了很久。最后决定班禅的坐位将和甘布朱古 Gampo Trulku 和朱巴朱古 Drukpa Trulku 这两名著名活佛的位子一样高。

这时西藏人穿各种样子的服装，有些是蒙古的样式，有些是汉人的样式。达赖喇嘛决定应当有自已的民族服装，特别是他的官员们，应按品级穿衣服。在乃东和仁蚌巴统治时期，在新年节日时所有官员必须穿早期国王的服装。这一风俗称为仁珍江恰 Rin chen Gyancha（宝饰），在藏巴汗时这一风俗没有了，这时又加以恢复。第西召集所有年老官员和僧人来帮助选定这种古代服装。一种按品级和资历排定坐次的规定也制订出来，称为"当仪阿库巴卓"Danyig a-Rha Badrə 。品级高的坐位也高。所有蒙古首长、喇嘛、僧人、贵族和官员，在这种制度下都得到一种确定的身份。这些规定于1672年新年正式颁布并开始执行。

在东部喀木的甲塘 Gyal fhang （今云南中甸县，译者注）那里的居民受汉人唆使，不服从拉萨派去的官员，结果西藏军队在官员噶杰诺尔布 Kagyad norbu 和梅恰巴的指挥下，还有蒙古军官图拉巴都台吉被派到那里，他们成功地恢复了那里的法律与秩序。报告送回拉萨提出要处决二十名肇事头目，达赖决定改为终身监禁。

不久后，满洲皇帝派来三名官员带着信来见达赖喇嘛，向他借西藏兵和蒙古兵。因为中国有发生内部叛乱的危险，这是由不满意的大臣搞起来的，康熙皇帝毫不踌躇地请达赖帮忙，达赖作了如下回答。

> 满洲皇帝和达赖喇嘛之间始终保持着宗教施主关系。你的父亲顺治皇帝在我访问中国时对我特别仁慈和宽宏，我也经常为你的国家的和平和繁荣祈祷。我不认为藏兵到中国能有多大用处，因为他们不适应那里的气候。蒙古人是优秀的战士，但他们是难于驾驭的，你会发现他们是一种负数而不是可依靠的力量。蒙古人和西藏人都不适应炎热气候和流行在中国的天花病，因此我相信他们对你用处不大，派他们到中国去是不可取的。

达赖喇嘛派了自己的两位官员康沙若登 Khangsar Rapten 和本塘索旺 Bumthang Sodwang 随北京派来的使臣到中国去了解真实情况。这些人一行刚刚出发了，就又有另外三名汉官到了，他们是由不满意的大臣派来的。西藏官员要求达赖喇嘛不要接见这些官员。但是达赖说把他们当外国人看待，并下令接待这三个人就和接待其它外国人一样。达赖喇嘛给了这些大臣的代表以和给满洲皇帝一样的回答。他还说他对这一事件是采取大公的态度并将为皇帝与大臣之间争执的和平解决祈祷。由于中国内部的斗争，达赖认为蒙古部落的团结是重要的。一位蒙古人叫达赖浑台吉退休到西藏来学经，达赖请他到蒙古去促进部落之间的团结。达赖派他带着致所有蒙古首领的信，要求他们对他全面合作，因为他是达赖的个人代表。

１６７５年新第西罗桑图托辞职。因格鲁巴严格要求僧人独身，但是罗桑图托却养着个女人。她是乃东家的后裔。当达赖听到此事，就让第西把女人打发走。第西办不到，只好辞职。他退休后和他的女人一起到桑日庄园上去。

桑结嘉错，第二任第西的侄子，被达赖指派为第西，但是桑结嘉错以年纪太轻为理由拒绝了这一任命，于是罗桑津巴被派为第西，一直任职到１６７９年。

这是不丹和门巴人的协议到期了，门巴人又谣传不丹人又打算进攻他们了。一支西藏部队迅速派入不丹，一个小地方的叫作登洞宗 Tengdong Dzong 的碉房被烧毁了。于是再开始谈判，但无结果。西藏与不丹间的贸易也停止了，由帕里到错纳之间的边境也封锁了。１６７６年不丹人进攻锡金，在春丕谷占据了三百户。西藏军再一次进攻不丹，不丹人从锡金撤出，春丕谷也放弃了。

达赖认识到喀木边界城镇的重要性。他派代表到甲绒、果洛、打

箭炉、中甸、乡城和绒。宣布减税和调解地方纠纷，建立新的寺院和重新分配无主土地。在中藏也进行了同样的措施。这些举措证明达赖是一位宗教和政治的伟大领袖。

罗桑津巴于1679年辞职，由二十七岁的桑结嘉错继位第西。这一年有十四名宗教学生从马图拉 Mathura ，瓦拉纳西 Varanasi 和库卢来到拉萨。

拉达克统治者一些时候来老为难，这里的格鲁巴寺院，甚至派军队来攻打西部西藏的一些地方。最后达赖派了达赖浑台吉的儿子，噶丹才旺为司令官带一支蒙古和西藏部队去打拉达克。在普让发生了一些战斗，但拉达克人都占据了碉堡，很难攻取。噶丹才旺决定越过这些碉堡，直接进攻拉达克。

拉达克统治者德来那介躲在他都城巴斯果 Basgo 碉堡里，西藏和蒙古军把巴斯果包围起来。后来德来那介请求喀什米尔的莫队儿统治者帮助。由于可能会成为一种旷日持久的战争，于是召开了一个调停会议。不丹的大活佛米帕那介出面调停。德来那介同意把古格，普让，如妥还给西藏并向拉萨三年进一次贡。1684年的条约划定了西藏与拉达克的边界，在以后的很多年都是有效的。有一百名蒙古兵驻扎在西部。噶丹才旺回到拉萨，把条约的利益献给了甘丹颇章（西藏政府）。

水狗年（1682年）二月廿五日达赖五世在布达拉宫去世，年六十八岁。达赖五世从幼年起就表现冷静、严肃，后来成为一个強毅有决断的人物。他是不多言的，但所言必信。虽然他是一位格鲁巴喇嘛，他却保留了几名其它教派的著名喇嘛，这曾引起一些人的批评。达赖并不理会这些意见，他说多了解一些别的教派的情况总比什么也不懂好些。传说他也是一位梵文学者，他写了很多书，包括一部关于

写诗的作品。他建立了两个学院，一个为僧官，一个为俗官。蒙文、梵文、天文、诗歌、射箭和马术还有宗教和行政科目是这两个学院的课程。

政治上达赖五世对统一地方是很成功的。早先各教派贵族和派系之间争权夺利非常激烈。达赖喇嘛成功地赢得西藏境内以及边境地区首领们的效忠。税收是公平的，没有例外。虽然他对属民是同情的，但对叛乱则无情镇压。在他写的《学习珍珠蔓》Bslabbya mu thi li'i Phrengba 中，这是一部关于政教事务的书他说不要怜悯那些为自己的罪行而被正法的人。通过他的宗教权威在蒙古和其它邻接地区，甚至在中国佛教徒中和流行藏语的中国地方都产生了政治影响。至今西藏人谈起他时都称他为伟大的五世。

有些中国资料说固始汗是中国的属下，他是有意使达赖于1642年当权的，这样就说明达赖喇嘛也同样是中国的属下。上面已经说明察哈尔、准噶尔和硕特和其它蒙古部落，在明朝末年都是独立的。这里就不存在固始汗帮助他们使达赖当权。他在巩固了达赖的权力以后，很少干予西藏的事务。宗教热诚和对达赖的信仰是固始汗行动的主要动机。他冬天住在拉萨，夏天住达木牧场，他随时应达赖和第西的召换送去部队。虽然他和他的后裔都称为王，但是他在坐次中占有比达赖和第西较低的位子。固始汗是和硕特蒙古的独立领袖。他创建了达赖的世俗权力，但他既不干予行政，也不控制它的政策，所有权力都置于达赖五世手中直到他去世。

八、西藏对立的权力

达赖五世死时，桑结嘉错任第西刚满了三年。在他小的时候，他受到叔父第西清来嘉错的教导，稍大一点就当了达赖喇嘛的侍从。因此在政治和宗教事务方面受到完整的训练。他成为一名著名学者，晚年成为宗教、历史、医药和天文学著作的作者。达赖喇嘛对他期望很大，在他二十七岁时就让他当了第西，给予他比过去的第西更高的地位。桑结嘉错能完全按照达赖喇嘛的意图办事。

有些学者说桑结嘉错是达赖五世的亲生子。但是在西藏记载中没有足以证明此事的材料。达赖曾经因破独身戒使前任第西辞职，他自己怎么能干这类事情呢！可能由于他还很年轻就当了第西，使人们产生种种联想，就推想他是达赖的儿子。

尽管有些学者说达赖五世的死，西藏人民是知道的，西藏材料则说桑结把它扣压了十五年。这一事实清楚地记载在桑结自己写的书上《黄琉璃》 Baitaryaperpo ，只有达赖的私人侍从、那介扎仓的僧人和第西才知道达赖之死。官员和属民都一致相信，第西的宣布达赖喇嘛是无限期地坐静去了，不能加以干扰。任何人有特殊紧急事务要见达赖，只能单独在达赖的私室去见。饮食像平常一样按时送上去，一切都安排的像他活着一样。

在房子外面的官员们，可以听到继续不断的铃鼓声，表示他在念经。在公开场合，他的官服被放在宝座上，朝见的人就和他亲临一样举行各种仪式。但是从蒙古来的要人要求觐见，第西就不好拒绝，他们被允许到达赖的居室去朝见。在这种情况下，一位那介扎仓的喇嘛装扮成达赖五世，按正常礼节举行朝见仪式。来访者从来没有在近处见过达赖，因此完全被这种安排瞒了，他们还帮助散布达赖还活着的

神话。礼物和尊称在达赖宝座前给予朝见者。他的官印仍按法定次序摆着。

达赖喇嘛的一名侍从在他日记中写道，这位那介扎仓的僧人苦于这种伪装达赖的差事，曾企图逃走。他有时被揍一顿，有时给点东西安抚一下。的确在那种情况下被关在布达拉宫里十五年是不怎么好受的。

这样瞒了几年后，一些人也起了怀疑，一位小喇嘛叫作明珠林东色，明珠林是一个宁莫派寺院，他要求达赖接见，并取得一个新法名。他的一个同伴告诉他，让他到近处看看达赖喇嘛，回来好对他们说一说。这个小喇嘛回来说得非常仔细，连这位伪装者戴的帽子和帽檐都描绘了。达赖五世几乎秃头，大圆眼睛，这是不会使人认错的，帽子和帽檐就是想蒙混这种特点。

桑结嘉错负担着包括达赖所管各种事务。他的行政是无懈可击的。他按时出席各种机构处理事务。每个政府机构都没有他的坐位。因为他随时可以出现。他经常装扮成一个平民出入。他经常在伪装下进出酒店商肆。人们都很小心不敢在公共场合多说。生怕偶然被这位"扁头的第西"听到。一次一位酒徒被这位伪装的第西问以对政府的意见，这位酒徒回答说，"我就会喝酒，其它事情是第西的"。

在固始汗和达赖汗时，每届新年大法会时，西藏和蒙古骑兵、步兵，要全付甲胄在达赖喇嘛前列队走过，在大法会以后的两天中，这些军队要比赛各种武艺，继之以宴会、奖赏。后来这就成为一种习俗，每一位高级官员都得提供骑兵和步兵在大法会时举行仪式，并轮流充当将军，这一习俗一直流传到现在。相传第西桑结自己参加了比赛，当时没有人能在射箭上胜过他。

蒙古部落中发生了不团结。达赖浑台吉死了，他的儿子仍然住在

蒙古。第西以达赖的名义写信给他要求他把蒙古人团结起来去收复落在满洲人手里的地方。准噶尔和和硕特联合起来。开始威胁中国的兰州，但是察哈尔部落在满洲人的阴谋下反对其它部落，不愿联合。

1695年布达拉宫完功了。第二年第西桑结嘉错宣布达赖五世于1682年去世，他的转世已经十三岁了。1697年，尼玛塘夏仲被派到中国皇廷正式报告达赖五世去世。康熙皇帝，自已跑到皇宫的二门来迎接西藏的使节，尼玛塘宣布达赖喇嘛早已死了，他的转世现坐在布达拉宫。

满洲人就利用这一宣布使察哈尔、和硕特和其它蒙古部相信，第西故意扣压达赖的死讯是为了把权力抓在自已手中。他们也攻击第西歧视住在西藏的蒙古人。然后他们就给察哈尔的首领以金钱和尊号。所有这些导致了两个部落成为一边，准噶尔成为另一边。第西不为青海地区的和硕特部所喜，当他们听到谣言说他们的同胞在西藏受歧视，又听说达赖已经死了。和硕特部就对收复失地完全没有兴趣了。

1682年达赖五世死后，第西桑结嘉错曾秘密找寻转世，1685年他得到报告说在门隅地区找到一个三岁的孩子，很可能就是达赖的转世。第西两次派可靠的人去寻认。然后于1688年这孩子被悄悄地弄到襄噶孜，在这里由第西派去的老师加以教导。若干年后，第西正式宣布达赖的转世已发现后，他就请班禅二世到襄噶孜去给他授戒，并取名仓养嘉错。

1697年达赖六世仓养嘉错在布达拉宫坐床。他是一位漂亮而聪明的青年，他从第西接受宗教和政治训练。班禅罗桑意希几次访问他并给他传法。这时班禅两次被康熙皇帝邀请到中国去。但和第西商量后，拒绝了这一邀请。班禅的理由是经典还没学完，另外还怕流行于中国的天花病。满洲皇帝怀疑第西故意阻挠班禅前来，但不是这种

情况。相反班禅写信给第西表示他不愿到中国去。

这位新达赖长大后成为一位优秀的射箭手，他经常到公园参加比赛。第西和班禅都劝说他不要过一种游荡生活，应当好好学经。他们要求他受格隆戒，这时他已二十岁了。第西请班禅到拉萨来给达赖授格隆戒，但是这位年轻的达赖却另有想法，他不仅不愿受格隆戒，连已经受过的格楚戒也不想遵守，后来他于1702年到扎什伦布访问班禅，回了他所受的格楚戒。接着三大寺的堪布，第西达克孜和固始汗的孙子，达赖汗的儿子，拉藏汗都劝说他不要回戒，但都没有效果。

慢慢地达赖失去对第西的尊重，开始游荡的生活，经常在拉萨和雪（布达拉宫下面的居民点，译者注）过夜，夜以继夜，他在拉萨街上鬼混，和一位朋友叫作塔坚乃 Thargganas 的喝酒歌。他偷偷的约姑娘们到他公园的帐房中过夜。一句话达赖成为一个市民，他喜欢和妇女们在一起，他写了绝妙的浪漫的诗歌，后来成为有名的作品。

第西桑结嘉错得悉塔坚乃经常给达赖和妇女牵线，决定将他杀死。在计划好的这天晚上，达赖喇嘛、塔坚乃都互换了服装，他们在完成他们的夜游后从布达拉宫的后门回来，在黑暗中他们受到三个人的突然袭击。塔坚乃的仆人背上吃了一刀死去。第二天达赖喇嘛请教他的卦师，他帮他找到凶手，他们都被正法了。从此达赖和第西的关系疏远冷淡起来，他疑心暗杀是第西搞的。

在喇嘛来龙吉仲 Lelong jedrung 的日记中对达赖六世有一个完整的描写，当时他去访问达赖，他说他等了好久，后来达赖出来了，他穿着一件俗人穿的兰缎子衣服，一手拿着弓，几个手指上都戴着戒指，头发长得很长，不像一位僧人的秃脑顶。达赖只给他几分钟就和一群随从到公园里去了，留下来龙吉仲和第西商量事情，他说

第西看上去很忧愁苦恼，不像平常欢乐的样子。他也只给了吉仲一小会儿时间，因为他公务很繁重。

拉萨的人开始唱一首关于达赖六世的歌子

在布达拉宫他是仁珍仓养嘉错，

在拉萨，在雪，他是快乐的青年。

达赖自已写了很多情歌，下面选两首作为例子：

去年花木忙复青，

如今枯萎伤人心，

青春老去身枯曲，

弯弯俨如南地弓。

我心已随我爱去，

但愿能得结同心，

我如获得无价宝，

一似来自深海中。

拉萨和雪的房屋一般都用白灰粉刷，但有一些是刷成黄色的。相传这些房屋是当年达赖六世所喜欢的女人住的。

一系列的情况，包括蒙古人的不满和达赖喇嘛的胡闹，迫使第西于1703年辞职。但在他辞职前，他给达赖五世修好一座华丽的灵塔，达赖五世的肉身就保存在里面。第西举行了一次历时十天的祈祷法会，结束时举行一次叫春曲色班 Thogcho serbang 的游行，这一仪式每年举行一次，一直到1959年。（这里叙述的是藏历二月的法会叫传小昭，藏语称为“春曲”。正月的法会叫传大昭，藏语称为“蒙派钦莫”。春曲结束时举行一次游行，陈列各种佛像擡幢表演各种宗教游戏，汉人称之为“赛宝会”或“晾宝会”，译

者注）桑结嘉错辞职后，阿旺仁清任第西，但桑结仍在幕后操纵。

这时和硕特蒙古在中藏的首领是拉藏汗，他是固始汗的孙子。拉藏汗于1697年任和硕特部首领。在以后的年月里拉藏汗与桑结之间矛盾愈来愈深。他们之间的分歧来自对修炼的看法，西藏人与蒙古人之间的摩擦，特别是关于达赖六世行为的问题，他们之间的关系愈来愈恶化。最后在1705年初，在达赖五世灵塔前召集了一个会来调解这位前第西和和硕特汗之间的纠纷。出席的有达赖六世、拉莫护法、达克孜夏仲、班禅的代表和三大寺的堪布。会上决定拉藏汗应当回青海去，不必留在拉萨，在那里可和西藏保持和谐的关系。

拉藏汗借口回青海，到了纳曲卡（即黑河），在这里他召集附近的蒙古人组成一支军队，然后向拉萨进发。前第西听到这一消息后，就派藏军去阻止蒙古军前进。接着达赖和三大寺的代表出面调解。班禅也亲自到前方去进行调解。在到达苏波拉山口时班禅得到达赖的通知说调解已成功了，双方马上就要停火了。

当时决定前第西不要留在拉萨，而去贡嘎，在那里可以给他以庄园的补偿。拉藏汗则回到青海去。听到这些以后，班禅就返回扎什伦布寺去了。几天后桑结嘉错就到贡嘎去了，在路上他被拉藏汗的人捉住，把他带到堆陇那孜 Tohlung Nang Tse 在木鸡年（1705）的七月十七日就在那里被正法了。拉藏汗回到拉萨，取得了全部政治权力。

中藏的人民和官员对前第西之死都表示遗憾，因为他唯一的错误只是隐瞒达赖五世之死。在桑结死后，支持他的人都被监视起来。桑结指派的第西阿旺仁清在1703年失踪了，拉藏汗作了仔细的搜查也没有找到他。

一批著名的西藏人开始支持拉藏汗。其中有一名叫颇罗乃他是一

位年轻的俗官。在以后的事件中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拉藏汗曾经支持达赖六世，但他一朝大权在手，他就对达赖的放荡行为不满意了。最后在火狗年（1706）五月初一，拉藏汗把达赖召到他面前，数说了达赖的一系列失行，然后下令把他带到拉萨附近拉鲁的蒙古营房，并派人到布达拉宫取他的私人物品。

人民对这样处理达赖有反感，举行了关门罢市以示抗议。但是除此之外毫无办法，因为有蒙古军队在场。达赖设法从拉鲁给他的情妇写了一个条子，上面说：

白鹤借我翼，

远飞到里塘，

盘旋归故乡。

当时没有人解释它的含义，后来达赖的转世在里塘找到，于是人们了解到这是他的予言。

拉藏汗是和满洲皇帝结了盟的。皇帝对西藏事务愈来愈有兴趣，这是由于西藏人和准噶尔蒙古的勾结，当时皇帝决定把达赖六世免职和放逐。有些西藏记载说要把他弄到蒙古去，另一些记载说康熙皇帝下令把他送到北京。在藏历五月十七日（公历6月27日）正式宣布达赖被废并派人押送放逐。当这一行人经过哲蚌寺附近时，寺院的僧人冲下山来，把达赖抢到寺院去了。三大寺的僧人联合起来保卫他。拉藏汗派兵围了哲蚌寺，达赖在寺内呆了三天，后来看到再抗拒下去将招致更大的损害，他本人也要求放他走。在告诉僧人他还会回来见他们时，他就离开寺院，又回到押送他的人那里。

在达赖六世被废后，拉藏汗就宣布达赖六世不是前世真正的转世。然后他指定一个年轻喇嘛叶阿旺意希嘉错，是真转世，并使他在布达拉宫坐床正式称为达赖六世。人们称前世达赖为塔木介清巴（意为遍

知一切）但对这位新替身却称为"古学"（意为先生）他并不被人们接受是达赖的真实转世。

1709年在堆和后藏发生严重地震，毁了很多房屋和压死很多人，政府进行了救济，但缺乏帮助使许多城镇荒废了。

几年后拉藏汗听到，在喀木找到了达赖的转世，他派了一个西藏人和一位蒙古将军去调查情况。在到达里塘后，他们被告知有一个小孩叫格桑嘉错，于土鼠年（1708年）七月十九日出世。他们就去看这个孩子，他家里说这孩子就是达赖六世的转世。西藏将军为了避免拉藏汗的支持者危害这个孩子就说是不是前代达赖的转世没有关系，反正人们说前代也是假的。晚上他就对孩子的父亲说，这孩子确实不寻常，他建议把孩子带到一个安全地方，不要让人看见。这一家就搬到里塘北方的德格。

有些蒙古部落对前世达赖是同情的，听说找到了他的转世，决定给予承认和保护。他们把孩子从德格护送到青海地区，在这里受到蒙古人的热烈欢迎。满洲人看到这是一个可以把他们的势力伸进西藏的机会，1715年派了一位代表去找孩子的家，建议把孩子送进寺院，接受宗教训练。最后于1716年，这孩子就被送进塔尔寺。

在中藏拉藏汗继续巩固他的权力。他的一次军事征伐遭到失败，他在1714年在对不丹的一次战役中被击败。同一年他收到准噶尔部长才旺若登的信，建议把他的女儿嫁给拉藏汗的儿子。才旺若登是达赖浑台吉的儿子，他和已故桑德嘉错的亲密结盟，使他收到拉萨三大寺僧人的呼吁，要求他推翻拉藏汗，把真达赖立起来。才旺若登知道他的女儿和拉藏汗的儿子噶丹丹津在通信，就决定利用这一关系，他写信给拉藏汗建议他们的孩子结婚，并请丹津来接新娘。

拉藏汗是怀疑准噶尔首领的意图的，但同时他也想和准噶尔蒙古

结成有力的联盟。他决定请教拉莫护法。这位护法作起法来陷入昏迷呢喃了一阵。拉藏汗和他儿子各有解释。拉藏汗说去是有危险的，最好不去。除非本人十分坚决。他的儿子说这仅仅表示如果婚期推迟会出些麻烦拉藏汗终于同意他去。于是丹津就出发去接新娘。当他到达准噶尔驻地后，立即被擒，关了起来。

1717年才旺若登指定他的兄弟才仁顿珠为准噶尔军司令。这支部队包括七千骑兵。立即向西藏进发。入侵已开始，丹津做为钓饵已失去作用，准噶尔人就把他处死。平常蒙古人进藏多取道青海地区，这次才仁顿珠取道叶尔羌从西北部进藏。为了避免在途中战斗，他们扬言是陪送新娘到拉萨去的。拉藏汗这时在达木地区，他收到噶大克官员的信，报告他一支大的蒙古骑兵正向拉萨进发。他还不知道他的儿子已被处死。拉藏汗派了一位信使带了九名兵去给他儿子送信。当他们在纳仓看到准噶尔骑兵，就留下五名兵，并对他们说如果有什么情况赶紧回去报告。然后他就和四名兵进了准噶尔营内。等候的五名兵不见他们归来，就立即追回向拉藏汗报告了准噶尔人的诡计。

急急忙忙在达木修了一点工事，颇罗乃被封为台吉，并派为将军。他劝拉藏汗把火枪兵调到山上，把守达木与拉萨之间的山口。但是拉藏却选择了把部队集中在达木些地上。准噶尔人利用间谍到处散布他们来西藏是为了达赖五世和六世，是为第西桑结报仇。他们要把一切权力还给西藏人，赶走假达赖六世。他们劝告西藏人不要参加准噶尔部和拉藏汗的和硕特部之间的战斗。当达木地区的战斗开始以后，西藏兵除颇罗乃率领的一部外，都无心战斗，但和硕特部则奋勇力战。在军力悬殊之下准噶尔兵占了上风，拉藏汗只得撤退到拉萨，在这里他准备守城。

准噶尔兵来到拉萨，包围了它，作攻城的准备。包围一直延续到

十一月末。这时准噶尔已经作好了攻城的准备。他们准备的很充分，一夜之间就把城拿下了。但拉藏汗仍坚守布达拉宫。认识到这样不能坚持很久。就派他的小儿子苏尔雅 Surya 突围出去到青海去调救兵。苏尔雅也被准噶尔人俘获了。拉藏汗决定战斗，在火鸡年十一月初一（1717年12月），拉藏汗冲出布达拉宫向敌人进攻。他们之间进行了白刃战。拉藏杀死十一名敌人。最后也被敌人砍倒了。拉藏汗的生涯就此结束，他从1705—1717统治着西藏。他和康熙皇帝保持密切联系，实际上他是中藏的独立的军事统治者。

在准噶尔控制了拉萨后，他们指派拉甲若登 Lhagyol Rapten

此人前称为达孜夏仲 Taktse Shapdrung

为西藏政府名义上的首脑。拉藏立起的达赖六世意希嘉错被废黜了，并关在甲坡日（俗称药王山，在布达拉宫之南不远，译者注）。班禅二世在他自传中记有他曾为意希嘉错祈命，但未得肯定的答复。关于意希嘉错的命运是不太清楚的，他被送到中国去了，于1725年去世。曾经在拉藏汗下面服务过的僧俗官员被逮捕。四位宁莫派的喇嘛，两位班禅的亲戚和三名西藏高级官员被正法了。颇罗乃受到宽大，因为他是新第西拉甲若登的好友，但是他也被刑罚和免去了职位。他被允许回到他后藏的庄园上去。

准噶尔蒙古人非常不喜爱宁莫巴派。他们摧毁了它的两所最好的寺庙。到这以前准噶尔还是得人心的，因为他们废黜了假达赖，杀死拉藏汗和把第西的职位交给西藏人。但由于他们杀死宁莫巴喇嘛，又摧毁寺庙，人们开始对他们有反感。

准噶尔人想把达赖七世接到拉萨，在布达拉宫正式坐床，但这位小喇嘛是在青海塔尔寺满洲人的保护下。1718年西藏人请求准噶尔把真达赖接回拉萨。准噶尔司令官才仁顿珠答应去办，但他无法使

满洲人把达赖交出来。这一失败更增加了西藏人的不满。

第西达孜夏仲和三位西藏官员秘密商议写了一封信表示他们承认住在塔尔寺的那位小喇嘛是达赖六世的真转世。这信派人送到塔尔寺。当康熙皇帝听到这位小喇嘛已被正式承认为达赖七世，他也派代表到塔尔寺承认格桑嘉错为达赖喇嘛的转世。在1720年三月送给这位小喇嘛一个金印，上面用满文、蒙文和藏文刻有"达赖六世之印"，这样康熙皇帝就避开了前两位达赖的真假问题。

康熙写一封信给达赖喇嘛和他在青海的支持者，信上说：

我很高兴达赖今天被认定了。他是一位真正的转世，人人都要敬重他。我和固始汗的后人都是他的施主。三年之内我保证供应他和他的随从一切开销，数目是一百卅四人。

达赖喇嘛像日光一样，是无所不照的，佛的光辉将通过他照到每人身上。在青海地区的蒙古人要团结友好，不要在内部争吵。达赖喇嘛要教导他们听命于皇帝，我也确信他们是不敢不听话的。

由于准噶尔统治的日益不得人心，西部西藏噶大克的藏官康济乃得以在这一地区巩固他的权力。当他听到有些藏官将取道这里放逐到准噶尔地方，把他们救了出来。他给颇罗乃写了一封信责备他坐着不动，不起来反对国家的敌人。颇罗乃于是离开他的后藏庄园，在西部边境设立起他的司令部。从那里他们巩固了后藏五个地区的控制。准噶尔人只控制拉萨和卫部。

这时两位重要的西藏官员逃到塔尔寺去。在1718年中有几千人的一支皇家军队由一名满洲官员阿兰泰率领，穿过柴达木到了黑河。他们遭到准噶尔和西藏人的进攻，被打败了。大批中国人被杀死少数逃了回去。

在黑河战败后康熙再派第二支军队，由他的第十四子允禵率领去

进攻准噶尔，并护送达赖七世由塔尔寺返回拉萨。到哲曲河（即金沙江。译者注）边允禵亲王就回去了。由满洲将军延信和三位蒙古官员，才旺诺尔布，罗桑丹津王和顿珠王率领继续前进。

当康济乃和颇罗乃知道达赖喇嘛正被大军护送回藏，他们就召集起一支藏军来到拉萨。准噶尔人发现军队正从南方和东北开来夹攻他们，就带了大量的掳获物离开拉萨向西北逃走了，颇罗乃还派兵追了他们一段路。一小部分逃到东北，在唐古拉山附近绕过皇家军，没有发生冲突。另一支皇家军队由满洲将军噶尔弼率领，从东方经四川和喀木也到达了。

大家都相信是满洲人把准噶尔人赶走，因而征服了西藏的。但是必须注意，在满洲兵还没有到达以前，康济乃和颇罗乃已经把准噶尔人赶出拉萨了。满洲皇帝也没有派军队来"征服"西藏，他们是来替他们的同盟者拉藏汗来报仇，并把达赖七世扶上宝座。

九、达赖七世和满洲势力在西藏的开始

在铁鼠年（１７２０年）九月十五日达赖七世格桑嘉错进入拉萨，并在布达拉宫坐床。一个临时军事政府建立起来恢复和平行政。一个军事法庭组织起来审讯准噶尔人和他们的同情者。由于准噶尔人已经跑了，不能抓回来受审，他们找到一个替罪羊，这就是年迈的第西达孜夏仲，和他的两个亲准噶尔的大臣。不顾颇罗乃的大声呼吁，他们仍然以出卖拉藏汗的幼子苏尔雅与准噶尔人的罪名被判罪正法。西藏人对第西的被正法有反感，因为他仅仅是准噶尔人的傀儡。

假的达赖六世被从药王山取出来解送到中国，五年后死在中国。满洲人在拉萨建立了营房驻扎军队维持和平与秩序。才旺诺尔布这位蒙古官员，在将军延信指挥下，被给予满洲将军之印并奉派为驻军司令。

一种新的政府形式建立起来。第西这一职位被取消，因为它把过多的权力集于一人之手。这新政府是一个大臣会议为首——由两名正大臣，两名付大臣组成。——他们对行政负责。西部西藏的长官康济乃受到大清巴图鲁的封号受派为首席大臣。工布地区的长官阿尔布巴受派为另一正大臣。扎尔乃和龙布乃为付大臣。1723年后颇罗乃也成为会议大臣。扎尔乃是一贯反对准噶尔的政策的，阿尔布巴和龙布乃是早先脱离准噶尔逃到塔尔寺去的。

1722年康熙皇帝去世由他的儿子继位，这就是雍正皇帝。1723年新满洲统治者开始了一种退出的政策。他撤退了，拉萨的驻军，把中藏的行政完全交与西藏官员之手，没有任何满洲的军事支持。

雍正元年，青海蒙古在固始汗的孙子亲王罗布藏丹津的率领下叛变。叛变受到镇压，在1724年青海地方被併入满洲帝国版图。

这时在拉萨的大臣会议中也发生了分裂。康济乃和颇罗乃受到另外三位大臣的反对，即阿尔布巴，龙布乃和扎尔乃。他们在卫地有既得利益，不满意康济乃同时兼任西部西藏的长官，又担任会议的首席。颇罗乃，他的兴趣是在后藏，倡议和满洲人结盟。这一政策是另外三名大臣反对的。属下的官员都慢慢的加入了这两个派系。他们各以自已地方的利益为主。这些会议大臣很少考虑国家的事务。他们走到那里都带着保镖。

情况愈来愈恶化，要达到爆发了。突然的在1726年夏雍正皇

帝派了个使团来宣布宁莫巴的教法要加以禁止。康济乃开始执行这一迫害宁莫巴的政策，这使他和颇罗乃也发生了矛盾，后者是庇护宁莫巴出名的。颇罗乃感到事情棘手，就提出辞职，但被拒绝了。这时颇罗乃听到他的夫人生病就于1727年春离开拉萨回后藏自己的庄园上去了。他请朋友随时通知他关于拉萨事态的发展。对立和仇恨的情绪使康济乃继续一意孤行，结果在火羊年六月十八日（1727年8月6日）会议在大昭寺楼上召开，阿尔布巴的兄弟递给康济乃一封信，当康济乃开始看信时，有几个官员从后面把他捉住，阿尔布巴，龙布乃，扎尔乃都抽出刀来一气把他扎死。等在门外的康济乃的保镖，也被突然杀死。他们又派凶手到康济乃家里把他的两个老婆、秘书和一位管家都杀死。康济乃和颇罗乃的朋友两名北方的官员也被杀死。又派人到后藏去杀颇罗乃。

颇罗乃受到拉萨朋友的警告，他把生病的妻子隔离起来，留了一些人保护她。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六十名家丁就到西部去了，在这里他找到驻在尼泊尔边境的后藏部队，他劝说他们支持他，他又写信给西部西藏的地方官，通知他们的长官已被残杀了，要求他们协助为死者报仇。噶细乃也叫多仁，是康济乃的一个兄弟，刚当了堆的新长官。他和其它有权势的官员派了大批人马来接应颇罗乃。当他已组成一支兵力后，就带着开到后藏。

有一股藏军在一位后藏将军指挥下驻在日喀则。当这位将军还没拿定主意要支持那一边，颇罗乃就把他扔出墙外，夺取了他的指挥权。他的临机决断的能力，赢得了“米王颇罗” Miwang Phalha 的称号（意为強力的颇罗）。

这时，阿尔布巴、龙布乃和扎尔乃从工布及卫部召了兵派到后藏的江孜，战斗打了起来，连续几月不分胜负。最后班禅喇嘛，萨迦喇

嘛和达赖喇嘛的代表都来调停。在土猴年三月初三（1728年4月11日）达成停战协议。双方退出战斗，卫部的大臣们把部队解散了，颇罗乃则保持他的部队不动。

过了不久一个卫地的叫作阿觉巴桑的人在纳仓地方杀死几个后藏人。以这一事件为借口，颇罗乃撕毁停战协议，他派他的大儿子带着九千兵去拉萨，他自已则到北方去又召集了达木地区的三千名牧民和蒙古兵，他从东北方向来到拉萨，于七月三日进了城，只遇到微弱的抵抗。

阿尔布巴、龙布乃和扎尔乃，在停战后已把军队解散，这时逃到布达拉宫求达赖喇嘛保他们的命。颇罗乃的军队包围了布达拉宫。甘丹池巴和另一名高级喇嘛在颇罗乃与达赖喇嘛之间进行联系。颇罗乃要求把三位大臣交出来，他又提出如果他的要求无结果，达赖和他的父亲应在护送下到哲蚌寺去。到那里喇嘛就安全了，因为颇罗乃想把他的对手逼出布达拉宫。达赖喇嘛最后劝颇罗乃允许这三个人各回自已家里在严密监视下等候满洲皇帝派人来处理。这三位大臣相信满洲人会支持他们，而颇罗乃则相信会支持他。由于拉萨已经在他控制下，他同意了达赖的请求。

两个月以后，一支皇家军队在查郎阿和迈禄的指挥下到达拉萨。这支军队是雍正皇帝派去保达赖喇嘛和停止内战的。当他们到达拉萨时颇罗乃已经把事情办妥了。颇罗乃是七月初进的拉萨满洲的军队是九月四号到的。查郎阿和迈禄和两名驻藏满洲官员僧格和玛拉组成一个法庭来审问那三位大臣和随从。审问进行了七天，结果三位大臣和十四位他们亲近的支持者都被判刑。九月初一，这十七个人都在布达拉宫西半英里的巴莫日 Bamari 山脚下正法了。三位大臣是受的剐刑，他们被切成了碎片，这种缓慢的、残酷的刑罚是当众执行的。

目的是吓唬拉萨人民。有两位喇嘛判了绞刑，其余的都砍了头。这些人的家属也都被正法了，只有扎尔乃的家属被解押到中国当奴隶。

当时也决定了达赖的父亲是这三位大臣和他们政策的有力支持者，对拉萨的这些阴谋事件负有重大责任。结果达赖喇嘛和他的父亲被送到离里塘不远的噶尔塔（今甘孜藏族自治州乾宁县。译者注）。他们在那里住了七年，在这期间颇罗乃统治着西藏。他是一位有经验的政治家，赢得了满洲人的合作。他的权力是如此之大，可以不理会拉萨的僧人和居民提出的把达赖和他父亲召回来的请求。

满洲人在拉萨重新建立了驻防军。第一次在拉萨驻了两位满洲官员，这些官员被称作安班，管理驻防军，是皇帝在西藏的直接代表。从此有两位安班驻在拉萨，一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担任安班的照例是满洲人。

大臣会议进行了改组（这里大臣会议实际指噶厦，但作者故意避免用藏名。译者注）指派了新的成员，但实权是在颇罗乃手中。他是一位精明的行政者，他下面的官员都认真执行自己的任务。他对寺院都有适当的维持。他取消了欠政府的拖欠了很久本利无法交清的债务。

颇罗乃决定提供资金刻一套新的大藏经。首先刻的是《甘珠尔》经，于1732年完成。这部经板由班禅祝福存放在日喀则西的纳塘寺。《丹珠尔》经板于1742年完成。由达赖喇嘛祝福，也和《甘珠尔》存放在同一地方。这两部经合称纳塘板《甘珠尔》和《丹珠尔》。

1730年不丹的内部斗争发展到顶点。两位喇嘛都自称是夏仲阿旺那介 Ngawang Namgyal 的转世。两位在不丹首领中都有支持者，袭击与暗杀不断发生。第八世不丹统治者是被继位者杀死的，原因是为了他曾派人去请求颇罗乃给予帮助。西藏军队于1730年侵入不丹，迫使不丹人承认一位候位者为喇嘛首领。他们

还强迫不丹人放弃俘虏和占领的土地。不丹首领们交换文件发誓维持和平。此后不丹的一位官方代表，每年到拉萨去向西藏政府致敬和送礼。这一习惯称为“洛恰” Tochak 一直继续到1950年。西藏政府对不丹代表免费提供运输与食宿。纠纷的解决是受到不丹人的欢迎的，他们派代表到颇罗乃和达赖喇嘛那里表示感谢。

1733年，以德拉朗纳 Francislo Orazio della Reuma 为首的卡普钦 Capuchin 传教士离开拉萨回到尼泊尔。这个教会于1707年开始，1711年关闭。1716年又重开。这些卡普钦神甫们经历了准噶尔的入侵和占领中藏；他们的医药知识为蒙古人和西藏人所欣赏，保证他们的安全。这些卡普钦神甫被允许购买土地，在大昭寺东边建起一座教堂。尽管他们向人民提供医药帮助，寺院集团还是压他们关闭他们的教会。1741年卡普钦又回来试图开展传教工作，也没有取得成功，最后于1745年又放弃了。

1734年满洲皇帝派他的兄弟到噶尔塔去看望达赖喇嘛。他出钱建了一所寺院，并提供维持僧人的经费。后来皇帝给了五千两白银为所有西藏寺院购买砖茶之用。从长远看满洲人发现对寺院花钱比派军队来安抚边境要合算的多。鼓励尽量多的西藏人当了僧人就减少了潜在的兵力。

到公元1735年颇罗乃把一切置于他控制下，政府行政也很顺利。于是允许达赖喇嘛回到拉萨。他于那年九月回来，在外共住了七年。同年十月雍正皇帝去世，由他的第四个儿子乾隆继位（1736—95在位）。

第二年第十世不丹王米帕王波 Mipham Wangpo 来拉萨访问达赖喇嘛和颇罗乃。达赖喇嘛想消除过去的隔阂，他派了两名

私人秘书和二十名官员到拉萨城外去欢迎他。不丹王受到宽待，表示想在不丹建一所观音庙。一位西藏喇嘛被派去，担任建庙的设计工作。

班禅二世罗桑意希于1737年去世年七十四岁。一年后他的转世在象 Shang 的扎喜孜找到，达赖给他取名为白登意希。

1740年不丹人进攻锡金。因为锡金王还年幼，一位管家来到拉萨，要求颇罗乃派人到锡金协助管理地方，直到王子成年。那里需要一位能干的人管理地方和对付不丹人。若登谢尔巴 Rapten Sharpa 被派为锡金行政官。同一年，颇罗乃从乾隆皇帝那里得到郡王的封号（第二等王）。

1747年颇罗乃项上生了一个恶疮，经过种种治疗均告无效，"米旺颇拉"就因此而去世了。他统治了西藏十九年，在这期中，西藏是连续的和平与繁荣。他与满洲皇帝结了牢固的同盟，使他对达赖喇嘛都能施加影响。达赖说他是一位勇敢、敏捷、头脑清楚的人。达赖赞赏他的行政能力。又说他从不对对手妥协，他对权力和地位的欲望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达赖喇嘛不能肯定他自已的麻烦是否颇罗乃搞起来的，但他承认他是一位正直的行政官。多喀夏仲 Dokhar Shabdrung 是颇罗乃的一位远房亲戚，记载了一次他与达赖喇嘛会见的情况。达赖喇嘛的一位侍从被颇罗乃逮捕了，达赖诉苦说这不是处罚那个侍从，简直是和我过不去。颇罗乃对达赖喇嘛在房子里专心念经坐静还不太满足。达赖曾说过"如果我退回哲蚌寺或者住到茅棚里，颇罗乃大概就会高兴了"。

很清楚颇罗乃完全控制了达赖喇嘛，尽管他是西藏的唯一统治者，颇罗乃和满洲人的合作为满洲和后来的中国提供了根据，说他们对西藏有主权。这一问题虽然争论不休，但的确在颇罗乃统治时是真实开始了的。

颇罗乃由他的幼子达赖巴图鲁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继位。他是由颇罗乃一手培养起来的。但是和他父亲的政策却完全不同。他不仅对达赖冷淡，对满洲人也怀有敌意。他写信给满洲皇帝和安班说在拉萨的满洲驻军是不需要的，西藏军队完全能够维持法律与秩序。还说这也可免去兵士偷人家的马匹和女人，欺压人民。他诉说满洲安班在干涉西藏事务。

乾隆皇帝同意减少驻军为一百人，只充当安班的护卫。但是他不同意成立西藏驻防军。皇帝指示安班不要过分干予西藏的内部事务，不许欺诈老百姓。充足的经费将送去以满足驻军的一切需要。

珠尔墨特和他的长兄发生磨擦。他的长兄于1729年任西部西藏的长官。达赖喇嘛试图调解兄弟二人之间的纷争，但无效果。1750年他的长兄次登神秘地死去。同一年珠尔墨特和他的大臣们召集了一个会议。事后他写信给安班和满洲皇帝，反对在拉萨驻扎安班和卫队。他认为西藏军队完全能够保护达赖和地方的安全。满洲皇帝原先减少驻军是考虑到多年以来颇罗乃和满洲皇帝之间结成的和平与和谐的关系。但是不断请求 使皇帝对珠尔墨特的忠心起了怀疑。

珠尔墨特偷偷地准备组成一支军队，并想恢复和准噶尔蒙古的接触。这时准噶尔仍然和满洲人对立。一些亲满的西藏人把这事告诉了安班。安班立即将珠尔墨特的阴谋上报皇帝。安班决定采取措施。在铁马年十月十三日（1750年11月11日），他们请珠尔墨特来接受皇帝的赏赐。珠尔墨特没有予料到会有意外就带了两名随从来到安班的驻地"冲赛岗"。安班付清和拉布顿申斥珠尔墨特，然后拉布顿抽出刀来将他刺死。两名随从也被杀死。

当珠尔墨特的支持者知道发生的事情后，就聚集起来包围了安班的住处。战斗进行了几小时。付清，拉布顿和一百名兵士和平民都被

杀死，住宅也一把火烧了。这一个夜晚充满了混乱与恐怖。约有二百多汉人，逃到布达拉宫避难，在达赖喇嘛的保护下逃脱了愤怒的乱党。

达赖喇嘛呼吁人们停止暴行，甚至在街上贴出告示，但激动的人群把它撕下来。他们还抢了军饷库。珠尔墨特的侍从罗桑扎喜是这一动乱的煽动者，事后逃往准噶尔，随从的有二十多人。他们被追上去捉了回来听候审判。

在珠尔墨特的三年当权中，他和达赖喇嘛的关系并不比他父亲时为好。实际上没有任何这一时期的西藏记载说过他一句好话。除了他想把满洲人和汉人从拉萨赶走外，他的所做所为没有一件事使西藏的历史家能称赞他几句。但是他的统治也有几点可取之处。从宗教观点来说，他对蒙古和中国的佛教寺院都是关怀的，可以推想他对西藏的寺院和僧人一定也不坏。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认识到两位安班和驻防军的在藏，对国家的独立是个障碍。他是勇于反对外来压力和坚决地作秘密军事准备的。假如珠尔墨特不是那么急躁，他可能活的长一些，看到他的政策的实现。应当说他是为西藏的独立丢掉自己的生命的。

珠尔墨特死后不久，达赖喇嘛就任命多仁班智达管理政府。他是一位有学问的人，因为他得到班智达这一称号。他是康济乃的侄子。

1751年一月满洲官员班第到达拉萨，立刻对罗桑扎喜和其它人进行了审讯。在审讯还在进行中罗桑扎喜和其他六个人就被执行了剐刑。其它六人则被砍头或绞死。其余则处以监禁 二月里远征军从中国到达了，指挥官是兆惠和那木扎勒。

在铁羊年（1751年）二月初一，达赖喇嘛又全部负起了西藏的政教事务之责。他开始直接管理西藏的行政。在达赖以下是大臣会议，包括多仁班智达，车仁王甲多喀尔 Tsering Wangyal Dokhar，西局次登桐巴和一位僧人叫作尼玛坚参，这个会议被

称为噶厦，大臣则称为噶伦或夏贝。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印，使他们负责处理国家的行政。达赖喇嘛要求他们团结一致，不要重复早期会议大臣的错误，那次事件导致了1727—28之间的内战。会议的成员都宣誓忠于达赖喇嘛并执行他的命令。

噶厦的大臣是由达赖提名的，很少代表同一利益集团。他们不给予个人责任或分部门的权力。所有四名大臣在处理大小事务时都必须完全一致，包括地方官员的挑选和其它职位的人事。各不同的政府部门由秘书负责。他们决定事务时对噶厦负责。各个部门的最后决定都得通过噶厦，因此办事很慢和不很负责。这一制度存在了二百年，阻碍了国家的进步。它的弱点主要表现在危机的时候，因为没有一个人肯负全责做出决定。唯一的好处是可以防止独裁和把不诚实减到最低限度，因为每个成员都是互相监督的。噶厦把珠尔墨特建立的军队接管过去，并定为常备力量。军队包括首次建立的"正规军"，不像以前临时从居民中抽调。每家有地的农户出一名兵。从卫地派了两名将军管一千兵，后藏四名将军带两千兵。

1751年从中国来的远征军是经喀木来的，沿途居民控诉他们的暴行。同时拉萨的居民也申诉汉人占据了他们的房屋。他们请求达赖喇嘛和噶厦把汉人送走。和安班谈判的结果，撤走了大部分军队，只留下一万五千。

后来，不丹王请求派艺人协助他们修建彭塘寺的金顶和制一面五彩壁衣。由于不丹和西藏的关系非常友好，一切需用的东西都送了过去。

在锡金，年轻的那介朋错已成年了。西藏顾问若登夏尔巴和锡金人民，要求达赖喇嘛为他们的统治者登基祝福。帕里宗的地方官被派去带着达赖的礼品参加典礼。

朱母拉和洛敏汤的两位王公，住在尼泊尔边境一带，不断的打冤家。双方都请求达赖协助，他告诉他们，由于都是西藏的属民，他不能偏袒一方反对另一方。他派了俄尔堪布和萨噶戈巴为代表去了解纠纷。经了解认为朱母拉的王公无理，于是把他免职，由他的儿子继任。达赖喇嘛训令这些陪臣维持和平，并给予他们官印，一切向他的呈文都必须盖用。他们对解决纠纷表示感激。

达赖喇嘛一个时期来健康不佳。他在火牛年二月初三（1757年3月22日）去世，年五十岁。同一年普拉赛之战 Battle of Plassey 正进行，英国正在巩固它在印度的权力。达赖七世是一位有学者丰度的人。他的政治生活充满了困难。只有到了晚年，他才实际行使了权力。尽管那些动乱时代的政治人物投下了阴影，达赖七世仍被认为比其它达赖強，至少从宗教立场来看是如此。

十、对廓尔喀与道格拉之战

达赖七世死后，他的侍从和噶厦成员以及西藏政府官员开会讨论是否要推举一位摄政代表未来的达赖八世，还是由噶厦全部负起达赖的职责。最后决定推举一位摄政。一致的同意，落在一位哲蚌寺的高级喇嘛头上，这就是德莫朱古降白德來，他也是负责管理拉萨登吉林寺的。他是西藏的第一位摄政，在达赖幼年时代理他的职务。早期的摄政都是正直的喇嘛，但后来他们习惯于滥用权力图谋私利。

达赖八世在后藏的托普介 Thob gyal 地方寻获，由摄政于1762年接到拉萨，当时他是四岁。由班禅三世白登意希给他取名

为降白嘉错。

在这以前，官员们作长途旅行，所有马匹、草料和伕役都由他们所经的沿途居民供应，但是大寺院和大庄园的属民则可以免除这种负担。在摄政降白德来的统治下，那些免除差役的要恢复负担。凡是征发差役的都必须持有噶厦的证明。

乾隆皇帝表示想在热河建两座寺院，样子要仿布达拉宫和扎什伦布寺。摄政立即作出反应派一位西藏建筑师和几位喇嘛去协助。就在这时候满洲人进攻准噶尔蒙古，一万户蒙古人准备逃到俄国去。摄政想到过去和蒙古人的联系，有五位蒙古首领还带有西藏的官衔，他出面代他们请求，结果满洲人允许这些蒙古难民留在他们以前地方的某些区域。

1772年不丹人在第西·悉达日瓦 Desi Shidariva 的领导下，侵入库次比哈尔 Cooch Bihar ，并且俘虏了它的大君。

由于这一入侵威胁到孟加拉及其邻近地区的安全，孟加拉总督海斯丁 Wi Hastings 派了一个印度连队把不丹人赶出库次比哈尔。在几次交火后，不丹人被推回到布哈都阿尔 Buxa Duar，就在这时候，班禅喇嘛应不丹人之请求，派了一个代表去见海斯丁，要求停止敌对。同时班禅也派另一代表去见不丹人，请求他们释放库次比哈尔大君，不久后，在1774年4月25日，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不丹之间签订了一项和平和通商条约。看到这是推进孟加拉与西藏关系的好机会，海斯丁派波格尔 G. Bogle ，由一位医官汉弥尔顿 A.Hamilton 陪伴穿过不丹到班禅的驻地扎什伦布去。

波格尔和汉弥尔顿在不丹停留了三个月，在这期间班禅为他们向拉萨西藏政府请求入境许可证。这些英国人员最后于1774年10

到达日喀则。班禅在德钦若甲 Dechen Rabgya 接见他们。波格尔和汉弥尔顿送上了海斯丁的信和礼物。过了几个月，拉萨政府说他们该回印度去了。在1775年他们离开时，班禅向总督提了一个请求，希望在圣恆河边划出一片地方为西藏的香客使用。后来海斯丁命令在加尔各答对面胡利河岸 Hooghly 修一所房子和一座庙。据波格尔说，他和班禅喇嘛的谈话是用印地语。可能班禅懂印度语，因为他母亲是个拉达克人。在1783年托纳上尉 Captain S. Turner 和沙德尔 T. Saunders，又到日喀则加強孟加拉与西藏之间的关系。

在位二十一年后，摄政降白德来于1777年去世。噶厦请求达赖喇嘛（这时他已二十岁）亲政；但达赖拒绝了，理由是他还没有完成训练。于是策墨林寺的阿旺楚才 Ngawang Tsultrim 他与色拉寺有联系，被推为第二位摄政。

达赖喇嘛收到满洲皇帝的信，邀请班禅到中国去。这一邀请在摄政与噶厦的一次会议中进行了商讨，虽然他们认为班禅到天花流行的中国去是不明智的，但是为了佛教的利益，还是应当去走一遭。1779年6月17日，班禅取道蒙古前往中国。他于1780年7月22日到达热烈，乾隆皇帝在那里欢迎他。然后他们一起到了北京，班禅受到了热河的欢迎。他住在黄寺，这是顺治皇帝为达赖五世建的。班禅对皇廷有很大影响，他使满洲人不干予西藏事务和增加达赖的权力。摄政和噶厦的顾虑变成事实，班禅染息天花，于1780年11月27日去世。他的遗体被送回扎什伦布寺，保存在一个灵塔里。

同一年摄政派军队在噶伦多仁班智达的指挥下，到喀木地区的三岩 Sa－ngan 。这里的地方头人把他们的势力扩大到里塘、芒康和贡觉，这样就侵犯了西藏政府的权力。多仁班智达花了两年时间去

镇压这些反叛的头人。祸首得到正法。随从者被放逐。

摄政和噶厦再度请求达赖亲政。现在他已完成了宗教训练。他同意了。但请阿旺楚才继续任摄政协助他。在铁牛年六月初一（1781年7月21日）达赖八世降白嘉错亲政。

习惯上每年秋季达赖喇嘛要到布达拉宫西边的一个大花园里住半个月。在那里和官员们野宴和在一个小泉池里洗浴。早先都是住在帐房里。但达赖八世决定在这里建一个夏宫。它建于1783年称为罗布林格（意为宝贝园）。

同一年，班禅四世在后藏的白纳 Panam 地方寻获。当他到两岁后。由达赖喇嘛取名为旦贝尼玛。

摄政阿旺楚才是一位直爽的人。他对满洲安班以礼相待。邀请他们参加所有官方仪式和招待。但并不鼓励他们插手西藏事务。为了破坏他的影响。满洲人于1786年请他到中国去。他们对他表示优待。让他停留了一些时候。安班则在拉萨扩大他们的影响。

在摄政出发赴北京后不久。廓尔喀人就闹起乱子来了。乱子的根子早就存在了。西藏人向尼泊尔出售羊毛、羊只和盐。换回大米和银币。银币在中藏流通。几年后尼泊尔人就在银币里掺铜。这样币值就下降了。1751年达赖七世曾写信给三位纽瓦尔 Nawar 国王。他们统治着尼泊尔的三个小领地。加德满都、巴丹和巴特贡。请求他们制止这种行为。在1769年廓尔喀首领纳拉颜 Prithyi Narayan 推翻了纽瓦尔国王取得对尼泊尔的控制。下一年西藏政府派人送去礼物和一封信解释西藏与尼泊尔之间存在的商务关系的背景。他们请求他允许商务关系继续下去。并注意关于银币成色低潮的问题。请求他不要把坏银币送到西藏来。他们建议应当让香客们在两国自由行动。廓尔喀王的回信很客气。但什么事也没答应。

1775年不丹人勾结并劝说廓尔喀人进攻锡金。西藏人支援了锡金人，但他们只接受给养而没有要军队。在瓦隆 Walung 锡金人和尼泊尔人在两名西藏代表噶卢堪布和代本巴柴前签订了一个条约。虽然商务和土地问题解决了，但廓尔喀人却厌恶西藏人的干涉，要找寻借口进攻西藏。借口终于找到了。是关于班禅三世个人财产的争执。班禅有两个兄弟，仲巴朱古和夏玛尔朱古，后者是第九世红帽派噶玛巴喇嘛，名叫曲主嘉错 Chosdup gyatso 夏玛尔朱古希望利用廓尔喀人的支持取得班禅在扎什伦布寺的财产。廓尔喀人则打算利用他来入侵西藏。

一名到尼泊尔去买药朝圣的西藏人被召到尼泊尔王的叔叔面前。让他回去带个信说纯银的钱币正在制造。从前的劣币应当贬值。西藏出口的盐也不应当再掺杂质。尼泊尔统治者威胁说，除非他的要求得到满足，否则要占据西藏的聂拉木、绒辖和济隆三个宗，这些地方都靠近尼泊尔边界。夏玛尔朱古将被留作人质，直到西藏政府给予满意的回答。同时夏玛尔朱古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申请，要求按尼泊尔的条件来赎他。噶厦在回答中说旧的成色低潮的银币和新的成色足的银币都是尼泊尔制造和发行的，一切都由尼泊尔负责。由于旧币在西藏流通甚广，骤然贬值会损害西藏的经济。但是考虑到改善商务关系，噶厦同意把旧币稍为贬值。关于西藏出口的盐，在边境上双方都有官员监督，责任是在监督官员的身上。还有夏玛尔朱古是他自已要去尼泊尔的，他被扣为人质，与噶厦是不相干的。噶厦另外给夏玛尔朱古写了信通知他，欢迎他回西藏来，如果他乐意的话，到尼泊尔是他自已主动去的，噶厦不能对他的福利负责。噶厦在结尾时附了一句话“知射然后买弓”。

同时噶厦提醒所有边境地方，要他们严防廓尔喀人进攻。当西藏

的覆信到达尼泊尔后，廓尔喀人立即准备入侵。廓尔喀兵分三处在夏玛尔朱古仆人的引导下，占领了聂拉木、绒辖和济隆。他们遇到了西藏人的抵抗，但都被人数众多的廓尔喀军打败了，受到很重的损失。到1788年夏，他们前进到宗噶和协噶尔，这两地都有路通到日喀则。

消息传到拉萨，噶厦派了两位将军带着后藏军队去阻击廓尔喀兵。他们又从卫地得到援兵，由噶伦宇妥负责全部指挥。西藏人进入协噶尔并占据了碉堡，但廓尔喀人把宅包围起来。噶伦宇妥在给噶厦的一个报告中说廓尔喀人有四名将军五千部队和三千伕役。

满洲安班把边境冲突上报乾隆皇帝，他立刻派了一支军队由御前侍卫巴忠率领，巴忠是通藏语的。当这支军队正在路上时，西藏人已经把廓尔喀人赶出协噶尔和萨噶，但他们仍然占据着最初侵入的四个地方。

一支有两千人的先遣部队到达拉萨，这支部队由沈泰图指挥，他通知噶厦，他来是要西藏赶走廓尔喀人的。由于他不熟习地形，他要求把一位年轻的噶厦成员，噶伦丹津班觉多仁，他是多仁班智达的儿子，派去做他的向导。孜本洞纳查德 Tsepon Dongna Tsade 和另一官员也陪伴他们到前线。

在到达日喀则后，沈泰图就踌躇不前了，他不知道他们将遇到什么样的敌人。丹津班觉多仁有这样的记载：

> 为部队迅速前进的一切准备都在日喀则做好了。马匹、口粮就在手边。但是沈泰图在日喀则住了五天，以各种小借口延缓前进。在和他的官员开了若干次会议后，沈对我说，如果我们不等后继部队赶上冒昧前进，就是找寻失败和丢脸。假如我们等主力部队来到后，供应方面地方又吃不消。他问我可有什么好法子。

我得到印象是这位官员想躲避战斗。我说西藏兵打得很好，中国军队看起来更好些，如果我们前进，一定能夠打败廓尔喀人。如果我们进攻赶走廓尔喀人，后续部队到达后，我们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廓尔喀人不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就可以前进到尼泊尔去。沈泰图公然问我有没有办法和廓尔喀人谈判，他建议我写信给达赖喇嘛提出此事。我告诉他我不能把我的责任推给达赖喇嘛。我是奉派到日喀则来打仗的，我一定要打”。

最后皇家军队勉勉強強地前进到协噶尔一路，给地方官找了好些麻烦。西藏人不打算和廓尔喀人讲和，但是新班禅的父亲和萨迦的秘书屈服于汉人的劝告，来到协噶尔开谈判。由于冬天已来临，没有发生新的战斗，中国军队在这里一休息就是八个月。后来又到了二千后续部队来和他们会合。

这时廓尔喀人攻击锡金西部的冬宫，迫使锡金王和他的家属逃回首府岗拖。一些西藏军队在代本基普的率领下，从协噶尔派出去帮助锡金人。他们带着火药和给养，在一位锡金官员的协助下，在冬天他们就把廓尔喀人赶走了。农村里到处是廓尔喀人烧杀劫掠的痕迹。

在1789年春季，住在协噶尔的调停人给夏玛尔朱古写信，他建议他们和达赖喇嘛的一位代表到济隆和他及一位廓尔喀代表商谈。这一建议中国人认为很有道理，但是西藏人则怀疑夏玛尔朱古的意图。四名西藏将军和噶伦多仁要求中国人利用他们的优势把战争打到底，不要在一仗不打就和敌人忙着讲和。他们指出皇家军队从中国来是为打仗的，西藏人在大力支持他们。如果现在要求讲和，那就把自已摆在祈求者的地位。但是中国官员根本不听这些劝告。

两位调解人，由噶伦多仁和其它三名官员陪伴，穿过宗喀前往济隆。宗喀这时还在廓尔喀人占领下。宗喀的寺庙被廓尔喀人劫掠一空。

西藏代表比廓尔喀代表早五天到达济隆。后者包括比姆沙西 Bhim Sahib 和四名官员以及厦玛尔朱古。根据噶伦多仁的日记，他们到处都被廓尔喀军队包围，使他们觉得是来求和的而不是谈判者，夏玛尔朱古表现的骄傲不可一世。

谈判建议和反建议历时好几天，噶伦多仁出色地总结了这次谈判：

> 我们同意把所有流行在西藏的旧尼泊尔银币贬值。旧的不掺杂的银币仍应和新币一起流通。同意西藏盐斤不再掺杂边境监督官员应严格检查。大米与盐的交换应按当前市场价格，这是无法加以规定的。任何尼泊尔米商在西藏住店应免费并供应柴火，但卖米所得十分之一应交纳店主。西藏商人为了任何商务和交换都不得进入尼泊尔。假如尼泊尔属民在西藏犯法，他将由那一地区的尼泊尔代表审讯判刑。西藏官员对他们不能进行司法处理。为了收回廓尔喀人占领的四个地方，西藏每年须向尼泊尔进贡银三百平。尼泊尔人在收到第一年的贡银后立即撤退其驻军。

条约的最后有一句附加语："第一年必须缴纳三百平藏银，第二年如果有负责的高级西藏官员访问尼泊尔要求减少贡银数目，尼泊尔同意到时加以考虑。"

双方都希望条约有效，他们请两位中国官员从协噶尔到济隆，中国人表示了非常满意，建议西藏和尼泊尔都派代表去中国向满洲皇帝道谢。廓尔喀的头人说几天后再答复。很显然他们征求尼泊尔政府的意见去了。几天后他同意派代表去北京。

皇军的主力撤走，只留一位将军和少数部队等候陪送尼泊尔代表赴中国。一个月以后两位廓尔喀人哈利沙西 Hari Sahib 和巴拉巴哈都尔 Bala Bahadur 和十名助手带着送皇帝的礼物来到了。他们由中国将军陪伴着前往。西藏人也派了一位代表。从西藏

材料看，在对尼泊尔的战争中，中国军队不仅不是个帮助，实际是个累赘。噶伦多仁在他的日记中说，中国官员对他们的行动感到羞耻，他们甚至把原始条约拿去，在向皇帝报告前，把他们盖章的部分删去。噶伦多仁在给达赖的父亲的一封信中说，廓尔喀人和中国人差不了多少，前者烧杀抢掠，因为他们是敌人，但是中国人也同样干，他们却是作为朋友来的。由于他的属下官员的暴行和他任务的失败，这位满洲侍卫巴忠回到中国后就自杀了。

当他们收到了第一批三百平贡银后，廓尔喀军队就从四个地区撤出了。1790年达赖喇嘛派了一个视察组到边区视察这些被占领过的地区的情况，听听人民的诉苦。两位官员孜仲顿珠朗错和雪仲多尔博东巴被派到尼泊尔去要求减少贡银，因为条约上这样规定的，尼泊尔政府说，他们级别太低了，他们只好返回西藏，连接谈的机会都没有得到。

达赖喇嘛和噶厦决定，这是从北京召回摄政阿旺楚才的时候了，他的行政经验现在成了急需。他们派了一名代表接他回来，乾隆皇帝想推迟他的行期，就说北京也需要他，但摄政答应派另一位喇嘛来代替他。他回到西藏重新担任摄政，这时前付摄政功德林的登贝贡保到中国去代替他。

阿旺楚才管事后立即批评和申斥噶厦和尼泊尔订立了这样一个屈辱的条约。摄政的性格是暴躁的，行动是直爽的，他抓起一碗糌粑就扣在噶厦官员的头上。他把在宗喀向廓尔喀人投降的将军降了级。然后他就发现了一系列行政上的失误，牵涉到达赖喇嘛的两个兄弟和一位财政秘书，管库的，管马的和罗布林卡的看守，摄政把这一千人都放逐了。同时他把那些忠实执行了任务的升了官。

两名四品官堪钦托美和孜本德布巴带着达赖喇嘛的信到尼泊尔请

求減少贡银。僧官堪钦由于不堪炎暑死在尼泊尔。俗官孜本德布巴给噶厦写信说尼泊尔不承认他有资格进行谈判。他们要求一位像噶伦多仁一样的大官。噶伦多仁不一定要到尼泊尔，只到边境的聂拉木就行，在这里比姆沙西和夏玛尔朱古将会他。他们将讨论贡银问题和保证夏玛尔朱古回西藏后不受控告的问题。

噶厦同意噶伦多仁去尼泊尔，但这一决议得由摄政和达赖喇嘛批准。当摄政得知噶厦的建议后，他又冒火了，他指责噶厦想和中国人一起姑息尼泊尔人，他们在玩弄拒绝和西藏代表谈判的诡计。摄政说如果尼泊尔人要贡银就让他们自已来取。联合的中藏军队要准备好，摄政自已虽然已经年迈了，曾任了七年的甘丹池巴，仍然将亲自指挥军事。他拒绝再派任何代表到尼泊尔去请求减少贡银，噶厦的建议只好撤销。

火猪年三月二十七日（1791年4月29日）摄政阿旺楚才由于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付摄政登贝贡保正 在去北京的半路上，他收到信请他返回拉萨。

噶厦在尼泊尔的几次恐吓信的压力下，决定派多仁和宇妥两人都是噶伦，另外还有七位助手到聂拉木去和尼泊尔代表及夏玛尔朱古会商。在他们到达日喀则后，他们收到夏玛尔朱古的信，说他正和两位尼泊尔人和一位西藏的俗官在路上，但他们在里提巴卡托 Littipakot 地方停住了，因为这位西藏俗官生了病，他们请求西藏代表团派一位医生先来，越快越好。一位医生叫察绒和他的助手不分昼夜的往前赶，在他们到达聂拉木后，那位西藏俗官已经死了。同时西藏人收到聂拉木地方官员的信证实尼泊尔代表团已经到达里提巴卡托了，并加上了他们正在做战争准备，西藏人要提防他们的诡计。西藏代表团在出发到聂拉木以前将这一报告转给噶厦。噶厦的回答在协噶尔赶上了他们，

训令他们到聂拉木去，并且不要带军队以免引起廓尔喀人的怀疑影响谈判。

在聂拉木他们遇到少数尼泊尔代表团的人员。这些人要他们把属下官员送到东姆 Dum 去，这是一个在聂拉木以南约十五英里的地方，初步谈判将在这里举行。登吉林扎萨和聂拉木地区的官员都去东姆开始谈判。

这时聂拉木的尼泊尔代表要求准许他们在聂拉木宗的院子内举行他们的摩荷提瓦 mahadera 节日庆祝会。装扮成苦力和米商的廓尔喀兵进了宗房参加唱歌、跳午、饮酒闹了一个通宵，到天快亮时他们一下子冲到观看他们庆祝的西藏官员当中，经过了一番格斗，他们都被制服了。噶伦多仁、噶伦宇妥和一名军官都用链子锁起来送到尼泊尔界内去了。三名藏官和三十五名随从在宗房的格斗中被杀死，廓尔喀人也死了近一百名。在东姆参加初步谈判的也遇到同样的命运，他们也和噶伦多仁等一起被关在尼泊尔。多仁的日记透漏出他们在被关押期中受了不少苦难。然后廓尔喀兵通过聂拉木和济隆开向协噶尔方向。

在1791年七月底，这一消息传到拉萨。班禅喇嘛到拉萨去避难，因为日喀则已受到威胁，下一个月就被廓尔喀人占领了。驻在协噶尔的西藏兵未能阻止他们的前进。廓尔喀人劫掠了日喀则的富户和扎什伦布寺。西藏政府从卫藏和喀木召集军队准备向日喀则挺进。满洲安班保泰向皇帝作了报告并劝告达赖和班禅为了安全搬到喀木的昌都去。看到安班的胆怯态度，拉萨的官员都认为城肯定要陷落了，于是人们纷纷收拾细软四处隐藏，居民也被投入恐怖中。达赖喇嘛被迫在大昭寺楼上对大批市民讲话，说廓尔喀人绝不会来到拉萨，他自已也没有离开的意思。他告诉人们无须惊慌，要求所有官员照常进行日常

工作，不得惊惶失措。这一举动才把拉萨的人心安定下来。

满洲安班继续要求达赖、班禅到喀木去。更胆小的高级官员都收拾金银财宝准备逃难。三大寺堪布和重要的退休政治家在布达拉宫召开了一个会议，事后他们去见噶厦申斥他们的卑怯行为。他们提醒噶厦官员，不要忘了达赖在大昭寺的讲话；他们抱怨还有一些官员在收拾财产准备逃难。带着那么点财产能跑到那里呢？把大量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财产都放弃了吗？这些大官们占有广大的庄园，在紧急关头不肯为国家卖力，那么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卖力呢？三大寺的堪布保证要保卫达赖喇嘛，防守大昭寺和布达拉宫。他们指出没有理由听满洲人和汉人的。早几年他们的行动已证明他们是不能保护西藏的利益的。堪布们的明朗的态度停止了 达赖喇嘛可能出走的一切准备，提高了军队和指挥官们的士气。

西藏军队开始进攻日喀则的廓尔喀人，经常切断他们的供应线。在尼泊尔兵中发生了瘟疫和西藏军队的袭击，迫使他们退到协噶尔和宗噶，带走了他们在日喀则和扎什伦布寺抢掠的赃物。在1792年的四月，西藏人更把他们赶到聂拉木和济隆。就在这时候一万三千名皇家军队来到西藏，为首的一位满洲将军叫福康安，他是乾隆皇帝的一位亲戚，同时也是两广总督。西藏军队有一万人，其中七千来自靠近四川省的甲绒地方，三千来自卫藏。

西藏和中国将领噶伦霍康和福康安发了一封联名信给锡金王丹津那介，告诉他正在率领一支大军征讨尼泊尔，现在通过帕里的地方官送去火药，要他从锡金一侧向尼泊尔进攻。他们同意锡金所获得的任何土地都可以永远占有。锡金军队的确占了一些土地，他们派代表去协噶尔要求更多的火药和铅丸。

七月在济隆和聂拉木发生战斗，西藏军队在第一次反攻中击败了

廓尔喀人。当失败的消息传到尼泊尔，又听到无数藏军和汉军正在开来，他们马上就改善了对噶伦多仁和其它西藏俘虏的待遇。

在拿下济隆和聂拉木以后，藏军和满洲军，在噶伦霍康和满洲将军福康安的联合指挥下，进入尼泊尔境内。廓尔喀人在第一次失败后，失去了信心，迅速退却，对前进的大军只作象征性的抵抗。他们派代表到印度去请求英国给予帮助，拉纳，巴哈杜尔沙阿 Rona Bahadur Shah 借口出猎逃走了，夏玛尔朱古服毒自杀。

尼泊尔王的叔叔向噶伦多仁提出请求，他当时是代年轻的国王摄政的，要求他到西藏军前请他们停止前进。一切责任都推到已死的夏玛尔朱古身上。尼泊尔人想谈判的要求非常強烈。噶伦多仁说最好是国王或者王叔自已亲自和他去办这件事。但是王叔不同意这一建议。喀齐拉特纳巴提 Kazi Ratna Patte 被派去和噶伦多仁到济隆去，另外达扎纳拉扬辛哈 Taksa Narayan Sinha 和噶伦宇妥和登吉林扎萨到聂拉木去请和。噶伦宇妥一行在往聂拉木途中抵达纳瓦浩特 Nawwkot 时就遇上了藏军，这里离加德满都只有二十英里。噶伦多仁一行在往济隆的路上在提朋 Theepung 遇上了前进的军队，这里距尼泊尔首都只有五十英里。

在提朋噶伦多仁遇上了卫部军队指挥帕觉拉康。第二天他先赶一天路去会满洲将军福康安，从这里他听到西藏联军司令霍康已于前几周去世，只由福康安一人任指挥了。尼泊尔代表和噶伦多仁被扣为人质，其余随从带着和平条件放回加德满都去。条件是夏玛尔朱古的妻子和随从必须交给藏方，所有从扎什伦布寺抢去的财物必须归还。然后方能下令部队停止前进。要求廓尔喀派一位负责的人到提朋去代表政府谈判。这时代替霍康的藏官就要到来参加谈判。

几天后，霍尔贡噶班觉夏扎 Hor Kunga Paljor Shatra

另一名噶厦成员来到替代霍康的职位，一周后尼泊尔谈判代表也到了。由比姆沙西和库拉巴都率领一个条约签订了。虽然手头没有藏文文本。根据多仁的日记内容如下：

> 廓尔喀人同意每五年派使臣到北京去向皇帝致敬。派一个代表团划定藏尼边界。双方表示愿意忘记过去的恶感。廓尔喀人同意把夏玛尔朱古的随从和所有战争中的俘虏交还，抢扎什伦布寺的东西全部退还。

多仁的日记没有提到关于减少贡银的事情。满洲人在拉萨布达拉宫前立了一通石碑，纪念对廓尔喀战争的胜利。刻碑的时间是1792年用藏文满文和汉文三种文字。

在廓尔喀战争期中拉萨居民贴出文告，抗议满洲安班的压榨和干预西藏事务，要求撤退皇家军队。福康安在拉萨时，这种传单文告也到处流传。传单说皇家军队是未经要求就来到西藏的，他们的出现给西藏人造成的损失，百倍于廓尔喀人的入侵。西藏人完全有能力在没有外力帮助下把敌人赶走。（这一段话纯粹是造谣中伤。译者注）为了安抚西藏人把在拉萨的两位安班撤职送返中国去。

西藏记载说夏玛尔朱古的骨灰和他的一位随从的尸体交给了西藏人。后者是在解往西藏管地的途中自杀的。喇嘛的妻子和二十名随从获释。西藏的俘虏也都获释。有一百名以上的脚伕搬运从扎什伦布寺抢去的东西。

英国总督康恩瓦里斯公爵 Lord Cornwallis 派克尔培垂克上校 Col. Kirpatrick 到尼泊尔来了解情况。但在他到达时，尼藏中三方已达成协议。满洲人在谈判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因为西藏的噶伦霍康死了，代替他的人对谈判毫无经验。满洲首领被邀巡视了尼泊尔，并由使节陪同回到中国去向乾隆皇帝进贡。尼泊尔

人还送给达赖喇嘛一头大象。

当一切都解决了，达赖喇嘛考察藏官的行为，把两名噶伦多仁和宇妥免了职。登吉林扎萨也受到处分。夏玛尔朱古的庄园和他在羊八井的寺庙由西藏政府加以没收，并定了一条法律不许找他的转世。

当尼泊尔代表从中国回来时，他们给他们的统治者带回一个王的头衔和一付孔雀尾花翎，这是满洲皇帝给的特殊优待，同样的荣誉也给了王叔临时执政者。

在廓尔喀战争以后，乾隆皇帝把安班提升到和四川总督一样的地位。一切以前向皇帝直接提出的申请，现在都必须经过安班。皇家的军队驻扎在日喀则和定日，作为前哨防止尼泊尔的入侵。在１７９２年以前，安班只不过是皇帝的政治观察家，有时也不是很有能力和决断的人。像保泰那样的胆怯，致使皇帝重新规定驻拉萨安班的任务，并派较有能力的人来担任。

后来中国人说对西藏享有主权的根据是满洲皇帝曾派军队去赶走廓尔喀人。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满洲人长期提供了皇家军队作为盟军，但是皇家军队并没有进入西藏，打西藏人和征服他们的国家。（诡辩可耻，欲盖弥彰。译者注）。达赖喇嘛与满洲皇帝之间的施主与喇嘛的关系就予定了要相互负责。施主要提供世俗的协助，喇嘛提供宗教指导。当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強时，如在康熙和乾隆时代，皇家施主能完成他们的义务，派军队到西藏打准噶尔人和廓尔喀人。到十九世纪满洲的势力衰微后，他们就无力对西藏提供世俗的支持了。在１８４１—４２的道格拉战争中和１８５５—５６的第二次廓尔喀战争中，就没有皇家的军队参加了。满洲势力在中国的衰微，驻拉萨安班的权力也缩小了，又落到不过是个政治观察家的位置。

１７９６年在洛敏汤有庄园的一个封建主，这里靠近尼泊尔边境，

停止向西藏政府缴纳年金。他说由于他在廓尔喀战争中出了力，满洲将军福康安免除了他的差税。噶厦通知他满洲将军无权免他的租税，他只是作为盟军来帮助西藏的。洛敏汤的封建主必须缴纳所有欠税。

达赖八世降白嘉错于木鼠年十月十八日（1804年11月19日）去世，年四十六岁。在他统治时期，他完全沉浸于宗教事务中，对政治不感兴趣，把一切行政事务都交于摄政手中。

达赖八世死后，摄政，功德林的登贝贡保统治了一个时期。他重新使在廓尔喀战争中失去财产的堆地的居民重新安定下来，由政府粮仓给予他们救济。在皇家军来往经过的沿途也进行了同样的救济。

一些人先前曾发传单写文告抗议在西藏的满人和汉人，现在又公开向摄政和皇帝申诉。他们指责有些西藏官员和汉人勾结，他们要求永久撤销安班和驻军。汉官在喀木与中藏之间来往经常受到阻碍。

摄政劝人民不要扰乱和平，同时给皇帝写信建议满足人民的要求。满洲新皇帝嘉庆（1796—1820在位）派了两位大臣到拉萨来了解情况。他们的报告使一些满洲官员被召回，驻军减到差不多二百五十人。

作为一种相应的姿态，西藏政府逮捕并监禁了发起抗议运动的头目，阿旺索巴　Ngawang Solpa　一个僧人和登巴次仁一个俗官。当满洲调查官员还在拉萨时，有谣言流传说，被免职的噶伦丹津班觉多仁在安班住宅的附近有一所林卡，和安班有密切接触。再加上有事实，他的十三岁的儿子索南班觉多仁，活动噶伦的位子。这就触怒了西藏人民。他们举行示威，攻击前噶伦多仁和他的儿子，还有噶厦的一位僧官，和安班勾结起来图谋私利。他们也被攻击盗空了政府的财富。人民拒绝承认中国皇帝是他们的保护者，宣布说还不如去找廓尔喀人请求帮助。功德林摄政派藏兵保卫安班和他们的库房。他

把丹津班觉多仁和他的儿子噶伦索南班觉和噶伦喇嘛甘丹夏尔巴软禁于家中。

两位满洲调查官开始意见不一致，这从他们上皇帝的报告中泄漏出来。两位新的官员又派到拉萨来进行调查。他们于1805年到达。举行了询问。安班策巴克 Tsè-pa-k'e 被锁起来解返中国。另一个被放逐到乌鲁木齐。满洲人由于他们恶劣的官员和昏庸的安班。在西藏事务中逐渐失势，在这次调查后，摄政把两名噶伦免职，他们是噶伦索南班觉多仁和噶伦喇嘛甘丹夏尔巴。反满示威的肇事者则被放逐出拉萨地区。

1807年在找寻达赖九世的灵童问题上发生争执。两个灵童都是两岁，一个出生在喀木，一个出生在安多。摄政派人去调查，他们的报告倾向于喀木旦曲科儿 Dan Chokhor 的那个孩子。两个灵童都接到拉萨附近。在这里由摄政和噶厦官员进行了审查。只有喀木的灵童把前世的个人用品认出来，因此他就被认为是达赖九世（1806—1815）。摄政对这事作了正式宣布。第二年班禅给他取名为隆多嘉错。

在廓尔喀战争后，乾隆皇帝对高级喇嘛转世订了一个新的制度，如达赖、班禅要抽籤来决定他们的转世。1793年皇帝送一个金瓶到西藏，作为抽籤之用。候选人的名字写在纸条上，放入瓶中，然后再抽出一条来决定转世。虽然达赖九世的灵童有两名，但是并没有理会金瓶的规定，是由西藏官员们自已选定的。土蛇年（1808年）九月，达赖九世隆多嘉错在布达拉宫坐床。中国、蒙古、尼泊尔和不丹的代表参加了这个希奇庄严的仪式。

一些时候以来东部西藏的果洛族的两个首领康更和康萨，不服从西藏政府的命令，噶伦霞扎被派带兵去对付他们。他在那里用了两年

时间，抚绥了果洛人民，保证他们对拉萨的服从。

多少年来，西藏商人的骡帮就来往于中国边境的打箭炉与西宁之间。他们把药材运到打箭炉换回砖茶，到西宁去是用西藏氆氇交换马匹和骡子。由于旅途艰苦，途中多匪，这种贸易一年只能进行一次。各帮之间相互竞争，物价波动，互相争吵是常见的，这主要是缺乏安全和控制。为了补救这一情况，摄政指派了贸易代办（ Garpon ）陪商帮去打箭炉和西宁。代办管理贸易帐房和价格。他们带有少量卫兵可以对付土匪。商帮开始结成大帮行动，最后成为一个大的组合。安全和组织就这样改善了。从噶尔本（ Garpon ）官员留下的文件看，他们是往来于扎纳卡松 Dranag Khasum ，错洛马 Tsoloma ，商提 Shangti 和科尔莫 Kormo 这些西藏东北部中国边境的地方，很清楚这些地方的人民是向西藏纳税的，而且实行西藏的法律。（这一段全是胡说八道。译者注）

1810年，达赖九世还年幼时，摄政功德林登贝贡保去世，由德莫图登计美继位。德莫摄政有偶然的精神错乱，但这并没有防害他很好地统治国家。实际上在他统治时期没有发生内部斗争，收成也好。西藏有一个传说，“德莫发了疯，国家享太平”。

满洲在西藏的政治影响在衰微下去，他们试图从宗教渠道来施加影响。住在西藏大寺院的汉人和尚劝说西藏僧人说，外国旅行者将对佛教产生威胁。在三大寺僧人的压力下，政府训令各边境地方官，外国旅行者一律不准进入西藏，这一宣传在西藏人思想上产生了影响，一直到后来，人们还认为吃了从印度进口的糖果和使用肥皂会影响宗教信心。更往后，甚至英国人也鼓励执行一种隔离政策——为了各种政治的原因——他们赞扬西藏人的生活方式，说是这比别的地方的不稳定的情况要好得多。

由于和外部世界缺乏接触，西藏没有取得像其它国家那样的进步。同时外部世界 对西藏也一无所知，他们毫无问题地就接受了中国和英国的说法。西藏人也没有反驳这些政治意见。简单说来就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论调。只是到了西藏人被从他们的国土中赶出来，才认识到他们是多么和外部世界隔离起来。

在1814年廓尔喀对英战争中，尼泊尔国王基尔凡王达。维克拉马沙阿 Girvan - yuddha Vikrama Shah 曾请求西藏政府协助。虽然不知道是否曾有正式答复，但有一封摄政写的信存留下来，是给西藏各寺院的首脑的，要他们为尼泊尔的胜利祈祷。这表示当时西藏人是同情尼泊尔的。

达赖九世在十岁时，于1815年到大昭寺参加新年大法会。他在从布达拉宫到大昭寺途中受了寒发展成肺炎。在木猪年二月十六日去世（1815年3月26日）。

两年后，摄政收到五个孩子的名字，都是一岁，都作为达赖转世的灵童。有两名从卫藏来的孩子的名字被排除了。从喀木来的三个孩子生在里塘的那一名是最可能的选择。满洲安班要求用金瓶掣籤来决定避免争议。1819年三个灵童都接到拉萨附近的聂塘。摄政和噶厦成员访问了他们。里塘的那个孩子表现最有希望，因此没有公开宣布他们的决定。摄政、噶厦成员和大寺院的代表一致承认他是达赖十世。当安班听到这一消息就鼓励另外两个孩子的父亲提出要求。安班下决心要按皇帝的命令举行抽籤，但拉萨市民表示了抗议。

就在这时候摄政德莫死于天花，这对西藏是最不幸的一件事，因为这一位置交给策墨林的降白楚臣，是比他的前任不那么聪明和有决断的。鉴于群众的強有力的意见，那两个孩子的家属撤销他们的请求。为了保全面子，安班把三个孩子都审查了一下，然后说里塘的孩子是

中选的。他们教训摄政，他们可以自由作出决定，但是要巧妙地避免表示满洲皇帝颁布的金瓶掣籤制已不实行了。

在水马年（1822年），摄政宣布里塘的灵童是达赖十世，并且说是由金瓶选定的，尽管实际并非如此。这一宣布的政治含义证明摄政的举动是错误的和缺乏远见的。由安班监督的金瓶掣籤来选定达赖喇嘛，被后来的中国人引为对西藏拥有主权的证据。达赖十世由班禅取名为楚才嘉错，按传统仪式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

在策墨林摄政统治期中，详细研究了卫地的农业情况，搜集了粮食生产的统计数字，家庭职业和人口趋势。这一史无前例的研究，帮助摄政改善了他的税收制度。

1832年，青海湖附近的蒙古人在汝囊扎萨 Junang Dzasa 的领导下进攻和抢掠了扎纳卡松 Dranag Khasum 的邻部。摄政策墨林派兵在噶伦吞巴和代本萨钧 Dopon Sarjung 率领下到了肇事地点。在路上他们又从德格和 Dimchi Nyernga （指玉树二十五族，译者注）补充了军队。和蒙古人发生了一些小战斗，很快汝囊扎萨的部落就投降了。汝囊扎萨和他的儿子还有一些头人都到拉萨去向达赖喇嘛致敬和表示服从。两年后，摄政派另一位大臣，噶伦顿珠多吉霞扎带兵去波窝 Powo 使那里的人服从。这地方在喀木的西南。这一地区的人民由噶南第巴管理，拒绝交税和服从西藏政府的法律。噶南第巴和他的人民被置于控制之下，必须按法律缴纳租税。

达赖十世楚才嘉错身体一直不好，没有比前一代活的更长些。在火鸡年九月初一日（1837年）去世了，年二十一岁。他喜欢和平民混在一起，而不喜欢宫廷的官员。人们经常看见他和小书记们在廊子上晒太阳。由于他的不佳的健康，西藏政府给他找来最好的医生，

并不断为他的康复唸经。一天摄政和噶厦来看他。他说。他们所有想使他好的努力都是为了他们自已的威望。他指出西藏人民在和波窝及青海地区的冲突中，吃了很多苦头。国家的情况更不如以前了，尽管政府官员们说得多么好听。相传他对他们说，“不论你们怎么说做了许多改善，人民生活的情况还是恶化了”。从这些谈话看来，那时的官员们是没有很好尽到自已的职责。

1841年，为找寻达赖十一世，发现了两个灵童。他们都被带到拉萨，经过通常的审查。1838年生在噶塔 Gathar 的那个孩子，看起来很有希望。有些记载说在火牛年五月廿四日（1841年），噶塔来的这个孩子被抽籤选了出来。很可能达赖喇嘛是经过抽籤选出来的，但是没有详细的记载。西藏和满洲的记载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争议。达赖喇嘛十一世由班禅取名为克珠嘉错。

几年前，查谟 Jammu 的道格拉大君经常扰乱拉达克的边界，在拉达克的一家早期王室的后裔，被迫逃到西藏来。1834年喀什米尔的大君古拉辛 Gulab Singh ，派瓦希尔索拉瓦辛 Wazir Zorawar Singh ，带兵到拉达克，支持道格拉的军队。经过一些战斗拉达克的大臣，俄珠丹達向索拉瓦辛投降。他把国王拉喇 La La 废黜，而把俄珠摆在他的位子上。拉达克同意每年向喀什米尔进贡五千卢比。但是他没有履行自已的诺言。六年后索拉瓦辛带着六千兵来，把俄珠丹達免职，又把原先的国王扶上宝座。

早先西藏政府的商人从中藏到拉达克用砖茶换取布匹和乾果，地方上是要为他们提供交通和食宿的。但是这些便利在1841年被取消了。同时索拉瓦辛和拉喇带着锡克 sikh 和拉达克兵进入西藏。拉喇死在西藏的巴尔提 Balti 地方。他的位子由他的表弟继承。他当时正在随军。战争在阿里三围的地方爆发，一方是索拉瓦辛的部队，

一方是代本霞扎和代本索康带领的藏兵。索拉瓦辛的主要是锡克人组成的部队打败装备很差的西藏人，前进到布让的塔克拉噶 Taklak-har 地方。

大批西藏援兵，在噶伦巴龙 Pal - Lhum 的指挥下被派到西部西藏。战争延续了好几个月。到冬天来临时，噶伦巴龙加強了努力，终于把索拉瓦辛的部队赶出塔克拉噶，这一仗打了五天。天下了大雪，冻得半死的锡克人，不习惯于这样的气候，无法抵御西藏人扑向他们。结果发生了白刃战。当索拉瓦辛正要上马时，让一个西藏的中队指挥官米玛 Migmar 认出来了，他挥起长矛向这位锡克头目刺去使他从马上摔下来，然后他就割下索拉瓦辛的头，回到西藏营地。

西藏记载说，锡克军队四散奔逃，有三千多人被杀。七百名锡克兵和两位拉达克大臣当了俘虏。剩下的败兵逃向拉达克，藏兵追他们差不多到达列城。

西藏的追兵终于在都姆若 Dumra Nupra停住，这地方今称努普拉他们在这里住了一年多。1842年古拉辛大君又派了八千锡克兵在提丸哈利強德 Dewan Hari Chand 和瓦西尔拉东 Wazir Ratun 的指挥下来到拉达克。战斗在道格拉的军队像潮水般地淹没了西藏营地后就停止了。代本霞扎和代本索康还有五十来个兵，被俘虏并送到拉达克的首府列城。拉达克记载说还有第三位代本若各夏 Ragashag 在途中自杀了。但西藏记载只提到两名代本。

在列城，噶伦巴龙的代表和提丸哈利強德举行谈判。在一个临时条约上，同意藏军撤出都姆若 Dumra 双方不再侵犯对方的土地，俘虏愿意回去的都允许回去。双方同意再起草一份更全面的条约，同时两

名西藏代本和被俘的西藏军队可以赎回。约有三分之一的锡克人和拉达克人选择留在西藏。锡克人被西藏政府安置在南部暖和的地方。好些人和西藏妇女结了婚。相传锡克人把种植桃、杏、苹果、葡萄的技术传到西藏。

西藏纪录说索拉瓦辛的部队是配备有火器和大炮的。西藏人只有刀、矛、弓箭和少数从蒙古来的明火枪。西藏人承认大雪帮助他们取得胜利。西藏政府尊敬噶伦巴龙。两位西藏代本霞扎和索康进了噶厦，当了噶伦。割下索拉瓦辛首级的米玛受到提升，并得到一个小的庄园。

噶伦索康奉命去西部西藏和代本比喜会合，一起到列城去谈判最后的条约。双方开过会以后，起草了两个协议文件，一个是拉达克人写的，另一个是西藏人写的。每方只在自已的协议上签字盖章。（这两个文件保存在拉萨噶厦的办公处，我曾有机会看过它）文件上允许维持永久的友谊，承认古代的边界，继续进行拉达克与西藏之间的商务。西藏商人在拉达克像以前一样，得到免费住宿和运输。

这一协议文件（载于附录）和《艾其逊条约集》Aitchison's Collection of Treaties 中所载的有很大差别。他的文本包括提到了中国皇帝，但是根据我所知道的，这个协议只是在拉达克和西藏之间交换的，没有在文件中提到皇帝。还有，并没有皇家军队参加了对道格拉的战争，所谓鸦片战争正在英国与中国之间进行。皇帝没有部队可以派到西藏的西部打仗。那时在拉萨的一小点驻军大部成了中藏部队 Sino - Tibetan Troops ，这就是说这些兵都是中国兵和西藏妇女生的儿子。这些驻军的素质和纪律都大大的恶化了。一般都承认道格拉的战败完全是在噶厦指挥下的西藏军队取得的。

最近时期的一个研究说西藏的签字人都是俘虏，很不可能在协议

签订前送到拉萨去研究。实际并不是这种情况。两名西藏代本在签订最后协定前就释放了，他们回到拉萨还当了噶伦。这篇研究提到索康是一位噶伦，这就表明他在签字以前就回到拉萨了，他被俘时是代本。

在水虎年九月廿日（1842年），拉达克王通过噶伦索康给噶厦送去一份协议文件，文件上盖有拉达克王的红印和民众代表的黑印。

1844年，噶厦成员和三大寺代表以及其它官员开会，会上决定将摄政策墨林免职，没收他的执照和庄园。在西藏记载中没有说这一决定的理由。很明显，一位干了二十四年的摄政突然被免职不能没有理由的。对这一时期文件的研究，知道他和班禅的关系是很坏的。班禅登贝尼玛（1781—1854）的一个叛变了的随从，成了摄政的亲信，给他在拉萨安排了官职。人们还认为，在某个庄园所有权的问题上，他和章嘉呼图克图也有争执。

噶伦索康和噶伦齐康恰仲巴 Chikhang Chogrongpa 代表噶厦到策墨林家里抄收所有官方文件。色拉寺美扎仓的僧人，策墨林是属于这个扎仓的，对此表示了公开的反对。他们把这两位噶伦捉住狠狠地揍了一顿，噶伦索康受了重伤，他不能执行噶厦的任务，几个月后就去世了。

从1844年九月到1855年五月，班禅喇嘛被指定为拉萨的行政者，在这时期里又选出另外一位摄政。这一事实证明策墨林的倒台和班禅不和的说法有一些根据。1845年春，班禅喇嘛辞职，热振意希嘉错被指定为下一任摄政。这时噶厦的成员是噶伦巴龙，噶伦王曲甲波霞扎，和噶伦齐康恰仲巴。噶伦扎喜康沙被指定代替死去的索康。在这些人中，噶伦王曲甲波霞扎后来成了一位重要的有权势的人物。

水牛年三月初三（1853年）西藏和拉达克的边境官员达成一

个商务协定（见附录）。这个协定为后来的规定提出了内容。如拉达克人必须为西藏商务代办提供马匹和西藏应当派能干的商务代办到拉达克去，相反拉达克也应派好的使节到西藏。西藏商务代办应该有炊事员和伕役的供应。如果他们有适当的证明，应免征关税。拉达克商人也应享受相同待遇。双方的商人在对方境内可以自由放牧驮畜。

当这个商务协定在谈判中，一封信送给了当孜喀尔本 Dangtse Kharpon 他是驻在日土宗 Rudok 的坦尼达尔比斯然 Thanedar Bisram 的一位代表。信上说，“西藏和拉达克的领导人关于边界谈判已经完成。我们同意按以前就存在的边界划定。你现在应当把乌地 od 还给西藏人。今后只管理自已的土地”。它是由坦尼达尔比斯然签字的，日期是水牛年三月初四（1853年）。

达赖十一世在继续他的教育，现在已到十七岁了，他被请求亲政，在木兔年正月十三日（1855年3月1日）正式坐床。摄政热振辞职，回到他的寺院里。十一个月以后达赖就死了。摄政是有经验的，噶厦又把他请回来任职。

达赖死后不久，和廓尔喀之间又发生了战争，这时是在权臣容巴哈杜尔拉纳 Jung Bahadur - Rana 掌权的时候。廓尔喀人借口违反商务协定，又占据了聂拉木、绒辖、宗喀和布让。西藏政府从拉萨派出军队和喀木的民兵，在噶伦扎喜康沙的指挥下前往。战斗发生了，双方都有死伤。但西藏人无力收复他们的地方。三大寺的僧人自愿去参加战斗，有好多去到前方，但他们没有实际作战，因为在他们到达前，廓尔喀人就开始谈判，要求西藏代表到加德满都去。

在火龙年三月十八日（1856年3月24日），一个有十点的协议达成了。在这些条件下，西藏政府同意每年交一万尼泊尔卢比与廓尔喀政府，停止对廓尔喀商人和商务人员收税。西藏还同意放弃最近

战争中俘虏的锡克人和廓尔喀人，以及他们的武器。廓尔喀人同意把济隆、聂拉木、宗喀、布让和绒辖交还给西藏，还有属于西藏人民的武器和牦牛。也规定了如果廓尔喀和西藏人之间发生纠纷，双方政府的代表应当坐在一起共同审理。杀人事件应交给他们本国的当局处理。那些参加了敌对一方的战斗的，也应尊重他们的人身与财产。这样西藏收复了失地，但是尼泊尔得到年贡和在西藏的治外法权。

十一、第西霞扎和白登顿珠，十九世纪有力人物

摄政热振主持了寻认达赖十二世的工作，找到三名适当的候选者。经过一般的考察，发现于火龙年十二月初一（1856年12月27日）生在西藏南部欧格 Olga 地方的孩子最为灵异。大部分西藏人都劝说摄政承认这个孩子为达赖喇嘛，不必去依靠金瓶抽籤了。但是摄政热振主张还得照寻认达赖十一世时的程序办。几个官员说如果抽籤的结果正好是这个孩子，大家没有话说。如果不是，那就要对后果负责了。

这三个候选者都在拉萨附近。当新年大法会就要来临，三大寺喇嘛已向拉萨集中，摄政怕出问题，就派军队去保护这些孩子。在1858年初，摄政热振在大法会高潮中要举行抽籤。幸运的是大家所同意那个孩子的名字首先被抽出来。为此事造成的紧张马上就消除了。摄政给孩子取名为钦来嘉错，正式承认他为达赖十二世。

摄政热振利用他的权力，滥加封赐官衔和庄园给他所喜爱的人。王曲甲波霞扎和他的同事私下议论过这件事，他们都同意摄政滥用印

信。他们把这个问题在噶厦的正式会上提出来。发现其他成员也有同样的意见。他们决定摄政对使用印信掌握绝对权力，对政府是有害的。他们请示摄政，建议设立一位'掌印官'，就像达赖喇嘛已经有的一样，这可以提高他地位的威望。摄政同意，噶厦就开会，由于霞扎是首席噶伦，他就被推举为"掌印"，为此噶厦写了一份公文呈交摄政批准。文件在晚上送交摄政，当时他正和他的顾问基巧堪布 Chikyab Khenpo 会见。基巧堪布警告摄政说，噶厦的计划是一个诡计，要夺去他的权力，应当找出谁在背后搞这套把戏。通过扎喜康沙，摄政发现是霞扎在鼓动这件事。霞扎被召到摄政的办公室，他以为会得到摄政的印，但情况正相反。他被摄政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免去了他的官阶和职位。连家都不让他回，就把他放逐到他聂莫甲科 Nyemo Jako 庄园上去了，要他在这里老老实实呆着。

霞扎虽然已结婚，但和另外一个女人有勾搭，他的妻子对此深有反感，正想找机会发作一下。霞扎任噶伦时，他和尼泊尔的大臣拉纳 Jung Bahadur Rana 经常有来往。在回答拉纳问他现在干什么的一封信中，他说他现在被免职，被强迫住在庄园上。这封信和一些礼品送到尼泊尔。但是这封信的手稿落在他妻子手中，又转到他在拉萨的一个对手手中，它立即被送交摄政，并说霞扎在勾结廓尔喀人反对西藏。摄政热振派了一名军官，代本香巴和一部分军队到 Nyemo Jako 庄园上去带着指示，要霞扎永远不得回到拉萨。作为一位僧人，摄政不能公开下令杀霞扎，但他的用意是如此的。

代本香巴到达庄园后，立即逮捕了霞扎，并告诉他以这一行动的理由。看到自已的生命成了问题，霞扎就源源本本地向香巴叙述他在拉达克和尼泊尔为国家效力的成就。代本香巴开始考虑，杀死这样一个有名望和爱国的人，对自已也是不利的。他就执行摄政指示的，永

远不准霞扎回拉萨，把霞扎关在一个叫作甲茂觉巴Gyalche Ompay的庙里。強迫他出家为僧。寺院的堪布受命要严密的监视他。

霞扎对摄政对他的处理深有反感。利用一个卖鼻烟的商人跑腿。他给甘丹寺的管家白登东珠写了一封信。这人曾在霞扎下面工作过。表现忠心而能干。霞扎要白登东珠发动僧人反对摄政。白登立即着手进行。利用这一鼻烟商通知霞扎一切都准备好了。霞扎回答说。现在行动还过早，最好能取得哲蚌寺僧人的合作。色拉寺是一定会支持摄政的。在1862年摄政以钱代粮供给各寺院。哲蚌寺的僧人对此很不满。这就造成了一个空子。白登东珠就煽动哲蚌寺僧人起来造反。甘丹和哲蚌寺的联合力量把霞扎放了出来。并搞到拉萨附近。

达赖喇嘛还很年幼，他的一些侍从人员是霞扎的拥护者。他们把达赖喇嘛的哈达和通常的茶和点心送给城外的霞扎。这种举动是对高级官员才有的。这一举动提高了霞扎在人民眼中的威信。习惯上霞扎必须向达赖喇嘛回敬哈达。但是霞扎一直等到他的队伍到达了布达拉宫的正对面，群众可以完全看得见时，才下了轿子，对布达拉宫磕了三头。把哈达献上去。这使人们产生混乱。开始认为他是被达赖召回来的，这一谣言很快传遍拉萨城里。

在甘丹和哲蚌僧人的簇拥下，霞扎回到他拉萨的家里。他故意传播谣言说，明天就要进攻摄政了。这使色拉寺僧人和政府军队开进拉萨去保卫摄政。但是霞扎派甘丹和哲蚌寺的僧人占领了布达拉宫和大昭寺。保护起这些神圣地方。霞扎自封为第西，并在大昭寺公开宣布。他没有称自已为“甲察”Gyaltsab （即摄政）因为“甲察”只在达赖幼小时执政；第西则在达赖掌权后，仍然可以执政。他的宣布贴在拉萨的四街上。

霞扎然后发出一份通告。给所有重要家族和官员，列举了摄政热

振的错误，滥用信仰，在挑选达赖十二世时，举行不必要的抽籤以讨好于满洲人，还有以钱替代粮食给哲蚌寺的僧人。他宣布他现在是第西，在通告的结尾中说，谁愿意支持热振就去支持，不然的话就到大昭寺来会见霞扎。官员中发生了混乱，在动乱中大部分人去参加了霞扎的会。霞扎把这次会议称为"甘哲仲欠" Gandre Drungche 意为官员和甘丹哲蚌寺僧人的大会。因为大部分西藏官员都去大昭寺参加霞扎召集的会，保护热振的政府军队也放弃了他，只有色拉的僧人在保卫他。

甘丹和哲蚌寺的僧人向摄政的住所进攻，把他赶走了。他到色拉寺去避难。从那里逃向中国，和他一起去的有基巧堪布和噶厦成员，扎喜康沙。基巧堪布死在路上，他的屍体为追兵所得。但是摄政和扎喜康沙逃出了边界。热振和扎喜康沙的庄园和财产被西藏政府没收，同情他们的官员被免职。

第西霞扎使达赖喇嘛表面上当权，尽管当时达赖还年幼，还未完成他的训练。霞扎自已控制着政府，他的忠心朋友白登东珠担任了政府职务，随即任为噶伦，到后来他取得更重要的地位。

被赶走的摄政热振到中国请求满洲皇帝帮助他恢复权力；那时中国正有内乱，又和英法两国打仗，皇帝无力帮助他恢复以前的地位。皇帝能办到的就是写一封信通过驻拉萨的安班交给第西，请他恢复热振的庄园和允许他平安无事的回西藏去。霞扎把这封信交给"甘哲仲欠"大会讨论，成员们认为这是一种请求而不是命令，因此他们愿意给予皇帝优待。热振在返藏时死在路上，但他的庄园还给了他寺院的随从。

同时东藏鸦龙，Nyarong 的头人宫保那介在利用他的军队在四处扩大他的恐怖统治，六千家难民从德格、伙尔科（今甘孜县，

译者注）里塘、乡城和乍科等地区来到拉萨，他们要求西藏政府帮助1863年政府派军队在噶伦普伦巴和代本池门的指挥下开到鸦龙（今新龙县。译者注）战斗延续了两年。最后宫保那介和他的家属被赶入碉堡，活活烧死。其余的军队都向政府军投降，从打箭炉到德格一共十七个地方都恢复了原状。西藏政府在鸦龙设立了官员，对这一地区享有全部权力。地方头人对自己所管的地方负责，遇有纠纷须和鸦龙藏官商量。藏官要兵时，他们必须提供兵力。关于这些情况的一个文件各地头人都签了字。逃难的家庭回到自己的家园。

第西　霞扎自己没有儿子，他抱了一个孩子，在很年轻时就派他为噶伦。他被称为娃娃噶伦才仁王曲霞扎。在掌握了绝对权力三年多以后，第西霞扎于1864年9月25日去世。白登东珠为了取得哲蚌僧人的支持，他派了一位哲蚌喇嘛钦若王曲德柱 Khenrab Wangchuk Dedrug 当达赖喇嘛的助手。这位喇嘛是一位诚实、直爽忠于职守的人。他的属下都是白登东珠的坚决支持者。

1868年“甘哲仲欠”指定白登东珠为基巧堪布，这使他能在更大程度上控制达赖喇嘛，这时他已约十二岁了。白登东珠是“甘哲仲欠”的操纵者，他设立了调查机构，对付那些欠租税的和加速了各部门的行政决定。

我的祖父，那时才十二岁，他告诉我曾看见过白登东珠，还记得他的模样。他是一个高个子庄重的人，小孩子都怕他。他的官员们一定也都怕他。他经常挂一张血淋淋的新鲜兽皮在他办公室的门口，谁不听他的命令，就把谁缝在皮里，扔到河里。他是有几次这样做了。我祖父说白登是一个残暴苛刻的人，但也是一位強毅的人。他是一位半文盲，眼睛也不好，他写的命令是难以认识的。习惯上在刻一件新印时，一般要刻上“吉祥”、“和平”和“繁荣”等字眼，但白登东珠

在他的官印上却刻上"觉洛"Kyok - Lo　二字，意思是"改正歪斜"。他的写法是十分古怪的，不自觉地创造了自己的简笔字。当他要一匹马时，他既不写成rta意为马，也不写成Stag　意为老虎，但是能念成这两个音。他的仆人问他到底是要老虎还是要马，他就向他们咆哮说，他们怎么会想到老虎，这东西在西藏根本没有。在另一个场面，他在宣读一份法庭的判决，助手们看见他把文件倒拿着，他假装抖他袖子上的尘土悄悄告诉他文件拿反了。他却回答说"我是故意倒拿着，因为我们要处理的是一个颠倒人"。白登的粗暴加強了政府各部门的纪律。他的不顾一切的为政府搜罗金银，使政府有了大量的赢余，一直到1959年西藏人起来反叛中国共产党时还没有用完。

1871年有传说白登东珠打算把达赖喇嘛废黜，把他送到一个山寺，按月给他一些供养。甘哲仲欠召集四个噶伦在白登东珠家开了一个会。当这些噶伦两三天都没有出来，人们开始怀疑究竟出了什么事故。公开说会议还在进行。但是消息传出三位噶伦都被捕了，噶伦崔科被缝在皮子里扔到河里。

没有牵涉到这一事件的官员，请求达赖喇嘛协助，钦若王曲请他利用他的威望来结束这种暴行。钦若王曲知道他的随从都是白登东珠的拥护者，于是把他们打发回哲蚌寺去。他召集了一个官员会议。他准知道色拉寺僧人不会支持白登东珠，由于他们在"甘哲仲欠"中没有代表。钦若王曲给哲蚌寺的堪布写信，告知他同一天将逮捕白登东珠，要求他把哲蚌寺的拥护白登东珠的僧人抓起来接。钦若王曲的一个兄弟也在这些人中，但他被放过了。

在定好政变的这一天，白登东珠在才仁王曲霞扎的陪伴下到办公处去。在路上他们得到消息说他们进入布达拉宫后就要被捕。白登决定前往而不是去哲蚌寺求助，但在他到达寺院前听到支持他的人都被

捕和挨鞭打了。他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躲到他所属的寺院甘丹寺去。

这时“甘哲仲欠”已经解体，政府派军队去甘丹寺，在色拉僧人的协助下把寺院包围起来，切断一切供应，结果投降了。白登东珠和他的兄弟趁夜离开寺院，但正在离甘丹寺十五英里以外的甲马沟 Gyama 里逃走时，他们看到后面来了追兵，于是就自杀了。才仁王曲霞扎和其他拥护白登的人被逮捕带到拉萨，在甘丹池巴的建议下饶了他们的命，但都被放逐了。色拉僧人长期受压，这回和政府军队一起攻打甘丹寺，烧了几所房子。

为代替“甘哲仲欠”，建立了一个国民大会叫作“春都”Tsongdu 它包括三大寺堪布和所有政府部门首脑。西藏政府修理了甘丹寺被毁的房屋，这些是被西藏军抢劫时烧毁的。

在协助达赖十二世八年后，钦若王曲于1872年去世。达赖喇嘛这时已经十七岁，噶厦和春都请求他亲政，于1873年初执政。他只统治了两年零十五天就于1875年去世了。在他短暂的统治中，达赖有两名宠信者，若卡美恰纳 Rakhamay Chag neng 和他的轿官。这两个人可以影响他给他们喜爱的人以封号和荣誉。达赖去世后，这两个人被指定招致了达赖的病，被关入监狱，施以酷刑，后来一齐遭到放逐。

满洲驻军这时只剩百十来人，大部分是出生在西藏的，中国驻军有三年更换的制度，把他们的西藏老婆、情人和孩子都留下来。这些没有父亲的孩子长大后都当了驻防军，他们穿中国制服说西藏话。由于中国的内乱，皇帝派不出军队来，安班只能依靠这些民族杂牌兵，好在这些驻防军无事可干，安班的任务只是参加各种典礼，向皇帝报告西藏政府的变动。当一名新的噶伦被任命了，皇帝照例要赏给封号和礼物，完全不必请求。当一座新寺庙盖起来，皇帝就要送来一付漂亮的匾，挂在显目的地方，表示施主的身份。满洲驻军穷到这种地步，每当春节，他们组织起来表演耍龙灯，跳狮子，向拉萨的居民敛钱，有人升了官，他们也来庆贺要赏。这些民族杂牌军，汉藏人都看不起他们，他们也被人们离得远远的，因为这些人都患有梅毒，这种病在西藏称为“甲马”Gyama 汉人病。

十二、达赖十三世和英国的边界政策

在达赖十二世于1875年去世后，功德林的曲季坚参被推为摄政，在全国找寻达赖的转世。找寻团的一名成员，名叫居堆堪苏 Gyutod Khensur 说他在群科儿介的拉莫拉错湖上看到了未来达赖的生地，这个地方后来在西藏西南部塔布的朗敦地方找到了。在这里找到一个火鼠年五月初五日（1876年5月27日）的孩子，只有十个月还不能进行通常的测验。

一年后，西藏官员带着达赖十二世的个人用物来访问这个小孩，在进行了测验后，认为还就是真的转世。摄政和噶厦都决定不经金瓶抽籤就肯定他是真的转世，并为此起草了一个文件。据柔克义 Rockhill 说，当时找到三个灵童，是在大昭寺举行了抽籤仪式后才确定为塔布的孩子。李说（指李铁铮写的《西藏，昨天与今天》一书）达赖十三世没有举行抽籤，因为只有一个灵童。实际上确有三位灵童，但最后的选择落在塔布朗敦出生的孩子的头上，经过了多种宗教测验，但是没有经过抽籤。

在火牛年九月初一（1877年）摄政正式承认这个孩子是达赖十三世，并把他带到拉萨附近，一年后班禅在宫塘寺给他取名为图登嘉错，这个寺在拉萨以东约四英里的地方。1879年，土兔年九月十三日，达赖喇嘛以全付仪仗通过拉萨，被迎到布达拉宫坐床。两年后，班禅五世登贝王曲去世，他的遗体被保存扎什伦布寺。

由孟加拉政府任命，化装成佛教徒到西藏进行地理测量的达斯 Sarat Chandra Das 是一位聪明和敏锐的观察者，他从孟加拉出发，于1879年到达了扎什伦布寺。陪伴他的有一个锡金喇嘛，叫乌金嘉错，在江金僧清喇嘛 Kyabging Sengchen Lama

的协助下，达斯搜集了大量的手稿和文件，通过认识了代本帕拉的妻子她是僧清喇嘛的亲戚。在她的帮助下，他访问了拉萨和南部西藏。在他居留的1881—1883年之间，他搜集了大量资料，编写了关于西藏的地理特点的报告，他制定订了羊卓雍湖的新地图。由于他秘密的探险，西藏政府怀疑他为孟加拉政府工作，准备逮捕他，但他逃掉了。江金僧清喇嘛，帕拉家和其它一些曾帮过他的人都受了西藏政府的处分。通过这件事和其他类似的事，西藏政府对和英属印度交往产生了怀疑和顾虑。

一年一次拉萨的僧人要举行宗教赛会，列队绕大昭寺遊行，1883年举行赛会遊行时，两名西藏妇女和一位尼泊尔商店主为几颗珊瑚珠争吵起来，他们赖西藏妇女偷窃。这一件事激起人们的反尼情绪，僧人和俗人一下子控制不住了。他们把整匹布当作火把点起来烧。借亮光来抢劫尼泊尔商店，整整进行了一夜，到第二天早晨，每家尼泊尔商店都被抢了。公开的冲突有立刻发生之势，双方政府的代表进行了会晤，西藏政府同意赔偿尼泊尔商人，但实际开销却由一个正在访问达赖喇嘛的富有的蒙古人查颜呼图克图 Chayan Hutuktu 出了。

在作了能干的和得人心的摄政十二年后，功德林的曲季坚参于1886年去世。达赖喇嘛这时还年幼，于是春都又推举了德莫的钦来若介 Trinley Rabgyas 为下一任摄政。1888年，班禅六世被寻获，达赖喇嘛给他取名为曲季尼玛。

1894年僧官向摄政提出关于噶厦组成的申诉，他们说噶伦的职位完全是由世袭充当的，它的成员都是俗官大贵族，僧官和有学问的人则被摈之于门外。这一申诉送给了噶厦、春都和摄政，它决定从此以后要有一位僧官充当噶厦的成员，就像在达赖七世时一样。另外还同意

在选择噶厦成员时，世袭不作必要的条件；低级官员如有成就也可选任。

在达赖喇嘛出行时，拉萨市民可在街上列队看，但任何人不能从楼上的窗口或廊檐下望，因为这就高出达赖的头了。在1895年的春节大法会的灯节这一天，拉萨街道上列满了用彩色酥油雕塑的各种装饰的架子，前面点着酥油灯，人们都出来挤在街道两旁观看达赖喇嘛经过。在看到有三名汉官从楼上下视达赖喇嘛的行列，西藏官员就向安班做了报告，安班说这些官员大概是不懂规距，但是当问到这座房子的主人时，却说他们是懂西藏规距的，但他坚持要从房子顶上看。这样触怒了西藏人，他们在安班住宅前举行了示威。为了避免发生冲突，安班让这些官员向达赖喇嘛道歉，并写一份今后不再违反的保证书。

在木羊年（1895）八月初八，达赖十三世于十九岁时当了权，摄政退休。满州人这时在西藏只有很小的权力，他们并没有对达赖掌权提出任何意见。

不久就发生了所谓"妖鞋事件"，哲蚌寺的内穹护法神两次予言达赖的生命有危险。他被召到达赖的私室，在这里他作法陷入昏迷状态后说出前摄政德莫的一位仆人送了一双鞋给喇嘛索甲 Sodgyal 在询问他时喇嘛索甲说他是收到了一双鞋子，这鞋子在他家里，他同意去取来。开始在鞋子里没有找到什么东西，但撕开以后就发现一个纸条藏在鞋底里，上面写着密咒，和达赖喇嘛的出生年月，目的是要使达赖很快死去。索甲否认他知道藏有密咒，但他说每次想穿这双鞋时就流鼻血。前摄政和他的亲戚被逮捕，由春都作了彻底的调查，前摄政承认他想用咒术使他重掌权力。他现在还年轻且而身体也好，由于达赖成年而使他猛然退休是不甘心的，他说他一朝失势，会有别的

官员来迫害他。他感到没有退路。他的两个兄弟诺尔布次仁和罗桑旦曾坚持要恢复他们以前的地位。他还透漏了真它为他的再起而使用的密咒。前摄政德莫缺乏像霞扎和白登东珠一样的政治上成熟性，他们是用更直接和现实的方法实现了他们的野心。

前摄政和他的两个兄弟在拉萨被判终身监禁，他的庄园被西藏政府没收，但属于前世的庄园则交给寺院的从者。当调查还在进行中，前摄政的从者贿赂安班要求释放他。安班同意参加调查委员会，但西藏政府拒绝他们加入，宣称他们的干予是不能接受的。

1900年，达赖喇嘛完成了他的宗教训练，他照例去访问曲科尔介和到南部地区朝礼。当他访问桑鸢寺时，感患了天花，但两周后痊愈，返回拉萨。

英国对待锡金、不丹和西藏的政策，是有较早的根源的。约五十年前，当英国把拉达克变为喀什米尔的属国时，西藏人听到英国人把斯比提 Spiti 和拉胡尔 Lahul 从拉达克划出来成为英属印度的行政单位。同时，也听到英国占据了前廓尔喀的领土阿拉木拉 Almora ，正在找一条入藏的道路，很可能想穿过不丹。这些事件再加上满州人声称的英国人会灭他们的宗教，使得西藏人避免和他们的接触。这时英国人了解到中国内部虚弱，深怕俄国把它的势力伸进西藏。西藏人自己则不愿有任何外面的势力进来，但是英国人在和西藏接触碰了钉子时，却不了解这些情况。英国人考虑的是巩固印度的边界，当他们听到西藏人在和俄国人接触时，他们认为对英国利益来说西藏置于满州的势力下要好些。

早些时候英国向锡金租借了大吉岭。1860年他们停付年租，后来把大吉岭和六个小地区併为英国的领土。一名锡金官员，卓康仲尼 Trokhang Dronyer 反对这一併吞，逃到西藏，西藏给予他避难，并由西藏政府封给他庄园和官爵。

一名英国上校和一名文官，艾登 A.Eden 来到锡金边界要求会见锡金王。这时锡金王在西藏的春丕谷，他的长子色均朱古代表他去会见。英国官员交给他一个二十三点的协议，说如果锡金人接受协议上的二十三点，英国可以退回六个地区，并恢复大吉岭租金。协议的主要内容是锡金王不应当留在西藏，不应允许西藏干涉锡金事务。下一年锡金王恰多那介 Chagdor Namgyal 因为年老，让位于他的长子色均朱古，当他的长子当权后，英国人又开始付大吉岭年租。1868年，自动增加为三千卢比。色均朱古统治了七年后，让位于他的弟弟图多那介 Jhulhop Numgyal

约在1860年，不丹发生了小型内讧，不丹王请求英国人协助，他的对手则求助于西藏。英国人首先来到控制了局势。当时正讨论穿过不丹修一条路和在不丹驻一名英国代表。后来，在过了五年四名不丹代表和英国人起草了一个协议，英国人同意不干予不丹事务，条件是也不许西藏人干予。英国还同意付与不丹二十万卢比以取得某一林区的採伐权，英国打算在这里建立伐木工业。关于这个协议的消息传到拉萨，这时是在钦若王曲 Khenrak Wangchuk (1864—72)掌权之下，噶厦和"甘哲仲欠"举行了会议，结果做出了决议说，如果英国人不干予和放弃修一条路通到西藏，西藏当然也就没有理由要加干予。

1875年，有几名英国官员在锡金旅行来到西藏边境的乃杜拉 Nathu - la 地区。西藏政府问锡金当局为什么英国官员走近边境他们被通知说英国人要求允许建筑官员旅行用的台站房屋，称为 Dak Bungalows ，西藏政府提出了抗议，但毫无结果。

1880年，藏北里河的官员向拉萨报告，有一帮英国旅行者在这里出现，但是不能确定他们是否英国人，因为当时在西藏看到的高加

隶种人都当作英国人。西藏政府派官员去请这些人离开，他们就返回去了。

1883年锡金王图多那介把他的家属送到西藏来朝见达赖喇嘛。西藏政府给予他们以特殊接待。在他们回锡金以前，锡金王属下的一切人包括仆役都得到衣服的馈赠，六十驮中国砖茶，三十平藏银和一千克青稞也送给了来访者。

1885年，不丹发生了纠纷。对立的双方派阿鲁多吉 AluDorje 和宫喜丹津 Gongzin Tamdin 去拉萨请求达赖喇嘛调停。达赖喇嘛说，西藏已同意不干予不丹的事务，但是这是双方都同意的调解。而且又由和西藏人同一信仰，因此派代表去并无不便，噶伦然巴被派到巴罗 Paro。西藏的调解成功地结束了 不丹的内部纠纷，不丹派代表去拉萨表示他们的谢意。

当一名西藏噶伦走近锡金边界时，习惯上锡金王要到帕里来会他。当噶伦然巴在去不丹途中走近边界时，锡金王只派他的兄弟钦来那介和一些代表来见他。然巴噶伦感到受轻视，公开表示了不高兴。就在这时候，有报告说，有几名英国人从西部西藏到了日喀则，但他们想居留的请求照例是被拒绝的。

1885年，英国不断增加压力的表现使西藏政府感到不安，他们从安班那里听到满州皇帝在烟台条约中允许英国人从印度到中国穿过西藏进行一次考察。春都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宣布英国人从四面八方扰乱西藏，中国皇帝没有权力允许任何人穿过西藏。春都成员赌了咒，决不允许英国人进入西藏，并且在文件上盖了章。满州人无法使西藏人服从命令，为了补偿英国人，中国承认英国併吞缅甸。

帕里的地方官要求锡金王不要允许英国探险队通过锡金进入西藏。锡金王通知帕里官员说他完全了解形势，已经给拉萨写了报告，说明

英国人打算在西藏边境的则来拉山口 Dzalepla 附近的科布 Kobuk 地方修建台站。他们曾告知英国人西藏政府可能会抗议。西藏政府对锡金的报告表示惊异，马上派了两名代表，堪钦柱甲 Khenche Drugyal 和孜本察绒 Tsepen Tsarong 到边境地区去确定锡金与西藏的边界。一位老的居民说老的边界在热纳宗，系在锡金界内。在和当地人商量以后，就在隆吐山设卡，这地方比热纳更深入西藏的领土。不顾锡金人的劝阻，他们深怕触怒英国人，西藏还是在1887年在隆吐山设卡，由二十名官兵把守。

当他们听到设卡后，英国人却通知满州人说西藏人在面对印度的边境上建筑侵略性的工事。同时他们通过锡金王写信给达赖，要求在1888三月十五日前撤销卡哨，如到时不撤，英国人将进攻把西藏人赶走。噶厦回答锡金王说保卫自己的领土是没有错的，西藏人准备抵抗英国的进攻。两名西藏军官代本阿沛和代本索康，九百名兵在噶伦拉鲁的总指挥下被派到边境。

锡金王极力弥补英国与西藏政府之间的分歧。他对西藏人说，向英国的力量挑战是愚蠢的。但是西藏人并不理解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力量。他们对现代战争没有经验。负责这一地区的官员姜洛坚 Chang Lo Chon 开始在边境上调动部队，丝毫也不考虑后果。他的动作使英国比他们最后通牒所提的日期早三个月来到边境。两千英国兵，四门大炮开到噶伦堡。锡金王图多那介派代表团去请求他们停止前进。同时他派他的兄弟到春丕谷去见噶伦拉鲁，说服西藏人撤销他们的卡哨。当谈判正在进行中，英国兵继续前进。在土鼠年二月十一日（1888年3月21）在隆吐卡哨发生了战争。

这是西藏人和西方强国军队的第一次冲突，他们被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英国兵击败了。那些没有被打死的，遭英兵追击直到亚东。在混

乱中代本索康和他的一部分兵士逃到了不丹。

隆吐战役不久，就被编成拉萨的民歌

拉鲁回来了，

边境丧失了，

拉鲁回来了，

大炮遗失了，

我们花了一辈子建成的碉堡，
一早上的袭击就被摧毁了。

阿沛咆哮如故，

索康逃到边角，

姜罗坚比狼还机灵，

骑着他的棕色马逃跑，

比飞鸟还要快些。

在像西藏这样的地方，根本没有报纸表示群众的意见，群众用民歌方式表达他们的批评和感情。隆吐的失败歌，巧妙地利用了官员们的名字，例如"索康"意思是角上的房屋，姜罗坚的姜和狼是同音的。

英国军队在锡金官员的鼓动下，进入岗拖，这些官员是不喜欢他们的国王的。图多那介逃到西藏，在他春丕谷的庄园里避难，但他被英国官员捉住，他们已经占领了纳东，要求他返回锡金。图多那介和他的儿子以及官员们往回走，在纳塘 Nagthang 遇到一位英国军官对他进行了访问。国王的儿子、兄弟和一名喇嘛没有被扣，允许他们到西藏去，图多那介则返回岗拖。他发现行政已经掌握在英国官员和两个反对他的人手中，这两个人是颇塘喇嘛 Phothang Lama 和雪仲 Shotdron 。他的宫殿已被没收，英国人只给他和他的家属每月五百卢比的津贴。不久锡金王室被迁到噶伦堡。在这里被软禁

了五个月才允许他们回到锡金去。

通过英国政治官怀特 C.White 和锡金官员的勾结，使国王感到为难。他们对他施加压力要他召回他在西藏的儿子和兄弟。他们要求他付给仆役工资，这些人习惯上是以支差方式向他服务的。他们还对锡金行政作了一系列更动，也没有征求国王的意见，但是要求他在这些文件上盖章。图多那介回答说是英国人而不是他把他的儿子和兄弟逼到西藏去，他们正在日喀则学习，他不愿中断他们的学习。他拒绝在没有和他商量过的文件上盖章，还有他不能靠他现在的一点工资给报酬，这些人是自动来服役的，如果官员们愿意可以把他们撤走。锡金王在向英国政治官表示了这些意见后，还写了一封信给孟加拉总督，但是这一行动并没有改善他和政治官的关系。

1892年春，图多那介、他的妻子和十名可靠的官员决定到西藏去，这回他们没有取道习惯上的路线，而是到锡金北部，朝西藏登吉 Tengkye 的方向而去，这里锡金官员卓康仲尼 Trokhang Dronyer 曾被允许避难并得到一个庄园，图多那介非常失望地发现西藏地方官员通知当地人民不得给锡金人以任何协助。锡金王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到尼泊尔的瓦弄 Walung 去。五天后，他们正考虑去加德满都时，突然被一连廓尔喀兵把他们捉住，強迫他们到离瓦弄十天路的廓尔喀营地达纳科特 Phanakote 去。

廓尔喀军官对图多那介说，他是奉尼泊尔政府的命令逮捕他的。他们被要求逮捕并送回锡金。这一行人被带到西明 Shimin ，这里是距印度边界三天路的地方，他们被正式交给了英国的印度警察。他们被拘在大吉岭附近的多阻 Dotsug ，几个月后于1893年又把他们监禁于克松 Kurseong（已故锡金大君扎喜那介既生于克松狱中）。王室在克松被监禁了两年多。在被监禁期中，图多那介给孟加拉总督，

寇仁 G.N.Gurron 写了一份申诉。这份申诉受到英国官员的审理。对王室的怀疑弄清楚了，认识到那些怀疑都是国王的政治对手搞出来的。大吉岭专员诺兰 P.Nolan 来到克松告诉图多那介英国政府愿意忘记过去的分歧，从新把他立为锡金王，但要遵守十个条件，主要的有，建立一个行政委员会，在作出任何决定前要与英国政治官协商，这样他就不再享有过去的权力了。图多那介接受了这些条件，在木羊年九月初九（1895年）他就回到岗拖了。

图多那介的一生总是避免搞阴谋，在对待西藏和英国政府的关系中都极力以正直行事，但是他的对手却把他和英国的关系搞坏。他是一个勇敢而坚持原则的人。当他被监禁在多阻时，他被告知如果他辞职并放弃一切权力，就可以被释放，但他坚决地拒绝了。他没有给西藏或英国造成任何损失，他只是想保持他的传统的权力。

1890年，英国印度总督兰斯敦公爵 Lord Lonsdowne 和从拉萨来的满州安班升泰在加尔各答签订了一份条约，事先没有和西藏政府协商。这条约的第一条是规定西藏与锡金的边界，第二条是承认锡金是英国的保护国，这样就把内政外交的全权都交与英国人。但是没有相应的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下余六条是关于西藏的，由于签约时没有西藏代表，西藏人拒绝执行这些条款。

英国人也看出中国在西藏并没有真正的权力，但是他们认为和满州人打交道对他们有利。同时由于隆吐山的藏英冲突，满州人害怕西藏与英国直接谈判，因此同意这个条约作为一种予防。

在条约以外还有所谓1893的通商规定，规定中提到了通过锡金西藏边境增加贸易便利的问题。同样这些规定都行不通，因为西藏不是参加谈判的一方。很奇怪的是英国人又和满州人订立了第二个协议，他们已经知道第一个协议是无法付诸实行的。满州人代表西藏人签了

字，但却无力说服西藏人执行。一位西藏的拉恰 Lachang 班觉多吉霞扎被派到大吉岭去了解情况。他发回了有价值的报告，但他没有受到政府的重视。西藏政府仍然相信和英国人接触密切会损害西藏的生活方式和宗教。

就在这时候，一名日本僧人河口慧海 Ekai kawguchi 假装成拉达克僧人进了色拉寺学经。他通过达斯向英国人提供了一些不正确的情报，使英国人相信西藏正从俄国接受军事援助，包括小型武器、子弹和其它东西。河口还估计在三大寺有二百名以上的布里雅特蒙古僧人。对俄国在西藏伸张势力的恐惧，使他们放弃了通过中国和西藏打交道的想法，他们必须和拉萨政府建立直接的联系。

1890年的条约和1893年的商务规定证明没有半点用处，因为西藏不承认他们。荣赫鹏引当时锡金政治官怀特 C. Whice 的话说："中国人在西藏没有任何权威。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只是个空名。"

十三、荣赫鹏的远征和后果

从1899—1903年任印度总督的寇仁公爵认识到和满洲统治者商谈西藏事务是完全无用的。于是他设法找寻渠道和拉萨政府直接谈判。当两位西藏官员来到纳敦，他们是代本察绒和西藏政府秘书长罗桑称来，他们拚命使用拖延战术。他们的冷漠态度更加強了英国人对俄国参与西藏事务的怀疑。此外在达赖喇嘛的侍从人员中，有一名叫多尔基叶夫 Dorjieff 的布里雅特蒙古人。西藏人称他为陈义堪布 Tsengi Khenpo 或阿旺罗桑。此人是一位非常博学的人。他和俄国人保持密切的宗教联系。由于这些因素，寇仁公爵得

到结论说试图和西藏人举行和平谈判是无用的。因此他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在荣赫鹏上校的率领下到西藏去。

1903年藏历六月，消息传到拉萨，荣赫鹏上校和他的部队正在向岗巴宗前进，目的是要开始商务谈判和讨论英国与西藏的关系。

这两位藏官派岗巴宗的官员和二十五名藏兵到甲贡 Glagong 去阻止英军进入西藏，并迅速报告英国人的行止。从锡金的拉清传来消息，英国代表团包括五名官员七百名部队已于1903年6月19日出发。秘书长罗桑称来和代本察绒立即前往甲贡。

在到达甲贡几天后，他们遇到一位会说藏话的英国官员欧孔纳上尉 W.O'Conner 和二百名军士。地方官要求欧孔纳停止前进，因西藏代表已经于当晚来到甲贡。欧孔纳说他打算明天前进到岗巴宗，到那里他的政府同意举行谈判。他又说，他仅仅是先遣队，大队英国官兵还在后头。

第二天早晨军号一响，英军就集合起来，毫不停留，他们立即向岗巴宗方向进发，带头的是欧孔纳和几位骑马官员。这两位西藏代表立即跑到路当中企图阻止他们，坚持要在甲贡谈判。欧孔纳作为锡金政治官怀特的译员，大部分话是通过他讲的。怀特说，北京允许到岗巴宗谈判，满洲代表将到那里。这一说明并不能对西藏人产生效果，但是由于英国人多势众，西藏人无法阻挡他们，只好跟在他们后头走。

英国人在距离岗巴宗碉堡不远的地方扎了营，用带刺铁丝和壕沟把他们的营房围起来。这时两位藏官收到春都紧急通知，指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一名英国兵或平民进入西藏。春都说英国是佛教的敌人，他们唯一的兴趣是扩张他们的领土。这是西藏人从过去与廓尔喀打仗时的经验中学到的。假如英国人是真诚的要谈判，商务就应当在边界上进行。假如英国人进入西藏，西藏军队将接二连三地派去阻

止他们。

春都的这一指示是在英国人已经到达岗巴宗后才送达的。驻在日喀则、江孜和定日的军队准备好行动。三大寺僧人，代表春都来与岗巴宗的西藏官员会合。满洲安班在日喀则的代表何光熙也来到岗巴宗准备谈判。英国人表示希望安班自已亦来。西藏人则重申如果英国人退回到边界就准备谈判，西藏人说没有必要让任何中国人参加谈判，何光熙借口健康不佳，悄悄回日喀则去了。

这时荣赫鹏上校带着四百名军队来到岗巴宗，他遇到西藏人和他们开了几次会，但是讨论的题目仍然是谈判的地点而不是商务。西藏人坚持英国人撤退，给荣赫鹏的印象是这些打交道的藏官都不是负责官员，因此他要求有全权作决定的官员来，要求满洲安班出席。西藏代表说安班和西藏商务无关。他们答应派一名有全权的高级官员来，但是英国人应当同意在边境上谈判，而不是在西藏土地上。这种辨论重复了三个月。英国军队在岗巴宗驻扎期中进行了军事训练，照像、爬山、测绘地图和搜集动植物标本。

岗巴宗是由扎什伦布寺管的，班禅的代表和扎什伦布寺的堪布在拉萨政府训令下来到岗巴宗，试图劝说英国人撤走，但他们也未成功。没有任何结果，最后英国人撤退了，可能是由于冬天就要到来和得到政府的命令。在水兔年九月十七日（1903年）他们回到锡金。

噶厦和春都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噶厦強调了和平解决而不要诉诸战争，因为认识到西藏没有足够力量从事这一行动。春都完全不知道英国的实力，宣称要战到最后一个人。噶厦是受了派往大吉岭的班觉多吉霞扎的影响，他现在当了噶伦。谣传在政府的高级官员中，有一名卖国贼，他们请内穹护法神在达赖喇嘛和噶厦面前指出这个人，但是护法神不愿干这些事，他昏迷的时间太短没有道出什么人的名字来。

虽然如此，四名噶伦，霞扎、学康、伙康和喇嘛噶伦江钦都被逮捕，关在达赖喇嘛的夏宫里。春都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噶厦成员。伙康是一位胆小和缺少经验的人，他是被派到噶厦代替拉鲁的，他怕受到虐待，结果自杀了。

春都的调查引了霞扎的大吉岭报告，其内容是同意和英国人接触的。春都说霞扎受了英国人的贿赂，替英国说好话。对噶厦成员都进行了个别审问。霞扎对春都的人说了如下的话（1）他是在亲眼看了并研究了英国在印度的势力后，才向西藏政府写了报告，他完全出于忠心，所报告的都是实情；（2）他建议春都研究他的报告，特别是关于西藏未来政策的意见和对英国谈判应当采用的方法；（3）假如他曾勾结英国人，他们就不会写信给达赖喇嘛要求撤换他。后来达赖还是把噶伦蚌塘派到大吉岭去作他的上司；（4）他说他有内穹护法给他的一封信，称赞他对国家的功劳，是和一条哈达一起送到大吉岭的；（5）他请求他们不要根据谣言来控诉他，要求和那些说他卖国的人对证；（6）他说他从大吉岭回来后，被任为噶伦，内穹护法神当着噶厦的其他成员祝贺他，称赞他的成绩；（7）他要求一个最后的判决，必须证明他有罪或者为他的劳绩而奖赏，不能听任谣言胡说。

噶伦霞扎发现自己处于困难地位，有两股势力在控诉他。春都怀疑他和英国人勾结，因为他主张和平解决。英国人则怀疑他和俄国人有勾结，霞扎是坚决反对1890年条约的，西藏人从来没有承认过它。

霞扎的同事们说，一切决定都是集体决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未来的好处。他们否认霞扎接受英国贿赂。尽管他们作了有力的辨护，他们还是被关了一年多。在这一时期又任命了四名新噶伦。他们是喇

嘛噶伦江巴丹津、色琼、宇妥和前代本察绒。这些人就是和荣赫鹏打交道的噶厦成员。

1903年末，西藏政府收到怀特一封信，信中说荣赫鹏的代表团就要进西藏，要求派一名负责的西藏官员到江孜等他们到达后开始谈判，但是西藏政府把军队派到帕里而不是江孜。12月英国远征军到达纳敦，其中包括荣赫鹏上校、怀特政治官，欧孔纳上尉，少将麦克唐纳和五千锡克和廓尔喀兵，装备有步枪、机枪和大炮。还附有军医，后勤官员和四千名力伕。军队取道咱利拉到达纳敦。当地头人和帕里宗官员都来要求他们停止。但他们没有理会，继续前进到帕里。

在这时侯，现在不丹大君的祖父东萨本洛，乌金王曲 Tongsa Penlop Ugyen Wangchule 和卡齐乌金，他是前不丹首相计美多吉的祖父，到帕里来调停。他们告诉帕里的宗本，必须在江孜和英国人举行谈判。他们说他们来是要使双方避免误会，他们并且要负责使英国人不摧毁沿途的村庄和寺院。帕里的官员把这一切都报告给拉萨。

同时西藏军队驻扎在都纳与古如之间的曲米训科 Chumik Shonke 。在这里他们筑了一道乱石墙约五英尺高。西藏政府的秘书长和三大寺代表是在古如，在军队后方不远。西藏军队的司令官是代本拉定 hading 他收到锡金王的一封信，锡金王的妻子是拉定的近亲，信上要求他和英国人谈判而不要对抗。他们通知他英国人还有大批援军驻在锡金，英国人要补充军队和给养是很容易的。西藏军队向英国挑战无异以卵击石。

在古如的西藏谈判代表写信给帕里的英国人要求他们撤退，但是英国人不仅不撤，反而越过唐拉到了都纳。在水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4年1月12日），代本拉定带了少数随从到都纳去见荣赫

鹏。但荣拒绝见他。只好返回古如。

下一个月除了交换了几次信件和不丹领导人多次努力想调解外。情况无变化。到木龙年的一月十九日（1904年3月3日）荣赫鹏、欧孔纳和少数随从来到古如的西藏营房。他们受到欢迎。被带进营内给他们献茶。荣赫鹏通知西藏人。他将到江孜去和有权威的西藏代表谈判。他又说除了讨论商务之外。还想和西藏人建立友好关系。像俄国人享受的一样。荣赫鹏还说英国军队在路上将不开火。除非是受到攻击。但是西藏人仍然如前的加以拒绝。他们同意英国人退到纳敦方能同意谈判。他们否认和俄国人有政治接触。多尔吉叶夫不过是住在哲蚌寺的一名布里雅特蒙古喇嘛。最后说如果英国人坚持前进。西藏人将被迫抵抗他们。会议开了两小时。什么决定也没有达成。

几天后。西藏指挥官到都纳的英国兵营。他们受到了军事欢迎并献了点心。但是谈判结果仍然是僵局。3月30日西藏人得到通知英国人将于明日向江孜进发。这日是藏历二月十四日。如果发生任何阻挠的行动。后果将由西藏人负责。西藏人没有给予回答，但口头对送信人说。如果英国人前进将予以阻击。同一晚西藏人发现英国人已从都纳上来包围了古如的藏军营房。

3月31日晨。西藏人守在低石墙后头。当一部英国人走向石墙时，代本拉定和代本桑色林带着随从向前走了半英里来会英国人。英国官员下了马和西藏人谈话。他们同意如西藏人放下武器。英国军队将不作子弹进膛的动作。当谈话进行时。英国人已包围了石墙，并在制高点安好炮位。其余的英国军队占据了藏军营房后的山头。当荣赫鹏还在谈话时，英军开火了，很短时间内藏军即被歼灭了。

西藏的古如战役的幸存者次登王曲，他当时是指挥二十五名兵士的军官，他说。

我们正在墙后等待谈判。一阵子弹从周围的山头向我们射来。我们连抽出刀来的时间都没有。我躺在一个屍体旁边假装死了。枪声继续响了一些时候，约有喝六碗茶的时间，于是停火了。英国军队下来检查死伤。他们用刺刀拨我，但我仍不动。后来由于刺刀伤使我生了疮。我的亲戚东珠腿上受了伤，和其它受伤者被英国人带走。在我旁边的屍体中，我认出有章恰扎巴拉和新马康仲阿库拉。虽然我很害怕，我仍然躺在屍体中直到天黑。我趁黑一气跑到古如。所有西藏官员都走了。我又跑到五英里外的多金，告诉我们的部队已发生的事情。我的受伤的亲戚东珠经英国人治疗后和另外五十人也回来了。东珠说英国人问西藏是否受到中国或其它国家的帮助。他们还被告知英国军队是这样的，如果今天损失了一百，明天就可以补充一千。古学沙西(指荣赫鹏)有个镜子可以看得很远。英国人告诉这些可怜的农民说他们可以回家去了；对发生的事情他们是没有责任的，但是如果再来就要被杀死。他们被照了像每人发了五个卢比和一包香烟。那些受重伤的还给予食物和治疗，有一批藏军被英国人扣留，所有这些东珠都报告了指挥官。

西藏政府的纪录说，战斗中藏人死了五百多人，包括代本拉定和麓色林，以及如本康沙姜马 Khansar Changma 和如本江钦 Changkhim ，寺院的两名代表。三百多人受了伤，所有西藏武器都被英国人缴获。

少将麦克唐纳打了一封电报给在印度的中将，电报的日期是1904年3月31日，地址是都纳。

我们损失是邓禄普少校 W.Dunlop 受轻伤，《每日邮报》的记者堪得勒先生 Candler 受重伤，五名伕役受伤。敌人的

损失是五百名死伤，二百名俘虏，所有营房和辎重，约六十头牦牛，三十头骡子，两支抬枪，一大批明火枪和刀子，有少数后膛枪，有两支是俄国造的。在被杀的人当中，有拉萨来的代本和甘丹寺的喇嘛代表。还有一名日喀则的代本，帕里的第本被俘，受了重伤。

几天后，英国军队离开都纳，在然章 Zamtzang 锁岗 Soughang 和乃营 Neying 克服了西藏的抵抗，于1904年4月11日到达江孜。在进军途中又有许多西藏人被杀。英国建立起两处营地，一处在姜洛 Changlo ，一处在学柱 Shodrup 两处都靠近河，离江孜碉堡约半英里。碉堡由西藏人据守。英国人在用大炮轰击后，占领了碉堡。代本太林 Tailing 逃了出去，又带着援兵回来，两个夜晚袭击姜洛营房，但损失很重。

这时满洲安班的一位代表来到江孜，通知英国人安班本人要来，但西藏人不肯提供马匹。荣赫鹏决定一直进到拉萨，借口西藏在他去江孜的路上进行了抗拒和没有负责官员来谈判，他宣称要直接和达赖喇嘛打交道。确实是西藏政府派来的官员没有一名是高级的，荣赫鹏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

当英军驻在江孜时，欧孔纳上尉到了日喀则，在这里他和扎什伦布寺的堪布和官员们发展友好关系。这些贵族们甚至跑到江孜去会见荣赫鹏。有些西藏人怀疑扎什伦布寺僧钦喇嘛 Sengchen Lama 的随从正住在英国营房里替英国人写信。

西藏军队的士气由于种种原因而低落了。关于英国人给西藏伤兵治疗和给予现钱和礼物后释放，很快传遍了卫藏。又说荣赫鹏很同情西藏兵。更有甚者英国人对柴火、粮食、马草优予给价，对当地居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西藏政府继续准备抵抗英国人。他们指派噶伦喇嘛江巴丹津为藏军总司令。在卡洛拉山沟里筑起一堵石墙，这是江孜与囊噶孜之间。白兰德中校被派去清理山口。英国兵没有走通常的山谷大道，而在一些牧民引导下走了一条山路，居高临下压在藏兵的上方。由于遭到突然袭击，藏军被摧垮了。有三百多人被杀，藏军四散奔逃"就像风中的羽毛一样"。藏军总司令噶伦喇嘛和他的后勤官员色琼色（Sen-Chung Sey），是在稍后的囊噶孜。当他们听到卡洛拉吃了败仗，他们就迅速撤退到拉萨。但在慌乱中他们迷了路，后来发现他们走到绒(Rong)。

在江孜停留了三个多月后，荣赫鹏于7月14日出发向拉萨。在卡洛拉克服了象征性的抵抗后，英国远征军进到囊噶孜。远征军停留在囊噶孜，他们访问了附近的桑姆丁寺和达垅寺。他们还在羊卓雍湖上划船，发现可以钓鱼和打野鸭。

一位噶伦叫宇妥和几名寺院代表被派到囊噶孜来和英国人谈话，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西藏人比方他们的官员说是来"赴宴的"。英国军队继续前进越过了岗巴拉，这是在囊噶孜与雅鲁藏布江之间。7月29日远征军到达了渡口。这时达赖喇嘛派他的宫廷大臣送信，请求英国人停下来就地谈判，不要前往拉萨，但荣赫鹏拒绝了。

这时英国人距拉萨只有三十五英里了。宫廷大臣急速赶回拉萨报告达赖喇嘛说，英国人正用他们自己的船渡武器和给养。春都和噶厦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决定达赖喇嘛留在拉萨固然容易办事，但有被强迫签订对西藏长远利益有害协定的危险，因此达赖最好还是离开拉萨。

达赖喇嘛只好中断了他正在进行的三年静修。他指定甘丹池巴罗桑坚参拉莫夏（Lamashar）为摄政，并作了如何对付英国人的指

示。甘丹池巴是一位诚实爽直的人。是在危急中可以依靠的人物。达赖喇嘛把印交给了他。并告诉他要释放前噶厦的成员。这些人至今还被监禁。现在允许他们回到自已的庄园上去。在木龙年六月十五日（1904年7月30日）达赖喇嘛带着一小批随从向北而去。

8月3日英国人到了拉萨郊外。他们扎起营房。同晚。满洲安班有泰去会见荣赫鹏。他重复了他不能去江孜的理由。并答应尽快的和西藏人达成安排解决——鉴于他连使西藏人供应马匹都办不到。这一允诺实属惊奇。第二天驻拉萨的廓尔喀代表吉特巴哈杜尔 Jit Bahadur 和喀什米尔回人首领都去见荣赫鹏。次日荣回访了他们。春都和噶厦分别召开会议。但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不丹人和尼泊尔代表继续努力作为摄政、噶厦与荣赫鹏之间的中间人。

最后摄政没有任何仪式地去访问荣赫鹏。打开了后来谈判的大门。荣赫鹏要求他和他的官员是否可以住达赖的夏宫。但摄政说。夏宫是个神圣地方。答应给他找拉萨最好的房子。指定达赖十二世亲属的房子拉鲁为他们的住处。后来摄政召集噶厦。通知它的成员。他和英国人的会面并没有丢失了体面。他说荣赫鹏也像个人。是可以讲道理的。噶厦这时不再害羞了。按照习惯送牛、干果、鸡蛋等礼物至英国军营。噶伦们也访问了荣赫鹏。

当讨论正在进行时。一个西藏喇嘛偷进英国营房攻击两名官员。一名是凯来上尉（T.B. Kelly），一名是医生科克杨格（Cook-goung）使他们受了重伤。这个喇嘛被捉住审问。但他坚决不说属于那个寺院。西藏官员说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人。后来这个人被当众吊死。后来在英军驻拉萨期间。一名藏官和三大寺各派一名代表住在英国军营作为人质以防发生类似事件。

荣赫鹏通知噶厦。英国人的要求是签订一个协定。关于对远征军

的赔偿。交换俘虏和划定边界都进行了讨论。英国人提出的条件总的说来对西藏是不利的。但是春都和噶厦都认识到一点办法也没有。达赖已经走了，国力很虚弱。在济隆和瓦弄与尼泊尔的纠纷还没有解决。还有中国军队正在喀木干扰鸦龙、里塘、巴塘和乡城的地方行政。北京的满洲人不理会西藏人的控诉。面对着两个敌人，为什么不找个朋友呢？"毒药有时可以治病"，春都说可以接受英国人的条件。

木龙年，七月廿七日（1904年9月7日），在布达拉宫的大殿签订了一份条约。代表藏方的是摄政甘丹池巴和四名噶伦。春都的四名秘书长和三大寺的代表。代表英方的是荣赫鹏，英国锡金政治官怀特和五名其它官员。证明人是满洲安班有泰，不丹调解人东萨朋洛和尼泊尔代表吉特巴哈杜尔。两百名英军排列在大殿内。布达拉宫本身是在安好炮位的英军包围之下。

由于西藏在1890年中英关于西藏条约中没有代表，西藏人拒绝承认它对西藏有约束力。这就造成了问题，使英国政府最后决定远征拉萨和西藏政府直接谈判。1904年条约说西藏将尊重1890年条约，是因为"西藏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已有了很好的谅解和友好关系"。很明显，英国是把西藏当作一个独立国家打交道的，特别是1904年条约根本没有提中国和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满洲安班，不丹代表和尼泊尔官员仅仅是签约的证明人，他们并没有在条约上签字。

1904年条约的第九条是最重要的。这一条规定西藏政府要保证在不得英国政府同意前不得（1）把西藏土地的一部分割予、卖予、租界或抵押予外国；（2）不许外国干涉西藏事务；（3）不许任何外国代表进入西藏；（4）不许把铁路、道路、电线、开矿或其它权利租让予任何外国或任何外国的属民；（5）西藏的财赋收入，不论是实物或现金均不得抵押或拨予任何外国或任何外国的属民。

在1914年西姆拉条约的第六条和1906年中英条约第三条均认为中国是外国。换言之，很明显，1904年英藏之间的条约完全否定了中国号称的对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

1904年条约也规定了在江孜和西部西藏的噶大克建立贸易市场，在亚东的一个市场已根据1893年商务规定建立起来。一共是三个市场。在和拉萨官员签订条约时，荣赫鹏还从他们取得两份文件：一件是允许英国江孜商务代办遇有重要事务时，可到拉萨去交涉；一件是给予英国人在噶大克建立商场的自由。

交换俘虏进行了。西藏政府为两名西藏人交付了一千卢比。他们是受英国人雇佣，被西藏军队俘获后被打伤致死。英国军队没有进行抢掠并尊重当地的宗教。他们对从西藏人方面得到的运输和给养均优予报酬，于是拉萨又流行一个民歌：

开始是我们宗教的敌人，
后来又说他们是外来人，
但他们的卢比花在本地，
于是变成"沙西"和上等人。（沙西 Sahib 印度对人尊称，译者注）

毫无问题，1904年的条约是强加于西藏人的。更有甚者，它限制西藏人与其它外国建立关系，加深了西藏对外部世界的孤立。当寇仁公爵派英国远征军到拉萨时，他认为达赖喇嘛和沙皇俄国有关系。尽管沙俄外长兰斯道尔夫 Lamsdarff 曾向英国大使斯考特（C.Scott）声明，俄国在西藏没有政治野心，只是对佛教有兴趣。在西藏政府纪录中，找不到与沙俄来往的证据，除了多尔吉叶夫的外交访问之外。日本喇嘛河口慧海访问拉萨报告说，西藏有俄国的武器，如果真是如此，为什么不拿出来对付英国远征军呢，英国所俘获并拍

了照的西藏武器。大部分是明火枪、矛、斧、刀和弹弓，只有几支来复枪可算是现代武器。实际上就是因为缺乏现代军事装备，西藏军队才遭到英国人的屠杀。

英国本国政府对寇仁的侵略政策采取严厉的批评态度。说没有必要把商务代表团变成一支军队。对印度事务国务秘书指出对西藏索的赔款太重了。1904年条约定为五十万英磅分七十五年还清。后来减为十六万六千英磅（相当于二百五十万卢比）分二十五年还清。

鉴于1904年条约是由西藏与英国直接签订的，没有任何第三国参加，在当时把西藏当作独立国对待。实际上在寇仁于1903年1月8日给印度事务国务秘书的一封信中说，"我们认为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是一种宪法的神话——是对两方的便利而维持的一种政治假象"。满洲安班要求1904年条约在他的住所签订，但甘丹池巴和荣赫鹏坚持要在布达拉宫大殿里进行，为了尽量使它合法。荣赫鹏问安班一点事情都没有，在拉萨怎么样过日子。

另外也很清楚，噶厦的新的成员对外交是一窍不通的。他们看到他们的前任丢了脸，因此不敢做什么大胆的举动，内穹护法神的予言成为做出决定的主要依靠。

冬天要来到时，荣赫鹏的远征军开始归程，1904年9月23日离开拉萨。在到达江孜后，欧孔纳上尉留下来当了商务代办，有一批职员协助他。在马格尼亚克 Magnioc 陪同下，去到日喀则会见了班禅喇嘛，建立了像1774年波格尔所建立的关系，一个月后班禅喇嘛带着大批礼物到加尔各答，他受到威尔斯亲王和明图公爵(Lord Minto) 接见。这标志了扎什伦布和拉萨政府磨擦的开始。

1906年，英国和中国签订了一项协议，批准了1904年的拉萨条约，这是在未通知西藏政府进行的。这个协议称为北京附加协

议。这个协议在1908的一次协议中加以修订。称为西藏通商条例。这个条例是当着噶伦察绒的面签订的。噶伦察绒后被刺死。在西藏传说是噶伦察绒签订了1908商务条例。没有事先征求达赖喇嘛政府的同意。另外西藏政府完全不知道1907年8月英国与俄国签订的关于波斯、阿富汗与西藏的条约。

在荣赫鹏到达拉萨前不久，达赖喇嘛和一小批随从到达了达壠寺和热振寺。在热振寺时他决定到蒙古去。他给摄政甘丹池巴送去一封信通知他的决定。经过了三个月的艰苦旅行，达赖到达了外蒙古。那时外蒙分为四个部，由哲布尊丹巴统治。蒙古人称他为博克多格更(Bogda Gegen) 他的首府是Urga （即库伦）也称为乌兰巴托当他听说达赖喇嘛来到他的地面，他就派他的兄弟和两名大臣带着轿子去欢迎他。达赖一行走了二十八天才到达库伦。在这里他受到哲布尊丹巴的接待。达赖在这里住了一年多。偶然也到乡间去。他所受到的蒙古人的崇敬使哲布尊丹巴妒忌。一度他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冷淡。最后蒙古大臣们又促使他们和解。

1906年，达赖到了青海地区。访问了格鲁巴教派创始者的出生地塔尔寺。他在这里受到两个邀请一个来自西藏政府敦促他回拉萨，一个来自满洲皇廷请他访问北京。喀木的官员告诉他汉人经常在边境上闹事。因此达赖决定到中国去作一次短暂访问可能有好处。

1907年末达赖一行到达西安府，这里在唐代曾是中国的首都长安，他在这里又接到西藏政府的信敦促他回去。他回答说前噶伦班觉多吉霞扎可任命为伦钦 Lonchen （首相），和摄政一起管理行政。霞扎拒绝这一任命，除非他的前同僚学康和江钦也同时复位。最后三个人都当了伦钦，权力在噶厦之上。虽然他们负起了政府的实际责任，但承认摄政的地位。在仪式中给予噶厦成员以优先的地位。

1908年，达赖一行离西安赴北京，沿途访问佛教寺院。在山西省的五台山，他受到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 W.W. Rockhill 的访问，这可能是西藏与美国的第一次接触。他也受到日本佛教僧人 Songa Otani 的访问，他和达赖交换了一部佛经。他们讨论了交换两国学僧的可能性。由于他和 Otani 的会见，达赖后来会见了日本驻北京的大使 Gonsuke Hagashe ，日本的驻华武官也会见了达赖喇嘛，他向达赖介绍了日本的军事训练制度。达赖喇嘛和日本人的这次会见，导致了1913年一位日本军事专家训练西藏军队。达赖在北京时也受到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Lirgohu) Gordan 的访问。

在土猴年藏历八月初三（1908年9月27日），达赖喇嘛在北京受到极隆重的接待。他住在为达赖五世建筑的黄寺，他在火车站上受到北京市长和内外大臣们的欢迎。

达赖喇嘛听说见皇帝时要磕头，他就拒绝到宫廷去，但是已经安排了他和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会见。西藏纪录表明皇帝是无权的，是在一种药品的麻醉下，他很少说话，显得毫无生气。慈禧太后则发号施令显然是皇位后面的真正掌权者。达赖喇嘛和她谈话，也和外务部谈话，申诉中国官员正干涉喀木，对那个地方的西藏民收税。他说中国和西藏的关系从来都是宗教施主互助的关系。他要求从喀木地区撤出军队和官员。慈禧太后对达赖保证对已有的关系将不作改变，但是外务部的官员却不喜欢达赖所坚持的纯粹宗教关系。他们最后同意减少喀木地区的军队和官员。外务部的代表还提醒达赖要遵守1906年中英所订的条约。这些讨论都没有留下什么协助文件，因为达赖与外务部之间有明显的分歧。这种分歧当时并没有公开。达赖喇嘛看出慈禧的统治不仅暗中受到大臣们的反对，广大汉族人民也同样不满。

在官员中和满洲宫廷中的高度腐败，使达赖看出满洲权力已面临末日。

在北京的一系列宴筵中，西藏人注意到皇帝不能自已吃饭，而是由他的几个妃子之一喂他。他在这一年的十一月没有留下儿子就去世了。就在他死后不久，慈禧也随着他进了坟墓。有谣言说，慈禧把皇帝弄成个鸦片嗜好者，以便由她统治，在皇帝死后她也服毒而死。土猴年十月初九（1908年），前皇帝的一个年幼的侄子继承了皇位，年号为宣统，达赖喇嘛参加了登基典礼，他就是满洲在中国的末代皇帝。

三周以后，达赖开始走向归程，他在塔尔寺住了几个月，他对这个寺院的管理和仪式作了一些改革。土鸡年八月初二日（1909年）到达黑河，受到了班禅喇嘛、摄政甘丹池巴和满洲安班代表的欢迎。在普布桥 Phurbu chok 三位伦钦来会他。这些人是由他批准担任伦钦职位的。

十一月初九，达赖喇嘛在隆重仪式下进入拉萨。两天后他重新进入布达拉宫。西藏人民献给他一个新印，上面刻有“由佛予示，嘉错喇嘛是地球上佛教的主持者”。这个印十分重要，因为它是西藏独立的象征，也是无视满洲或汉人干涉的标志。这种否定也为这一事实所证实，即它是在中国军队向拉萨进发时，由西藏人民献给他的。

在1792年尼泊尔银元纠纷以后，西藏自已铸造银币，每个上面都有狮子脑袋的标志和铸造年月。从1910年后，西藏政府的名字甘丹颇章都印在所有银币上。这是达赖从中国回来后发行的。他还在拉萨成立了外交局，由台吉彭康和堪穹坚参彭错担任首脑。这些官员后来都当了噶伦。

十四、1910年中国侵入拉萨和西藏为独立而斗争

1896年鸦砻总督的一些地方（此处指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新龙县境。解放前旧名瞻对，更早为瞻化。译者注）被东部西藏的首长甲拉所占据（甲拉即康定明正土司的藏名。译者注）。总督要求归还这些土地，但是甲拉家是有四川的汉人作后盾的。他们派来了由唐礼指挥的一支军队。汉人占据了东部西藏的很多土地。德格土司和他的家属被俘虏送到四川。德格土司的父母死在狱中，但由于西藏政府的干涉，他的两个儿子被释放了。德格的权力由西藏人交给他的长子。在和汉人谈判以后，唐礼的部队也撤退了。类似的地方冲突在以后的几年中不断发生。1903年汉人开始用军队在噶尔塔（Gorthar）建立他们的权力（这里是达赖七世曾住过几年的地方）。（噶尔塔即今甘孜藏族自治州乾宁县，旧称泰宁县。译者注）。同时新任驻藏付安班凤全在赴藏途中停留于巴塘。他批评当地寺院的喇嘛人数太多了，有一些回去参加农业更为有用些。僧人们对凤全的这些话有反感。于是把他和他的随从都杀死了。接着从四川派来了由马维骐率领的汉军去对付巴塘的僧人。他们在附近却没有藏军支持，被迫投降了。中国军官逮捕了三百二十二名僧人，都作为杀死凤全的嫌疑犯被正法了，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寺院的一些建筑被烧毁。马维骐然后返回四川。

借口继续调查此事，1905年汉军在赵尔丰的率领下又来到巴塘。又杀了四名喇嘛，并严重处罚了寺院。附近里塘寺的僧人抗议对巴塘僧人不公正的处理，因为已经处理过了。赵尔丰召集里塘的两名西藏政府代表，问他们是否真的里塘僧人在反对他的做法。这两个西藏人肯定了这个说法，赵立刻把他们就地正法。这样就把里塘僧人的气焰镇住了，但是附近的乡城的人民却在准备支援巴塘。赵听说后就

派他的军队去乡城。结果有一千二百一十名僧人和俗人被杀。

1906年六月赵尔丰的军队来到贡噶南木林寺 Gongkar Nemling ，四名僧人出来表示投降却遭到就地正法。其它都逃入森林中，只留下两名年老僧人和三名火夫，这些人也全部被杀。同样的进攻也发生于羊登寺（gong teng monartery 四十八名僧人被杀，其余的逃到森林里，所有这些寺院的金顶银饰和粮食都被抢掠一空。佛经被烧。大部分掳掠物运到四川，铜制品被熔化制造铜币。赵尔丰的一名付手去攻击拉岗寺（Lagang ，二十五名僧人在战斗中被杀，他们的九名首领被正法，中国将军很快被藏民称为"赵屠户"。

赵尔丰建议从打箭炉西迄工布江达划为中国的一个新的省。工布江达是拉萨以东约一百二十英里的一处村镇。虽然从来未置于中国的行省制以下，但是赵所建议的西康省却出现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地图上。1907年，赵派军队到喀木南方的察门贡（Tsa-menkhung ）一文钱不给就从这里的居民手中夺走了上千驮粮食。1908年，赵又得到四川军队的支援，于是宣布由于西藏人和英国人接触，他将在昌都建立一个地方政府，然后开赴拉萨。

在拉萨摄政和噶厦写一封给皇帝的信，交给了安班联豫，抗议赵尔丰的暴行。联豫拒绝转这封信。由于安班坚持拒绝转信，摄政甘丹池巴认为安班和赵尔丰是协同行动的，很可能皇帝是不知情的。于是噶厦派了一位代表到加尔各答打电报给中国外务部和军事部门（军机部），请求下命令让赵尔丰撤出喀木。也向英国人发出呼吁请他们从中协助。

北京没有回答。中国在拉萨的驻防军得到六千名援军。安班通知噶厦，从现在起所有在西藏的部队都由钟颖指挥，他是一位满洲人，

被任命为总司令。噶厦拒绝承认安班的命令，西藏军队超过了拉萨安班的军队。但由于达赖喇嘛仍然在汉地。西藏政府为了达赖喇嘛的安全只好容忍喀木的无数暴行。满洲皇帝已经很微弱，无力控制他的省份，各省的督军都是各自为政。

1909年西藏政府获悉一支大的中国军队被派到西藏来保卫商埠，这是根据1908年在加尔各答签订的商务条例进行的。西藏人反对由中国来保卫商埠，表示如果需要西藏自已可提供部队。噶厦向安班作了多次抗议，要求从西藏土地上撤走中国军队。安班的答覆却是比计划更快的召来军队。

急切地盼望达赖喇嘛比中国军队先到拉萨，西藏人派了一名代表堪穷江白曲桑。(Chamba Chozang) 到喀木去，要求中国军队停下来直到北京回答了从加尔各答发出的电报。中国军队已经前进到离开昌都四天路的地方。堪穷在达尔宗(Tar Dzong 遇到他们，请求他们暂停，但中国人不理会他，反而把他逮捕了。中国人是用现代武器装备的，但是他们没有给养，他们每前进十五英里就停下来，从当地居民中強迫索取给养。他们到达工布江达后，堪穷江白曲桑和八名随从在安班的命令下被正法。

达赖喇嘛于1909年12月回到拉萨，他命令春都的代表去会中国军队，请他们停下来。害怕受到正法，他们带着一名尼泊尔驻拉萨的付代表和一名喀什米尔回商的一名头目。付安班在尼泊尔代表陪伴下去见达赖喇嘛，向他保证中国军队只是来保卫商埠，到拉萨以后即将分散，不会干予西藏内部事务。作为保证，他答应给达赖写了一份字据。字据第二天送达，内容包括安班所口头应允的，但把不干予西藏内部事务取消了，只说"将不干予达赖喇嘛的宗教事务"。

在铁狗年正月初三(1910年)在钟颖指挥下的中国军队到达

拉萨河畔，这里遇到了安班卫队的迎接。下午三点钟中国军队进入拉萨，向拉萨的警察开枪，打死打伤其中的一些，他们还向大昭寺开枪。在穿过街道时向外事局首脑，新年大法会的主持者彭康台吉开枪，彭康的马被打死。他本人被逮捕，把他的首饰剥光带到安班的住处。他的同僚孜仲嘉样坚参和彭康的仆人都被打死。

中国人又向布达拉宫开枪。达赖立即任命了一名新的摄政，策墨林的阿旺罗桑、赤任波清（Trl Rimpoche Ngawang Lozang Tsemoling），还给他配了一名助手名叫堪钦彭错牛霞（Khenche Phun Phuntrok Neushag），他告诉他们他将去亚东，要他们负起他的责任来。天黑以后达赖喇嘛就在三位伦钦，会议大臣噶伦色穹（Serchung），两名付大臣，噶伦丹津王波和噶伦桑珠颇章，医药顾问，江巴图旺饿细，在拉马岗 Ramagang 渡过河向西而去。（1959年西藏反叛时，现达赖也从同一地点渡河，只是渡河后向南去了。）

第二天安班听说达赖喇嘛逃走了，他向部队要自告奋勇的人去把达赖的首级取回来。一名姓吴的汉官，一名被藏汉人叫作甲果董 gyalgo dong 的自告奋勇，他带了三百名骑兵去追达赖喇嘛。

当达赖到达甲桑姆 Chaksam 的晚上，他收到一信，说追他的人距他只有十英里。他立即出发向羊卓萨姆定寺 Yardok Sumding 而去，这里是多吉帕姆的住地。她是西藏的少数佛教尼姑之一，被认为是一个化身（多吉帕姆的化身，和转世活佛一样地找寻她的化身）。少数军队和他的随从，达桑占都 Dazang Dadul 留下来牵制中国人。第二天早晨中国骑兵到达了甲桑姆，他们受到达桑占都一小支人的攻击，在这里使他们耽搁了两天还遭到一些死伤。占都后来为他在甲桑姆的英雄行为受到奖赏。

从萨姆定寺他送一封信给江孜英国商务代办古尔德，B.gauld要求他给予在印度避难方便。如果必要的话，达赖然后前往帕里。在这里他遇到驻亚东的二十五汉兵的中国指挥官。他劝达赖不要到印度去。答应给满洲皇帝和安班写报告。达赖回答说等到亚东后再考虑。

达赖喇嘛每天收到报告说中国人还在追他。当他继续前进时，几乎全部帕里和卓木的人口都出来陪伴他作为他的卫士。中国人受到警告，在达赖经过时不许上街，这时英国商务代办的一名官员从江孜到达帕里，陪伴这一大群人到亚东去。一行再没有遇到中国军队的干扰。穿过亚东的大门后，他受到亚东商务代办麦克唐纳的欢迎，并在他的住宅里过夜。麦克唐纳于１９０４年曾随荣赫鹏到拉萨，他能说藏话和书写藏文，他和许多西藏人建立了善意和友谊。

达赖喇嘛原来的计划是留在亚东然后和北京谈判。当他听到中国军队已到达帕里，只有一天路的距离，他最后决定跨过边界进入印度。在离开亚东前，达赖喇嘛给麦克唐纳留了一封信，请他转到印度的英国官员手中。鉴于英国人几年前曾侵入拉萨，致使达赖逃到蒙古，因此这封信的内容是有趣的，有必要引在下面：

> 中国人大大地压迫了拉萨的西藏人民，骑兵到达了那里。他们向居民开枪，打死打伤他们。我被迫和我的六名大臣逃了出来。我的打算是到印度去和英国政府协商。自从我离开拉萨，一路被中国军队追逐。两百名中国的蒙古步兵在甲桑姆时就紧跟在我后头，我留了一些兵阻止他们，在那里发生了小小的战斗，在交火过程中有两名西藏人和七十名中国人被杀。我留下摄政和代理大臣在拉萨。但我和我的大臣们已经把印带出来了。我受到了英国政府的种种礼遇，对此我表示感谢。我现在希望你们给予我保护，我相信英国政府和西藏之间的关系就像父子一样，希望接受你的

指导，等我到达印度后，我将向你们谈详细的情况。

取道咱利拉达赖到达了噶伦堡，在这里他作了不丹大君卡齐乌金 Kazi Ugyen 的客人。达赖住过的这所房子今天被称作"不丹家"，西藏人则称它为明居贡噶颇章，意为不变普善宫，这是和达赖十三世联系起来的称号。

在噶伦堡住了一周，达赖喇嘛就到了大吉岭，他住在一所叫巴达布克 Padabuk 的房子里。在这里他受到锡金政治官柏尔C.Bell的访问。他是达赖和印度政府之间的联络官。大吉岭的付专员负责照顾达赖喇嘛的安全。

几个电报打到北京去，要求从西藏撤退中国军队，但丝毫无结果。印度报纸还发表了，满洲人已将达赖喇嘛免职，另外抽籤找寻继承人。拉萨的满洲安班也流传类似的报告。达赖决定今后决不直接与满洲人或汉人谈判。他引用1904年条约的条款，请英国代表他们进行干予。达赖喇嘛到达加尔各答时受到鸣礼炮十七响的接待，并在护卫下乘王家马车到汉斯廷公舘（Hastings house ）。

1910年3月14日达赖喇嘛会见了英国总督明图公爵，叙述了中国人在西藏的欺骗与扩张。下面就是由巴特勒 Butter 所记的这次私人会见的内容。他开始这样记，总督阁下，于下午五时在加尔各答政府官邸接待达赖喇嘛，进行私下的会晤，出席的有锡金政治官柏尔和我，柏尔是作为译员的。在相互问候以后，达赖喇嘛对他所受到的仁慈的接待表示诚挚的谢意。达赖阁下说他从拉萨出来经历了艰苦，因为中国兵在后头追他。当他离开拉萨时那里有五百名旧中国兵和四十名新兵，他们是两千人的一支队伍的先遣队。主力离拉萨只有两天路。总共有二千七百名军队来到拉萨和附近地区。根据收到的消息，中国在西藏的这些兵力，并非仅仅用于西藏。中国人对尼泊尔、

锡金、不丹都有野心。他们想征服这些地区，而且将摧毁喇嘛教的最后的痕迹。中国人曾多次阻挠西藏与英国政府间建立友好直接的关系。1888年的锡金纠纷和1904年的荣赫鹏远征完全是由中国人搞出来的。在北京时达赖阁下曾请求英国使臣取消中国人的有害干涉。

达赖喇嘛继续说，在1908年的商务条例下，英国和西藏政府间的直接关系已得到保证，他呼吁应当尊重西藏在这方面的权力。他要求恢复到达赖五世时的地位，他曾作为一个友好国家的统治者和中国皇帝谈判。他要求把中国军队撤走。

总督问他是否知道英国政府和中国与俄国签订条约的内容。达赖回答说他正在研究这些条约。

西藏政府声称它有权直接和英国政府打交道，但在1890年和1906年条约中都未得到承认。在这些条约里它没有参与。达赖还说自从他离开帕里后，和拉萨的中国人没有联系。在目前情况下他不打算回到拉萨，对他的一切允诺都未实行。他不会再相信北京政府所作的书面的东西，因为他们已经违反了已故慈禧太后对他的允诺。

当问到如果拉萨回不去，他打算干什么时，达赖回答，目前还难说，除非问题满意地解决了他是不会回拉萨去的。他否认他阴谋反对中国。他在逃出来以前在拉萨只呆了两个月。安班是充满了敌意的。达赖带着大臣和印出来。他指派了摄政并留给他签订1904年条约的印。他自已的印则随身带着。他自离开后和摄政也没有接触，中国截收一切官方信件，他和西藏没有正式往来，有一些私信传过来，这些来往必须保持秘密。

在访问中达赖澄清了关于布里雅特蒙古多尔吉叶夫的问题。他访问过俄国沙皇。达赖说多尔吉叶夫现在他自已的国家。他曾经是他的总宗教顾问的七个助手之一，除宗教事情外，从不谈别的事情。

在访问终了时，达赖说他已提出呼吁，问可能会得到什么答复。总督阁下说。他非常高兴有机会会见和招待达赖阁下。他已下令对他从各方面进行照顾。但是关于重要的政治问题需要很好考虑。但只能说他将把神圣阁下的意见转达给英皇陛下的政府。达赖再度表示感谢总督，然后就离开了。

总督建议达赖喇嘛可以在加尔各答观光。虽然对达赖做了精心的照顾，但没有作任何帮助的允诺，可能是他对英国与中、俄条约的义务还不是很清楚。在加尔各答住了几天后，达赖又回到大吉岭。

只有两名原来的噶伦留在拉萨，他们是噶伦罗桑钦来和噶伦察绒。达赖在离开前曾指示摄政派德吉林巴 Dekyi Lingpai 和堪穷坚参朋错为付噶伦。中国人将罗桑钦来免职，而不承认德吉林巴和坚参朋错，不须他们进噶厦。只有察绒一人办公。中国人新任命的噶伦是丹津曲扎。然巴、兰桐巴、摄政的助手钦若彭错牛霞被中国人逮捕处死刑，但在摄政呼吁下未执行，械系送到打箭炉。

在拉萨，中国人取代了西藏警察。达赖个人财物正从中国运回，都在黑河加以没收。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的财产，以及西藏政府的大量财宝都让中国人运走了。拉萨的军械库被搬空，造币厂和军火厂也被占据，那些和达赖一起逃走的大臣家里都劫掠一空，前摄政德莫的财产，当初因阴谋反达赖被没收，现在还给了他的家属。

许多地区原来把赋税直接送到拉萨，现在开始通过商人旅客送到大吉岭。为了阻止这一行动，中国人在边境设立了检查站对赴印度的客商严加搜查。不久拉萨的西藏人就开始涂抹和撕毁中国人贴的告示。寺院代表和西藏官员向满洲安班抗议达赖被免职。勿论是西藏人还是他们的政府都不和拉萨专制的中国人合作。在东部和南部中国人经常受到袭击。

中国人认识到把达赖免职是一个错误。他们指示安班派罗吉泰 Lo ji - tai 去大吉岭恢复达赖的名号并要求他回西藏去。中国官员于1910年9月到达印度。

在答复罗吉泰，达赖写了如下的信：

达赖喇嘛致罗吉泰：铁狗年九月初十（1910年）我从你收到一份从北京政治军事部门来的紧急信件，要求我回拉萨去。作为答复我要说，满洲皇帝对历代达赖的福利都照顾备至，历代达赖也都报以友好情谊。我们心里经常考虑的是对方的利益。西藏人民从来没有对中国人怀有恶意。

在木龙年（1904年）当英国远征军来到西藏，除北京之外我没有考虑向谁求助。在北京我见到了皇帝和他的姑母，他们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同情。皇帝答应照顾西藏的利益。在皇帝指示的鼓午下我回到西藏。我发现在我们的东部边境有大量中国军队集结，有好多我的属民被杀死，寺院被摧毁，人民的权利被镇压。我确信这些你都是知道的。

更有甚者，驻拉萨的安班联豫，得到军队的增援，目的是占领拉萨。好几次我对此提出反对，但他对我的呼声，充耳不闻。当军队在向拉萨开拨中我派了代表堪穹去会见他们，说明我的处境，但军官们把他正法了，而且没收了他的财物。

中国军队在行进中，对人民和寺院压榨到如此程度，致使我的属民和寺院僧人要求准许报复。如果那样做了，并不一定就打不败你们的军队，因我们对地势是熟习的。但是考虑到对你们军队的攻击可能被认为是反对满洲皇帝，因此我要我的大臣们和你们的官员谈判，并保护你们在拉萨的代表。我也曾给皇帝写信要求撤走这些军队。所有这些在中藏两方的记录上都是清清楚楚的。

我几次打电报给北京的政治部门，但是没有得到答复。

我从中国回来到达黑河时，我写了几个条子给安班，通知他中国和西藏必须继续保持长久的友谊，他不听我的呼吁坚持把更多的军队开到拉萨。中国军队的进入正好赶上拉萨举行新年大法会，成千上万的喇嘛从各寺院集中到这里。为了避免冲突驻拉萨的尼泊尔代表去见满洲安班，防止任何麻烦的发生。安班拒绝做任何事情，相反他却派他的卫队去迎接前来的军队。在路上他们向拉萨警察开枪，打死其中的一些。他们还向大昭寺和布达拉宫开枪。

达赖十一世的侄子台吉彭康和孜仲嘉样坚参是派定主持大法会的西藏政府官员。在他们去大昭寺的路上，他们遇到军队向他们开枪，孜仲嘉样和彭康的随从和马被打死。台吉彭康被打后又带到兵营去。拉萨的人民是如此气愤，他们要求报复。但我禁止他们那样干，我仍然希望可以和中国谈判以避免流血。不知道我如果被俘将得到什么遭遇。我在拉萨指派了一名代表继续谈判。我来到藏印边境也是为了亲自主持和中国的谈判。

我的大臣们请求我留在拉萨。假如我照办了就会出现类似穆斯林侵入印度时的那种情况。结果许多宗教机构被摧毁了。由于我不愿在西藏出现这种情况，我才来这里专门为我的国家谈判。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将忍受。当我到达帕里时，亚东的中国官员要求我留在帕里寺和北京谈判，用电报和拉萨的安班谈判。我想这一安排倒很理想，但是军队到达要不论死活把我拿住。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跨过印度边界。

到了噶伦堡我听到满洲皇帝已下令将我免职。这已经发表在印度报纸上，甚至拉萨也公布了。贴出的布告宣布我今后是一个

普通人。新的达赖很快就要选出。由于皇帝完全听拉萨安班的话行事，不考虑西藏的独立和我们两国间的宗教关系，我感到直接和中国谈判已经没有用了。我对中国失去了信心，根本不可能同中国人协商找到什么解决办法。

我和英国人接触，因为1904年条约允许我们直接的打交道。中国人对我的这一行动是负有责任的。

在我在印度期间，安班联豫把军队派到西藏各地，压榨西藏居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截断了我的供应，检查从西藏给我的信件。他们把拉萨的库藏封起来，搬空了军械库，拿去造币厂。我在拉萨代表的助手堪钦、钦若朋错，已经七十岁了，他毫无罪行就被关押起来并解送到打箭炉。司法案件已了结的又重新翻出来。西藏政府的财产，西藏官员的财产和寺院的财产被非法没收。

你对你们军队所干的这些不可饶恕的非法行为是完全清楚的，但是你对我和我的大臣们却说西藏的局势是平静的，既成的局势在维持着。我知道这不过是要劝我回去，我也知道这些都是假的。

由于上述的原因，西藏和中国是不可能恢复到以前的关系了。为了使我们可以谈判，第三方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双方都得请英国政府作为中间人。我们未来的政策将根据我们自已、中国和英国人讨论的结果。你是否能同意英国人参加讨论呢？如果同意，请通知我。

如果你不同意，我将交给你一封用满文和藏文写的信，内中包括以上所谈的，希望你把它转给皇帝，请你向皇帝仔细说明我的信的内容。　　铁狗年九月十三日（1910年）

达赖喇嘛盖章

这年冬达赖喇嘛朝礼了印度的佛教圣地。他访问了 Lumbini.

Bodh gaya, Sarnath 和 Kushinagara ，这里是佛出生、成佛、讲经和去世的地方。

同时班禅的官员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想利用班禅，于1911年1月请他到拉萨。他开头住在大昭寺，后来搬到罗布林卡（达赖的夏宫）。这样使西藏人民感到不快，后来由于班禅对满洲安班公开表示亲密，如相陪赴筵或看戏，这就更触怒了西藏人民。

在酥油灯节，班禅和安班都坐上轿子就像往常达赖出行一样在拉萨大街上绕行。拉萨市民参加了仪式。他们拿土块和臭袜子往安班和班禅头上扔。那时拉萨又流行一首民歌：

穿着肮脏衣服的和尚

站在大昭寺的屋顶上，

要不是黎明的到来，

他准会去作小偷。

"黎明"在歌词中是指西藏的反抗运动。它使班禅不敢接受达赖的行政责任，人们怀疑中国人在准备让他代替达赖。从达赖和班禅之间的私人往来书信，班禅对达赖是高度敬重的；主要是他的官员和中国人的勾结才把他置于这种不愉快的地位。从那时起拉萨官员和扎什伦布的官员之间就继续存在着恶感。

拉萨的中国军队大部分是从四川召来的。有些是普通兵士，另一些则属于哥老会，这是一个革命的秘密组织。由于兵士之间的对立和粮饷不足，在中国军队内发生了火併。安班把哥老会的头子正法了，但这更导致了官员之间相互残杀。政治分裂和个人之间的冤仇，使一名中国上校谢国梁和三名其它官员投入西藏一方，他们参加了色拉寺僧人的行列。

1911年10月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推翻了满洲在中国的统治。

当消息传到拉萨，哥老会的成员就起来叛变了，他们攻击了安班的住地，抢了他的家。安班逃出拉萨到哲蚌寺避难。但是反叛者捉住他并把他带到日喀则作为人质。满洲总司令钟颖替安班出来说情使安班获释。随后反叛者又从外地把军队召来，准备开回中国去。这使更多的军队来到拉萨，他沿途和在拉萨的抢劫引起了西藏人的广泛的恶感。

赵尔丰在昌都维持着他的司令部，但是他收到中国发生革命的消息后，他就回到四川首府，留下他的付手指挥喀木的军队。第二年赵被正法了。

消息在西藏传播说达赖喇嘛就要回来了。这使得在卫藏的中国军队和平民处于经常不安状态。波密的噶南第巴公开起来反叛中国人。在罗长裿领导下的皇家军队从拉萨派到波密去镇压叛乱。由于山路崎岖道途遥远，中国军队在路上损失了很多人，结果也未能平息叛乱。

在大吉岭的一些达赖的年轻官员自告奋勇要回西藏去参加战斗。他们到后藏组织了起事。他们进攻日喀则和江孜的中国人，但受到巨大损失，结果还是退回大吉岭，有一个时期他们为老年官员所讥嘲。他们被召到伦钦霞扎面前，本来是准备挨批评，但霞扎却赞扬了他们的努力。他宣称他们都是英雄，而且说下一次战斗一定会取得成功。受到伦钦的信任和鼓励，这些年轻官员又回到西藏，他们组织了很好的游击战。最后把中国人赶出日喀则和江孜，以后这些年轻官员都当了军官。

达赖喇嘛从大吉岭挪到噶伦堡，他还是住在不丹家。在这里他向拉萨发去盖了印的命令给孜本诺尔布王甲池门和秘书长江巴丹达，他后来当了噶伦并担任东藏总督。孜本池门后来成为伦钦霞扎的助手参加了西姆拉会议，带着总司令的官爵（后来他得到噶伦的位置并继江巴丹达之后当了东藏总督）。

达赖喇嘛训令这两名官员秘密组织一个军政部准备军事行动。他还告诉他们如果需要请示可以直接在噶伦堡和他接触。这表示不让噶厦知道他们的计划，江巴丹达和池门和色拉寺的主要僧人进行了接触。这时中国军队在拉萨统治已经微弱。中国兵把他们的枪和弹药卖给西藏商人。江巴丹达和池门组织起自已的商人去买中国武器。并在暗中组织和召集藏军。

豪迈的和爱国的色拉寺僧人知道了这些准备工作，他们胆子大起来。敢公开来反抗中国人，这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怀疑。他们在拉萨召开会议讨论这种局势。他们抱怨没有从北京得到任何帮助，生活是越来越困难了。西藏政府已停止借贷，如对之施加压力，可能召致色拉寺僧人的攻击，因此他们决定冒险进攻色拉寺，尽管如此，他们对将要遇到的反抗和如何对付，毫无把握。

当池门和江巴丹达知道中国人要进攻色拉寺后，他们和喀木的八纳宿 Banagshal 部落联系，请他们来保卫色拉寺。1911年11月2日，中国人开始向寺院进攻。他们占据并烧毁了附近的民房，把寺院包围起来。原来投到寺院的三名中国官员现在对防守起了很大作用。其中之一，谢国梁，趁夜跑到中国防线后头散布谣言僧人从后面包抄过来了。这样就分散了中国人的注意力，色拉僧人则采取了攻势。喀木来的部落民战斗的非常英勇，使中国人毫无进展。战斗连续进行了九十六小时。

同时池门和江巴丹达在拉萨公开向中国人宣战。当这一消息传到色拉寺，中国军队立即停止战斗返回拉萨。拉萨被分成两部。北部由西藏人占领。南部由中国人占领。所有居民的门窗都用木板和沙袋堵起来，交通通道则把墙壁穿通。可以房连房地往来。当街修了工事，把两部分分割开来。

西藏人和中国人都挖地洞通到对方的地区在一些重要的据点下面放置火药进行爆炸。地洞都是弯曲的，以减少爆炸的冲击。为了吸引中国人来到布置好的爆炸点，西藏在这一地区进行佯攻。但由于西藏人屡次使用这种战术，中国人也就不再上钩了。爆炸就安排在已退出的地区。为了侦察挖地洞，平着地面埋下瓦罐，罐边涂上泥土，地下稍有振动，泥土即落入罐内。

很少有大规模的对阵，一般是隔着窗户互相谩骂，因为在分界线上经常发生狙击，因此站在窗口上是十分危险的。在进行了差不多一年的战斗以后，拉萨的约三分之一被摧毁了。池门本人臂部受伤，但他隐忍不说，继续执行任务。色拉寺僧人和八纳宿的康巴人参加了拉萨的战斗，多次袭击中国扎布基 Drapchi 的营房。许多人在进攻这个防守很好的堡垒时丧命。

中国在后藏和印度边境的哨所经常受到攻击并被西藏人俘虏，这些都是从大吉岭回来的。通往喀木和印度边境的道路都被阻断，逃走的中国人只能朝向拉萨在那里他们以为人多可以安全些。

在噶伦堡，达桑占都，这位在甲桑姆抗击中国兵的英雄被任为藏军总司令。1912年1月派到拉萨去和池门和江巴丹达设立的军事部门密切合作。中国军队面对严重的粮荒，他们可能很快要投降了，但是他们进入了友好的登吉林寺就能支持的更久些，这个寺院属于前摄政德莫的随从者。那里储存的给养足够六个月之需。这使拉萨又出现了一个民歌，意思是说虽然到了新的总司令，战争仍然延长下去。

达桑占都、孜本池门和江巴丹达召开了一个秘密的秘密会议。会上决定逮捕所有亲汉的西藏官员，以防再发生登吉林寺的事件。这一决议使所有噶厦成员都被捕。噶伦察绒，他的儿子和噶厦的秘书噶仲察霞巴 Tsashagpa ，由于和中国人有密切关系而被枪毙。另外

中国人任命的三位噶伦，丹新曲扎、然巴和耶通巴被关起来。一位秘书长彭若巴 Phunrabpa 一位财政官 门仲，和一位僧官罗桑多吉由于他们和登吉林寺的僧人友好被正法。在拉萨战斗爆发前，这个寺院拒绝了政府军队的保护，被正法的三个官员说他们可以保证防守。现在没有噶厦了，所有重要事务都由军事部和沓都处理，有时请示在印度的达赖喇嘛。

达赖在印度期中受到英国人的优待，印度和西藏的关系大大改善。由于他回藏的准备已经做好，达赖通过柏尔给总督写信，感谢英国政府在他居留印度的两年内给予的优待。他表明打算回到拉萨去。他把西藏的局势比作一个水库，需要经常注入，否则就会干涸。由于中国发生革命，在西藏的中国军队得不到补充，这个水库的水正在耗干。西藏人正以高昂的士气。达赖希望他们不久就可以把中国人赶走。但更重要的是西藏的未来。他提醒总督不要忘记中藏之间今后解决问题需要英国参与的请求。收转这封信的柏尔非常称赞它的内容。

在噶伦堡时大君卡齐乌金非常尊敬达赖，他就住在他家里。达赖为了表示感谢，给他和他的后裔以西藏"任细"（四品官）的头衔。

水鼠年藏历五月初十，达赖离开噶伦堡取道咱利拉向拉萨进发。在亚东，他在英国商务代办麦克唐纳家里住了一周。从这里他给东藏的各寺院和土司写信，鼓励他们反抗中国人，允许他们很快就要解放。他也写信给八纳宿的康巴部落民感谢他们在色拉寺和拉萨的勇敢行为。

达赖喇嘛在大吉岭时的一位秘书夏格林巴被任命为噶伦，代替察绒的缺。夏格林巴是一位爽直年老有名的诗人。他在大吉岭时写了非常动人的《忆拉萨》诗篇，回拉萨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两百名三大寺的僧人自告奋勇护卫达赖返回拉萨。他们由若各厦领导。同时有两个著名的康巴，芒康的尼玛甲波邦达昌和贡觉的卓巴

昌他们自动带着武装的康巴人来与达赖一行会合。他们日夜护卫着达赖喇嘛直到拉萨。

班禅喇嘛像是后悔他和中国人的亲近。和他的官员们从扎什伦布到热龙来欢迎达赖喇嘛。继续前进。达赖在羊卓雍湖的桑姆丁寺停留了一些时候。

在北京英国公使朱尔典会见了中国的新大总统袁世凯。抗议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行动和试图把西藏改为中国的一个省的计划。总统通过印度发了一封信给安班联豫。命令他返回中国。这封信还指示他让满洲将军钟颖在一个中国官员会议的帮助下继续执行任务。中国人都想回到内地去。但所有通道都在西藏人手中。

没有援军和给养。中国人在拉萨维持不了好久。他们通过尼泊尔代表和西藏的军事部联系投降。联豫和钟颖都给在桑姆丁的达赖喇嘛写信。要求投降时有达赖喇嘛的代表。达赖派伦钦江钦。色拉美察瓦池朱Sera mey Tsawa Tnitrul ，和孜仲丹津坚参到拉萨接受投降和主持谈判。

谈判在尼泊尔代表面前开始。中国人同意将所有武器弹药交出。他们要求允许经喀木回中国去。他们要求西藏政府提供回程的运输和给养。他们也要求对他们留下的财产给予补偿。由于在喀木仍然驻有中国军队。他们取道喀木回中国的要求被拒绝了。其它要求则加允可。中国军队允许经过印度返回中国。联豫和钟颖允许保留卅支枪作为个人护卫。那些和西藏妇女结婚的可以把妻子和儿女带走。如果他们愿意走的话。那些愿意留在西藏的也可以。但要作为西藏的属民。

下面是印度总督关于投降协议发来的一份电报。

1912年9月3日总督发（同样发北京）

外交秘。西藏。我的8月28日的电报。8月31日江孜商

务代办的电报。达赖喇嘛的机要顾问拉蒙堪布通知我8月12日的协议内容如下，

第一条，所有中国武器军火在双方代表和尼泊尔代表监督下加以储存。

第二条，在第一条的规定实现以后，中国的官员和士兵可以经由印度返回中国。赴印途中的粮食由西藏人民供应。

第三条，商人和其它自称为中国人的，可受到西藏人的保护，他们必须服从西藏法律。

第二节，据拉蒙堪布说，中国人迟迟不实行规定的条件。第一，他们要求在放下武器以前把投降了西藏人的王康泰交出来。西藏政府最后同意交出，由尼泊尔代表负责此人的安全。然后于8月23日中国人储存起八百四十支步枪，千门大炮，一百六十支叉子枪，九十支抬枪，九十个箱子，多数装有军火，他们不允许西藏当局检查这些箱子的内容，还拒绝交出手枪和子弹夹。还有联和钟都要求保留卅支步枪自卫。这也得到同意，但是怀疑他们保留的武器比提出的数字要多得多。因此对他离开的日期8月21和22日进行了讨论。中国人要求西藏拆除所有新修筑的工事，并且从扎布基营房运八百蒙（ Maund 系印度重量单位约重八十磅，译者注）粮食到联所居住的城南。

第三节，由于他们的拖延和阻挠，中国人在引起愤激，有些使西藏政府感到惊愕。

协议于水鼠年六月十三日（1912年8月12日）签字。它规定中国人于十五天内离开拉萨，但是他们拖延了七个月。达赖喇嘛留在桑姆丁寺和曲科儿羊孜 Chokhar gangtse 直到他们离开。当他在曲科儿羊孜时得到通知说，中国大总统袁世凯已恢复了他的封

号。柏尔和达赖喇嘛在印度时有密切联系。他写道：

> 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打电报给他（达赖喇嘛）对中国军队的过火行为表示歉意，并恢复达赖喇嘛原先的品级。达赖回答说他不向中国政府要任何品级，他是要在西藏行使世俗和宗教的统治。这样这位神王就清楚地宣布了西藏的独立。

中国人分三批离去。第一批离开后，后面的两批就在他们的登吉林寺基地打起来。西藏人把他们分开，切断粮食供应，置他们于饥饿状态。最后他们又被迫投降了。1913年1月6日钟颖和最后一批中国军队被迫走上了赴印度的路程。一些登吉林寺的喇嘛害怕惩罚，化装成中国兵陪他们到了印度。

西藏政府派一名代表伴送中国人到咱利拉。那些不愿意回中国去的就定居在印度的噶伦堡，大吉岭和加尔各答，还有一些留在锡金。他们的后裔至今仍然居住在这些地方。

在水鼠年十二月十六日（1913年1月）达赖喇嘛又在庄严隆重的庆祝中回到拉萨。

十五、更多的西藏独立的证据

由于达赖喇嘛从大吉岭不断的努力和西藏人民坚持斗争的结果，每一个怀有敌意的中国人都被赶出中部西藏，还有一部分留在喀木。但是西藏人，在达赖喇嘛回到他的首都后，也在准备赶走他们。

达赖回拉萨后不久，就向全西藏的官员和属民发表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和早先拒绝接受袁世凯的品级，在西藏被认为是正式宣布了

独立。这个公告的日期是水牛年正月初八日(1913年)。

我，达赖喇嘛，遍知一切佛法，这一称号是由光荣的国土印度所生佛陀给予的，对你们讲话如下：

我是对所有阶级的西藏人说话。从光荣国土印度所生佛陀曾予言观音的化身历代相传，从早期的法王直到今天，都要照顾西藏的幸福。

在蒙古成吉思汗和俺答汗时代，汉人的明朝和满洲人的清朝，西藏和中国在施主和僧侣的关系上都合作得很好。几年前，四川和云南的中国当局努力殖民化我们的地方，他们借口保卫商埠，派了大批军队来到中部西藏。因此我和我的大臣们离开拉萨，到了印藏边界，希望用电报和满洲皇帝澄清西藏与中国的关系是施主与僧侣的关系，并不是相互从属的关系。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越过边界，因为中国军队的意图是不论死的活的都要把我拿住。

在我到达印度后，我给皇帝发了好几封电报，但是他对我要求的答覆，却让北京的贪官们给拖延了。这时候满洲帝国垮台了。西藏人受到鼓午，起来把中藏的中国人赶走。我也安全地回到我合法的神圣的国家。我现在正准备把剩下的东部西藏多喀木的中国兵赶走。现在中国人想把西藏殖民化的意图正像天空的彩虹一样的消失了。我们再度得到了一个快乐和平的时期。我现在给你们所有的人规定如下的任务，你们必须认真执行毋怠。

(1)在这个世界的和平和快乐，只能在保存佛教信仰中维持。因此保存所有西藏的佛教机构是十分必要的，如拉萨的大昭寺和小昭寺，山南的桑鸢寺和昌诸寺和三大寺等。

(2)西藏的各个教派应当以清楚和纯粹的方式加以保存。佛法应当用适当方法传授、学习和修炼。除特殊人物之外，寺院

行政者禁止经商、放借贷、买卖任何牲畜，或占据别人的属民。

（3）西藏政府的文武官员，在收税时或和他们的属民打交道时，应该以公正诚实的判断执行自己的任务，这样既对政府有利，也不损害属民的利益。驻在西部西藏阿里三围和东部西藏多喀木的中央政府官员，迫使属民高价购买他们的商品和超过政府所允许限度滥加运输负担，因细故将属民的房屋、财产和土地没收。更有甚者以砍掉肢体来处罚属民。今后这种残酷刑罚不准再执行。

（4）西藏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但是没有像别的国家一样科学进步。我们是一个小的、宗教的、独立的国家，为了赶上世界的其它部分，我们必须保卫我们的国家。鉴于过去外国的入侵，我们的人民还会遇到某些困难，这必须加以克服，为了保证和维持我们国家的独立，每个人都必须自动努力工作。住在边境附近的属民提高警惕，对任何可疑的发现要用专差通知政府。我们的属民一定不要为了小事件制造两国之间的大冲突。

（5）西藏虽然人口稀少，是一个广大的国家。一些地方官和土地占有者阻止人民开垦荒地，他们自己又不利用，有这种思想的人就是我们国家和进步的敌人。从今起谁也不许阻止人们种植不管是什么样的荒地。三年以内不准收租。过了三年，种植者每年要向政府和地主交租。按地租的份额，土地将属于种植者。

你们对政府和对人民的责任就是执行和完成我这里所说的。这个文件必须在西藏的每一个地区贴出并加以宣布，每个地区的办公室都要保留一份存入档案。

发自布达拉宫（达赖喇嘛盖印）

在达赖喇嘛宣布西藏独立前一个月，在水鼠年十二月初四（1913年1月）西藏和蒙古签订了一个条约。这条约是在库伦签字的。在这

个条约里双方都宣布他们不受满洲统治和中国脱离。作为主权国家。他们同意加強已经存在的友谊和宗教的联系。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主宰。同意组织一个独立的蒙古国。哲布尊丹巴则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在达赖回到拉萨后，摄政策墨林辞去职务，并受到 Sha-Cin Til-gig- Che 称号的嘉赏，表扬他在达赖逃亡期中胜任的工作。江巴丹达被任为噶伦，池门被任为付总司令带台吉的头衔。达桑占都被任为正总司令带扎萨克头衔。他和已故察绒的女儿结了婚，继承了家名。这样他就占有了察绒的庄园、家族的权力和继承权。达木的八个牧场给了色拉寺，报酬他们忠诚的服役。甘丹寺得到错那的一半。所有为达赖喇嘛的重返出了力的都受到官爵和庄园的赏赐。

登吉林寺被拆毁。有罪的喇嘛都被放逐，其余的分散到各寺。所有曾和汉人合作的都受到惩罚。另外那些世代居住在西藏的中国人和没有对西藏人进行反抗的，都允许继续留在西藏。

达赖十三世是第一个开始在西藏发行纸币的。纸币的额面有五、十、十五、二十五和五十个章噶。所用的纸是手工制造的，花纹是传统的。过了几年派了两个学员到加尔各答考察印度纸币的印刷。他们回到西藏后把最高额面提高到一百两。邮票也在这时开始使用。稍后又铸造了金币和银币。

达赖喇嘛和英国政府的亲密关系，导致了后者为西藏培养了四名学生。他们被送到英国去接受西方的教育。钦若宫桑门仲 Khenrab Kunzang Mong-dron 主修开矿，但回到西藏后却没有机会使用他的专长。相反他当了达赖的个人翻译，同时担任拉萨警察总监。第二名是错南宫保果喀瓦 Sonam Gompo Gokharwa 他是研究军事科学的，但回西藏后不久就死了。第三名叫日增多吉任

岗 Rigzin Dorje Ringong 他学电工，回来后使拉萨城和达赖的夏宫电气化。他也兼任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的译员。第四名叫王堆诺尔布基浦 Wangdu Nobu Kyibuk， 他是专学测量和电报。他发展了西藏的电报网，同时兼任拉萨的县长。一个时期在外交局工作。这几个学生是由孜本龙厦陪送到英国去的。龙厦是一位聪敏，但是反覆无常和野心勃勃的人。他在英国学了很多东西。他回到西藏后当了财政秘书和军政部的首脑。在达赖十三世于1933年去世后，他试图在西藏发动革命，但失败了。

1913年，一名退休的日本军事专家 Yasujiro yajima，访问拉萨，有一部分藏军交由他训练，他用日本战术训练藏军。他在西藏六年中接受了西藏的风俗习惯，但是他为达赖的卫队所组织的司令部，却完全是日本的传统方式。另一名日本人叫 Togan Tada，他能说藏话，于1913年来到西藏，在色拉寺当了僧人，住了十一年。他精通佛教哲学（1961年他接了一些西藏人到日本去研究佛学，他现在住在东京）第三名日本人是 Bunkyo Aoki ，他于1912年来到西藏，在哲蚌寺住了一年，然后又到拉萨来，在彭康家住了一年半。

达赖喇嘛决心把敌对的中国人从喀木清除出去。他加速军队的补充，从海外进口自已不能制造的装备，粮饷都有了增加。第一次派一位议会大臣（噶伦）到喀木当总督，他具有民政和军事的全权。噶伦江巴丹达被派充这个职务。他带去八个军官和一大批民政和军事人员。他被授予全权指派他所属地区的地方官员。

在对中国人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达赖喇嘛继续催促英国安排三方的会谈。中国人不愿意在他们和西藏的事务中有英国人参与，但他们想不出办法来。他们眼睁睁看到蒙古转入俄国人的控制下，发愁西

藏也将沦入英国势力之下。中国人愿意在北京或者伦敦开会。而且不同意给予西藏代表以中英两方代表相同的地位。他们提出这些反对意见目的是拖延时间。但是在喀木出现了江巴丹达率领的藏军。这就迫使他们从新考虑自已的位置。

英国代办通知中国人，三方代表都以相同身份参加会谈。中国派出了他们的全权代表陈贻范参加三方的会议。中国政府实际上给了西藏代表以平等的地位。承认西藏有签订条约的权力。

达赖喇嘛发给西藏全权代表的证书是这样写的："我这里授权西津霞扎班觉多吉 Sridzim Shatra Poljoz Dorje 决定有关西藏福利的一切事情，我授权他在所有这些文件上盖章"。

全权代表伦钦霞扎和助手台吉池门还有寺院代表到达大吉岭，在这里他们收到麦克马洪爵士的电报。他是印度外交部秘书和英国参加会议的全权代表，请他们立即到西姆拉去。一位联络官派来陪伴他们。他们到达西姆拉时，总督的秘书和柏尔在车站迎接他们。伦钦霞扎相会了印度总督和麦克马洪。他们受到麦克马洪和总督秘书的回访。总督设宴招待西藏和中国的代表，他发表了讲话表示希望会议的结果能使所有各方都满意。

在予备会议上英方由麦克马洪代表，柏尔和罗斯 Rose 协助；中国方面是陈贻范和一名助手，西藏方面是伦钦霞扎，由台吉池门协助。互相交换审查了全权证书，西藏代表被要求于次日提出意见书。

伦钦霞扎告知柏尔达赖喇嘛要求把下列条件列入协议，（1）西藏要自已管理内部事务；（2）对外事务，有关对英的重要问题；（3）不许中国安班、官员或军队驻在西藏，只允许商人居留；（4）西藏领土包括东部地区直到打箭炉，其中一些地区已在中国控制下。

西藏人拿出证据表明西藏从古到今都是独立国，达赖五世和满洲

皇帝的关系纯粹是宗教性质的。但是中国人把它解释为政治上的统一。西藏官员表明由于赵尔丰借口保护商埠派兵进入西藏发生了战争，中国人被赶走。西藏人要求确认他们的独立和承认达赖喇嘛是西藏政教首脑。他们要求1906年和1908年分别在北京和加尔各答订的条约宣告无效。他们要求对中国的边界包括所有西藏人居住的地区向东北直到青海，向东直到打箭炉。他们要求和内蒙、中国的佛教寺院继续保持宗教关系。最后他们要求中国人为在拉萨造成的破坏和赵尔丰军队在喀木造成的损失赔偿。

中国人说，成吉思汗就征服了西藏。他们说达赖五世的称号是由满洲皇帝给的。在准噶尔蒙古和后来廓尔喀的入侵西藏，中国军队曾来协助西藏。他们说在康熙皇帝时，西藏人曾要求在拉萨设置安班指导西藏政府和驻扎中国军队保卫地方。他们说赵尔丰来东部西藏是调查巴塘安班凤全被杀的案件，部队派到拉萨是根据1908年商务条例，执行保护商埠的任务。他们说由于达赖不听安班裕刚的劝告，而听了多尔吉叶夫的话，才使英国人于1904年来到拉萨。由于那次远征的结果，中国代西藏政府赔偿了二百五十万卢比的赔款（十六万六千英磅）；因此完全可以说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坚持有权在西藏设置安班，驻扎二千六百名军队，控制对外和地方的军事事务。一千名军队和安班在一起，其余的由他决定在那里驻扎。他们追求的目的是恢复到1906年英中条约中所描绘的西藏的政治地位。最后他们坚持中国与西藏的边界应当在江达而不是离拉萨更远。

中国的说法是口头的，对他们的许多说法都没有历史根据。他们拿不出证明在东部西藏由中国管理的纪录。西藏人参加西姆拉会议做了很好的准备。他们拿出广泛的文献纪录支持他们的说法。他们拿出五十六卷政府文件，包括税收记录，房屋、官员和争议地区头人的清

册，效忠文书等等，麦克马洪签字证明它们的内容。

西藏人反驳了中国人的说法。关于成吉思汗征服西藏，西藏代表说汗是个蒙古人而不是汉人，还指出那时候蒙古和中国是分开的，还有汗从来没有接手西藏的实际行政。关于满洲皇帝封达赖五世，那不过是达赖五世给予皇帝尊称的一种交换。关于准噶尔蒙古，他们是由西藏人赶走的。在对廓尔喀战争中满洲皇帝是派了皇家军队来帮助，那是作为达赖喇嘛的盟国而来的，并不是作为西藏的主权国。没有证据说西藏人在康熙时曾请求派驻军队和安班在西藏。关于中国代付1904年英国远征军的赔款，那是因为英国政府减少了赔款额，中国人很快就支付了，这并不是西藏人要求这么办的。为了更进一步反驳关于赔款问题，夏扎回忆起，有一个蒙古贵族曾代西藏人偿付尼泊尔人的赔款，当时拉萨的尼泊尔商店被抢劫，这并不能使蒙古对西藏有主权。

为了解决中国代表和西藏代表的难以和解的立场，麦克马洪于1914年2月17日建议把争议地区划为内外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西藏人是不愿接受任何方式的中国统治，中国人则不愿接受提出来的边界。但是为了解决争议，西藏人还是勉強地接受了麦克马洪的建议。

在建议的条约中，英国和中国都承认西藏是在中国宗主权之下，中国将承认外藏自治，同意不干予这一地区的行政和关于达赖喇嘛的选立。中国允诺不把西藏改为中国的一个省，英国也不进行吞併。中国将不派军队到外藏或试图设置官员，或在那里建立殖民地。所有仍然在西藏的中国军队和官员应在条约签字后三个月内撤走。中国人将允许派一名高级官员随带不超过三百人的卫队驻在拉萨。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同意不作关于西藏的谈判，不论是在他们之间还是对其它任

何外国。

条约的第九条叙述中藏边界和其它边界时这样说，"为标明目前条约的西藏边界，和内外藏的界线将在附图上以红线和兰线划出。

在条约主体之后的附带换文中，西藏仍被提为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让步是西藏人坚决反对的，所以在主文中没有写上。在附文中的条款还说外藏不在中国议会中有代表和限定英国商务代办的卫队为中国专员卫队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五。

虽然陈贻范在西姆拉草约上签了字，但是中国政府不让他在最后文件上签字。继续不断的建议和反建议拖延不决，使英国人感到很厌烦。最后于1914年6月25日给中国政府发去如下的照会，"现在的情况已使陛下的政府无可再忍了，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通知中国政府，除非在月底前签字，陛下的政府将单独与西藏签字"。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然拒绝。

麦克马洪和伦钦夏扎签署了最后的文件，包括下面的说明，

"大英国和西藏的全权代表接受下面的条约。英国政府和西藏政府将承认和遵守已经签订的条约。条约所赋予中的权利在中国政府批准条约以前，英国和西藏都不予承认。这个条约用英文藏文一式两份于木虎年五月初十，公历1914年7月3日盖章签字。

英国政府和西藏政府都批准了条约，但中国政府拒绝批准。英国和西藏对条约的批准实际上取消了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重申了西藏的独立和签订条约的权利。接着英国和西藏的全权代表又签订了一个新的商务条例，内容包括十一款，代替了1893年和1908年的条例，这些已在西姆拉条约第七条中加以撤销。

不丹以东的藏印边界，通常称为麦克马洪线的是在西姆拉条约中

同意了的。在1914年3月麦克马洪和伦钦霞扎曾谈判共同边界，并在地图上标线。地图交给了伦钦霞扎由西藏政府认可。下面就是双方全权代表的换文。

致伦钦霞扎。西藏全权代表。2月份你接受了印藏边界从伊苏若其山口 Lsu Razi Pass 到不丹边界如图所标明（两张）这里附有两份请交由你的政府认可。并附有下述条件，（a）西藏所有的私人庄园在英国一侧的不加扰动。（b）如神圣地方错噶波 Tso Karpo 和扎日沙巴 Tsari Sarpa 如果是在英国边界一侧一天路以内的，它们将包括在西藏的土地内。边界可作相应的修改。我了解你的政府现在已经同意了关于边界的上述两个条件。

你愿意知道西藏政府在错那宗、工布、和喀木从门巴人、珞巴人现在因卖东西应收的某些款项，仍然可以继续收。柏尔先生通知你这些细节问题可以在友好的气氛中解决。你已经答应提供更多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印藏边界的最后解决有助于防止未来的纠纷，因此它对双方政府都是有利的。

A. H.Momahon 麦克马洪，英国全权代表

1914年3月24日于德里

伦钦霞扎致麦克马洪一信承认所定边界，

致麦克马洪爵士参加中藏会谈的英国全权代表。为了怕将来发生磨擦，除非是把印度和西藏的边界划定。我送去的地图是你于2月份送来由我请拉萨西藏政府审批。我已从拉萨得到指示，同意你签字的两份图上的红线作为边界，并适应于你来信中所提的两个条件。这封信的日期是3月24日，由柏尔送到我手中。

现在我已在这两份图上签字盖章。我留下一份把另一份退还给你。木虎年正月二十九日（1914年3月24日）。

伦钦霞扎。西藏全权代表（印）

在8月4日，西姆拉条约签字刚满一个月时，英国就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伦钦学康受达赖喇嘛指示送了一份照会给锡金的政治官，表示支持英国对德的战争。下面是伦钦学康致锡金政治官古尔德 Gould 的信。

亲爱的古尔德先生，我们从近来的报纸上和伦钦霞扎的信上得悉欧洲的局势很不稳定，德国已经向英国和法国宣战。达赖喇嘛阁下指示我用书面告诉你，虽然中国人在喀木（东部西藏）不同的地方对我们进行战争，西藏仍愿意派一千名西藏军到印度去，支持你们的帝国，因为我们认识到西藏的存在有赖于大英帝国继续存在。附哈达，伦钦学康 木虎年七月初三。

由于信是由伦钦霞扎转交的，他一定给古尔德准备了一份英译本，他自已把原件保存下来。

古尔德的复信是交给伦钦霞扎的，他又把信转交伦钦学康、信文如下：

亲爱的伦钦霞扎，谢谢你七月十五日给我的信。我收到后立即将内容通知我们在印度的政府，我已得到回答说英国政府深深的感动并感激达赖喇嘛阁下，要送一千名藏兵来支持英国政府。请通知达赖阁下英国政府将在需要时寻求西藏的支持。附哈达

古尔德，锡金政治官7月27日。

达赖喇嘛认真对待锡金政治官来信的内容，尽管喀木的局势占重要地位，仍然保留了一千名精锐的藏军，随时准备支援英国，这支军队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木虎年九月十七日（1914年），伦钦霞扎和他的代表团回到拉萨。在向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作了全面的报告后，他赞扬了他的助手池门，赞扬他早先在拉萨军政部的功绩，特别是他在西姆拉会议中的优秀的工作，他对会议进程作了详细记录。为此池门被任为噶伦。从结婚后改名为察绒的达桑占都也被任为噶伦，继续担任藏军总司令。

在西藏甲颇日山有一所土医医学院，但是没有关于历算的公共学校。达赖喇嘛设立了一所为研究医药和历算的公共学校，地址在登吉林寺的废墟上。政府负担学习人员的开支，毕业后他们就被派到各地去，免费为穷人治病。（纯属造谣。译者注）

英国军队依照商务条例的规定，驻军在江孜保护商埠。达赖喇嘛派扎萨东巴 Dompa 和台吉多仁 Doring 和一些军队去江孜学习英国人的军事制度，近代的战术训练，这些西藏人是不懂的，从此时起被吸收为藏军训练的一部分。两年后，中国军队和蒙古军队的军事训练也被包括在藏军的训练中。一位蒙古官员登白坚参，他曾在俄国受训，请他训练一个团，他用俄国的军事典范练兵，一位日本官员 Yasujiro yajima 负责训练第四团。

这四个团用外国系统加以训练，最后都开到拉萨，用了四天时间让他们列队行进、操演战术和从事各种比赛，由达赖喇嘛、政府官员和群众检阅。在这次表演后，决定西藏军队按英国系统训练。每一个团都发了一面国旗，使用番号来区别各个团。

西藏政府派桑珠颇章、丁甲基浦 Dingja Kyibuk 诺尔介那巴 Norgay Nangpa 和一些挑选的兵士到奎塔 Quetta 和西弄 Shillong 去受训，学机关枪和炮兵。西藏军队在一个时期里增加了他们对中国人的优越性，西藏的官兵切望接受特别训练，以为后来向西藏服务。

十六、西藏人和中国人在喀木的冲突

1917年噶伦江巴丹达被派率军到喀木。他在洛隆宗成立了临时司令部，对中国人占据的地区，由司令部派出两名军官带着军队分三路去赶走中国人。经过好几个月的激烈战斗，西藏军队收复了绒波 Rongpo 甲若塘 Gyaralthang ，琼波 Khyangpo ，色扎 SerTsa ，琼波登城 Khyungpo Tengcheng，类乌齐 Riwoche 甲桑卡 Chaksam Kha ，托克朱古宫 Thok Drugugon ，察瓦八宿 Tsawa Pakshod ，拉贡年达 Lagon Nyenda 和拉姆达 Lamda 。

中国人的坚固据点是在昌都，这里是喀木的首府，他们的大部分军队驻在这里。西藏人先收复了周围的大部分地区，然后向昌都合围，这是一个防守很好的地区，战斗进行了好几个月。在当地居民的合作下，这些人在中国人下面吃了苦头，西藏人逐渐的完全切断了昌都的给养，中国人员终被迫投降。

没有把中国俘虏从喀木逐出边境外，而是把他们解送到印度边境，让他们从那里自已回家去。中国指挥官彭日升将军感到投降是莫大的耻辱，他拒绝回中国去。他被允许给予一定的津贴，安置在山南的多瓦宗 Dowa Dzong 。尽管彭将军是以顽固著名的，他对昌都大寺、乍丫和延多 Yemdo 寺庙的毁坏负责，西藏人仍然这样安置了他。彭是继赵尔丰之后的西藏人的主要敌人。

噶拉喇嘛 Garalama 一位西藏的第五纵队，从俘虏的西藏人中被逮捕。他被放逐到杂隅 Gayul 。但是几年后他从那里逃出来跑到中国去了，在一次内战中死去。在Thok Drugugon 俘虏的中国人，西藏人认出了曾经追达赖喇嘛的中国官员吴某，吴被判

在僧格宗终身监禁。曾经帮助过奥某的汉藏混血儿甲果董 Gyal godong 在登城战斗中被杀死。他的尸体被认出来，因为他有十一个指头，他的头和手都被砍下来，装在一个盒子里送到拉萨。

（我在幼年时曾看见过中国俘虏的到达，个个都不成人形，当砍下来的人头和手被带过大街时人们都用手把鼻子堵起来）。

西藏人在战斗中也损失了不少人。有三名最好的军官——代本普龙巴，代本晋巴、和代本泰林在战斗中死去。噶伦江巴丹达使昌都成为喀木西藏总督的永久住地。仍然住在中国占领区的西藏人在西藏大军还未到达时就打起来了。由于他们装备很坏受到惨重的损失。由于在连续战斗中精疲力竭，江巴丹达只得给他的军队以在支援汉占区的藏人以前稍事休息。在休整期中，他进行了提升、奖赏和处罚，并对已收复的地区委派地方官员。

最后他派部队到芒康、乍丫、三岩、贡觉和德格，协助那里西藏人的战斗，这些地方也得到解放。在东南部，藏军一直进入中国的云南省。收复德格的藏军正接近打箭炉，当地人民惊惶万状，于是中国人请求英国出来调停商谈停火。

英国领事台克满，代表英国政府商谈停战。中国将军刘赞廷从巴塘到昌都去见噶伦江巴丹达。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９日达成了一个三方的协议，由台克满、刘赞廷和江巴丹达签字。争议的地区由藏中两方平分。边界大致相当于扬子江上游，由中国保持除德格白玉以外的江东地区。西藏人仍然控制转入中国地区的所有寺院。

在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１０日又起草了一个补充协议，要求撤退军队和中藏之间停止敌对活动。所有这些必须于１０月底完成。这一协议由台克满作证人由韩广春和明正土司代表中方签字，由堪穷罗桑顿珠，代本琼让和代本德通代表藏方。

从协议的文字和导致这一协议的事件都表明西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強国。协议中有关的三方政府和事实上中国人请求英国调停都是以证明西藏是独立的。

当拉萨登吉林寺因亲汉活动被没收后，在抄获的文件中发现有哲蚌寺罗色林扎仓的三名为首的喇嘛和他们有勾结。这三名喇嘛被“剥黄”关在拉萨。罗色林扎仓的三千多僧人在达赖喇嘛夏宫前示威要求释放和恢复他们的位置。达赖喇嘛拒绝释放他们，理由是他们曾经从事卖国的活动。另外，罗色林的僧人不是通过正常渠道提出请求。示威的组织者被逮捕并判刑。

在伦钦江钦死后不几年，三位伦钦中的又一位也去世了，他是很早由达赖喇嘛任命的。伦钦霞扎，他在西姆拉为西藏立了功，于1923年去世。伦钦霞扎作为西藏政府大臣的成就将被人们常记不忘。柏尔曾和他在西姆拉一起工作写道，“他对人们的认识和对政治事务的敏捷，使与会的人惊叹，他的朴素庄严和动人的举止，使在西姆拉和德里遇到他的人都是喜欢他”。现在剩下的只有年老的伦钦学康。在他的晚年他奉命训练朗敦，他是达赖喇嘛的一个年青的侄子，他是被培养担任伦钦的职位。

以前大寺院和贵族占有大量庄园但向政府交税很少。但是政府必须负担相当的开支去维持一支常备军，于是决定成立一个机构来修改税收制度和制订收赋办法。赋税是按庄园大小的比例规定的。班禅喇嘛的扎什伦布寺占有广大的庄园，现在也得缴纳一定数量的赋税。这造成了班禅官员的不满。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之间的个人关系倒是很融洽的。但班禅的官员意识到他们和中国人的合作，感觉到新的赋税是对他们的一种处罚。他们怕还会有别的报复行动，他们和四十岁的班禅曲季尼玛，在水猪年十一月十五日（1923年）取道南如

Namru 和西宁逃往中国去了。

日喀则的官员听到班禅突然离去，立即派人到江孜找英国商务代办打电报通知拉萨。西藏政府派出一个代表团去阻止他，他们到达南如，但没有能赶上班禅一行。一位拉萨的代表被派到扎什伦布寺去代替班禅管理寺院的行政。

班禅于1925年2月到达北京，他受到热烈欢迎。这时国民党在中国掌了权，班禅的官员利用班禅影响国民党政府，使他们反对拉萨政权。班禅喇嘛官员的地位成了问题，由于那时中国的局势很不稳定，而达赖十三世的威望和能力又很大，国民党政府无法帮助班禅解决他和拉萨政府的分歧。班禅在中国住下去。

在西藏，达赖喇嘛认识到英国的教育对人民的重要性。他请求英国政府协助，在江孜办了一所学校，由路得劳干 F.Ludlow 管理。三年后，由于寺院集团的反对，于1926年学校就停办了。寺院感到学校办下去会危害宗教。

在中国人占领拉萨后，警察制度就失效了。达赖喇嘛把大吉岭的警察总监锁南拉登喇 Sonam Laden. La 请来，在拉萨成立了一个警察局。拉登喇是藏人的血统，训练了几百名警察，并被任命为拉萨警察总监，得到扎萨的头衔。他由英国训练的采矿工程师门仲清饶宫桑 Mondrong Khenvab Kunzag 加以协助。

到1920年西藏军队发展得很強大，那些过去忠心耿耿为国家服务的老军官仍然继续在喀木战斗。拉萨的新军官都是年轻人，其中一些是在江孜和印度训练的，他们很想表现一下，在拉萨有谣言说文武官员之间意见不一致。这个谣言在一次春都的会上成为现实，当时正讨论关于噶厦成员和军官们的庄园的税收问题。年青军官以噶伦察绒为首，中断了会议要求军队在春都中有代表。这是从来都没听到过

的事情。当时春都的首领之一龙霞对察绒的不断增长的权力产生忌妒，鼓励僧人起来大闹。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都由僧人层层保卫起来，以防军事占领。但是军官们没有予料到有这样的反应，匆匆把武器交给了他们的部队。

达赖喇嘛直接干予这次争议，在经过调查以后，认为军队中断了春都的会议是非法的。两名军官代本霞苏 Shasur 代本崔科 Tsogo 和一名噶伦凯美（也称为古桑子）被免职。察绒被派到亚东去视察那里叫作诺尔布错基 Nazbu Tsokyil 的造币厂，过后他又访问了印度和尼泊尔。当他回拉萨途中到达相距一天路的地方，他得到命令解除了他军队总司令的职位。但以后仍然担任了一个时期的噶伦。

扎萨顿巴 Dumpo 被派为总司令以代替察绒。顿巴是一位又懒又不实际的人。这些品质是受到政治野心很大的龙霞的欢迎的，他利用他们使自已成为国防秘书。1922年噶伦江巴丹达去世了，噶伦池门被派去接任昌都总督的位置。

一名叫作甲波的西藏人娶了一位尼泊尔籍的协尔巴女人，在拉萨开了一家商店，名称就叫协尔巴甲波。1922年他没有执照就出售烟酒，拉萨县长决定逮捕他。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躲到尼泊尔代表的住处。尼泊尔官员认为甲波是个廓尔喀人，拒绝把他交给西藏当局。拉萨警察就冲入尼泊尔代表处逮捕了甲波。由于1856年条约给予尼泊尔人以治外法权，这一事件几乎导致了尼藏战争。英国人出来干予，消除了误会。龙霞对这一事件是负主要责任的，因为他坚持要逮捕甲波，不顾他已经藏到尼泊尔代表处。

就在这时候，英国政府要求准许由亚东到江孜筑一条公路以便利商务代办的运输。一条临时的路修通了，在台站附近还建立了油站。三部车子运行来回跑了两趟，但是当地人民靠驮运为生的坚决反对汽

车运输，结果公路计划只好放弃。

波密地区的统治者早先对西藏政府缴纳一小部税收，曾经成功地抗拒了中国人的加税甚至成功地反击了中国人的入侵。他们受到成功的鼓午，后来拒绝向西藏政府缴纳任何负担，而且不让西藏官员进入他们的地区。噶伦池门，当时是喀木总督，开始想用和平方式和波密统治者噶南第巴商谈，他派如扎堪穹 Ru Tsa khen dung 为代表。但是由于如扎堪穹的压榨，波密人不听他的命令，并杀死一名随从和十五名藏兵。

1926年池门完成了他昌都总督三年的任期。由噶伦门卡多巴 Menkhab Todpo 接替他。这位新总督派了一团兵由代本达那 Takna 率领到波密去。这位军官深入这一地区，但在不同地区遭到伏击被杀死，军队也损失了很多人。后来更多的军队派到波密去，在联合进攻下波密人失败了。噶南第巴和他的一些随从逃到阿萨密去避难，五年后他死在那里。1931年两位地方官和一小部分军队驻扎在波密。

习惯上蒙古僧人和香客进入西藏是没有限制的。1927年一些布里雅特蒙古僧人由一位叫桑布的率领，取道黑河来到拉萨，目的是要和西藏政府发展友好关系和作苏维埃的宣传。当他们在拉萨时，达赖喇嘛接见了他们，但是由于信守西姆拉条约的规定，禁止西藏和外国谈判，这些亲苏的布里雅特蒙古人，只能无结果而去。一年后，另一个苏维埃蒙古代表团到达拉萨，由一名苏联军官率领，在拉萨住了几个月，除蒙达赖一见之外，也不得要领而去。

中国政府几次试图送一名代表到西藏来，但是对所有要来西藏的中国人都一律拒绝入境。1927年北京雍和宫的西藏堪布贡觉仲尼回到西藏，蒋介石总统交给他一封信带交达赖喇嘛，信中允许给达赖

喇嘛以全面支持。如果同意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也许诺让班禅回到西藏去并不附带任何条件。由于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向他写信。达赖喇嘛欢迎这封信和带信的人。达赖喇嘛把回信交给这位堪布。信中表示欢迎建立友好关系。但避免提西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1930年刘曼卿女士被允许进入拉萨作非正式访问。她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西藏人。她也带来了蒋介石的信。她作了几次非正式的接触建议和中国建立密切联系。但她没有得到西藏政府的鼓励。

这时。噶伦察绒。孜本龙霞和古恰宫比拉 Kuchar KunpheLa 都是达赖喇嘛亲信的人。在西藏很有势力。但他们相互之间非常妒忌。孜本龙霞在当了部队司令官后。发现遗失了相当一部分军火。他的前任察绒说不出原故来。1925年察绒被免去噶厦的职务只保留龙扎萨的头衔。这主要是为了他过去的功绩。直到那时。造币厂、纸币厂、和军火厂都由不同部门管理。达赖喇嘛把它们合为一个机构。称为扎布基来孔 Drapche 察绒和宫比拉被任为首脑。这个新部门改善了纸币的质量。进口了军火。在拉萨实现了电气化。这是利用了在英国受过教育的任岗完成的。

真正有权势的人物是宫比拉，就是噶厦的成员也都怕他。他是除达赖之外唯一有一部私人汽车的。那是一部奥斯汀 A—40，当他开车来拉萨时，真是惊天动地。到达赖十三世统治的末年（1933年）宫比拉建立了一个新的团叫作仲扎马喀 Drong Drak 包括一千名贵族的子弟。这个团得到特别的制服、粮饷、住房和其它便利，它的总部就在宫比拉办公室的附近。他的意图是使这个团帮助他掌握权力。

1920—21年柏尔访问拉萨时，被给予名誉伦钦的称号。后来历任锡金政治官贝利 Bailey 、韦尔 g.Weir 威廉逊

F.Williamson　都被称作哲季伦钦 Dreche Lonchen（锡金的大臣或首相）。他们每两年访问拉萨一次。这些访问是为改善英国和西藏的关系以及调解与中国的纠纷，当时在喀木的冲突仍然在进行。

第一个访问拉萨的美国人是苏丹卡亭 Suydam Cutting 他在1930、1935和1937年三次入藏。有一次访问是由他的妻子陪伴的，她是第一个高加索种女人被政府正式请到西藏。卡亭一家和达赖十三世建立了坚強的友谊并经常交换通讯。达赖送了他一对狮子狗，这是西藏的一个特殊品种。卡亭还给达赖弄了一张胡佛总统签名的像片。达赖怀着对美国的友好情谊接受了它。下面是达赖写的一封信。

> 我诚挚地希望，我们这个纯宗教的王国，从你们的国务院在能力所及的地方，给予我们国际协助，为得是使佛教不断兴旺和我们可以享受我们真正的权力，超乎一切的是增加人民的繁荣。

1931年，金沙江东大金寺和白利寺互相攻打起来。四川省主席刘文辉支持白利寺，派军队进行协助。住在德格的西藏团协助大金寺，把中国人从白利赶出去，差不多进到甘孜地区，中国政府派唐柯三和刘赞廷来安排停火。如果西藏人这时同意停战，可以获得相当多的土地。但是他们坚信能取下打箭炉，拒绝和中国人谈判。

达赖喇嘛正试图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达成一种解决，但这是无效的，因为南京那时管不了四川省。刘文辉在作了广泛的准备以后，在下半年开始反攻，把西藏人赶了回去，达赖喇嘛努力想通过英国取得解决，也无结果。

噶伦门卡多巴完成了三年的任期，由噶伦阿沛接替他的职位。援军和武器从拉萨运出。但是在1932年被赶过了金沙江的西藏人正

准备谈判。西藏军官与刘文辉的官员之间成立了临时的岗拖柱卡 Kamthok Drukha （汉文资料上称岗拖协定。译者注）停火协定。西藏、英国和中国政府都不知道这次停火。负责这次停火的军官后来被达赖免职。

就在这时西宁的马步芳将军，他是一位穆斯林军阀，他不受中国政府的控制，他帮助一个寺院去反对另一个。西藏军队被派去干予。当他们前进到结古多（即玉树。译者注）时，他们受到中国援军的反击，在丹曲科儿宫 Dan Chokhorgon 吃了个大败仗，在这次战斗中，两名著名的西藏军官扎西如本那拉 Drashi Rupon Nangzak 和米歇如本沙达拉三巴 Mekyok Rupon Sangda Lasampa 被俘，损失了大量的人员、武器和军火。失去斗志的西藏军队退到昌都，类乌齐和登城。再一次请求韦尔 Weir（当时他正在拉萨作为英国的代表）安排谈判，但是中国政府否认它对马步芳有任何约束力。

在昌都，噶伦阿沛陷于困难地位。我的母舅秘书长俄喜图登 Ngoshi Thupden 从拉萨派出去管理喀木北部，噶伦阿沛则管东部。援军和武器随俄喜送往前方。我作为一个私人秘书跟着他，但实际上是奉达赖喇嘛的命令，对中国人和他们的武器摄影。当俄喜到达登城，他发现西藏军队已从青海撤退，虽然马步芳的军队并没有追逐他们，从登城到囊谦有好大一块地方未被占领。俄喜下令藏军回到未占区原先占据的地方。

噶伦阿沛不久就去世了，在他的继任者未到达前，俄喜兼任了喀木北部和东部的总督事务。噶察德通 KoTsap Tethong 过了几个月后来接替了喀木东部的事务。这两位总督在拉贡年达 Lagon nyenda 相会，讨论了未来的计划然后各返自已的岗位。

利用一位喇嘛作为联系人，中国人开始和俄喜谈判，俄喜是以勇敢威严著称的，给他们以深刻印象。在水鸡年的二月（1933年6月15日）在中国境内的囊谦德扎宫签订了一个条约。代本索康苏巴和孜仲多吉于介代表俄喜签字，我以掌印官的身份陪着他们，趁机对中国营房拍了照，对签订条约和其它活动也都拍了照。马步芳是由马松奇和李正模代表的。条约规定中藏边界恢复到冲突发生前的位置，这对西藏是有利的。互相交换战俘。假如藏方撕毁条约、类乌齐、昌都、和察瓦八　都将交与西宁。假如中国人撕毁，他们将交出德木齐 Dimchi　的二十五个地区。这个条约双方都未破坏。俄喜被召返拉萨担任他原来的职位。

达赖十三世在他死的前一年，于1932年对他的官员讲了他的政策的要领，要求他们照办，下面就是这些内容的简述。

在回忆了他早年对国家的工作后，达赖说他的成就并不是由于他有多大能耐，而是由于官员们提供了情况使他能满意。他表示愿意退休，但是他知道他不能停止为国家服务。认识到他已五十八岁，他知道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他曾努力使西藏在印度和中国两个大国之间保持独立，同时也把军队派到喀木的边界向那些入侵西藏土地的人挑战。谈到外蒙古的共产主义，他描绘寺院如何被摧毁，哲布尊丹巴的转世也被否定了。僧人被強迫编入军队。达赖喇嘛予言共产主义迟早要来到西藏，不是从外部来就是从内部来，避免它的到来只能从现在起就加以努力；否则的话，整个国家都变成那种制度的奴隶，人们想“熬过一天一夜”也是困难的。现在还有时间和机会让我做准备，把国家的力量建立起来。每个人都要合作，使我们国家在未来没有可后悔的。

在达赖喇嘛死前几个月，伦钦和噶厦都向他保证所有官员都将勤

勉尽职，寺院都在为他长寿而祈祷。达赖在书面回答中表示他对寺院祈祷的赞赏。他说官员们如能忠于职守，一定可以得到成就。但是如果像现在的样子继续下去，鱼目混珠，今天的事情推到明天，他们就要感到后悔。他告诫他的官员，国家的命运就完全寄托在他们身上。

这是达赖十三世的最后的声明。11月份他患了感冒，越来越重，在水鸡年的十一月十三日晚上（1933年12月17日），他去世了。

达赖十三世从掌权后就改善了寺院的纪律。尽管他任务很重，他每年还抽出时间在罗布林卡考试僧人，评判他们的辨论。在新年大法会时，他更考试僧人仔细排列他们的名次。那些通过考试取得最高名次的，有机会成为甘丹池巴的候选人。

柏尔是达赖的一位密友，他说，“他决心最大限度地使西藏摆脱中国的统治。西藏种族的大多数是在他一边，认他为国家党的领袖，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唯一的工具”。柏尔还提到达赖喇嘛一次曾告诉他“中国人的办法是先说些或办些温和的话或事情，然后等等看，如果没有引起反对，就说些或办些厉害的话或事情。假如遇到反对，他们就回答说他们所说所做是被误解了，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的”。

在政治上，中国人的这种战术在今天已是尽人皆知了。在政治上，达赖喇嘛成功地把中国人拒于西藏之外。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保持了力量的均势，他能以维持西藏的独立。官员和属民做出成绩的都得到嘉赏，那些不尽责的则受到惩罚。他的特工人员使他能知道官员中的贿赂和贪污情况。在一些地方广泛实行的砍头和截肢刑罚加以废除，那些阴谋反对政府的案件除外。达赖喇嘛禁止开除老仆役，儿女不许将年老的父母送走。他制订一条法律防止任意支用乌拉差役，这在过去是每个官员都能享受的。他规定了使用乌拉的价格。对放借贷的利息

也作了限制。假如一位地主不耕种他的土地，另一耕种者有权加以利用。遇有这些情况，头三年免交租税，以后每年向政府缴纳收获的十分之一，向地主缴纳百分之五。各地区都派去医生，妇女分娩和牲口生病都免费治疗。

每个官员都必须穿西藏的传统服装，烟草、鸦片、酒类禁止进口。赌钱被认为是犯法。达赖说这些罪恶在削弱国家的力量，既费时又费钱。他不鼓励妇女买首饰和争奇斗艳的穿华贵的衣服。因为穷官员的老婆都负了债。那时的风气是没有值钱的首饰和衣服就不敢参加上层社会活动。这些改革对有钱的和享受特权的是不欢迎的。但是人民中的大多数却认为达赖喇嘛是西藏从来没有过的好统治者。

美国驻中国的公使柔克义 W.W. Rockhill 当1908年达赖在北京时曾几次会见他。他这样来描写达赖。

"他是一个无可置疑的精明和有能力的人。理解能力很強，性格很有毅力。他是胸襟开阔的，这可能是过去几年各种经验的结果。他对他作为宗教最高首脑的巨大责任有深刻的印象，远比他的世俗责任为強。他性情暴躁，易冲动，但乐观和慈祥。在所有时间里，我发现他是一位最能深思的主人，一位愉快的谈话者，并且非常谦逊有礼貌。他讲话很快，但声音很低。他是个矮个子，身高约为五英尺六寸，身材瘦小。他的面色较一般中国人为深，是一种红棕色；他的脸很宽，散布着麻子，但不太深。他微笑时漏出牙齿给人以轻松愉快感。在静坐时，脸上无表情，甚至有点冷酷和凛然不可犯。他的鼻子小而直，耳朵较大，长的地方很适宜。他的眼睛是深棕色的，大而有些斜，他的眉毛很重，明显地向两鬓升起，给他一付很流俗的表情，这种表情又由于他留得小胡子而加強。他的手是小而好样子的，在他的左腕上总是绕着一

串紫檀木念珠，上面附有银算筹。走路时举步很快，但是他站的不很直，这是由于长年盘腿坐的结果。他的通常服装是和其它喇嘛所穿同样的深红色的僧装，穿一件金丝缎背心和挂一面长方形金丝缎牌子内藏一个净水瓶。

达赖十三世死后，没有战事一直保持到1950年，但是西藏官僚中的争权斗争削弱了政府政策的力量。

十七、政治斗争的风暴

达赖喇嘛是西藏政府的首脑，它的支柱包括司伦 Silon （首席大臣），噶厦（大臣会议），译仓 yigtsang （僧官会议，他的成员被称为秘书长）、孜康（俗官会议它的成员被称为财政秘书）和春都（国民会议）。年轻的首席大臣，司伦朗敦，于1926年受任，在政治上是很软弱的，但由于他是达赖喇嘛的姪子，人们对他还有一定的敬重。宫比拉、龙厦和察绒这三位是达赖的亲信，他们在西藏政府中都占有重要位置，这是他们之间争权夺利的结果。

宫比拉是造币厂的首脑，带有堪钦的官衔。他还控制着武器军火的进口和分配。为了使他自已掌权，他还建立了一个新的团称为仲扎马噶 Drong Drak Makhap ，成员都由贵族子弟组成。宫比拉给人的印象是“西藏的有力人物”，特别是在达赖十三世的晚年。

龙厦的职位是孜本，抓到了军权，他是达赖的亲密顾问。虽然他是一位聪明的政治家，但由于未得达赖许可而逮捕协尔巴甲波而被免

去军职。龙厦怀疑他的被免职宫比拉插了一手。虽然他从如此重要的位置上掉下来，但他以孜本的身份仍然可以左右春都。

察绒，是第三位亲信，是一个能干和有远见的人。他聪明而进步，但他的政治威望由于免去总司令职务而受损害，后来噶厦的职位也被免了，但他留在幕后，避免在政治上牵扯太深。

1933年达赖的突然去世，使西藏陷入政治不稳定的状态中。孜本龙厦认识到要夺宫比拉的权必须先把仲扎马噶解散了。他暗中煽动军队以不适应军队为理由而辞去，因为他们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习惯于舒适的家庭生活，部队则很不乐意允许他们辞职。

在达赖去世后的第三天，整个仲扎马噶到罗布林卡前示威，这时噶厦和春都正在开会。他们要求解散。噶厦命令他们先回去，随后准许他们的请求。但是他放弃了他们的军事职守，保护政府造币厂，而回到拉萨。

在龙厦的授意下，三大寺的代表向春都建议派僧人去替代被放弃的保卫造币厂的职位。噶伦池门建议说，把僧人派去代替军队的工作是不明智和不必要的，可以把达赖的卫队分一半去保卫造币厂。他然后下令由卫队去接收造币厂的职务，并指示对任何阻挠接收的可以开枪射击。

在达赖死后的第四天，春都在龙厦授意下开会讨论达赖突然去世的问题。宫比拉和达赖的另外两名随从被捕，理由是他们没有提供关于达赖病情的足够的情况。他们因使政府一无所知和没有给达赖以足够的医药治疗而有罪。结果宫比拉和另外两名随从都被放逐到工布。

不久后，春都抽签从两个候选人中选择摄政，这两人是热振和甘丹池巴。热振，个人名叫佳白意希当选，于木狗年正月初八日（1934年1月）正式成为西藏的摄政。他由年轻的司伦朗敦协助。

在把他的对手宫比拉推倒后，龙厦如果把忠于他的僧人代替了仲扎马噶的话，他本来是可以控制政府的。他的这一计划被噶伦池门所挫败。龙厦在年轻官员中寻求支持，他建立了一个组织叫克巧恭敦 Kechog Kunten 意思是"快乐的联合"。在这个组织里还有一个核心，可以讨论极为秘密的事情。以龙厦为首的这批政治匪徒的公开政策是要改变政府的文官制度。但是私下的政策和这个组织的主要政治目标，只有核心的人才知道。

这个组织的一名重要成员，一个很聪明的人叫作仁细噶须巴 Rimshi Kanshopa ，他通知噶伦池门说，龙厦计划暗杀他。池门把龙厦的阴谋向热振作了告发，然后，临时躲到哲蚌寺去。同时噶厦从摄政那里知道了阴谋，于是逮捕了龙厦和噶须巴，后者的逮捕是变象的保护他。一个审查委员会在龙厦的家中找到一些文件，证实了阴谋的存在。他的目的是在谋杀池门之后推翻政府，委员会在详细研究了这些罪证后，判决龙厦挖眼并监禁终身。这是对叛变行为所保留的少有的刑罚。

从1912年把中国的文武官员赶出西藏后，直到1934年没有任何中国人被允许进入西藏。这一年中国政府要求派一个特别代表团由黄慕松将军率领到西藏来致祭已故的达赖喇嘛。中国人善于利用时机来进入西藏，因为西藏政府是很难拒绝一个纯宗教性质的代表团的。黄慕松一行于1934年4月经由东部西藏到达拉萨。同时一个类似的代表团由印度政府派出，在若乙巴都诺尔布顿珠 Rai Bahadur norbu Twndup 的领导下也来到拉萨。他是锡金政治官属下的一名职员。

在布达拉宫致祭以后，中国将军访问了摄政和其它高级官员，赠送了优厚的礼品。非正式的讨论继之以巧妙的外交手腕。黄提出三条

建议来解决下余的西藏与中国之间的分歧，(1)西藏必须同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2)西藏的国防由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负责，(3)一位中国专员应留驻拉萨。

在回答时，西藏政府提到１９１４年的西姆拉条约，同意如果中国政府批准条约，西藏就同意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它同时也強调了英国政府应当作为一方参与西藏与中国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西藏政府提出要求归还金沙江以东的某些土地，如德格、鸦龙和伙尔科 Honkhoy 。他们也允许班禅返回西藏，但要在没有中国卫队的护送下。

西藏人坚持他们的要求，结果没有达成解决。最后黄慕松回中国去了，留下两名联络官继续两个政府之间的对话，这些官员有一部电台，他们答应在问题解决后就交给西藏政府。

在１９３４年末，达赖的去世和宫比拉的被捕传到邦达多吉的耳朵里，他是宫比拉的拥护者和东部西藏芒康一带的民兵领袖。邦达多吉集合起他的力量向西藏政府军队代本诺纳进攻。战斗发生时代本诺纳不在本地。政府军吃了败仗，芒康也被邦达多吉的民兵占领。

邦达多吉计划把喀木这一省组织成一个独立国，他曾为此目的散发传单。两三个月以后，在昌都总督指挥下的军队打败了多吉的民兵，把他的部队赶到中国占领的巴塘，西藏政府和中国政府交涉要求送回邦达多吉，但是中国人既不帮助他也不把他交出。他们允许他留在巴塘，希望将来在政治斗争中可以利用。

多吉的哥哥叫饶阶，也牵涉到这一事件中，但他们的长兄邦达养璧住在拉萨，他对芒康的事件一无所知，当西藏政府听到多吉在东部的活动以后，他们将养璧拉萨的住宅包围起来，养璧是一个敏锐而富有的人，他代表他老弟道了歉，对他兄弟所造成的损失向政府作了赔

偿。

1934年，由于中国的国共斗争，一支约十万人的共产党受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开始向西北"长征"，他们来到西藏人的地方伙尔科、巴塘、里塘、鸦龙和德格。西藏政府派军队去防止他们渗透，这些被追的中国人最后被迫继续走向中国的西北。这是第一次中国共产党踏足于西藏的土地上。

达赖十三世死后，找寻他的转世按传统方法进行。1935年春天，摄政热振和噶伦池门去到群科儿介寺在附近的拉莫拉错湖观海。在噶厦选的陪伴噶伦池门的人员中，我被任命为噶仲来察 Kadrung Letsap 代理噶厦秘书）。

群科儿介寺是达赖二世根敦嘉错所建的一座小寺院，这一地区的天气是多变的，雨雪风暴和阳光相间而来。寺院以东约十英里即神湖所在，有高耸的雪峰守护，湖大体上是园形的，直径约一英里。

我们到达后，就分散开保持静默，摄政和官员们都深入打坐默想，因为相传每人能看到不同的异象。我承认我什么也没看见。但是摄政说他看见三个西藏字 A ཨ .Ka. ཀ 和 Ma མ 和一些农村景色，许多人说他们看到他们的未来，另一些人像我就什么也没看到，甚至费很大劲也是白搭。

从群科儿介，摄政又到了他的出生地若美 Rome ，在塔布加查，这是一个小村子，骑马两天可达。在热振出生的地方村民们修了一所小庙。有一个木头橛子钉在一块岩石上，就在庙的前面，人们说摄政在三岁时，把木橛子钉入岩石里。人们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将有一队客人来把他带回家去，这个木橛子是为拴马用的。令人惊奇的是找寻热振转世的人员就在当晚来到这个村子里，后来就把孩子和他的一家接到热振寺去了。

摄政花了十天时间访问他的出生地和会见亲友，我很奇怪这样一个有能力的人竟然出生在一个穷人家，他的亲戚都是长得很难看，在这些村民中，从来没有见过像摄政一行所带的华贵的行装。整个团体都住帐房，一连三个晚上，每次几乎都到天亮，摄政和池门讨论一些重要事务。在第四个晚上，使我感到非常失意，噶伦池门悄悄让我给他起草辞职书。我表示了我的惊异，问他为什么这样突然决定辞职，他正处在事业的顶峰，他告诉我，他和摄政都打算辞职，由于我不能理解他们的理由，我要求池门不要匆匆作出决定，但他回到拉萨后就辞职了。摄政还访问了南部一些地区然后回到拉萨。他向春都提交一份详细的观海的报告。在收到他的报告有了达赖转世地方的一些标志后，政府就组织了三个寻访团。以普尔乔任波清 Phurchok Riwpoche 为首的被派到西藏东南部的塔布和工布，以康色任波清 khangrer Rimpa Oche 为首的被派到东部的喀木和然 gang ，以格乌仓任波清 Keutsang Riwpoche 为首的被派到安多和阿日格 areng 在西藏的最东北部。

同时班禅六世继续在中国过流亡生活。他做了几次努力想回到西藏来。1932年，他的代表安钦达赖喇嘛把班禅的愿望转达给西藏政府。当时达赖十三世同意允许班禅和他的官员回来，并恢复他以前的地位，权力和庄园，但要服从下面的条件，(1)在一般的租税之外，班禅应当缴纳一种西藏政府规定的新税，以支持国防计划。(2)班禅应当只由西藏随从的陪伴下回来。

第二年，达赖喇嘛突然去世，摄政和噶厦感觉让班禅喇嘛长期留在中国是不明智的。于是通过驻南京的西藏代表打一封电报给班禅，请他按照已故达赖所提的条件迅速回藏。另外西藏政府同意为他提供所有交通和便利，并护送他回到扎什伦布寺。很明显，当西藏代表访

问班禅去交这封电报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代表之一曲批图丹亲自告诉我说，班禅如果接受了西藏政府的条件那是好事情，但班禅却轻蔑对之。

班禅迟迟不能回来的主要原因是1935年国民政府宣布班禅将在西宁成立司令部，由一位中国代表和五百名中国兵护送他入藏。国民政府给班禅以“西陲宣抚使”的称号。西藏代表通知南京的中国政府，西藏政府不承认给予班禅的封号。另外还反对五百名中国兵护送西藏人为此也与印度的英国政府联系。结果英国驻南京大使贾德 Codogan 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

在过去，遇有重要问题需要讨论时，锡金政治官可以访问拉萨。当黄慕松率领的致祭达赖十三世的代表团被西藏政府允许到达拉萨时，锡金的一位政治官助理若乙巴都诺尔顿珠也来到拉萨，表面上也是同样的理由。实际上则是监视黄慕松的行动。

现在中国打算派军队护送班禅回藏，西藏政府即请求锡金政治官威廉逊 F.W.Willcawson 访问拉萨，帮助找一对策。威氏到拉萨不久即患病且日趋严重，英印政府要求准许派飞机接威氏赴印度治疗，但这一要求被西藏政府拒绝了。理由是如果给予英国以飞机降落权，别国提出类似要求，西藏政府就会感到难办。不幸的是西藏政府的态度对威氏没有帮助，几天后他就去世了。

古尔德 B.Gould 接替威廉逊，在印度东方司令部的尼姆少将 P.Neame 陪同下来到拉萨。西藏政府是想通过古尔德要求英国政府遵守条约义务，使中国政府了解西藏政府反对中国政府派兵护送班禅。古尔德说他将通知伦敦的英国政府，并提出強烈的建议，利用英国的影响对付此事。他又说黄慕松代表团留下两名联络官和一部电台在拉萨，古尔德也要求得到同样的权利，在江孜商务代办黎吉生

的指导下，建立一个代表团和一个电台。

当西藏政府听到班禅喇嘛带着一个武装的中国卫队取道玉树返回西藏时，就派多仁台吉去会他。西藏政府通知东部总督准备接待班禅但不准中国卫队进入西藏。差不多同一时间，听到班禅和他的卫队已于1937年3月到达玉树，又听到还有班禅的大批随从人员携带班禅的财宝到达打箭炉。昌都总督派官员通知班禅不要随带中国卫队前往，但是班禅的一位代表到达昌都，通知总督说中国卫队要护送班禅。

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什么结果。同时班禅的秘书给扎什伦布寺送去一份紧急通讯。内容是班禅将随带二十名中国官员和五百名中国兵回藏，可以击败西藏的任何阻挠。这一通讯附着一枝箭，表示它是非常紧急的，信上还表示了班禅要采取的路线。

当这份紧急通讯在拉萨被截获后，噶厦提交春都。它的内容为春都所不欢迎。于是决定班禅不能带中国卫队入藏。假如班禅坚持，他应当写一个书面保证，这些卫队在休息一个月后经由印度返回中国。还有决不许护送团成员干予西藏的事务。书面保证必须有第三国代表作证。假如班禅不同意春都的安排，西藏军队将奉命阻止他入藏。

西藏代表把春都的决定通知了南京的中国政府。同时班禅离开玉树到达若克西龙宫 Rekshi Lungon 。为了弄确实春都的决定通知到班禅，昌都总督送了一份决定的文本给代本囊色林巴和伙尔其堪穹 Horche Khen Chung 他们是负责在甲桑卡及其附近地区守卫边界的。在这时候，中国卫队得到国民政府的命令撤出若克西龙宫。班禅又回到玉树等待事情的发展。他生了病，于1937年12月1日死于玉树。

没有了班禅，他的随从回西藏就很困难了，另外他们也不想回到中国去，因为中国正和日本打仗。结果他的随从把班禅的尸体弄到伙

尔科(即甘孜县，译者注)。当他们在打箭炉时，他们想联络一些不满意的康巴部落来反对西藏政府。但是由于和刘文辉的部队发生了磨擦，而被迫离开那些地方而到了德格。

当昌都总督听到这些消息，立刻派人去通知班禅的随从，带着班禅屍体返回西藏，保证他们不会受到惩处。随从人员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回到中国青海省的西宁，一部分带着班禅的屍体回到西藏。西藏政府派代察卓克贝 Jatsap chokpe 去迎接这一行，他们于1938年回到扎什伦布寺。

同一年，年青的摄政热振时常提出他要辞职，噶厦和春都多次阻止他这样做。摄政是一位年轻人，身体也很好，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辞职。当人们问他所以感到不满的是什么，他回答说，他的地位是这样的，有什么事情要决定，他得先和司伦商量，他和他联合掌权。这样就使他自已不能作出决定，而拖延了需要迅速作出决定的事情。

噶厦和春都经过仔细考虑了摄政的问题，决定最好让司伦辞职，以便利摄政的做出决定的权力。接着司伦朗敦就辞去了政治活动，但还保留司伦的头衔。使噶厦惊异的是司伦朗敦欢然接受了这一建议。他于土虎年二月十三日(1938年)辞去一切政治活动。在他辞职的时候，他的支持者怀疑他是自愿辞职的，拉萨出现一种恐怖和紧张气氛，但是危机很快平息了，因为朗敦是一位好心肠的和聪明人，他没有任何遗憾和反感地下了台。

在这事后不久，西藏政府就收到三个转世寻访团的报告，关于可能是达赖转世候选人的情况。西藏政府训令他们把灵童送到拉萨来进行宗教测验。格乌仓仁波清的寻访团要把青海省打泽地区的灵童送到西藏来却遇到了困难，这地方早先是西藏的，现在由中国人统治。塔尔寺的代表和青海省的回回主席马步芳要求证明打泽的灵童是达赖的

转世。西藏政府说，只有把三个灵童都接到拉萨经过宗教测验后，才能最后肯定。就在这时打泽的灵童在塔尔寺出了家。最后在交付了青海省主席四十万大洋的赎金（相当于九万二千美元）后寻访团才被允许把灵童带到拉萨。

1939年7月，春都在达赖喇嘛的居室布达拉宫的德登基 Dedan khil 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四位大秘书（仲译钦莫）之一宣读三个寻访团的报告。一个报告是叙述打泽灵童顺利通过测验的情况。这个报告是格乌仓仁波清写的。他指出摄政在神湖看到的异象和打泽村子的形象是相合的。他也告诉春都，内穹护法神和许多喇嘛都肯定打泽的灵童是真的转世。大秘书继续说，政府由于把灵童从青海接来遇到问题，所以政府没有作最后的肯定。现在打泽的灵童已进入西藏的土地。大秘书通知春都，西藏政府已承认打泽灵童是达赖十四世。春都一致肯定这一决定，并且通知西藏各地。

西藏政府准备把达赖迎入拉萨只能匆忙地进行，因为整个事情直到最后都还是保密的。噶伦彭须代表政府去黑河迎接达赖喇嘛，我自己是由噶厦挑选去陪伴噶伦彭须的。我们日夜的骑马赶路，要在达赖到达前抵达黑河。从黑河我们又向前走了三英里，在噶细那卡 Gashi hakha 接到了这位四岁的达赖喇嘛，他是坐在轿子里，西藏称为"折姜" Treljaw （"折姜"意为骡驮轿，不是普通人抬的轿子，译者注），达赖喇嘛一行还包括他的家属。噶伦彭须向达赖献了哈达，后来在他的帐房里举行了一个欢迎仪式。仪式中向他献了曼扎登松（Mendel Tensum ）。这样这个孩子就被正式宣布为达赖十四世了。摄政在达木乌马塘 Damthang 来会达赖一行。然后一起行进，在热振寺停留了几天。

习惯上达赖喇嘛都要访问日甲 Rakya 这是一个小茅棚。在日

甲停了两天后，被西藏所有政府官员迎接于多古塘 Dogu Thang 各寺院的代表。英国、中国、尼泊尔和不丹的代表都参加了欢迎。

在土兔年八月二十五日（1939年10月8日）整个队伍隆重地穿过拉萨的大街。先访问了大昭寺，然后到了达赖的夏宫罗布林卡。

在土兔年十月十三日（1939年），摄政热振在大昭寺的佛像前给达赖十四世剃了头，并取名为丹增嘉错。他的正式坐床的日期定为铁龙年正月十四日相当西历1940年2月22日，噶厦打电报给中国、印度的英国政府，尼泊尔国王和不丹与锡金的大君，通知他们坐床的日期。印英政府是由锡金政治官古尔德代表的，不丹和尼泊尔的代表已经在拉萨。中国政府派出它的代表吴忠信，中国声称吴忠信是派到拉萨去主持达赖喇嘛的坐床的，但实际上，吴的出席仪式比其它国家的代表并没有更多的意义。

后来国家算师和打卦的予言如果不进行坐静修行，热振的生命将是很短促的。热振辞去职务并推荐打扎任波清阿旺松若，达赖的正经师代替他的职务。在噶厦和春都的要求下，打扎任波清于铁蛇年正月（1941年）接受了摄政的职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于1942年初印度与中国之间取道缅甸的供应线被日本切断了。印度和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西藏东南部的察隅地区修筑一条军事供应线。驻拉萨的中国联络官孔庆宗和英国代表团的首脑若乙巴都诺尔西顿珠和拉萨的外事局接头，要求西藏政府准许修筑这条路线。这一要求由噶厦转交摄政打扎，他又把它提交春都。春都拒绝允许军需品通过西藏。中国政府以战争威胁西藏政府，如果不同意这一计划的话，甚至煽动边境的省主席搞起冲突。西藏军队准备应付任何侵略。最后，中国人的筑路测量队被召回，危机也就消除了。

若乙巴都诺尔布顿珠也強烈要求西藏政府同意这一供应线计划。甚至警告说，如继续拒绝将会失去英国的支持。西藏政府向英国代表团解释，西藏希望保持中立，但是他们不愿为难印度的英国政府，因此将允许非战争物资通过西藏输往中国。

同一年，春都要求中国联络官孔庆宗离开西藏，因为他违犯了西藏的法律，他把冲进他住宅的一名西藏警察扣留起来。这个警察是去捉拿逃进中国办事处的，在街上打架的一名尼泊尔人和西藏人。1943年中国政府要求西藏政府允许他们的联络官沈宗濂和一小批职员经印度入藏代替孔庆宗。印度政府询问西藏外事局是否可允许这批人入境。西藏外事局表示同意。然后中国人一行由印度进入西藏。沈宗濂运用巧妙的外交手腕，改善了中国与西藏间的紧张关系。

1942年晚些时候，拉萨接待了托尔斯泰上尉 Ilia Tolsgoy 和陪同他的付官多兰 B.Dalan 的美国人的正式访问。这两个人是由华盛顿战略局派出探测通过西藏运物资到中国的线路的。美国来访者受到西藏政府的热烈欢迎。他们会见了达赖喇嘛，把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交给了达赖喇嘛。另外还送了一些礼品。他们在拉萨住了约一个月，就由西藏卫队护送至边界，经由西宁返回中国。

下面是罗斯福总统致达赖喇嘛的信：

白宫

华盛顿　　　　　　　　7月3日1962年

神圣的阁下：

我的两名同乡，伊利亚托尔斯泰和布鲁克多兰希望访问你的敎区和历史性的和著名的城市拉萨。在美利坚合众国有许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对你的土地和人民都非常向往，并感到很大兴趣，都珍视这种机会。

你知道，美国人民和二十七个其它国家正联合起进行由侵略成性的国家所強加于世界的战争，他们的意图是摧毁思想的自由，宗教的自由，甚至行动的自由。今天联合国正在为保卫自由而斗争。我们相信将取得胜利，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力量是充足的，我们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我请伊利亚托尔斯泰和布鲁克多兰带去一点礼物，表示我对你的友好情谊。

热情的问候，我是

你的最诚挚的

福兰克林·D·罗斯福（签字）

神圣阁下

达赖喇嘛

喇嘛教的最高教长

拉萨

下面是达赖喇嘛给罗斯福总统的回信。

尊敬的福兰克林D·罗斯福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白宫

华盛顿

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以极大的满意，通过托尔斯泰上尉和多兰付官收到你的信和作为友好情谊象征的一块华美的金表，它能表示月和星期。他们安全到达了他们要访问的教区和拉萨城。

我很高兴知道美国人民对我们的国家表示极大的兴趣。美国人民联合二十七个国家进行保卫自由的战争是有巨大意义的，这

个战争是由侵略成性的国家所強加于他们的，他们的意图是摧毁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和行动自由。

西藏珍惜她自古以来就享受的自由和独立。作为佛教的巨大基地，我正在努力，尽管我年龄还很小，发扬我们的宗教精神以求胜过我的前辈们的虔诚的事业。我真诚的希望并为之祈祷，战争早日结束，使全世界的国家能享受在自由和善意基础上的持久的和正义的和平。

作为我的敬意的表示，我给你带去哈达一条，三枚西藏第一贵重金属（黄金）的钱币，我的照片，三幅手绣的唐喀 Thangka（佛画）表示六道轮廻的长存，四个和睦的兄弟和八种吉祥符号。全部用金丝缎装裱。

你的最诚挚的，

西藏的达赖喇嘛

（盖印）

水羊年正月十九日，西历2月24日1943年。

1944年，美国军用飞机，由克罗希衮 Crozior 驾驶，坠毁于桑鸢寺附近的朵 Doh。这架四引擎的运输机是在印度与中国之间跑运输，由于迷失航向油料用完而失事。西藏政府给美国驾驶员提供了各种协助和招待，护送他们到印度边境。美国在印度的外交代表团保证今后美国飞机不再飞越西藏领土。西藏政府由于对美国飞行人员的协助而受到感谢。

西藏政府认识到能讲英语的西藏人在处理政府事务中是十分必需的，但是只有少数西藏人有英语的知识。在和英国代表团的古尔德商谈此事后，西藏政府得到从英国来的派克先生 Mr. R. Parker 到拉萨来教英语。1945年春天开办了一所学校，由政府挑选的一批学生在这里上学。过了几个月，寺院提出了強烈抗议，理由是这种

学校会影响国家的宗教信仰。这一抗议导致了这所新开小学的关闭（这种事件不是没有先例的。1923年在江孜设立了英国学校，到1926年以同样理由而关闭。）西藏政府送了一些学生到印度去学习，由政府提供助学金。还有一些私人家庭的子女也参加了政府选送的到印度留学的行列。

中国政府一直是想控制西藏的寺院，这时候他们在格西喜饶嘉错身上找到这么个武器。嘉错是一位有学问的佛教学者，以先在哲蚌寺，现在在中国为所谓的“蒙藏委员会”工作。喜饶嘉错想回到西藏来，已经到达了黑河，但西藏政府拒绝他入境，因为听到他要在寺院里为中国作宣传。当中国在几年后落入共产党的统治，喜饶嘉错又成了一个共产党的工具。

1945年，两名德国战俘，亨利哈拉 Heinrich Harrer 和彼德·阿夫希乃特 Peten awfzchnaiter 从英国在第拉东 Dehra dum 的集中营中逃出。他们进入西藏，他们受到庇护，因为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西藏是保持中立的。在他们在西藏的七年当中，他们和西藏人民相处的很和谐。他们帮助修建了一条灌溉渠道，植树造林和修了一条河堤，哈拉后来写了一本书叫作《西藏七年记》 Seuen yers is Tibet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摄政打扎任波清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庆祝盟国的胜利。这个代表团由扎萨图登桑佩和扎萨凯墨为首。当时英国驻拉萨的代表黎吉生警告外事局，如西藏代表团参加了中国召开的国民大会，西藏政府就是破坏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噶厦对黎吉生说代表团不打算参加中国的国民大会，它的唯一目的是向盟国庆祝胜利。

对印度的英国政府，这个代表团通过总督魏菲尔 Wavell 送了

礼品和一封贺信。通过在新德里的美国代表，礼品和信件也送给了美国政府。代表团然后前往中国。代表团到达后在没有得到西藏政府的许可下参加了于1946年5月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代表团的成员说，他们只是去参观大会的程序，因为中国已经指定了他们的所谓代表，参加国民大会，代表团还进一步表明他们既不承认也没有在大会通过的新宪法上签字。

下一年，西藏政府响应印度政府的邀请，派了一个代表团以台吉桑珠颇章和堪穹罗桑旺结为首参加于1947年3月23日在德里召开的泛亚洲会议。西藏的国旗被悬挂起来，还对大会作了发言。下面就是西藏代表团的发言。

> 我们西藏政府受到邀请参加亚洲关系会议。我们是一个以宗教精神治理人民的国家。印度作为佛教的故乡，自古以来就和佛教徒，特别是西藏发展了友好关系，因此我们的政府派我们来参加这个伟大的会议，维持我们基于宗教的和平关系。同样的我们也非常高兴和亚洲各国来这里参加大会的代表见面，我们愿意对伟大的印度领袖们，马哈特马、甘地 Mahatma Gandhi 班底特、尼赫鲁 Pandit Hehru 和耐都夫人 Mrs.S Naidu以及所有参加这次大会的尊贵的代表们表示诚挚的感谢。对于未来，所有亚洲国家之间应当兄弟相待，建立一种以精神联系为基础的感情，这样使我们可以希望在亚洲有持久的和平和团结。

长期以来，占有土地的寺院和富裕的个人把粮食借给西藏属民，利息是由政府规定的，虽然利息很低，还是有一些人到时还不上本利，时间长了利上加利，贫苦的欠债户就受不住了。拉萨政府于1944年发布命令，使苦于债务的属民免交过去累计的利息。在澎波

Phanpo 的林周宗的属民，听到政府有停收旧利的命令，就决定拒付色拉寺戒扎仓和鄂巴扎仓在林周宗所放粮债的旧息。属民在拒付旧息方面得到地方官（宗本）的支持。地方官与寺院收债者之间发生争执，结果宗本被收租人狠狠揍了一顿。宗本因伤重而死去。政府派了一个调查团去了解情况。调查团的人要求寺院交出凶手，但寺院拒绝交出。寺院的僧人还以不出席1945年的新年大法会头两天的活动，作为抗议。

情况愈来愈严重，政府代表最后强行进入色拉戒扎仓和鄂巴扎仓把肇事的人逮捕，这些扎仓的堪布被免职，任命了新人。

同年，色拉戒扎仓请前摄政为他们修理好的一所旧庙开光，前摄政是属于这个扎仓的。就在这时候拉萨有谣传说打扎摄政要辞职，热振将复位。谣传在拉萨居民中引起一些激动和猜测。在打扎和热振之间早先有过这样的谅解，即他们将轮流执政，打扎将因年老而辞职，由前摄政二次执政。这种谅解导致了双方关系的紧张。当权的摄政拒绝下台。色拉戒和鄂巴扎仓的事件和现在摄政的争权斗争，给这个国家蒙上了一层神秘、恐怖和阴谋的浓影。

一年后，1946年11月，孜本拉鲁，他是龙厦的儿子，在回他自已住宅的路上遇到了伏击，除打死一匹马外，没有人受伤。政府再一次调查这种事件，但未能找到伏击者。

1947年2月，正当新年大法会的前夕，摄政打扎突然取消参加法会。习惯上摄政和政府官员要列队穿过节日会场。突然决定停止参加，是怀疑叛乱分子将暗中狙击他和政府首脑，两周后一个神秘的包裹交到打扎的一位亲信手里，他是大仲译阿旺那介。包裹上写的是昌都总督交给摄政的。它由大仲译的一位管家打开。一枚手榴弹爆炸了，但是没有造成损失。政府仔细地进行了调查。

差不多一个月后，噶厦收到从西藏驻南京的代表发来一份电报，说前摄政给蒋介石总统写信告知他摄政打扎的暴政和西藏人民的痛苦。热振还提到他正在准备推翻现摄政，希望蒋介石给予支持。打扎摄政和噶厦官员之间举行了紧急会议，两名噶伦奉命带着部队到热振寺去把前摄政拿来拉萨。于4月18日到达拉萨，色拉寺戒扎仓的僧人曾企图在途中抢救前摄政，但由于有政府军队的护卫，他们的计划未能成功。

热振和他的随从在拉萨被软禁起来，热振被迫交出所有文件以供审查。在文件中春都找到充足的证据，整个阴谋是由前摄政的权迷心窍的随从人员搞的，其中主犯是娘乃喇嘛 Nyung Lama 。也发现前摄政多次阻止使用暴力，但是他被迫参加了推翻摄政和政府的阴谋。前摄政的随从承认了曾伏击孜本拉鲁，炸弹案和准备在灯节晚上伏击摄政和政府首脑，以及其它谋害打扎的计划。

正在审问的过程中，前摄政突然于火猪年三月十八日（1947年5月8日）去世（热振是由打扎派人去勒死的，凶手是拉鲁的兄弟。这事在拉萨人人皆知而作者却说是突然去世，证明作者是反热振的。译者注）他的突然去世造成一些恶感。色拉寺的僧人特别是戒扎仓的僧人企图起来造反。春都和热振寺的代表检查了前摄政的尸体并没有发现任何足以致死的伤痕。同时政府的部队足以平息僧人的动乱。前摄政的随从根据他们罪行的轻重，分别处以终身监禁和放逐。娘乃喇嘛已经自杀身死。

在这一危机结束后，英国政府正准备把权力移交给印度人。西藏政府开始忧虑是否还能得到像英国人时代的外交支持。1947年7月，拉萨的英国代表团正式向西藏政府保证英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将与西藏在对华交涉中保持旧有的关系。达成一种谅解，即印度政府作为

英国政府的继承者，将继承并遵守英国和西藏所订条约的义务。同时也谅解西藏将通过英国驻印度的专员与英国保持接触，如果形势需要可以访问西藏。1947年8月15日印度正式独立。西藏政府打电报庆祝。在西藏江孜、亚东和噶大克的英国商务代办和拉萨的代表处自然转为印度的机构。

同年10月25日，西藏政府决定派一个商务代表团到印度，英国、美国和中国去。我被任为首脑，其它团员有我的兄弟，堪穷娄钦 Changkhyim 代本索康和任细邦达仓，派遣这个商务代表团有三条理由：

1.西藏的非亚洲出口物资，主要是羊毛、麝香、毛皮和牦牛尾等，平常是经过印度出口，所有商务都是通过印度商谈，并以卢比支付。商务代表团的目的是寻求印度放松对西藏出口的限制，并要求以美元或英镑支付而不用卢比，这样就需要和外国建立直接商务联系。代表团也要考察进口的前景，找寻农业和毛纺的适当机器。

2.代表团打算购买金条作为西藏通货的准备金。

3.由于世界不了解西藏的政府地位，因为他们主要从中国方面了解，因此有必要和外国建立正式关系，表示西藏的独立和享有主权的地位，西藏的护照发给每个代表团的成员（这是西藏为国外旅行第一次发正式护照）。

商务代表团，带着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致送各国首脑的信件和礼品，在德里会见了蒙巴顿总督和尼赫鲁总理以及其它印度领导人，讨论了通商事务。印度领导人给代表团以种种协助，并表示了他们对西藏的善意。后来代表团还会见了甘地，那时他住在德里的比尔拉大厦 Birla 当我献一条哈达给他时，甘地问哈达是否西藏制的，当我告诉他这些都是进口的，他表示惊异，他強调了一个国家应当自已制

进需要的货物。他的这些和其它的直言不讳的劝告使我们商务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为之深为感动。

1948年1月31日，代表团到达南京，听到甘地不幸被刺杀的消息，代表团的成员为之震惊。在拉萨，西藏政府在大昭寺举行了一个国家祈祷会以表示哀悼。

在中国首都，代表团会到了蒋介石总统和中国政府各部门领导人，讨论了关于通过两条路线向西藏进口茶叶和其它商品的问题，一条是通过打箭炉，另一条是通过印度。通过印度的路线是专为进口云南的茶叶。

这时候中国正在举行选举，中国政府请商务代表团参加国民大会，当时正在开会通过一个宪法，但是西藏商务代表团坚定地拒绝了出席中国的国民大会，声明他们是来中国进行商务谈判的。在重新选出蒋介石后，代表团奉西藏政府之命向蒋介石总统和李宗仁付总统表示祝贺。

在他们在中国停留期间，所谓的蒙藏委员会的首脑和前任驻拉萨的联络官沈宗濂，现任上海市秘书长，劝告代表团不要去访问英国和美国。如果一定要去，他们劝告不要携带西藏的护照。西藏代表团拒绝听从这些劝告。在他们整个海外旅行期中，他们都是使用西藏的护照和旅行文件，在他们所访问过的国家都是加以承认和接受的。这样就建立了史无前例的表示西藏独立的证据。

代表团在离开中国前，还向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英国驻华大使斯提文森 Siri R. S sgeveuzon 和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 S.K.M.Panikkar 作礼节性的访问。

当代表团到达美国后，曾由国务卿马歇尔接见。当时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表示愿意陪伴西藏代表团会见国务卿，但是西藏代表团拒绝

了中国大使的陪伴，不顾他所作的抗议。代表团的成员通知中国人西藏代表团正在会见政府各首脑，中国大使无权陪伴他们去国务院或任何地方。国务院也认为中国大使没有陪伴西藏代表团的必要。

在华盛顿，西藏商务代表团讨论了关于出口羊毛和购买金锭以支持西藏币制的问题。在他们在美国居留期间，代表团参观了一些农场，畜牧场和工业基地。他们也采购了一些农业机械准备在西藏试用。通过他们的老朋友托尔斯泰，成员们还会见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爱森豪威尔。这位将军对西藏政府给予坠毁飞机的飞行员的协助表示欣赏和感谢。

在英国，代表团会见了首相艾德礼。还访问了外交和商业部讨论发展商务的可能性。

当代表团回到印度以后，成员们继续和印度政府讨论商务。他们也表示希望在印度留驻一名西藏代表。印度政府同意在印度设立了一个西藏商务代表团。

印度政府通知西藏商务代表团，由于西藏通过印度直接和美国、英国贸易。西藏人非政府间的交易不得以美元或英镑支付，但属于西藏政府的出口物资，印度政府愿以美元或英镑支付。印度政府还声明经过印度直接运到西藏的货物可免收关税。

当我在德里时，印度总理尼赫鲁亲自对我说，西藏不能再孤立下去了，必须跟上时代的变化。回到拉萨后，我向噶厦和春都作了详细的汇报，并大力建议发展和印度与其它国家的外交关系。

就在这时候，共产党人开始在中国夺得权力。驻拉萨中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和一些商人在西藏首府开了一家舘子。这个舘子经常被告到西藏政府，说它是共产党的宣传机构。西藏政府不愿意看到任何扰乱或任何外国的宣传。知道中国代表团的设立是为解决中国与西藏之

间的悬案并非常设的外交机构，因此西藏政府于1949年7月下令要求代表团和有关商人立即撤走，通过印度返回中国。他们被允许携带他们的西藏妻子和带走他们的所有财产。直到印度边境可以享受免费运输。

不久后，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森 L. Handerson 给我写信，说美国无线电评论员汤姆斯 L lhomas 和他的儿子小汤姆斯愿意访问拉萨。美国大使要求我使这两位探险者能够访问拉萨。我把这一请求通知外事局，并表示需要世界对西藏了解的更多些。外事局在几周内就作出了允许，汤姆斯和他的儿子就登上来拉萨的征途。在亚东他们遇到了正在回国途中的中国人。在拉萨他们会见了达赖喇嘛、摄政和噶厦以及外事局和许多西藏政府官员。在拉萨停留了一个多礼拜，他们就回到自已的国家去了。西藏从他们的电台和电视得到广泛的宣传，小汤姆斯还写了一本关于西藏的书叫《在这个世界之外》 Out of thiz World 。

差不多同时，美国付总领事麦基南 D. S. Mackiernom 由贝萨 Fnonk Bessag 和三位白俄朋友陪同由新疆逃出来到西藏，当时这个省正落入共产党之手。经过了艰苦的旅程，他们于1950年5月到达西藏的一个地方叫纳仓。 Nagtsang 美国政府通过印度政府要求西藏政府接待这些人，并给予必要的援助。西藏政府当即通知各检查站，通知守卫人员关于这些人的到达，他们是被准许入境的，但不幸的是美国人比西藏政府的命令到达的早，他们到达检查站后，守卫人员出于怀疑，向这些人开枪射击。付总领事和两位白俄朋友都被打死。这个事件是最令人遗憾的。拉萨当局当着贝萨和他的俄国朋友的面处罚了那些任意开枪的守卫者。

十八、共产党中国的入侵

1949年10月，共产党政权控制了中国大陆，北京广播电台宣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西藏进军，把西藏人从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西藏政府強烈反对这一声明，申称西藏与中国的关系是僧人与施主的关系，西藏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有并沒有必要把西藏人从外国帝国主义下解放出来，因为并沒有外国控制西藏。

一年后，西藏政府派孜恰图登甲波 Tsecha Thub - ten Gyalpo 和我作为一个特别代表团的领导和中国谈判维持西藏的独立。下面就是在土牛年十二月十五日（1950年）春都对代表团的领导所发的証书，內容的译文：

雪国西藏，由历代观音的化身所统治，是一个独立的和献身于宗教的爱好和平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和平由于中国內战中溃败的中国兵的渗入而受到扰乱和危害，西藏政府的外事局已经给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去了信，要求他使用他的权力阻止中国兵跨越西藏的土地。中国人对这一要求未予答复。相反，西宁和北京的电台都声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煽动人民起来解放西藏。代表团被授予全权处理有关西藏的事务，前往谈判下列题目：

(1)关于西藏政府外事局致毛泽东主席的信未经答复的问题。

(2)关于西宁和北京电台荒谬声明的问题。

(3)通知中国政府，西藏政府和人民将不容忍对历届达赖喇嘛统治的任何干涉。他们将保持他们的独立。

代表团奉命与中国代表在靠近中国的一个地方谈判上述的问题。

在印度我们申请签证去香港，中国人通知我们他们的大使就要来新德里，我们应当和他谈判。在德里我会到尼赫鲁总理，通知他我们的代表团就要为维持西藏的独立和中国人谈判了。我们也提醒印度总理1904年的条约和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有一个义务现由印度政府继承，即西藏与外国的任何谈判，印度政府应当参加。我向总理解释，假如亚洲需要和平，西藏应当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缓冲国。我告诉他两个大国接境，难免发生磨擦。我強力劝告总理，不要只顾眼前的利益，而要看到未来。要看到支持西藏独立对印度安全的长远利益。这时中国大使袁仲贤来到印度首都，我和他谈了好几天，但都没有什么满意的结果。最后他要求我接受两点，然后到中国去签订协议。这两点是(1)中国应当处理有关西藏的国防事务，(2)西藏应当承认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通知中国大使我不同意他的提法，但我愿意转告我的政府。我打电报给拉萨我的政府，我立即得到复电要我不承认中国的建议。在我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个复信转给中国大使，中国武装部队突然从八个方面向东部西藏进攻。进攻的日子是铁虎年七月二十三日（1950年10月7日）。我把我收到的政府的答复通知中国大使，并请求他敦促中国政府把军队撤出西藏土地。

我们也通知了印度政府关于共产党在东藏的入侵。

在铁虎年十月十一日（1950年11月17日），春都给达赖喇嘛以全部权力。这时他只有十五岁，摄政打扎辞去了职位。几周后，在春都建议下，他去亚东，他指定罗桑扎喜和鲁康娃为司伦，来管理国家的事务。

在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前，青海的中国当局強迫达赖喇嘛的大哥图登诺尔布到拉萨去劝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接受中国对西藏的统治。他

们答应给他以报酬。诺尔布是亲眼看了几个月中国共产党人的残暴和扩张政策的，他抓住机会来到拉萨，警告达赖喇嘛要反对中国人强加于西藏的可怕的危险。后来诺尔布感到在西藏呆不下去了，他先去印度，然后从那里到了美国。

西藏政府争论西藏是一个主权的独立国家，是中国人破坏了它的领土完整。但是在1950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已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藏前进，把三百万藏族人民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巩固中国西部的国防"。这个声明是在中国军队已于10月7日侵入西藏以后，在西藏领导人的宣言中有如下的说明：

> 对我们西藏来说，"解放西藏"这句话从道德和精神的意义来讲完全是个骗局。一个自由人民的国家在解放的幌子下被入侵和占领了。到底是从谁和怎么解放的呢？一直到1950年中国人入侵以前，我们是一个有有能力的政府和人民满足的快乐的国家。

1950年10月26日，印度政府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使用武力，说入侵既不符合中国也不符合和平的利益。两天后，印度政府收到西藏政府的请求，要求印度帮助。同年11月6日，英国政府的外事付秘书戴维斯 E.Davies 向众议院提出申明，英国对中国人入侵和对西藏使用武力深表遗憾，并"完全支持印度政府所采取的立场"。

11月7日一份日期是铁虎年九月二十七日的呼吁书，由我于1950年11月11日从噶伦堡用电报发给联合国组织，西藏的噶厦和春都抗议中国人的入侵，他们称之为明目张胆的侵略，这份发向联合国的呼吁书部分内容如下：

> 为了把西藏并入共产党中国而入侵西藏，通过使用赤裸裸的

暴力。这是一个明显的侵略的事件。在西藏的人民被迫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违反他们的意愿。这是強国欺负弱国的最突出的例子。因此我们通过你们向世界各国呼吁，替我们制止中国的侵略。

萨尔瓦多正式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西藏的问题。但是在印度代表说明西藏。中国和印度可以找到一个相互有利的和平解决办法，无须联合国进行讨论后，大会程序委员会搁置了西藏的呼吁。虽然英国和西藏有良好的关系，并且把西藏当作主权国签订了条约——这是一种承认西藏独立的明显的标志——但是英国代表却说西藏的合法地位是不清楚的。这对西藏人是一个愤慨的失望，因为英国对西藏的情况是最熟悉的。

在英国外事付秘书在众议院发表声明三天后，印度付总理兼内政部长巴特尔 S.V. Patel 在新德里说"用刀来对付传统爱好和平的西藏人民是不公正的。在世界上没有国家像西藏那样爱好和平，中国政府没有依照印度的劝告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他们把军队开进西藏去，为了解释说什么有外国势力阴谋反对中国。这是没有根据的。

在同年11月14日，印度总统普拉沙德 R.Prasod 在印度议会讲话中说。

我的政府一直是遵循对我们伟大邻国中国实行友好的政策。我们深表遗憾，中国政府竟在西藏进行了军事行动，而和平谈判的道路是通着的。西藏不仅是印度的一个邻邦，我们之间有历史悠久的密切的文化和其它联系。因此印度有必要关切西藏发生的事情，希望能够保持这个和平国家的自治。

当1950年11月达赖喇嘛到达亚东后，噶厦立即打电报要我来，我来到亚东后，汇报了我在印度谈判的经过。由于联合国搁置了西藏问题，印度政府未能给予有效帮助。西藏政府指派扎萨索康苏巴

和大仲译曲批图丹到印度去，通过中国驻新德里大使来补救和共产党中国政府的关系。中国大使欢迎这个代表团，并劝告派一个相同的代表团到北京去。接着扎萨凯墨和大仲译土丹旦达由亚东派出前往北京。堪穷土登列门和仁细桑波色由拉萨派出到昌都，他们在这里和前被俘的昌都总督阿沛会合，然后一起去北京。

一朝落到中国人手中，西藏代表团就没有办法了，都成了中国压力下的猎获物，并成了制造所谓“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一个工具，一般称之为1951年5月23日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应当指出的是，西藏代表不许请示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在这些轻蔑和不遵守普通承认的国际法之外，中国人还复制了西藏的印，并强迫我们的代表用它盖签文件。

同时在亚东，达赖喇嘛还安排了一个释迦佛和他的弟子遗物的纪念会，这些遗物是从加尔各答印度菩提学会取来的，达赖喇嘛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欢迎和宗教仪式。有上千名佛教徒从印度、不丹、锡金聚集到这里，来向年轻的西藏佛教首领致敬。

1951年7月，新任命的西藏军政委员会首脑张经武将军到达亚东，他要求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在铁兔年的五月十七日（1951年7月24日）达赖喇嘛离开亚东。我陪伴他到帕里，然后得到西藏政府准许，留在印度。在铁兔年六月十三日（1951年8月17日）达赖喇嘛回到拉萨。9月9日在王其梅指挥下的几千名中国共产党部队到达拉萨。他们后面又跟着张国华和谭冠三率领的两万中国部队。

所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到达拉萨后，对西藏人民的压迫就开始了。中国人向西藏政府强迫索取修建营房的土地，此外还得供应他们的部队以大量粮食。结果稳定的西藏经济崩溃了。西藏物资缺乏，价格涨了好多倍。有历史以来第一遭拉萨人民被陷入饥饿的边沿。人民抗议

这些由中国人采行的不合理的措施。情况却是愈来愈糟。

两位西藏司伦鲁康娃和罗桑扎喜強力反对中国人处理西藏事务的办法，表示不赞同中国的政策。鲁康娃说，西藏无法满足中国需要的大量粮食，因为西藏的资源只能满足它自已的需求。他说他看不出任何道理要有大批中国军队驻在西藏。很明显，中国人的目的是政治统治，他们在建立了对西藏政府和国家的完全的物质控制以后，就能实现这一目标。对西藏资源不正当的榨取和对西藏人民的压迫把人民陷入饥饿的边沿。鲁康娃充满勇气和决心，指摘中国人自己违反了十七条协议，这是強加于西藏人的，因此提到那个协议的条款都是荒谬的。他公开要求撤走中国部队，这些部队非法占领了西藏。

西藏人民为了表达他们的苦楚，向西藏政府和张经武将军提了一个六点要求。中国当局指控两位司伦搞阴谋，他们是帝国主义代理人，在背后支持抗议运动。他们坚决要求达赖喇嘛免去鲁康娃，因为他阻挠了所谓的福利计划。他们警告说如果达赖不除去他，军队将会完成这一任务。

达赖被置于困难的地位。他说："我高度赞赏鲁康娃的对付中国人的勇气，但是我现在得决定是让他继续干下去还是再一次屈服于中国的要求"。他实在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满足中国人的要求，因为如果反对并触怒了中国当局，只能带来进一步的压迫和不满。在水龙年三月初二日，这两位司伦就辞职了。中国当局还迫使西藏政府把西藏人民的五名代表关起来，这些人是负责提出了六点要求的。

现在让我们谈谈班禅喇嘛。在班禅六世去世三年后，扎什伦布的官员在西藏政府的协助下班禅喇嘛的其它随从到西宁去开始找寻班禅喇嘛的转世。1944年扎什伦布的官员找到两个灵童，西宁的随从找到一个。西藏政府要求把三个孩子都接到扎什伦布寺进行传统的宗

教测验，以便选定真正的转世。但是西宁的随从要求政府肯定他们找到的灵童是班禅喇嘛，如果西藏政府同意这一请求，他们就把孩子接到西藏来。同时西宁的灵童已在塔尔寺出了家。西藏政府把从喀木接来的两个孩子也披剃出家，一个放在哲蚌寺，一个在扎什伦布寺。

几年过去了，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的国民政府开始给予财政援助，并没有确定承认西宁的灵童。但在西藏政府要求中国代表团离开拉萨时，国民政府于1949年8月10日派了一个代表到塔尔寺，没有进行通常的测验就正式承认西宁的灵童是班禅的转世。几星期后，青海省的首府西宁就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了。班禅当然也落到他们手中。国民政府撤到台湾、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也逃去。

不久，班禅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下被迫支持毛泽东和朱德的所谓解放西藏。1951年在签订十七条协议时，西藏代表团毫无办法只能承认西宁的这个孩子是班禅七世。应当指出西藏政府认为现在的班禅是第七世而班禅的随从则认为是第十世。分歧在头三世的转世算不算班禅的问题。

在两位司伦被迫辞职后，班禅喇嘛在大批中国共产党部队的护送下，于水龙年三月初四日（1952年4月28日）由西宁到达拉萨。在到布达拉宫朝见了达赖喇嘛后，继续前进回到扎什伦布寺。

这时候中国人开始修筑两条公路通到拉萨，一条从四川经喀木，另一条从兰州经西宁。在拉萨以北约九十英里的达木修建了飞机场。大批从中国来的劳改犯和从西藏雇佣的成千的工人从事修路工作。中国人公开许诺机场和公路都是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但是在完工以后，却从中国运来了大批军事物资，这标志中国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对西藏的独裁统治。

西藏政府通知中国人，他们将按照当地习惯和现在的情况继续进

行改革。西藏有条谚语是房子盖好了才能住进去，果子熟了才能吃。达赖喇嘛为此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叫来觉列孔 Legchos Lekhung 专门负责改革。这个委员会经常发现中国人阻挠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是要按照他们的办法进行改革。

1954年北京政府邀请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参加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西藏人民是非常反对达赖到中国去的，害怕被扣住不能回来。在人民的忧愁和哭泣声中，达赖只得于木马年五月十一日（1954年7月11日）前往北京。

到达北京后，他参加了人民代表大会，几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朱德付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达赖喇嘛在国庆日还会见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印度总理尼赫鲁也在那里，达赖喇嘛也会见了他。在所有这些场合，达赖被禁止自由谈话，他被带到中国各地参观，也回到他的塔尔寺附近的出生地。

在1955年3月回拉萨以前，北京政府提出设立一个"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这一动议好像是中国人要让从西藏各地来的代表参加中国人的事务了；但实际上，这些代表只有中国政府批准后才能担任，自然所选的都是他们的亲信。

在达赖喇嘛在中国期中，他和中国政府收到从西藏各地来的成千封信，要求他迅速安全返回。在回拉萨的途中，达赖喇嘛收到喀木各地的邀请，但他只能访问途中经过地区和寺院。像里塘乡城　和巴塘这些地方，他派他的付经师赤江任波清代表他去访问。仲任波清被派到鸦龙，噶玛巴任波清被派到德格和囊谦，都做为他的个人代表。

在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去中国时，他的哥哥嘉乐顿珠，堪穹罗桑坚参和我本人组织了一个"西藏社会福利委员会"（ Bod-Kyi Bde-don tshogs - pa ）。这个委员会寄了几封信给达

赖喇嘛和毛泽东主席，強调达赖喇嘛离开西藏是违反西藏人民的意愿的。委员会要求他迅速安全地返回拉萨。委员会也给尼赫鲁总理去了一封信，他正在准备去中国，要求他利用他的地位使达赖喇嘛早日返回。

1954年4月29日印度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了一个协议，被广泛称为潘查西拉 (Ponch Shila) 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简单说这一协议规定中国在印度设立商务代办，印度在西藏也设代办。它规定了两国可以进行贸易的地方，以及商人、香客和官员所走的路线。虽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进了西藏和印度的商务和文化交流，但西藏人却不是签订协议的一方。

印度政府全权代表赖加文 (N.Raghavan 于1954年4月29日在他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付部长章汉夫的信中，代表他的政府同意撤走驻在西藏亚东和江孜的军事卫队，在适当的价格下把印度占有的邮电台站等设备交与北京政府。

协议的第一条，印度可在亚东、江孜和噶大克设立商务代办处，中国可在新德里、加尔各答和噶伦堡设同样的办事处。由于协议中规定了互不干涉内政，中国人就可以在西藏搞各种暴行而不必考虑印度的感情。印度这下子把它在1904和1914年的条约权利都被剥夺了，这就是关于西藏问题的调解和与西藏政府直接谈判的权利。这项协议规定有效期为八年。由于目前的情况，协议没有重订，在1962年7月2日满期后，印度在西藏的商务代办处和中国在印度的相同机构都关闭了。

1954年7月，在西藏和不丹边界上的一个小湖叫聂如 (Nyero) 突然崩溃，它的供水在江孜、巴南木和日喀则造成很大的水灾，洪流吞没了好几百人，包括驻江孜的印度商务代办和他们的家属、职员。

年楚河沿岸的土地财产也受到损害。

1956年北京政府派付总理陈毅元帅到西藏主持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典礼。噶厦和所有政府官员都得去罗布林卡西北约一英里的几采卢定 Kidtsel Luding 去欢迎中国代表。拉萨的中国当局强调达赖喇嘛也应该到几采卢定去。政府官员和西藏人民提出强烈批评，但达赖同意去。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改善和中国人的关系，逐渐减少他们的颠覆活动。

火猴年三月初五日（1956年4月17日）陈毅元帅到达拉萨。一周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了。达赖喇嘛是主席，班禅喇嘛是第一付主席，张国华是第二付主席，阿沛·阿旺晋美是秘书长。委员会包括五十一名成员，但是只有十五名包括达赖在内代表西藏政府。主要寺院教派、社会团体、知名人士的代表有十一名。有十名代表是属于昌都解放委员会的。相同数目的代表为班禅喇嘛的委员会所占有，剩下的五名归中国人。筹委会分为十三个部门。在西藏的每个地区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地方办事处是由一名中国人和一名西藏官员共同管理。筹委会只执行中国当局已经决定的事情。西藏代表既不能提出新的建议，也不敢表示他们对中国人决定的不满。

达赖喇嘛自己说，

二十名成员虽然是西藏人，却是代表昌都解放委员会和班禅喇嘛的西部地区。这纯属中国人的安排。他们的代表全靠中国人的支持，翻过来他们又必须支持中国人提案，尽管如此，昌都的代表比班禅的代表行动要更合理些有这一批控制很严的选票，再加上五名中国成员。委员会无能为力——只是表面上有西藏的代表，背后所有实权都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实际上，一切根本政策都是由另一个叫作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决定的，这个机构

里并没有西藏成员。我们只不过准许讨论小问题，从不能作较大的改动。虽然我名义上是主席，我也毫无办法。有时看到这种严格控制的程序感到可笑。在另外一个委员会决定的计划拿到筹委会来空洞讨论一下就通过了。我在这些会上感到难堪。我想中国人使我当主席只是为了使他们的计划加上西藏当局的外貌。

1956年，印度正准备庆祝释迦牟尼诞生二千五百周年。这一年春天，锡金王太子，他是印度摩诃菩提学会的主席，他带着学会的信来到拉萨，邀请达赖喇嘛到印度参加这个纪念会。达赖喇嘛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在达赖要出发的日子近了时，拉萨的中国当局说他留在西藏的首府是必要的，筹委会有许多工作要做，在喀木和安多好几个地方发生了乱事，赤江任波清，达赖的付经师被派为代表准备到印度去。

由于这是一个重要的佛教集会，各大寺院的喇嘛和西藏人民都強烈表示达赖喇嘛应当去参加这个纪念会。另外尼赫鲁总理也劝告北京最好让达赖喇嘛到印度参加纪念会。中国当局最后允许达赖前往，并且安排了让班禅喇嘛陪伴他去。达赖喇嘛的两位经师和三名噶厦成员也随他去。在出发前，中国人没有忘记嘱咐达赖喇嘛怎么做和给他以发言稿。

除了有一天需要骑马跨过纳桂拉山口，达赖喇嘛一行，从拉萨到西里古里都是坐小汽车，在西里古里的巴格多格拉 Bagdogra 机场，乘上一架飞往德里的专机。1956年11月25日达赖喇嘛到达印度首都的巴兰机场 Palam 。在这里他受到印度付总统、总理、其它领导人和外国贵宾的欢迎。

达赖喇嘛出席了一个联合国文教委员会的会议，有一次他还发表了一个关于佛教从印度传到西藏和现况的讲话。丢开所有中国人的指

示和准备好的讲话。他说当全世界为和平祈祷时，却有小的独立国被強国和大国吞食的例子。他強调这是不应加以忽视的。

达赖喇嘛从新德里出发到印度各佛教圣地朝礼。他也参观了许多工业基地。从噶伦堡，嘉乐顿珠，堪穹罗桑坚参和我还有一些西藏社会福利委员会的成员，就和达赖一行一起旅行。我们和噶厦成员集会了很多次，告诉他们，我们听到中国人在喀木和安多強行改革，当地人民坚决反对这些改革。我们也听到中国人破坏十七条协议在那些地区杀死僧人和摧毁宗教机构，我们揭露了许多我们所听到的情况。然后问达赖一行这些情况是否属实，是否在卫藏也有发生这种暴行的危险。

有一个时期噶厦成员没有给我们以明确的答覆。有一天在有空闲的时候，他们把西藏比作放在大象脚下的鸡蛋，大象就是中国，鸡蛋的生命就靠大象的行动。我们问他们是否有把西藏从这种苦难中救出来的任何计划，但是官员们个个发愁，互相埋怨没有一个有这类的计划，能对我们说明在中国人统治下的西藏局势。

许多天里我们压他们抓住机会使达赖喇嘛留在印度，至少暂时不回去。在这时候可以和北京政府通过印度政府进行和平谈判。这样我们可以希望达到一个对西藏前途有利的解决。噶厦成员说，他们可以把这些建议向北京提出。我们不知道他们这样做了没有。但是很明显，达赖喇嘛早先已向尼赫鲁总理表示过“他愿意留在印度直到我们用和平方法争得我们的自由”。印度总理劝达赖回西藏去依靠十七条协议和中国人和平地工作。他答应对中国总理周恩来讨论此事，周也正要来印度，最后还是决定达赖喇嘛应该回到拉萨。

当达赖喇嘛在德里时，毛泽东主席于1957年2月公开声明西藏改革的时机还不成熟，西藏的共产党当局宣布改革推迟六年，

过了这一时期如果西藏人还不愿改革，改革还可以推迟十五年甚至五十年。拉萨中国当局也宣布要紧缩筹委会的机构。

在达赖喇嘛离开德里前，他个人邀请尼赫鲁总理访问西藏。后来西藏的事态使中国人撤销了这一邀请。

在离开印度的前夕，达赖喇嘛被请到噶伦堡，这是一个西藏商务中心，有不少西藏移民住在这里。中国人却不赞成这次访问，理由是在噶伦堡有国民党特务，达赖个人可能受到损害。但是达赖还是访问了噶伦堡，在不丹家作为觉尼多尔吉的客人住了一周。觉尼多尔吉是已故不丹首相计美多尔吉的母亲。

在噶伦堡，达赖喇嘛参加了许多宗教活动，向成群的人讲经和祝福，到锡金后再一次作为已故锡金王的客人。达赖在岗拖也举行了同样的宗教活动。他的回拉萨的行期，由于大雪而推迟。最后于火猴年十二月十一日带着他的随从向拉萨进发。1957年4月1日返抵拉萨。约在三周前，出于怕对班禅喇嘛和阿沛阿旺晋美有生命危险，中国人用飞机把他们送回拉萨去。

在印度时班禅喇嘛邀请达赖喇嘛访问扎什伦布寺。在回拉萨的途中班禅的一名高级代表又作了重新邀请。当达赖喇嘛和他的随从到达江孜时，他受到西藏政府主要官员的迎接，他们要求他在去扎什伦布前访问日喀则宗。日喀则宗是一个有历史重要性的地方，因为它是固始汗于1642年把达赖五世扶上宝座的地方，使他成为东起打箭炉，西抵拉达克边界，整个西藏的最高的权威。达赖喇嘛在日喀则宗住了三天，又到扎什伦布住了两天。

在拉萨，中国人完全无视他们早先所作的推迟改革的声明，恢复了全面的关于改革的宣传，借以使西藏人对改革有思想准备。西藏政府也按照人民的意愿制订了改革的计划。西藏政府完全认识到改变

的需要，但是愿意在和平和有秩序的方式下进行，免去強迫和社会紊乱。西藏政府向中国当局提出一些改革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不合中国人的计划，他们完全不理会他。

1959年6月20日，达赖喇嘛在印度的摩索里 Mussoorie 的一次招待新闻界的会上谈到改革时说，

"在这一点上，我愿意強调，我和我的政府从来不反对进行改革，改革在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方面都是必要的。我们不想掩盖我们是一个古老社会的事实，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必须立即进行改革。实际上，在过去九年，我和我的政府已经提出若干项改革，但是每一次这些措施都遭到中国人的坚决反对，甚至不顾普遍的要求，结果是对改善人民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什么也不能做。特别是我迫切希望对租佃制度进行刻不容缓的改革，大的庄园应当由政府备价征收，把土地分给耕种者。但是中国当局千方百计地阻挠这一合理改革的实行"。

1957年后，中国人从事于积极建立起他们的军事力量。这无疑表明他们在准备利用武力进行他们的改革，不管西藏人是否愿意照着他们计划办。

十九、反　叛

到1958年，喀木和安多地区的西藏人都上山打游击去了。中国人无情地用大炮轰击寺院城镇，到处发生种族灭绝的大屠杀。抵抗运动也不断扩大蔓延到西藏的其它地方。中国当局通知达赖喇嘛除非

他照着他们的政策办，他们就要把他当作宫塘喇嘛和夏甘丹嘉错 Gung Thang and Shar Kalden gyatso 这是两名著名的安多喇嘛。对达赖的这一警告是因为这两个喇嘛屡次反对中国人最后被关起来了。

同时，地方的藏文报纸1958年11月28日的甘孜日报登载着中国的宣传，以诽谤的言语斥责宗教，指控释迦牟尼是一个反动派。同样的谩骂也出现在西宁和打箭炉的地方报纸上。天复一天局势愈来愈严重。在拉萨，中国人宣布所有康巴人、安多娃和其它由东藏来住在拉萨、日喀则及其附近地区的人都必须返回原籍去。如不听从这一命令，这些人将被逮捕，強迫送返原籍。

这些东藏来的人，以阿珠宫保扎喜为首，公开到了山南叫作哲古的地方，在这里他们组织起一个几千人的队伍，他们和西藏各地的反抗运动的领袖联系。在哲古这一革命团体组成一支部队叫作达朗登松马喀 Danglang Tensung makhar 或义勇国防军。反抗不断增加，他们袭击中国的车队和军事营地。更多的人受不了中国人的压迫，都投到这个革命阵营，一起战斗，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者。就在这时候，在印度的西藏社会福利委员会才严重关切西藏的局势，深怕这个美丽的国土，它的宗教、人民和寺院受到摧毁，他们向世界上爱好自由的国家呼吁干预局势，导致这个国家实现和平。

在南部西藏，地方人民由于义勇国防军的增长受到一定的苦难，但是他们乐于负担军队的供应，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为西藏独立的斗争。有许多例子是中国部队化装成康巴人突然向地方人民进攻，造成极大的损失。这种残忍的政策为的是分化战士和地方人民，幸运的是地方人民完全能认清这些事情。

中国政策发生了变化，中国军队企图扑灭东部的叛乱，但是毫不

成功。相反他们的进攻造成更深的仇恨和反抗。中国人就坚持西藏政府应该派藏军去平息叛乱。西藏政府研究了这一问题，认为如果派西藏军队去消灭义勇国防军，那就是一个西藏人残杀西藏人的问题。这是再坏不过的事情了，根本不能考虑。另一可能是派去的西藏部队可能参加了革命军，结果造成更大的乱事，使西藏人民吃更多苦头。中国人已经威胁要使用重武装部队来平息叛乱，如西藏政府不采取行动的话。政府是不愿作任何行动的，但是最后决定由政府派代表到各革命据点，劝说这些游击战士和平地放下武器。这一计划是执行了，但代表们未能完成他们的使命。

同年，西藏人民希望尼赫鲁总理来进行访问。一位世界著名政治家的访问，无疑会帮助西藏的，因为这位印度总理可以亲眼看到这里的实际情况。他的出现甚至可能导致西藏人和中国人之间冲突的和平解决。当总理表示愿意在这一年进行访问，中国人则通知他这里的情况十分恶劣，他们无法保证他的安全。他们客气地要求总理无限期推迟他的访问。

到1958年底，西藏的抵抗运动力量大为增加，几乎控制了南部的所有地区和东部的许多地区。西藏政府想在对西藏有利的情况下和平解决冲突，发现机会已愈来愈少了，因为中国人在不断加強他们的兵力。西藏军队胜利的消息传到拉萨，鼓午了拉萨及其附近地区人民的爱国热情，但是在一切之上的是对达赖喇嘛个人安全的焦虑。

在1959年2月，在新年大法会期中，达赖喇嘛正通过他因明辩论的考试，中国当局邀请他去看演出。他们通知达赖喇嘛的卫队长说，达赖要不带卫队来军区。这是非常例外的。平常达赖喇嘛勿论到那里，总是有卫队跟随，军队沿途列队。政府官员讨论了中国人的要求，他们对这一邀请产生怀疑。消息传开了，说达赖喇嘛将访问中国

军区，拉萨的人民害怕他被共产党绑架而去。

予定达赖喇嘛要在3月10日访问军区，在这一天，约三万拉萨和附近的藏民包围了罗布林卡，企图保卫达赖喇嘛。西藏人民愤怒抗议并向中国人示威。这时西藏的紧急情况也传到印度，世界上的报纸都登载了西藏起事的消息。住在噶伦堡的几百西藏人不断打电报给尼赫鲁总理，请求印度为西藏的利益和人道主义进行干予。后来住在印度北部的西藏人派了一个代表团，以司伦鲁康娃为首，来到德里，会见了尼赫鲁总理和其它印度领导人，寻求他们的干予和帮助。在这时期里有许多事例，西藏人受到西藏悲惨消息的打击死去或发疯了。

在拉萨，一些西藏政府官员和群众的代表召开了紧急会议，宣布西藏不再根据十七条协议承认中国对西藏的权力。接着就发生了反对共产党政权的群众示威。自由的精神鼓午了人民。西藏军队穿中国制服的，都脱下来换上西藏服装。这时达赖喇嘛多次努力压低紧张气氛。他给中国将军谭冠三写信，不过是想安抚中国人，劝他们不要使用武力。这些信都是在紧急混乱中写的。

达赖喇嘛自己说，"我回答所有他们的来信是为争取时间——使双方的愤怒平静下来，使我有时间敦促拉萨人民缓和下来……我最紧迫的道义责任是防止我的手无寸铁的人民和中国军队发生灾难性的冲突"。

混乱和不安笼罩着拉萨，义勇国防军和游击战士切断了西藏南部所有中国人的交通。许多地区发生起事。拉萨人民的代表去见印度总领事请求干予。后来，成千的妇女和儿童聚集到印度和尼泊尔领事舘请求帮助。

西藏人聚集起来保护达赖喇嘛，寻找他们所能找到的武器，他们开始在罗布林卡外修筑工事。在1959年3月17日晚上，达赖喇嘛

化装逃向印度。中国人不知道他的逃走。当时达赖和他的一行就是经过中国军营房的。

在到达藏布江南岸后，达赖喇嘛就在游击战士的保证之下。听到了中国人解散了西藏政府，达赖喇嘛和他的一行，立即于1959年3月29日在玉甲隆子组织了一个新的临时政府，在他逃往印度的路上，到达错那后，达赖派了两个代表到印度去。这些人在曲塘木 Chuthongmu 附近的兼则马尼 Kanzeymane 到达印度的边境哨所，为达赖喇嘛和西藏难民请求政治避难。很快尼赫鲁总理就在洛克沙巴正式宣布印度政府给予达赖喇嘛政治避难。

4月18日，达赖一行到达提兹浦尔，他声明：

> 在3月17日，有两三发迫击炮弹朝罗布林卡方向射来，幸好都落在附近的水塘里。此后顾问们警惕到达赖喇嘛人身的危险。于是就考虑达赖喇嘛，他的家属和他的高级官员是否要离开拉萨的问题。

3月19日，在达赖从拉萨逃出两天后，中国人炮轰了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和拉萨其它战略要地。轰击继之以坦克和步兵的进攻。约有一万二千人被无情地杀死了，许多被俘虏。直到第三天后，中国人才知道达赖喇嘛逃走了，他们立即派军队和飞机去追寻，但是未能找到逃走的这一行。没有好久，成千的西藏难民，在非常可怜的状态下开始涌入印度和其它邻邦。

到达印度后，达赖喇嘛受到热烈欢迎。许多世界的领导人都给他写信，对悲剧事件表示同情，并高兴他安全到达印度。在他完成了艰苦的逃向自由的历程后，达赖喇嘛和他的随从定居在穆苏里 Mussoorie， 这里是印度北部山区的一个避暑胜地。从世界各地来的新闻记者聚集到穆苏里，来听达赖喇嘛说什么，但是为了希望和

中国政府实行和平谈判。达赖喇嘛有几个月没有对新闻界发表声明。

4月24日尼赫鲁总理在穆苏里会见了达赖喇嘛。然后在5月30日西藏独立的印度支持者在加尔各答召集了一个大会，由 Sarrodaya 领导人纳腊扬 J.Narayan 主持。大会通过一个决议，同意设立一个亚非委员会。Afro - Asian Committee 帮助提倡同情西藏的舆论。

6月20日，达赖第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他清楚地说明他希望的一种为他的国家争取的政治地位。他说："我和我的政府完全欢迎对目前的悲剧有一个和平的和满意的解决，只要这种解决保证实现1950年以前西藏所享有并执行的不受任何干涉的权力"。

在穆苏里，达赖喇嘛的官员召集了一个会，决定对西藏难民解决救济和福利的问题。我被派为达赖喇嘛驻新德里的代表，去照顾日益增长的难民救济和安置问题。设立了一个中央救济委员会来协调来自各方和各外国政府的援助。印度政府在适当地区建立移民村给予了巨大的协助。

几个月后，达赖喇嘛访问了德里，会晤了印度政府的首脑和各外国的显要人物。这时候向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可能性进行了讨论。达赖喇嘛在1959年9月5日在德里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说："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理会从印度政府得到的劝告，我们已决定向联合国呼吁。我们希望也是我们的信心不论呼吁的结果如何，真理和人道主义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不久以后，马来亚联邦和爱尔兰共和国提出把西藏问题列入第十四届联合国大会的议程中去。达赖喇嘛指定他的哥哥嘉乐顿珠、任清三都仓和我代表西藏，为西藏问题寻求支持。在10月9日在共产党集团的热烈的反对下，联合国大会的总程序委员会辨论西藏问题是否

要包括在大会的讨论范围之内。到10月中大会考虑了总程序委员会西藏问题应当讨论的建议交付表决，结果以四十五票赞成，九票反对二十六票弃权而通过。哥斯达黎加的票后来被算为赞成。这一决议没有任何地方提到共产党中国人对西藏的入侵和占领，它只说：

"注意到西藏人民有独特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他们也传统地享受着自治……〔大会〕1，肯定它的信仰尊重宪章的原则和关于人权的宣言在法律的基础上发展一个和平的世界是十分必要的，2，提请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他们的特殊的文化和宗教生活。

结　束　语

西藏的历史的和政治的发展清楚表明它是一个主权国家，享有谈判条约和它的邻邦建立直接关系的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藏曾提出要派兵加入英国一方战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保持中立，不顾英国、中国和美国联合施加压力，要求允许军事物资通过西藏运往中国。仅仅这些就足以证明西藏控制它自己的事务，勿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西藏有它自己的国防军，甚至派到外国去受军事训练。它有自己的邮票和钱币，和邻邦有直接贸易关系。西藏代表参加了在新德里召开的第一次泛亚洲会议，带着足以象征西藏独立的自己的国旗。最重要的是西藏代表用自己的护照走遍了全世界，美国英国和其它各国，都当作合法文件接受它。最后在1960年国际法律学家协会关于西藏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这样说：

委员会的意见是，西藏最少是个实际上的独立国。当1951年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时候，1959年西藏政府废除了这一协议是完全有道理的……从1913年—1950年西藏所表现的国家的状况，在国际法上一般是可以接受的。

具有这些明显的主权，为什么西藏不能防御共产党中国的入侵和对它独立的破坏？

西藏危机的一些主要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1.世界上不知道西藏独立的历史证据。

2.世界上不太清楚喇嘛与施主关系的真正性质，如萨迦喇嘛与蒙古汗和后来的达赖喇嘛与满洲皇帝之间的关系。

3.是印度英国政府和中国满洲皇室的政策使西藏孤立于世界之外，使中国有办法描绘一个西藏国际地位的假象，阻止西藏表示它的政治独立。

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邻邦印度脱离英国而独立。印度埋头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对巴基斯坦的不断的冲突，就不去看西藏发生了什么。巴基斯坦倒向西方寻求友谊和支持，印度追求不结盟政策，对共产党中国交了朋友。这就造成了印度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执行软弱的政策，这就给中国借口把西藏从外国帝国主义下解放出来，轻易地侵入西藏铺平道路。只要中国共产党人留在西藏邻接的独立国家就不会有和平与安全，这一事实已由1962年10月中国入侵印度而清楚表明。

很难予言西藏的未来，依据历史观点和真理最后要胜利的信仰，西藏最终会重新得到独立。西藏人民苦难深重，对一个如此爱好和平的西藏和西藏人民粗暴的压迫，震惊和唤醒了世界上的自由国家。西藏人在他们自己国土里，处于经常的恐怖中，尽管他们是向往自由的，

他们的这种愿望在中国共产党权力重压下是无法表达的。

是那些成千上万在印度和其它国家避难的人必须负起保存他们的信条和他们的宗教和文化。在真理的光辉和达赖喇嘛的正确领导下完成这个任务。难民的苦难应使大家觉醒。在他们之间需要团结和教育的重要。西藏人的斗志比任何时候都高，但仅此并不能获得自由。重要的是要使世界经常注意西藏问题。西藏要争取联合国的爱好自由国家更多的支持。甚至前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也呼吁解放所有殖民地人民。事实表明西藏现在成了殖民地国家了。因此西藏也盼望从俄国得到支持。

中国人民总的来说是无可责备的。西藏的暴行是共产党中国的少数政治领导人所犯的。权力必须小心使用。滥用权力在现时代是一种罪恶。中国人并不是西藏的主子。有一个微弱的可能性，也许有朝一日，中国把西藏还给西藏人，就象今天许多国家从原来被统治下获得独立一样。也有可能像中国共产党人曾允许过的，他们在发展了这个国家后把它交给西藏人而他们离去。无论如何实现这些可能性都是很遥远的，在目前情况下可能性也是很少的。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到新独立的国家闹起内部纠纷，有些是出于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些简单就是权力地位之争。我们也看到国家分裂成势不两立的敌人。印、巴的分裂、南北朝鲜、南北越南和刚果都是这些可悲的例子，西藏人必须从这些政治分裂中吸取教训。

西藏人不能永远保持地方主义和教派主义。他们不应当考虑自己是从卫、藏、喀木、安多来的，而首先应当意识到他们都是西藏人。他们应当很好地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保卫自已的权利，他们必须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实现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而斗争。

附 录（略）

（一） 拉达克文议定书，1842年。

（二） 西藏文议定书，1842年。

（三） 西藏——拉达克通商协定，1853年。

（四） 达赖喇嘛〔十四世〕光临印度新德里关于佛教对艺术、文学和哲学方面的贡献的讨论会上的演说词，1956年11月29日。

藏 语 词 汇

Amban　安班　从1728—1912年驻在拉萨的帝国官员，作为满洲皇帝的主要代表。这种职位只能由高级满蒙官员担任。

Amdo　安多　西藏对东北部藏族地区的称谓，这地区从1928年起成为中国的青海省。

Bande　班第　早期王朝佛教僧人大臣的称号。

Chang　酸　一种用发酵的青稞酿制的西藏啤酒。

Spyi - skyabs mkhan - po　基恰堪布　西藏政府中僧官系统的主要大臣，英语中一般称为 Lord Chamberlain 宫廷大臣或总管。

Chol - kha-sum　曲卡松　藏族地区的三个主要区域，包括阿里三围（部）、卫藏和多喀木。

Cos- rgyal　曲结　'教法之王'，早期崇佛国王的称号。

Chu　曲　河流。

Mad - dpon　代本　军队的将军。

Mad - khams　多喀木　东部和东北部的藏族地区，包括多堆 Dotod （喀木 Khams ）和多美 Domed （安多 Amdo ）。

Dotsed　多折　一种币制的单位，相当于50两，1950年时相当于10卢比（汉译为'平'或'品'）。

Bri　只　母牦牛，英语中称为yak，但在藏语中只有公牦牛称为 yak 。

Rdzong　宗　西藏政府地方行政单位的名称。它同时也是指这些行政单位所在碉堡式建筑。

Rdzong-dpon　宗本　宗的行政者的称号。

Dge - slong　格隆　受了佛教完全戒的僧人的称号。

Dge - lugs - pa　格鲁巴　改革过的正统黄帽派的名称，它以达赖喇嘛为首。

Dge - tshul　格楚　一种学僧，他只受了佛教的初级戒。

Dgon - pa　贡巴　对寺院或尼姑庵的一般称谓。

Bka'-rgyud - pa　噶举巴　由译师马尔巴（1012—97）和弟子们在西藏创立的半改革教派。

Bka' - blon　噶伦　大臣的称号（也称为辖倍 Shab - Pe ）属于政府会议（噶厦 Kashang ）。

Karma　噶尔马　早先银币最小的单位（汉译为“分”）。

Karma - pa　噶玛巴　噶举派一个支派的名称，十二世纪时创立于楚浦寺（Mtshur - Phu ）。

Khal　噶厦　西藏政府的行政会议。由四位大臣（噶伦）组成。

Khal　克　一种量的单位，一克约等于32磅。

Khams　喀木　西藏东部省份的名称。

Kha - btags　哈达　用白丝或棉织的一种仪式上用的围巾。

la　拉　山口。

Mnga'-ris - skor - gsum　阿里三围　西藏西部省份的名称。

Ning - ma - pa　宁莫巴　未改革教派的名称，它遵

循入世纪印度人莲华生所传教法。

Bon　本　佛教传入前，西藏萨满教的名称。

Ri - khrod　日错　一个小的寺院或隐处。

Sa - skya - Pa　萨迦巴　一个半改革的教派，得名于中部西藏一个寺院所在村落。在蒙古皇帝统治中国时它在政治上居统治地位。

Sang　桑　一种纸币，额面有5、10、25和100桑，1950年的价值是5桑等于1卢比（汉译为“两”）。

Sang - gang　桑刚　前发行的一种钱币等于10学刚

Sho-gang　（汉译为两）。

Shab - Pe　辖倍　政府会议大臣的称号（噶伦的别称）。

Sho - gang　学刚　一种钱币相当于10噶尔（分）。

Srid blon　司伦　总理大臣的称号。

Tamka　章噶　一种钱币1950年时相当于4桑。

Tishri　帝师　中文帝师意为“皇帝的师付”蒙古皇帝宗教师付的称号。

Khri - skor　万戶　早先的一种行政单位，理论上包括一万戶人家。

Trung - yik Chen - Po　仲译钦莫　这个会议包括四名僧官。

Gtsang　藏　中部两省中的西部的省，合称为卫藏其主要城市为日喀则。

Tsekhang　孜康　财政部门。

Tse - pon　孜本　财政大臣的称号。

Tsi - pa　孜巴　天文学家，算卦者。

Mtsho 错 湖。

Tshogs 'du 春都 国民大会，由僧俗高级官员及各大寺代表组成。

Dbus 卫 中部两省的东部省，合称为卫藏，首都拉萨就在这里。

书　　目

（一）藏文资料

觉尼（Bcu - gnyis ）贡噶坚参著，《Ngo - mtshar mdzad - pa bcu - gnyis 》达赖一世根敦珠巴传记。

比都尔（Bee - dur ）第西桑结嘉错著，《Bee-durya Ser - po》关于格鲁派的叙述（汉译为《黄琉璃》）。

噶钦（Bka' - chems ）《Bka' - Chems Ka - khol - ma》松赞干布遗训，是一个得尔马 gter-ma （藏于石室的书）它由阿底峡发现而为世所知。

噶厦（Bka' - shag ）噶厦档案（一种条约和协议的集子）。

噶塘（Bka' - thang ）Pad - ma bka'- thang （一种关于莲华生和桑鸢寺的记载。

赛路（Bse - ru ）绛求坚参著《Rlangs Pusti Bse -ru 》朗氏家传。

霞扎（Bshad - sgra ）霞扎文件（保存于贡噶乃沙尔庄园。Gong - dkar gnas - qsar gzhis - ka ）。

哲均（'Bras - ljong ）'Bras - ljong rggalrabs （锡金史）。

朱记（'Brug — gi ）'Brug - gi rgyal - rabs （不丹史）。

布敦（Bu - ston ）布敦仁清主，《Bsung - rab rin - po - che mdzod》（西藏佛教及教派史）。

清波伙译（Chenpo Horyi ）绛央格西。

Gser-gyi deb - ther 》早期蒙古史。

曲季津（Chos -kyi - sprin ）曼殊室利弥达拉，
Man -dzu shri mitra ：《Chos kyi
Sprin - chen - po'i dbyangs 》朱巴阿旺那介传记。

曲达（Chu - rta ）Chu - rta Bka'- shaq mgron - deb
dbang-shel me-long 水马年1822，噶厦日记。

达甲（'Dab - brgya ）班禅罗桑意希《Dad - pa'i
'dab-brqya bzhad-par byed pai nyi-ma》普觉 Phur-lcog
阿旺江巴传记。

当协（Dangs - shel ）Sgo-mang mtshan-zhabs ngaq-dbang
blo - bzang ：《Dangs-shel me-long 》达赖十二世
钦来嘉错传记。

达尔罕（ Dar -han ）Dar-han mkhan sprul Blo-bzang'
phrin-las rnam-rqyal:《Ngo-mtshar nor-bu'i phreng-
…》达赖十世楚才嘉错传记史

白史（Deb - dkar）Dge-'dun Chos-'phel:《Deb-ther
dkar - Po 》藏王松赞干布和弃松德赞简史。

红史（ Deb -dmar ）Tshal - pa Kun-dga' rdo-rje:
《 Deb -ther dmar - po 》西藏早期国王史。

青史（Deb -sngon）'Gos-lo Gzhon-nu-dpal:
《Deb-ther Sngon-Po 》西藏佛教史。

喜筵（Dga'-ston ）Dpa'-bo gtsug-lag Phengs-ba《 Mkhas-
pa'i dga' - ston 》西藏佛教史。

米布（ Dmigs-bu ）Bka'-drung Nor-nang:
《Deb-ther long-ba'i dmiqs-bu 》达赖喇嘛及摄政

印谱。

拔桑（Dpag-bsam ）Sum-pa mkhan-po Ye-shes dpal-'byor:《Dpag-bsam ljon-bzang 》西藏宗教史。

东若（Gdung-rbas ）Bsod-nams qrags-pa rqyal-mtshan ：《 Sa-skya'i gdung-rabs rin-chen bang-mdzod 》（萨迦史）。

林布（Gling - bu ）Thub-bstan chos-phel rgya-mtsho:《Ngo-mtshal qtam-qyi qling-bu》十万颂'Bum 目录。

果桑（Gos-bzang ）《 Du-ku-la'i gos-bzang 》（卷1—3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错自传，卷4—6第西桑结嘉错所著达赖五世传）。

柱塔（Grub-mtha' ）土观 chos-kyi nyi-ma:《Grub-mtha' Shel-gyi me-long 》西藏教派的研究。

色栋（Gser - sdong ）第西桑结嘉错：《 Gser - sdong' dzam-gling rgyan-gcig dkar-chag》（达赖五世金塔内藏名册）。

嘉木样（'Jam - dbyangs）班禅锁南扎巴 《'Jam-dbyangs Chos-rje bkra-shis dpal-ldan-gyi rnam-thar （嘉木样曲结扎喜班丹传记。

居俄（ 'Jug -ngogs ）Mkhas-grub dge-legs dpal-bzang:《Dad - pa'i 'jug-ngogs》宗喀巴传。

噶协（Ka - bshad）Ser-khang Nang-pa'i Phyag-drung:《 Ka - bshad 》关于柴赫鹏远征拉萨的藏文记载。

康萨（ Khang -gsar ）《扎喜康萨笔记》。

拉达克（La - dags）《La - daqs rgyal - rabs》（拉达克史）。

明译（Lam - yig）纳错译师 Nag-mtsho Lo-tsa-ba:《Rnam - thar rgyas-pa》此书也称 Lam - yig（系阿底峡访问西藏的记录）。

章嘉（Lcang-skya）章嘉呼图克图。《Dad-painyi-ma》（达赖七世格桑嘉错传）。

额巴（Lnga - pa）第西桑结嘉错。《Lnga-pa drug-par 'Phosnat gtam》（关于达赖六世仓养嘉错的记载。）

洛齐（Lo-tshig）嘉木样协巴。《Lo-tshig gser-gyi nyi - ma》（关于著名喇嘛及寺院的历史）。

玛尼（Ma - ni）Ma - ni Bka - 'bum（关于松赞干布统治的记载）这是一部"得尔马" gter - ma 由桂妥欧珠 Grub - thob dngos-grub 发现。

多喀（Mdo - mkhar）《Mdo - mkhar zhabs-drung tsherin dbang - rgyal rtog-brjod》这是一部多喀娃的传记。

泽金（Mdzes rgyan）Dge - slong spyin - pa:《'Dzam - gling mdzes-rgyan》班禅四世传记。

美隆（Me - long）萨迦锁南坚参。《Rgyal -rub gsal-ba'i me - long》西藏史。（汉译本称《藏王世系明鉴》）。

米王（Mi - dbang）Mdo - mkhar zhabs - drung:《Tshe - rin dbang - rgyal mi-dbang rtog-brjod》（米王锁南多结传，即颇罗乃传）。

错恩（Mtsho - sngon）Sum - pa mkhan - po ye-

Shes dpal - 'byor ：《 Mtsho - Sngon lo-rgyus tshang-glu gsar-Snyan 》关于青海地区的历史。

诺尔布（ Nor - bu ）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错，《 Nor -bu'i 'phreng ba》（四世达赖云丹嘉错传）。

宁鉴（ Nyin - 'byed ）Kun - mkhyen Pad-ma dkar- Po:《 Thob-bstan Pad-ma rqyas-pa'i Nyin -'byed》西藏宗教史。

乌赛（ 'Od - zer ）《 Nyi - ma'i 'od-zer 》关于班禅三世班丹意希的无名传记。

白嘎（ Pad -dkar ）Phur-lcog Ngag-dbang byams-pa:《 Pad - dkar 'phreng - ba 》西藏大寺院史。

白采（Pad - tshal）Yongs-'dzin lho-pa Blo-bzang bstan - 'dzin ，：《 Dad-pa'i Pad-tshal bzhad-pa'i nyin-'byed 》（班禅五世丹贝王徐传）。

班禅（ Pan - Chen ）班禅罗桑意希，《'Od-dkar Can-gyi 'Phreng - ba 班禅罗桑意希自传。

称瓦（ 'Phreng -ba ）班禅意希孜茂：《 Ngo-mtshar nor-bu'i 'phreng-ba （达赖一世传记）。

普乔（Phug-lcog ）Phur-lcog yongs-'dzin byamspa tshul - khrims ：《 Rin-po-che'i 'phrengba 》达赖十三世传记。

若赛（ Rab - gsal ）第西桑结嘉错，《 Rab-gsal gser-gyi Snye - ma 》（达赖六世仓养嘉错传）。

多仁（ Rdo -ring ） Bka'-blon bstan-'dzin dpal-'byor vdo-ring （ Dga'- bzhi ）

《 Zol-med Gtam-gyi Rol-mo 》噶伦多仁自传。

佐丹（Rdzogs-ldan ）达赖五世罗桑嘉错，《Rdzogs-ldan gzhon-nu'i dga'-ston 》西藏史。

囊塔（Rnam-thar）Dga'-chen ye-shes rgyal-mtshan:《lam-rim bla-ma-ma rgyud-pai rnam-thar thub-bstan mdzes - rgyan》（著名黄教喇嘛传记集）。

若莫（Rol - mo）Dar - han mkhan-sprul blo-bzang 'Phrin-las rnam-rgyal:《Ngo-mtshar lha'i rol-mo》达赖十一世克珠嘉错传。

沙东（Sa - 'brug ） 土龙年1808年噶厦日记。

巴协（Sba - bzhed ）Sba Gsal- Snang ，《Sba-bzhed》赞普弃松德赞时的宗教史。

协扎（Shel - brag ）Bka'- thang shel - brag 莲华生及桑鸢寺的记载。

新柱（Shing - 'brug ）

木龙年1844年噶厦日记。

新达（Shing - rta ）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错，《Dngos-grub shing - rta （达赖三世锁南嘉错传）。

西姆拉（Simla ）西姆拉会议西藏文书（由噶伦池门保存）。

赖龙（Sle - lung）《Sle - lung rje-drung blo-bzang 'phrin -las》赖龙自传。

局楚（Spyod - tshul ）班禅罗桑曲坚，《Rang-gi Spyod-tshul qsal-ba' ston-pa 》（班禅一世自传）。

汤东（Thang -stong ）'Gyur-med bde-chen:

《 Nor - bu'i me - long 》大圣者汤东结布传记。

吐介(Thugs-rje) Kun - mkhyen Pad-ma dkar-po:
《 Thugs-rje chen-Po'i zlos-gal- 》(白马噶波
自传)。

央金(Yangs - rgyan) Nag-shod bla-ma bstan-'dzin
shes - rab :《 'Dzam-qling tha-gru yangs-pa'i rqyan
达赖八世降白嘉错传。

意措(Yid-'Phrod) Rgyud-smad dbu-mdzad 'jam-dpal
tshul-khrims dang Bde-yangs rab-'byams Skal-
bzang:《 Dad-pa'i yid-'phrod》《达赖九世龙多嘉错传》。

义仓(Yiq - tshang) 《 Stag-Sna'i yig-tshang mkhaspa
dga' - byed 》萨迦简史作者不明。

达瓦(Zla - ba) 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错, 《 Zla-ba'bum-
phrag 'chad-ba'i rdzing-bu 》达赖五世遗训。

(二)西文资料

Western Sources

Ahmed, Zahiruddin, China and Tibet, 1708-1959, Oxford, 1960.

Aitchison, Sir Charles, A Collection of Treaties, Engagements, and Sanads relating to India and Neighbouring Countries,

Vols. 12 and 14, Calcutta, 1929-31.

Aoki, Bunkyo, Study on Early Tibetan Chronicles, Tokyo, 1955.

J. Bacot, F.W. Thomas, and Ch. Toussaint, 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a l'Histoire du Tibet, Paris, 1946.

Barthold, W., Encylopedia of Islam, 4 (S-Z) Leiden, 1913- 36.

Bell, Charles, Portrait of the Dalai Lama, London, 1946.

——, Tibet: Past and Present, Oxford, 1924.

Bretschneider, E., On the Knowledge possessed by the Ancient Chinese of the Arabs, London, 1871.

Bushell, S. W., "The Early History of Tibet from Chinese Sources," JRAS, New Series, 12 (1880), 435-541.

Cutting, Suydam, The Fire Ox and Otber Years, New York, 1940.

Dalai Lama (14th), My Land and My people, New York, 1962.

Dalai Lama and India, A.V. Rau, ed., New Delhi, 1959.

Das, Sarat Chandra, "Contributions on the Religion,

History,etc., of Tibet," JASB,51-1(1882), 1-75.

——, Jour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 London,1902.

——, "The Monasteries of Tibet," JASB, New Series, I (April 1905).

——,"A Short History of the House of Phagdu, which ruled over Tibet on the decline of Sakya till 1432 A.D.. . . ." JASB, New Series, I (August 1905) .

Dodwell, H. H., ed., Tb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6, Cambridge, 1932.

Eliot, Charles, Hinduism and Buddhism 3 vols., London, 1954.

Fillipo de Filippi, Editor, An Account of Tibet: the Travels of Ippolito Desideri, London, 1932.

Fisher, Margaret, Leo Rose, and Robert Huttenback Himalayan Battleground, New York, 1963.

Francke, A.H.,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Tibetan Text, 2, Calcutta, 1926.

Frankfurter, Oscar, "Narratives of the Revolutions which took place in Siam in 1688," Siam Society, V-4 (Bangkok, 1908), 5 - 38.

Haarh, Erik, "The Identity of Tsu-chih-chien, the Tibetan 'King' who died in 804 AD," Acta Orientalia, 25, 1-2 (1963), 121-70.

Hitti, Philip K., History of the Arabs, London 1956.

Hoffmann, Helmut, "Die Qarlug in der Tibetischen Literatur," Oriens, 3 (Leiden, 1950), 190 - 208.

——, The Religions of Tibet, New York, 1961.

Holdich, Sir Thomas H., Tibet, The Mysterious, New York, 1906.

Howorth, Henry 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9th Century, London, 1876.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Geneva, 1960.

Kawaguchi, Ekai, Three Years in Tibet, London, 1909.

Li Fang-kuei, "The Inscription of the Sino- Tibetan Treaty of 821-822," T'oung Pao, 44, 1-3 (1956), I-99.

Li Tieh-tseng, Tibet: Today and Yesterday, New York, 1960.

Ling Nai-min, Tibetan Sourcebook, Hong Kong, 1964.

Ludwig, Ernest, Visit of the Teshoo Lama to Peking (Ch'ien Lung's Inscription), Peking, 1904.

Macdonald, David, The Land of the Lama, London, 1929.

—— , Twenty Years in Tibet, London, 1932.

Markham, Clements R., Narratives of the Mission of George Bogle to Tibet and of the Journey of Thomas Manning to Lhasa, London, 1879.

Martin, Desmond, The Rise of Chingis Khan and His Conquest of North China, Baltimore, 1950.

Papers relating to Tibet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is Majesty), London Cd. 1920 (1904), Cd. 2054 (1904), Cd. 2370 (1905).

Pelliot, Paul, Histoire Ancienne du Tibet, Paris ,

1961.

Petech, Luciano, 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Leiden, 1950.

——, A Study on the Chronicles of Ladakh, Calcutta, 1939.

Report of the Officials of the Governments of Indi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Boundary Questio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February 1961).

Richardson, Hugh E., "The Karma-pa Sect. A Historical Note," JRAS (October 1958), 139 - 64.

——, A Short History of Tibet, New York, 1962.

Rockhill, W.W., The Dalai Lamas of Lhasa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Manchu Emperors of China, Leyden, 1910.

Roerich, George N., The Blue Annals, 2 vols., Calcutta, 1953.

——, Trails to Inmost Asia, New Haven, 1931.

Sandberg, Graham, The Exploration of Tibet, Calcutta, 1904.

Sen, Chanakya, Tibet Disappears, Bombay, 1960.

Shen, Tsung-lien and Liu, Shen-chi, Tibet and the Tibetans, Palo Alto, 1953.

Smith, Vincent A., The Early History of India from 600 B.C. to the Muhammadan Conquest, Oxford, 1904.

Stein, R.A., Une Chronique Ancienne de bsam-yas: sBa-

bžed, Paris, 1961.

Teichman, Eric, 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Eastern Tibet, Cambridge, 1922.

Tucci Giuseppe, "The symbolism of the Temples of Bsam-yas," East and West, VI-4 (Rome,1956), 279-8I.

——— , "The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 Serie Orientale Roma, I, Rome, 1950.

———, Tibetan Painted Scrolls, 3 vols., Rome, 1949.

Williams, E. T., Tibet and Her Neighbors, Berkeley, 1937.

Wood, W.A., A History of Siam from the Earlist Times to the Year A.D. 1781, London, 1926.

Wylie, Turrell, "A Standard System of Tibetan Transcript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22 (December 1959), 261-67.

Vira, Raghu, Tibet: A Souvenir, New Delhi, 1960.

Younghusband, Sir Francis, India and Tibet,London, 1910.

Yu Dawchyuan, "Love Songs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Series A,No. 5, Peking, 1930.

译　者　的　话

这部书的作者夏格巴是达赖叛国集团的头目之一，也是著名的民族分裂主义者和亲帝分子。这部书就是为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而找寻历史依据的。他力图把西藏地方说成是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国"，祖国与西藏的关系只是"施主"与"僧侣"的关系。元、清两代中央对西藏的直接统治被说成是西藏与蒙古族和满族的关系。他按照这一意图有选择地利用史料，肆意歪曲，全书充满了谬论，是一部典型的反面教材。

夏格巴名汪秋德丹（1907—　　），出身于西藏的大贵族。他的叔父在十三世达赖时任喇嘛噶伦。他的另一个叔父是十三世达赖时的噶伦池门，曾随伦钦夏扎参加过西姆拉会议，也是一个亲帝分子。到热振活佛任摄政时，他仍继续任噶伦，曾和一些贵族中的亲帝分子勾结，把十三世达赖的侄子司伦朗敦·贡噶旺秋赶下台，后被热振免职。

夏格巴以"色那巴"（贵公子）的身份，十几岁就在噶厦任噶仲（秘书），这是大贵族子弟最好的进身之阶，因为任噶仲可以得到极好的统治术训练，并且可以接触到西藏地方政府的文书档案。由于他有显要的亲属支持，很快就得到提升，不到三十岁就担任了孜本。孜本是地位仅次于噶伦的俗官职位，主管西藏地方政府的财赋兼管俗官即"仲科尔"的训练和任用。在这个岗位上，他也可以随时接触到西藏地方政府的文书档案。他任孜本一职长达十年以上，一直到和平解放西藏的前夕。1950年，夏格巴逃赴印度的噶伦堡，他在国外活动，也利用孜本的身份，如发表文章和写书，都用孜本·夏格巴这一名称（前者为官名，后者为家名），而不用个人名字。

夏格巴逃赴印度时，带去大批噶厦政府的文书档案，其中一部分是他家所藏的。西藏贵族都有收藏文书档案的习惯，有的还编写家史，一代一代地继续下去。夏格巴就是利用这些资料，也利用了不少外国的资料，在噶伦堡编写《西藏政治史》，用藏文写稿，并由其子译为英文，在美国耶鲁大学出版。这部书唯一可取之处就是利用了噶厦的大量档案材料和个人经历的叙述，这些材料，外面是很难得到的。但是，他在利用时也竭尽歪曲之能事，我们阅读时，一定要进行分析批判。

从外文刊物的报导中，得知最近他又重编了一部详本《西藏政治史》，仍用藏文写成，据说内容三倍于此书，特点是引用了大批原始档案材料，藏文版已在印度出售，英译本尚未问世。

当1947年夏格巴率"西藏商务代表团"出国时，他是第一个使用噶厦政府擅自发给的"护照"访问外国的，他想造成一种既成事实证明西藏是"独立"的，他把使用过的护照签证的照片附于书尾，但这些伎俩都是徒劳的，违反了民族利益，投靠了外国，并没有能挽救了旧制度的灭亡。他的这部《西藏政治史》，正好是他分裂祖国西藏的最有力的罪证！

译　者

1978年12月1日

